《中国体育通史》
总主编　崔乐泉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体育通史

ZHONG GUO TI YU TONG SHI

第五卷

主编　傅砚农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国体育通史

第五卷

ISBN 978-7-5009-3297-0
9 787500 932970 >
定价：35.00 元

责任编辑 丛明礼
封面设计 刘 泉

《中国体育通史》
总主编 崔乐泉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体育通史

ZHONG GUO TI YU TONG SHI

第五卷（1949-1979年）

主　　编　傅砚农
编写人员　傅砚农
　　　　　邓星华
　　　　　陈　彦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体育通史. 第五卷，1949—1979年 / 傅砚农主编.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ISBN 978-7-5009-3297-0

Ⅰ. 中…　Ⅱ. 傅…　Ⅲ. 体育运动史-中国-1949—1979
Ⅳ. G8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2572 号

*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

880×1230　32开本　14.5印张　388千字　插页6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ISBN 978-7-5009-3297-0
本册定价：35.00元　全套定价：280.00元

社址：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8号(天坛公园东门)
电话：67151482(发行部)　　邮编：100061
传真：67151483　　邮购：67143708

毛泽东畅游长江；1952 年，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全国代表大会题词





1952 年 6 月 20 — 24 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团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 15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图为大会组委会在奥运村为中国队举行升旗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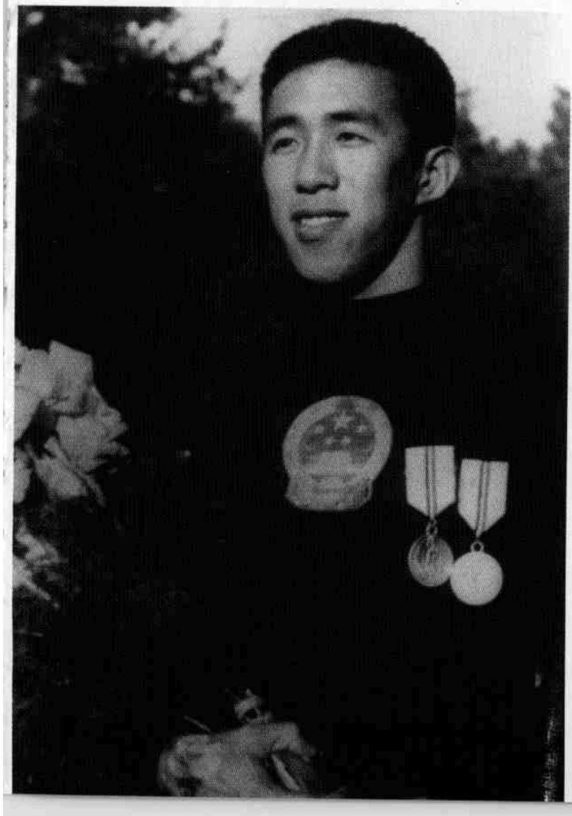


1954 年，苏联功勋运动员戈其耶利在指导中国田径运动员练习起跑



1956年，贺龙为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中国举重运动员陈镜开（右三）颁奖

1953年，吴传玉在第1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游泳比赛中，以1分8.4秒的成绩获100米仰泳冠军，首次为中国在国际体坛升起五星红旗



1957年11月，跳高运动员郑凤荣以1.77米的高度，成为我国第一个打破田径世界纪录的选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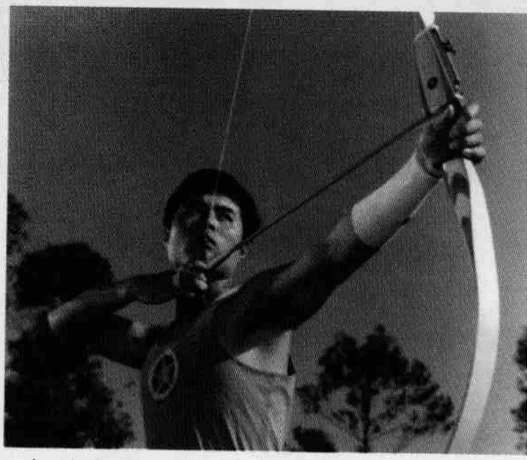
1959年5月，朱德、周恩来接见优秀跳伞运动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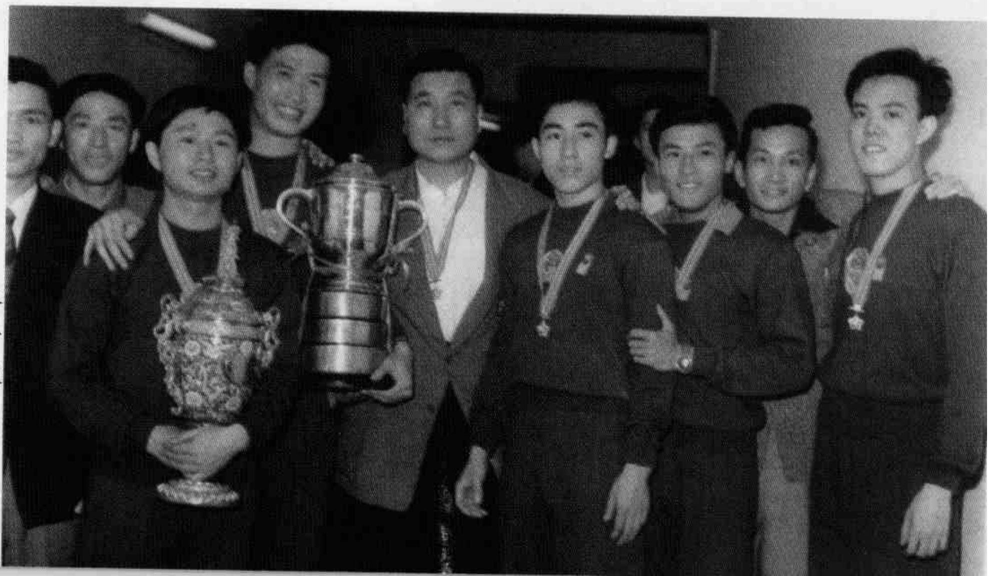
我国第一个获得世界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



两度刷新100米蛙泳世界纪录的运动员穆祥雄



打破男子双轮70米射箭世界纪录的运动员徐开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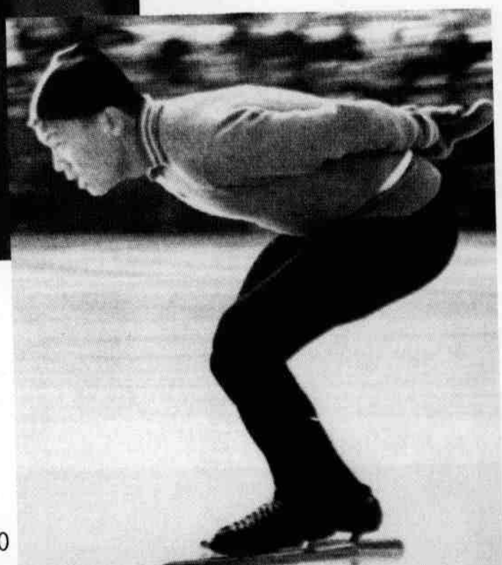
1961年，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男子单打前3名和女子单打冠军。由左起第三人徐寅生向右：王传耀、傅其芳、庄则栋、李富荣、姜永宁、容国团



1959年9月13日－10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第1届全国运动会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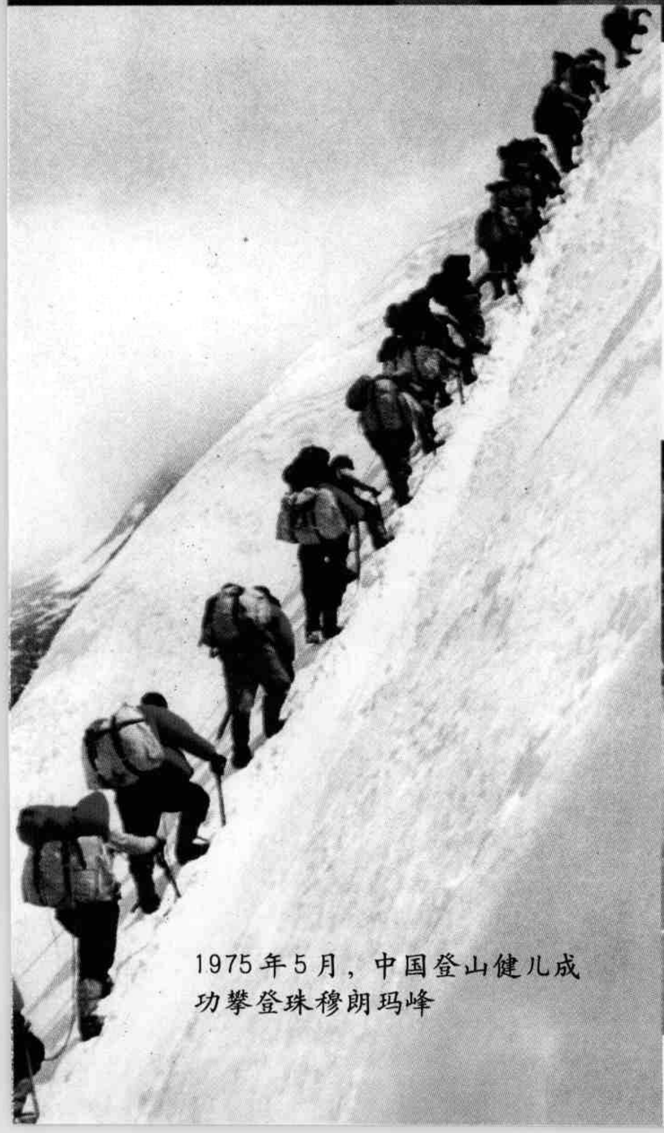
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



1963年罗致焕在第57届世界男子速滑锦标赛中夺得1500米第一名，成为我国在世界速滑锦标赛上的第一个冠军



1975年，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接见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中国登山队队员



1975年5月，中国登山健儿成功攀登珠穆朗玛峰

1978年，在第8届亚洲运动会上，中国男篮（着深色服装者）在决赛中战胜韩国队，第一次获得亚洲冠军



前　言

体育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体育思想与实践的真实记录。体育史和体育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发现并揭示体育发展的规律，探索体育发展过程中各种问题的解决途径和方法，从而促进体育更加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其为人类的发展服务的目的。

中国体育史是世界体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体育史的研究，是随着西方体育的传入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步的。在此之前，尽管中国已有数千年注重修史的优良传统，但由于体育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因而也未能成为传统史学研究的对象。20世纪初期，清政府实行"新政"以后，各级各类普通学堂按照新的学堂章程相继设置了"体操"科目，一些专门培养体育人才的学堂设置了"体育史"课程。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国第一部体育史专著——《中国体育史》，就是郭希汾（绍虞）先生为爱国女学体育科和东亚体育学校开课准备的。此后，相关的研究成果亦有不少问世，体育史的论著和译著也逐渐增多，如1931年章辑五的《世界体育史略》、1945年程登科的《世界体育史纲要》等等。不过，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体育在内，都处于落后的状态，因而对中国体育史的研究也处于较低的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体育史研究有了较大发展。通过体育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先后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国体育历史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大批文献资料的积累、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以及相关考古资料的不断披露，使得中国体育历史的研

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国运盛，体育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中国当代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悠久的中国体育历史文化开始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应用通史的形式，整理和传播具体的体育历史文化知识，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一项时代的重要工程，也是体育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基于上述考虑，2002 年我们提出了编撰《中国体育通史》的计划，通过论证准备，这一计划先后被批准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国家体育总局重点课题。

《中国体育通史》各卷分别对不同时代中国体育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研究和梳理。总体上，整个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大致划分为中国古代体育、中国近代体育、中国当代体育 3 个大的历史阶段。

1. 中国古代体育（史前—1840 年）

中国古代体育，历经史前社会（—前 2070 年）、夏（前 2070—前 1600 年）、商（前 1600—前 1046 年）、西周（前 1046—前 771 年）、东周（前 770—前 256 年）、秦（前 221—前 207 年）、汉（前 206—220 年）、三国（220—280 年）、两晋南北朝（256—589 年）、隋（581—618 年）、唐（618—907 年）、五代（907—960 年）、宋（960—1279 年）、辽（907—1125 年）、金（1115—1234 年）、元（1206—1368 年）、明（1368—1644 年）和清前期（1616—1840 年），为中国体育产生、发展和演变的重要历史时期。

历史的发展表明，人类的祖先大约在距今 300 万年前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仅史前社会所跨越的时间就占去了 99%。就其组织形式而言，这一社会形态先后经历了血缘家族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 3 个社会发展时期；从经济发展与生产力水平来看，则先后经历了以采集、狩猎经济

为主的旧石器时代和以农业、畜牧业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在史前社会，原始形态的体育是随着劳动等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主要的表现就是在生产劳动、部落战争、日常生活中，逐渐产生了走、跑、射箭、攀登、搏斗、跳跃、舞蹈、导引等运动形式。这些原始形态的运动形式，为文明时代体育形态的出现揭开了序幕。

从公元前2070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的建立，直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历史上先后延续了夏、商、西周和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4个历史时期。这是我国文明社会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经济上，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为我国文明时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治上，华夏大地各部落相互融合，形成了华夏族，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壮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作为华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体育，随着频繁的战争、学校的兴起和各种宗教祭礼仪式的出现，也日益发展和丰富起来。尤其是战国时期思想文化上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促使各家学说中的体育思想崭露头角。这些变化，对古代体育的初步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射箭、技击、赛车、游泳、奔跑、摔跤、技巧、导引、球戏、棋类活动以及各种体育思想在这个时期已初步形成。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为华夏民族体育的初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古代体育的雏形开始形成了。

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后，经过长期的发展，中国历史上先后经历了秦、西汉、东汉、三国和两晋南北朝几个时期。在这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初步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而体育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形成了后世体育发展的基本格局。特别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各民族融合过程中，物质、文化的相互交流，推动了各民族体育的发展和交流，也为

体育活动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色彩。

经过两晋南北朝将近四百年的长期封建割据战争之后，历史进入封建社会繁荣的隋唐五代时期。较为完备的封建体制、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为体育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对军事训练的重视和武举制的实施，在推动武艺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马球、蹴鞠等体育活动的风行；城市的繁荣和宫廷娱乐的发展，推动了各种传统体育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并吸引了妇女阶层的积极参与；而与周边国家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既促进和丰富了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的发展，也使体育文化的交流更为广泛，成为我国古代体育史上的黄金时代。

唐朝以后，中国境内先是出现了北宋、辽、西夏并存，后为南宋、金和西夏鼎立的局面，但随着元王朝的建立，中华大地又归于统一。这一时期，体育发展是多方面的。在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军事武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各民族体育活动的开展也各具特点。而市民阶层的壮大，为城镇健身娱乐体育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蹴鞠、马球、角抵、游泳、龙舟竞渡、蒙古象棋、围棋和象棋等成了市民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在养生体育方面，注重对前人导引养生资料的汇辑与整理，出现了大量的著名的养生家和导引养生著述，文人儒士、佛道教徒对导引养生术的研习等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外体育文化的交流日趋频繁和广泛。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鼎盛的时期，相对稳定的社会形势，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作为中国古代体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体育活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民间社会的宗教组织与秘密结社的盛行，促进了民间武术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体系。在养生体育方面，编辑整理了古人的精华之作，进行了分类和评述，导引养生体育逐步完善和系统化。随着传统的蹴鞠、击球、捶丸这些体育活动因竞技性减弱而走向衰弱，角抵、龙舟竞渡、棋类、秋千、风筝、举重、踢毽子、跳百索等体育活动在民间得到了普及。少数民族开展的体育活动各有

特点，百花齐放。在中外体育交流中，西方近代体育开始引起国人的注意。

从整个中国古代体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是经过不同时期的流传融汇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除了华夏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外，中国古代体育还包括了在历史长河中由许多其他民族传入并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展的体育活动。中国古代体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原始的朴素和谐的理想、中和融通的宽和精神，决定了其竞技性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那种带有强烈对抗性的形式，更加注重礼仪和实用性。与此同时，体育与文娱活动融为一体又使中国古代体育的娱乐性、游戏性和趣味性殊为明显。而华夏民族长期形成的清静淡泊、顺乎自然的性格，天人合一、和谐共处、融合化一、贯通一体的理想及注重个人修身养性的务实精神，还导致了养生保健术的产生，使其成为中国古代体育活动的重要形式，形成了东方体育文化的典型代表。

2. 中国近代体育（1840—1949 年）

中国近代体育，是指 1840 年到 1949 年这段时期在中国流行和实践的体育。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本身固有的由古代延续下来的传统体育；二是由西方传入的近代体育。其中涉及到了晚清时期的体育、民国初年和北京政府时期的体育、抗战前南京政府时期的体育、抗战后南京政府时期的体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带有新民主主义色彩的革命根据地的体育。古代中国体育经历了高度繁荣和发达的阶段，但到了清代，它和它所处的社会，都已远远落后于欧洲。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接触到西方近代体育，从而开始了其缓慢的体育近代化的过程。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入侵所导致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加剧，促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学说和

文化教育。而西方近代体育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传入中国，并逐步居于近代中国体育的主导地位的。可以说，它是在古老的封建帝国逐渐解体的背景下，作为中国人寻求救国图强的世界先进科学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被引进、吸引并传入中国的。从主观上看，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教会等向中国传输文化、体育，是其文化侵略中国的手段之一，但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加快了中国与世界先进文化、体育接轨和融合的步伐。洋务派“新军”和“新学”中的“体操”，开近代体育之先河；清末民主主义者则利用体育与军事相联系的特点，以体育作为培训革命军事力量的重要途径；而清末日益增多的西方教会的文化教育活动，亦成为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重要渠道。在近代西方体育大量被引进的同时，中国传统的、丰富多彩的体育仍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继续得到流传与发展。这也是中国近代体育初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色。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埋葬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思想，促进了人民的觉醒。特别是 1915 年后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给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在它们的推动下，中国近代体育也经历了重大的演变：在学校体育中，以体操为主要内容的体育课，发展为以球类、田径等多种生动活泼的体育项目为内容；培训体育师资的工作已在较大范围内开始；在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方面，由于远东运动会的影响，全国、大区、省市等不同级别的体育竞赛已初步形成制度；体育竞赛的组织和裁判方面，逐渐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了主权。

1927 年后，国民党逐步在全国建立起统治。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近代中国体育也处于一个发展较快的时期，中央政府在教育部下设立了“体育组”等专门管理体育的组织，诞生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和其他许多体育方面的法律法规；体育运动竞赛在这个时期空前地发展了起来，不仅举办了 3 次“全国运动会”，举办了一些地区、省市的运

动会，还开始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体育理论界，随着西方一些体育思想的传入和影响，不同的体育思想学说在中国得以展现；学校体育在发展过程中，并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了制度；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如武术等取得了新的发展。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以苏区体育和工农红军中的体育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体育已初步形成并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使近代体育普及到了穷乡僻壤，取得了显著成效，显示出了新民主主义体育的特性。

1937 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由于出现了社会性质不同的 3 大区域，即日本统治下的沦陷区、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使发展中的近代体育也呈现出 3 种类型，即沦陷区的殖民地体育、国统区的战时体育和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体育。在战时状态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体育，由于它突出为革命战争服务，注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性，因而成为一种全新的体育运动。尤其是在 3 年解放战争中，随着军事训练的开展，在军队和人民群众中，体育活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解放区体育运动的开展，创造和积累了发展人民体育事业的经验，为新中国社会主义体育运动的建设与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近代体育只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尽管这个时期社会动乱，人民饱经沧桑，但却是中国体育内涵和面貌发生较大变化的一个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方体育开始传入中国，并逐渐地得到普及与发展。同时，中国传统体育也在不安定的环境中艰难地奋进。正是在这两大不同体育体系的相互排斥与相互吸收中，中国体育走完了它的近代化历程。

3. 中国当代体育（1949—2005 年）

《中国体育通史》所记录的中国当代体育，是 1949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05年这56年间中国体育的发展历程。而这一时期中国体育的发展，也是一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的历史。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更意味着一幅撼人心魄的历史巨变画卷在当代中国展开。而批判改造旧体育，建立新体育，成为当时体育界的主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前，新民主主义文化、体育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体育中得到体现。新中国的成立，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在全国的贯彻实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体育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及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要“提倡国民体育”。同年10月，朱德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全国体总筹备会上的讲话中，将体育确定为“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卫生保健的一部分”。他指出：“过去的体育，是和广大人民群众脱离的。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1] 冯文彬则进一步提出新民主主义体育的方针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要把体育活动和一般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结合起来，反对为体育而体育，脱离人民的思想办法。……为人民的健康、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和人民的国防而发展体育。”[2] 1952年，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明确地界定了新中国体育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从1953年起，随着陆续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毛泽东“要学习苏联”的号召下，全国体育界掀起了一个相当长时间学习苏联的热潮。其时，通过大量翻译介绍苏联体育模式，并聘请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尤其是聘请他们指导了新中国的一批体育理论研

---

[1] 朱德副主席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上的讲话，新体育，1950（1）.

[2] 冯文彬．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新体育，1950（1）.

究生，使苏联体育模式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和推广。但与此同时，体育界也出现了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和急功近利思潮。如1958年提出的体育运动10年发展纲要，要求在10年内全国有4000万人通过劳卫制，800万人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出现5000个运动健将等等。在这一阶段，整个体育事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变化，既出现了发展高峰期，也因为“左”倾思想的影响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出现了短暂的冒进和收缩所形成的回落期，呈现出马鞍形曲折发展的境况。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体育事业遭受了一场浩劫。文化专制，形而上学猖獗，体育思想也被极度扭曲，出现极左的体育观，把体育为政治服务绝对化、庸俗化。竞技体育、学校体育急剧衰落。但在“文革”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由于夹杂着极左思潮支配的形式主义，因而在一定层面和时间段里，群众体育还显现出了畸形的兴盛状况。当然，这种恢复和畸形兴盛在没有平稳的政治局势和良好的经济状况背景下，是不可能长久的。“文革”后期，体育又整个滑向了低谷。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中国当代体育发展的过程中，它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在反思中不断冲破旧的思想束缚，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发展最快的时期。体育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发展体育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思想上解除了精神枷锁，恢复和健全了体育组织管理机构，恢复了正确的规章制度，提出了攀登体育高峰的目标，为当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中国当代体育发展史上，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年代。第一，从这一时期开始，在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中国体育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第二，中国体育在这一时期全面走向世界，在国际赛场上创下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成就，奠定了中国体育在国际体坛的地位和影响；第三，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中国体育还在适合中国国情的体育发展道路方面进行了初

步探索与实践。此外，在制订新时期我国体育发展战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推动体育体制的改革、促进体育文化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

1992年以后，随着邓小平一系列重要谈话的发表，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开始形成，同时也为我国体育的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从此我国体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主要标志是体育的发展呈现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趋势。1995年《体育产业发展纲要》《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的制定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体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中国当代体育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随着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成功，实现中国人近百年的奥运梦想成为中国当代体育发展的又一个目标。虽然1993年北京市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中以两票之差失利，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长足进步、国际政治地位的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大，北京市又以崭新的面貌开始了新一轮奥运会主办城市的申办工作，并最终成功地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

进入新的世纪，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了《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为中国当代体育在新世纪的发展描绘了新的蓝图。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为新时期中国体育的发展确定了路线和方针政策。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体育的发展是中国体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历史原因，港澳台地区的古代体育发展颇具特色，近代体育受西方近代体育的影响较为突出，当代体育全面发展，成效显著，是《中国体育通史》中独具特点的历史画卷。

随着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北京市的筹办，新的中国体育发展高潮正在到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和全国人民的支

持下，当代中国体育必将得到全面进步与发展，取得更大的成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体育通史》由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同一课题负责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员崔乐泉博士担任总主编，共分为8卷：第一卷（即古代体育史第一卷），史前—960年，由崔乐泉主编；第二卷（即古代体育史第二卷），960—1840年，由南开大学体育部教授杨向东主编；第三卷（即近代体育史第一卷），1840—1926年，由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教授罗时铭主编；第四卷（即近代体育史第二卷），1927—1949年，由罗时铭与厦门东南职业学院教授赵戋华主编；第五卷（即当代体育史第一卷），1949—1979年，由鲁东大学体育学院教授傅砚农主编；第六卷（即当代体育史第二卷），1980—1992年，由成都体育学院教授郝勤主编；第七卷（即当代体育史第三卷），1993—2005年，由杭州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教授曹守和主编；第八卷，即香港、澳门、台湾体育史，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副编审马宣建主编。各卷分之可独立成书，合之为一有机整体。参加撰写的学者近50位，其中大多为国内各院校的体育史科研人员，同时我们还邀请了国内有关科研机构的专家，参与了本书的部分编写工作。作为一个集体性的项目，本书涉及了中国体育上下数千年发展的历史，以及体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交融与影响，因此我们力求在现有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在撰写中要突出历史性、科学性、全面性和客观性，同时更要有创新性。鉴于《中国体育通史》，尤其是其中当代中国体育史编写的复杂性和难度，我们自2000年起，先后邀请体育界的张彩珍、谢琼桓、王鼎华、毕世明、陈荫生、熊斗寅、张天白、谷世权、徐永昌等领导和专家进行座谈，从提纲的拟定到编写的具体原则广泛地征求意见和建议，并先后召开了数次由各卷主编人员和具体编写人员参与的研讨会，以求保证本书的编写质量。尽管如此，对于这样一部由几十人参与，又涉及时代如此之长久、地域如此之

广阔、内容如此之广泛、问题如此之复杂的庞大著作，其中的不足和缺陷在所难免，我们诚挚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中国体育通史》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领导、专家的关心、鼓励和悉心的指导；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体育文化发展中心、成都体育学院以及全国各地的相关院校、体育科研机构均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和大力的支持。

作为国内最高档次的体育专业出版机构，人民体育出版社承担了《中国体育通史》编写与编辑出版的主要组织工作。在史勇总编辑的领导下，丛明礼、孙静敏编审和吴永芳、谢建平等各位编辑人员，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和热情投入的态度，审读书稿、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和相关的事务。正是他们的辛勤努力使得作品能够顺利出版。就在即将完成全部编辑工作之时，经人民体育出版社申报，《中国体育通史》被列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实现了体育类读物列入国家级重点出版规划的“零”的突破。

在《中国体育通史》付梓之际，我们向所有关心、指导、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同志们，向全国各相关单位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7 年 12 月

目　录

绪 论

本卷是《中国体育通史》第五卷，叙述的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9年，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这一期间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历史。

1949年10月1日，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时刻，中国人民被三座大山压迫的悲惨境况就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将要成为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巨人。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曾对参与新体育建设工作的同志说过一段话：“过去洋人骂我们是‘东亚病夫’，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顶帽子要摘掉。谁来摘呢？搞体育工作的人来摘嘛！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体育是人民的一项事业，我们不去干，还算共产党员吗！”[1]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体育工作者和全国人民，抱着一定要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扔进太平洋的期望，抱着要使中华民族强大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再铸辉煌的决心，从新中国刚一建立，就着手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废墟中开基立业，浇铸起新中国的体育事业的坚实基础。在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不到20天，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就摆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议事日程。经历了从新民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10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到“拨乱反正”，使社会主义体育事业最终步入了快速

[1] 熊晓正，等. 中国体育.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87.

发展的轨道。体育事业在1949—1979年这30年中，从几乎为零的起点开始，有兴旺发展、高歌猛进的高潮，也有遭遇浩劫几乎湮灭的低谷；从起始走向一个个高峰间有波浪马鞍形的曲折轨迹，也有从高峰跌入低谷过程中显现的起伏波澜。新中国的体育事业随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状况的变化，最终在社会主义制度坚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

按照新中国建设历程和体育事业奠基、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本书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10月1日建立，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确定工作重点转移的30年，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1日到1956年初。在这一阶段里，筹备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国家体育的组织管理机构迅速形成体系，在新中国的基础上，树立起了体育事业的支柱。新中国刚刚建立，党和政府就委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就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体育、确定什么样的发展方针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提出了新中国体育事业“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我们要把体育活动和一般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结合起来，反对为体育而体育，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思想和办法……为人民的健康、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和人民的国防而发展体育。”[1] 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进一步指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事业的任务和发展方向。1954年，提出了“结合实际情况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并逐步地使之普及和经常化”的群体工作方针[2]。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体育活动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起来。为了扩大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迅速提高我国运动技术水平，1952年2

[1] 冯文彬. 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 新体育，1950（1）：8.

[2]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汇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12.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共青团中央在联合发出的关于《选拔各项运动选手集中培训的通知》中，提出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要求，使我国的优秀运动员得以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训练，并相继组建了国家专业运动队伍，使整个竞技运动水平得以很快提升，这为后来全面赶超国际水平打下了基础。

在这个阶段，体育突出了“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基本任务，在全国推行《劳卫制》，在改善人民体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第二阶段，从1956年，以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标志，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倾”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至1961年的自然灾害及“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1962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落实，使整个体育事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变化，出现了两个发展高峰期，也因为“左”倾思想的影响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出现了短暂的冒进和收缩形成的回落期，呈现出马鞍形曲折发展的境况。

在召开第1届全运会和第2届全运会的推动下，体育运动得以在全国广泛普及，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积极投身于体育活动中，配合《劳卫制》的全面推行，群众体育活动达到了大普及，运动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体育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内容。群众体育蓬勃发展，在偏僻的乡村，体育过去是人们围观的西洋景，现在成为亲自实践的娱乐活动。

从郑凤荣这只报春的燕子开头，陈镜开、容国团、庄则栋等在国际大赛中频频夺冠争金的成功；两届全运会刷新旧中国的全部全国纪录，竞技体育成绩大幅度、大面积地提高，标志着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诚然，“反右倾”运动、“大跃进”高指标、三年自然灾害加人为的影响，确使体育事业的前进道路出现了波折，造成了损失，

延缓了前进的步伐，这是我们应该记取的教训。但是总的来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仍然从一个高峰走向另一个高峰。

第三阶段，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体育事业遭受了一场浩劫。从贺龙元帅到一般体育工作者，无一幸免地遭到了冲击。贺龙元帅及一些为国家争得巨大荣誉的运动员惨遭迫害致死。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一度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林彪、“四人帮”集团横行的日子里，广大体育工作者凭着对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热爱和忠诚，竭诚努力创造条件开展工作。老一辈无产阶段革命家也无时不在关注着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命运。正是体育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乒乓外交”的成功，打破了中美僵持的坚冰，打破了国际反华势力的封锁，给中国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的同时，也为体育的全面复苏提供了绝好的契机。竞技体育逐渐得以恢复，在文化的饥渴环境中，体育成为了沙漠中的一块绿洲，群众体育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文革”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夹杂着极左思潮支配的形式主义，在一定层面和时间段里，群众体育还显现出畸形的兴盛状况。

当然，这种恢复和畸形兴盛在没有平稳的政治局势和良好的经济状况背景下，是不可能长久的。“文革”后期，体育又整个滑向了低谷。

“文化大革命”中决不是没有体育。恰恰相反，“文革”中体育境况的特殊和复杂，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如果没有“文革”十年的破坏，我们赶超世界体育先进水平的时间，会在新中国第二个体育高潮的基础上缩短很多很多。

第四阶段，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9年，是历经10年“文革”后，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后确定今后工作重点转移的时期。在这一阶段里，体育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全面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为遭受迫害和身负“罪行”的人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思想上解除了精神枷锁，恢复和健全了体育组织管理机构，恢复了正确的规章制度，提出了攀登

体育高峰、尽快夺回“文革”造成的严重损失的目标，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点的转移做好了准备，打下了基础。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跨入了新的世纪，我们期待中国体育事业取得飞跃式的发展。过去的是历史，过去是今天的基础。了解过去的历程，研究过去的历程，将会给今天的我们以很多的启示。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事业的初创(1949—195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者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国人民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肃清国民党政府的残余武装，建立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镇压了反革命，稳定了社会秩序；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其他各项民主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了执政党自身的整顿。作为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也开始了“新体育”的建设工作。在继承、发扬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体育传统，接收和改造旧体育的基础上，确定了新体育的建设方针和任务目标，初步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新的体育事业。

第一节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与开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就将体育事业作为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确定了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的体育方针，进行了接管、改造旧体育，学习苏联体育经验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新体育”建设，创建了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奠定了我国体育文化事业的基础。

一、社会主义体育方针任务的确定

社会主义体育方针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新中国开展体育活动的方向与指南，也是实现人民参与体育的重要保障。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政权。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建立了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组建了人民自己能够当家做主的政府。因此，新中国一成立就非常重视人民利益的根本保障问题，其中就包含有体育的内容。

（一）体育为生产、国防和国民健康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就把发展体育事业摆上了议事日程，提出了建设“新体育”的要求。1949 年 9 月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文化教育政策”第 41 条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第 48 条规定“提倡国民体育”和“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持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1949 年 10 月 26—27 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出席了会议，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大会致贺，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不但是学生，而且工人、农民、市民、军队机关和

团体都要搞体育”。[1]青年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在向大会作的《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报告中指出：“为了迎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必须开展推动一个广泛的体育运动，以便使人民的身体健康、国防建设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得到更有力的支持和进展。”[2]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

“新民主主义体育”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早在1940年，毛泽东同志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地勾画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蓝图：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3]。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则更加明确地指出：“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4] 1949年10月，朱德同志在向“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致词中也指出：“体育是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卫生保健的一部分，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对它要重视的”。“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这些论述，不仅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也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体育”的理论依据。

基于这样的认识，1949年10月26日，冯文彬在《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报告中正式地，也是第一次全面阐明了新民主主义体

---

[1] 朱德副主席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上的讲话. 新体育，1950（1）：7.

[2] 冯文彬. 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 新体育，1950（1）：9.

[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659.

[4] 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961.

育的特征，即“新的体育方针，就是新民主主义的。这就是说，体育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我们要把体育活动和一般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结合起来，反对为体育而体育，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思想和办法”。首先，它应当是民族的，因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独立的”，所以它应有民族的特性，同时又必须与各国进步的体育运动相联合，成为世界新体育运动的一部分。它应当是科学的，就是要“反对落后保守、狭隘宗派、互相诽谤攻击等错误，以及企图把体育作为个人或少数人的工具。我们主张团结和进步。把学习政治和发展体育结合起来，即是‘身心’两者都要健康，不使自己成为‘身体健康、脑筋简单’的人。应不断地学习和改进，努力赶上并超过世界体育的水平。”它应当是大众的，因为“体育应当为人民服务，并逐渐使体育成为是人民自己的；要改变少数人的运动成为国民的普及的运动；要从学校发展到工厂到部队，从城市发展到农村，从知识青年发展到劳动群众中去，到一切人民中去”[1]。根据新民主主义体育的方针，冯文彬在1950年7月20日的体育工作者暑期学习会上作了《关于开展人民体育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了新体育的目标：“是为了增进国民的健康，为了发展新中国的建设和巩固新中国的国防。”[2]

（二）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为新中国体育工作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2个大字。这一题词，是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2届代表大会所作的。

在全国体总成立大会前夕，体总筹备会副秘书长黄中给筹备组全体人员传达了毛泽东这个题词。当时，一些看不起体育工作的知识分子，听了传达后，精神为之一振，逐渐转变了体育不过是“打

---

❶ 冯文彬. 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 新体育，1950（1）：8.

❷ 冯文彬. 关于开展人民体育的几个问题. 新体育，1950（3）：4.

打球”“玩一玩”的肤浅认识。

在全国体总成立大会上正式传达毛泽东这一题词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讨论时，人们喜气洋洋，尤其是马约翰、吴蕴瑞、徐英超等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名体育教授，格外喜悦，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毛主席把体育的真谛抓住了。”

当年唯一的体育刊物《新体育》杂志在1952年第7期（总第21期）以整页的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这一题词，并突出宣传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这一重要思想。这一题词体现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最高宗旨，明确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根本目的和发展方向，推动了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为此，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冯文彬就提出了“体育运动是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出发，为人民健康服务的。”[1]

题词强调增强人民体质，特别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旧中国，中国人被蔑称为“东亚病夫”，炎黄子孙无不为之痛心疾首。毛泽东早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为改变中华民族体质孱弱的状况而大声疾呼。

毛泽东的题词，把着眼点放在增强人民大众的体质上，使中国的体育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广大人民群众不再是被体育遗忘的对象，而成为体育的主人，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参加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此，我国群众性体育运动蓬勃发展，人民健康水平日益提高，人们的平均寿命比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延长了许多。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体育方针与任务

根据新民主主义体育的目标，负责全国体育事务的团中央和全国体总制定了体育工作的具体任务。全国体总主办的《新体育》发刊词对此作了比较具体的说明。首先，“要把体育普及到千百

---

[1] 冯文彬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 新体育，1952（21）：10.

万劳动人民中去。有步骤地从学校到工厂，从城市到乡村，从部队到地方，使体育很快成为广大人民的体育，溶化到人民的生活中去，成为人民在自己伟大的建设事业和国防事业中获得胜利的一个有力因素和保障。”其次，“必须系统地研究和总结旧体育，严格地批判它们，摒弃一切体育理论上，技术上，作风上不合理的部分，细心地去发掘人民中已有的丰富的民族体育，扫清新体育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切实改造我们体育界本身，使之能担负起建设新体育的重任。”再次，“必须向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吸取他们成功的经验，来充实我们的体育内容和启发我们的创造，使我们的体育，成为世界进步体育的一个构成部分。”❶

冯文彬在他1949年的讲话中提出了建设新体育的三项具体工作：一是建立发展体育组织，团结全国体育工作者，把爱好体育活动的人们都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二是研究中国既有的体育，总结其经验，扩大体育教育和宣传，以指导体育活动。三是有计划地翻译苏联和各国有关体育的成功经验和办法，并协助政府编辑系统的体育教材❷。“提倡体育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锻炼人民健康的身体，为祖国的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❸

为了保证新体育任务和目标的实现，1951年提出了“使新中国的体育运动成为经常的广泛的运动”的具体工作方针。荣高棠在1952年所作的《为国民体育运动的普及和经常化而奋斗》的工作报告中，对这个工作方针进一步阐述说：“我们今后的工作方针应该是：在现有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并与实际相结合，使体育运动普及和经常化，积极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加强生产建设与国防建设而服务。”中心任务则是“大力开展各学校、机

❶《新体育》发刊词. 新体育，1950（1）：6.

❷ 冯文彬. 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 新体育，1950（1）：9.

❸《新体育》短评：加强目前学校的体育. 新体育，1950（6）：3.

关、工厂、部队、农村等基层单位经常性群众性的体育活动”[1]。与此同时，结合当时体育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团中央和体总提出要正确处理以下关系：

1. 正确处理从实际出发与积极创造条件的关系。新体育的建设不是一次性任务，而应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在思想上要以“新民主主义的改革”为出发点，以实现新旧体育的转换。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要防止“左”的偏向的出现，即“不考虑和不根据客观条件的可能与否，而要求过急过高，看到别的地方发展快，马上就想照样地搞起来，甚至希望像苏联那样把体育运动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坐待思想，“对于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不是主动地去创造条件加以克服，而光是等待上级来解决，要求上级把一切都规定下、准备好，自己只要等着‘吹哨子’就够了。”希望体育工作者认清新体育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艰难曲折的过程，急躁和等待都不行，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以便稳步前进。

2. 处理好体育与政治的关系。当时，有些人曾以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每一个体育活动中掺杂一些政治内容，比如把赛跑者编成三人一队，化装成工、农、兵，手拿斧头、镰刀和步枪，用绳子捆在一起赛跑，喊着口号。认为这就是体育与政治结合。冯文彬批评说，“其实这反而会使体育失去了它的内容和价值，成了活报剧。”冯文彬说，体育既然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这就有了它的政治意义，不要另外去制造什么政治意义。

3. 处理好体育与集体主义的关系。我们反对旧的个人主义的体育，反对互相嫉妒、斗争、损害、打击别人、为个人争锦标、出风头而从事体育的行为；但也反对另一种偏向，就是形式主义的集体。如运动会上取消个人锦标，不要田径赛，多少人捆在一堆赛跑等，以为这是集体主义。其实这是违反了体育科学的原则和原理，

[1] 荣高棠. 为国民体育运动的普及和经常化而奋斗. 新体育，1952（21）：16.

是丧失了体育的真实意义，把集体主义的精神同形式的集体混淆起来的错误做法。这样就束缚了个性的发展，妨碍了从竞赛中来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心。

4. 处理好体育与劳动的关系。即不能使体育与劳动脱离，也不能认为劳动就是体育。冯文彬说，虽然适当的劳动也能锻炼和培养人体的力量与促进发育，但劳动不能代替体育。因为体育是科学地有目的地锻炼身体，使人体各部位得到均衡健全的发展，并能适当调剂和消除劳动后的疲劳，发扬和培育人体劳动的能力。所以在劳动人民中开展体育运动是完全必要的。

5. 处理好体育与读书的关系。冯文彬说，许多学生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学习是好的，但整天闷头读书，忽略了必要的文娱体育活动，轻视体力的培养和身体的健康，以为搞体育活动是浪费时间，这是不对的。应当把学好功课与发展体育搞好身体两者结合起来。这样，将来才能很好地担负起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任务❶。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增强人民体质”的问题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早在 1941 年，毛泽东为《解放日报》的体育专刊题词时，就提出“开展体育运动，提高人民体质”。1952 年，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题词，再次要求“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他还从体育的人民性和广泛性的高度进一步明确指出：“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❷

青少年，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健康问题，是毛泽东考虑体育问题时的一个核心问题。他曾多次强调学生应该“健康第一，学习第二”❸。1953 年 6 月，他又提出“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要求。他说：“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

❶ 冯文彬. 关于开展人民体育的几个问题. 新体育，1950（3）：4.

❷ 人民日报. 1967-09-23.

❸《体育史》教材编写组. 体育史.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167.

危险。…… 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1]又说：“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因此，要充分兼顾青年的工作、学习和娱乐、体育、休息两个方面。”[2]“要保证大家身体好，保证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干部都要身体好。”[3]当时有许多人对毛主席的这些指示精神并不十分理解，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包括党内）对开展体育运动采取冷淡和漠视的态度，甚至有一位管教育的领导怀疑毛主席将“身体好”放在“三好”之首是“笔误”。针对这种现象，毛主席又于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4]此后，体育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才毋庸置疑地得到确认。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形成了“使体育运动普及和经常化”的体育方针，中央体委成立初期继续执行了这个方针：“继续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和‘结合实际情况，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并逐步使之普及和经常化’的方针。”[5]1956年以后，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工作任务的内涵有所扩大，除了继续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以外，还提出了要大批训练运动员和积极开展国际体育活动。“继续贯彻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和加速提高运动水平的方针，争取更多运动项目的成绩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6]提高运动技术水平首次

---

❶ 毛泽东选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84，85.

❷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指示. 人民日报 1953-07-03.

❸ 毛泽东选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84.

❹ 毛泽东选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85.

❺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17.

❻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30.

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要求"从各方面不断发现和挑选有培养前途的青、少年运动员，进行有计划的训练和培养，不断充实运动员后备力量，是迅速提高运动水平和创造新纪录的重要保证。"❶周恩来总理在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作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指出："我们应该在广大群众中进一步开展体育运动，有效地增强人民的体质，并且提高我国体育运动的水平。"❷在这里，"提高体育运动水平"第一次与"增强人民体质"并列，1958 年则更明确地被作为体育方针："克服右倾保守思想，鼓起革命干劲，继续贯彻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和加速提高运动水平的方针，争取更多运动项目的成绩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积极准备 1959 年全国运动大会，迎接建国 10 周年。"❸

事实上，在 1952 年 2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的关于《选拔各项运动选手集中培养的通知》中就已经提出："体育工作如果只有普及而不在适当范围内加以提高，就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需要，必须使普及与在适当范围内提高体育运动水平相结合。"❹但并没有作为工作方针确定下来。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当一部分人将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与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相对立，片面地认为搞提高是为少数人服务、是资产阶级的锦标主义思想、是单纯技术观点等认识分不开。这种思潮一直影响着抓提高工作，使搞提高工作的同志顾虑重重。因此，直到 1959 年 4 月 18 日，在周恩来总理向二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才明确、完整地提出了新的体育方针："在体育工作中，应当贯彻执行普及和提高

❶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31.

❷ 国家体委．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1）：精华本上册．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14.

❸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30.

❹ 熊晓正，等．从普及提高相结合到各类体育协调发展．体育文史，1997（5）：16-20.

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逐步提高我国的体育水平。”这就是我国体育“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方针的正式出台。

这样，便形成了“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基本任务，以“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为基本方针的体育发展思路。遵循这一思路，同时结合学习苏联的体育经验，逐步建立了中国体育的组织机构和制度。

二、接管、改造旧体育与建设新体育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正是如此，在建设新体育的过程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对旧体育接管与改造基础上建设了社会主义的体育事业。

（一）接管、改造旧体育

1. 对旧体育人员的团结教育

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曾严肃地告诫全党：“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1]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1948年12月22日的布告中，更是清楚地这样写道：“学校教职员、文化教育卫生机关及其他社会公益机关供职的人员，均望照常供职，本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2]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

---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583.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司令部布告//毛礼锐，等. 中国教育通史：第六卷.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20.

改造。…… 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❶

依据中央的精神，对争取原国统区体育人员问题，团中央和体总提出要“组织现有体育工作人员的政治学习和体育研究，以便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优良的新作风，不断地改进再改进，创造再创造”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有计划地举办了各种学习会，以帮助体育人员逐渐形成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1951 年 7 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清华园举办了新中国的第一期全国体育工作者暑期学习会，包括体总全体筹委、各地分会或分筹会秘书等共 208 名学员参加了学习，分别来自全国的 23 个省、15 个市以及旅大区（除云南、贵州、西康、西藏、台湾外）。学习内容除体育专业业务外，大课报告主要有形势和任务，开展国民体育的问题，怎样开展工厂、学校、部队的体育，以及苏联体育的介绍等。学习会受到了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学习会期间体育总会筹委会主任冯文彬、代理秘书长廖承志，教育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韦悫，卫生部长李德全等分别作了重要指示和讲话。通过为期两周的学习和讨论，大家在新民主主义国民体育的方针与任务上获得了一致的认识，即体育应该为劳动服务，为生产国防服务，为国民的健康服务；在国际上我们是站在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的一边，学习他们的经验与技术，学习他们热爱祖国的工作精神；反对“全盘西化”的盲目崇拜欧美思想与封建的宗派集团思想；体育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与此同时，体总各地分会、分筹会，也与当地人民政府、青年团工作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了体育工作者署期学习会，组织工厂、部队、农村等的体育干部参加学习。经过学习，大家提高了对新体育的认识。

为了更好地团结和发挥原国统区体育人员的积极性，在各级体

❶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2-23.

❷ 冯文彬. 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 新体育，1950（1）：9.

育组织中都吸收了一些旧体育人员。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中，原国统区的体育知名人士马约翰、吴蕴瑞、徐英超等都担任了筹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又如对董守义这位唯一留在大陆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有人认为他反动，不可使用。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可请到北京一谈[1]，充分表现了人民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肯定。而在体总的各级体育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原国统区体育人员就更多了。如原上海市立体育专科学校代理校长吴邦伟先生任上海市分筹会副主任，河北师院体育系主任罗爱华女士任天津市分筹会副主任，西北师院体育教授王耀东任西安市分筹会副主任等等。在这些地方体育组织中，大批来自原国统区的体育人员为新体育的建设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为了保证新体育的人民性，体育界结合“三反”运动[2]，展开了对体育工作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体育界认为，体育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现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忽视体育运动的群众化。正如《新体育》社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有些人仍然醉心于训练少数球队和选手；有些地方习惯单纯举行热热闹闹的“昙花一现”的运动会，满足于参加运动会的人多，有几个工农运动员参加，对于各基层单位广大群众经常的体育运动的发展和巩固则很少注意，不肯深入地想办法去发动、组织和指导群众；也有些人对提倡篮球、田径等近代体育形式不遗余力，但却不愿发展群众熟悉而易于接受与推广的多样化的民间体育，甚至加以轻视。资产阶级思想的又一表现是忽视政治思想教育。《新体育》社论中说：体育不仅锻炼人民坚强的体格和体力，而且培养人民革命的意志和性格。广大群众和运动员们参加体育运动锻炼身体，提高运动技术必须建筑在高

[1] 华智. 夙愿——董守义传.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

[2] “三反”运动主要是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主要是反对贪污）的运动。1951 年 11 月东北局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揭露出一些干部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中共中央随即决定开展了“三反”运动。

度的政治思想觉悟基础上，离开了政治思想教育的体育不可能培养任何革命的意志和性格。政治思想教育不但不是体育工作中额外的附加的东西，而且是贯穿在体育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此外，资产阶级思想还被认为表现在好求表面、铺张浪费、不从实际出发，以及在体育教学工作上的粗制滥造和不负责任[1]。

半年多的“三反”斗争，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虽然在某些方面言论过激了些，过分地上纲上线，但对于教育和改造大部分旧知识分子，团结更多的人同心同德地与新生的人民政府一道进行新体育的建设，是起了一定促进作用的。它与后来发生在1955年展开的对资产阶级体育思想的批判，有着很大的不同。著名体育家徐英超说，作为旧体育工作者，首先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下定决心改造思想，与工农结合，批判过去，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的人生观。其次是从实际出发，从自己的工作中、具体的内容上研究。第三是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徐英超主张把改造旧体育与改造体育工作者本身结合起来。他的意见反映了大多数体育工作者对思想教育的认同。

2. 对旧体育的批判和借鉴

对旧中国的体育制度与体育实践的批判和借鉴，是建设新中国体育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在旧中国，广大爱国的体育工作者为了提高民族的体质和体育水平，在从事体育教学、体育训练和体育科研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这是人民的精神财富，理当继承和发扬。即使是国民党政府推行的一整套体育制度，也不能全盘否定，国民党政府大量地采用了发达国家的许多体育措施，其中一些是符合体育发展规律的。正是在这个基点上，在新体育建设的过程中，注意了对旧体育某些有用经验的吸取，从而加快了新体育建设的步伐。如在组织上建立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实际就

[1]《新体育》社论：向体育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坚决斗争. 新体育，1952（17）：3.

是对旧中国“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改组和重建。正是在旧有体育组织的基础上，很快地形成了一个新中国的全国体育组织网络系统。借助这一系统，使新体育建设的方针、任务和目标，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执行。

3. 保护和建设体育设施

在团结、教育和改造旧体育工作者的同时，人民政府也十分注意保护原有的体育设施。早在 1948 年 2 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工委关于恢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中，就强调指出，我们在城市工作中的“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1]。1948 年 12 月 22 日，平津前线司令部特别发布布告，宣布约法八章，其中第四条指出：“保护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及其他一些公共建筑，任何人不得破坏。”[2] 1949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明确要求：“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以上的这些指示、经验和做法，使体育设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例如 1949 年 5 月，原上海的 31 片体育场地全部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保护起来，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政府一边修复、改造旧的体育场地，一边又着手建设新的体育场地，以满足人们体育锻炼的需要。到 1953 年底，上海市能向群众开放的体育场地已达 53 片[3]。

（二）对解放区体育的应用推广

新体育是人民大众的体育，它理所当然地要以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时代的体育经验为蓝本。这些经验的重要特点是体育的广泛人

---

[1] 胡绳.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238.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司令部布告//毛礼锐，等. 中国教育通史：第六卷.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20.

[3] 上海体育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8.

民性。毛泽东于1941年在为《解放日报》体育专刊的题词中就提出要“开展体育运动，提高人民体质”。朱德于1942年在《祝九月运动大会》的文章中也强调“改进我们军民的体力，应从两方面着手：一即改善军民生活，丰富军民的给养；一即普及体育运动和卫生保健知识。”[1]所以朱德号召解放区的军民“运动要经常”。从1942年，边区就推广起“十分钟运动”，每天早晨和傍晚到处都可见到军民成群结队参加跑步、做操、打球和游戏。延河成了人们夏天游泳、冬天滑冰的极好去处。可见，早在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体育就已经开始了坚持体育大众化、生活化与经常化的发展方向，从而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体育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在思想方法上，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体育形成了民族的、多样化和创新的思路：“第一，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去开展体育运动，不仅是田径、球类等应当继续发展，对于国术、打拳、劈刀、刺枪、骑马、舞蹈等，也必须提倡和发扬；”“必须根据年龄、性别、职业来规定体育活动的内容。对于少年儿童，则不应进行过分激烈的运动，以免妨碍他们身体的发育和健康。第二，必须积极创造新的体育形式，对于团体操、集体舞蹈，表现战斗、劳动及有教育意义的体育活动，都需要好好地提倡和发扬。”[2]

在组织方法上，解放区的体育经验是不受运动比赛规则的过分限制，而尽可能让人们广泛地参与活动。例如解放较早的东北地区，他们组织的体操比赛，一般都不分级别，也没有规定动作，这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从事这项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继承了这种传统，比较典型的就是修改一些运动项目的规则，以更好地为群众锻炼服务。如篮球比赛中，女子每场比赛的时间采取“四节制”，每节10分钟。在排球运动方面，既宣传开展六人排球，又同时继续

❶ 朱德. 祝九月运动大会. 解放日报，1942-09-01.

❷ 冯文彬. 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 新体育，1950（1）：8.

提倡九人排球，甚至提出“为着适应群众不同的要求，排球运动形式何止是六人及九人两种，还有许多种形式都可以采用，例如小学生或初学者的落地排球或不限打球次数的集体排球等。”十二人制甚至十六人制都曾经在中小学体育活动中采用。标准的六人制排球也可采用不同的网高：一种是比赛标准（国际标准）：男子为 2.43 米，女子为 2.23 米。一种是成年群众标准：男子为 2.30 米，女子为 2.15 米。一种是少年群众标准（初中程度或 15 岁以下）：男子为 2.15 米，女子为 2.00 米。在足球方面，则提出了广泛开展小型足球运动。因为小型足球用的场地比较小，不需要穿足球鞋，容易在学校、工厂、机关中普遍开展，而且也能收到与正式足球几乎相近的运动价值。由于小型足球的剧烈性比较正式足球稍微弱一些，一般人都可以参加，所以对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之间的少年和青年特别适宜，而儿童则可以踢更小的橡皮球以代替小型足球。

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为了更好地普及体育，人们曾新创了不少体育活动形式和器材，以适应锻炼的需要。例如延安的警一旅三团一连，他们在学跳木马的活动中，经过不断研究，创造了一种适合于官兵练习的“口袋木马”。即在埋在地上的板凳上面放一个装满沙土的口袋，以代替昂贵的真皮木马。这种木马高低长短可随时调节，无论谁都方便练习。这种创新经验在新体育的建设中也被进一步发扬光大。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新集体舞”的讨论就具有典型性。在《论新集体舞》的文章中，作者说：“毫无疑问，必须在今天新秧歌的基础上，把秧歌不断地普及与提高，使创造的新舞蹈与今天的秧歌有适当的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我们的新的人民的舞蹈来。”[1]他们提出，在动作表现上要能启发情绪，要轻松、愉快、活泼、健康，即使旁观者也跃跃欲试，甚至投身其中；动作结构上要简单，应该是容易教，容易学，几分钟内便可以学会动作；动作组合上不要平铺直叙，应有高低起伏。

[1] 管玉林，濮思温. 论新集体舞. 新体育，1950（1）：23.

总之，新集体舞是为了普及和提高秧歌舞。因为“跟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带着浓厚乡村气味的秧歌，已经进入到城市。这个变化并没有使得秧歌落伍，相反地更发展了，它的群众已不仅是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且扩大到全国人民各阶层中，工人、农民、学生一般市民”[1]。所以，新集体舞的形式创新，实际就是坚持在秧歌舞基础上的创新和提高。

老解放区开展体育活动的经验，对加快新体育建设步伐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1948年旅大生产建设的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广泛的体育活动逐步地开展。旅大行政公署于9月举行了旅大首届体育大会，并规定以后每两年召开一次。在竞赛分组上，为了照顾工人运动员，将工人与青年划分为两组。选择适合于工人的项目，并奖励工人将自己的劳动形式结合着运动表演，如织网接力等项目，使运动员和群众对于体育为劳动服务这一观点得到了极大的认可。通过举办与工人生产、生活相结合的运动会，拉近了劳动群众与体育的距离，工人的运动情绪非常高涨，纷纷报名参加，促进了群众体育的普遍开展。又如哈尔滨自1946年起到1949年共举办了4次全市性的运动大会，大规模的运动会共举办了10次(有一次是工人运动会，一次是中苏青年学生联合运动会)，并举办了两次游泳比赛和两次滑冰比赛大会。“为了加强哈市体育活动的领导，必须提高体育工作者的政治、业务水平；于是在假期里集中了学校的体育教师，举办了4次体育研究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方面批判了旧的体育观点，研究了新民主主义的体育方向；另一方面创造了各种工农兵舞，如劳动体操、生产操、农作舞，还有针对胜利的革命形势的新体操等。”[2]

解放区体育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体育，它第一次使体育真正成了人民大众的体育，具有较广泛的群众性。较

---

[1] 管玉林，濮思温. 论新集体舞. 新体育，1950 (1)：23.

[2] 哈尔滨市教育局. 哈尔滨市四年来的体育活动. 新体育，1950 (1)：29.

少有锦标主义和“选手体育”的缺点，同时它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因陋就简，小型多样，坚持经常。因此，解放区的体育经验是新体育建设的基础，新中国人民的体育事业与老解放区的体育事业在性质上、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新体育建设是对解放区体育的继承和发展。当然，解放区体育经验是马列主义和中国体育实际相结合的最初阶段的产物，加之革命战争的特殊情况和农村环境，它表现了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新体育的建设，实际应该是在解放区体育经验基础上的进一步上升、提高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我国新体育建设正是沿着这一基本思路而逐步展开的。

（三）学习苏联体育的经验

早年 1945 年，毛泽东就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确立了向苏联全面学习的方针。1949 年 10 月，朱德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的讲话中正式提出：“要学习苏联体育方面的好的经验。”[2]冯文彬在筹备会议讲话中也提出新体育的建设“必须与各国进步的体育运动相联合，特别是学习苏联体育方面成功的经验”[3]。“必须向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吸取他们成功的经验，来充实我们的体育内容和启发我们的创造，使我们的体育，成为世界进步体育的一个构成部分。”[4]为了发展与普及体育运动，“必须学习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各种体育运动的丰富内容和宝贵的经验”[5]。在当时我国受到帝国主义全面封锁、又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情况

---

❶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1032.

❷ 朱德副主席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上的讲话. 新体育，1950（1）：7.

❸ 冯文彬. 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 新体育，1950（1）：8.

❹《新体育》发刊词. 新体育，1950（1）：6.

❺ 冯文彬. 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 新体育，1950（1）：8.

下，学习苏联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它有利于加快新体育建设的步伐。

1. 广泛宣传苏联体育成就与经验

1950年《新体育》杂志一创刊，就把对苏联体育的介绍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如在创刊号发表的牟作云《今日苏联的体育》一文中，从苏联体育的发展历史、运动的原则与方法、制度与作风、体育组织以及体育师资培养、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竞赛与奖励制度等方面作了全面的介绍。同期还刊文介绍了苏联的全苏联运动会大会、冬季运动会、儿童夏令营等，对苏联体育纪录保持者也作了相关介绍。在1950年8月的《新体育》第2期上，又对苏联的"劳动与国防准备"的体育标准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1952年3月总第17期《新体育》还对苏联中小学体育教学法进行了系统、详细的介绍，同时讨论了如何"积极地学习先进的苏联体育教学方法"的问题。其中有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列宁格勒省委军事体育部部长乌·荷姆斯柯夫的《青年团组织与基层体育组织》、基辅医学专门学校医疗体育讲座讲师恩·柯拉布列夫的《智力劳动者的体育》、斯达利科夫的《苏联学校体育》等苏联作者的文章。除此之外，还有苏竞存的《谈苏联中小学体育教学法》。

除了利用媒体对苏联的体育经验进行介绍之外，一些访苏的团体和个人回国后也利用各种机会向人们广泛宣传苏联在体育上的成功做法。如1954年贺龙率中国体育代表团访苏回国以后，专门作了题为《苏联的体育运动是推动共产主义建设的力量》的报告，其中提到"对于苏联的体育运动事业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苏联体育运动的群众性已经发展到全民的规模"，并特别提到苏联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对于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的巨大作用。报告还提到了苏联的体育运动正是在广泛发展的基础上，使运动员队伍不断地壮大起来，并在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方面获得了重大成就。报告特别指出："体育运动在我们这个年青的国家里是个尤其年青

的事业，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以伟大苏联为榜样，踏实地工作，顽强地学习”[1]。

对苏联经验的学习有力地加快了新体育建设的步伐，推动了体育事业的发展。正像《新体育》在1955年2月号的社论中所说的：“我国人民体育事业一开始就肯定体育运动为人民健康、为生产和国防服务的崇高目的，以及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工作方针。”“在提高运动技术方面，我国运动员已经和正在学习着苏联运动员训练方面的‘全面发展，重点提高’‘全年训练’‘最大训练量’等科学原则和各项运动的先进的技术方法。”社论还说：“苏联体育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运动技术是先进的，所以我们还得努力学习苏联体育理论和多种运动技术。”[2]

除了通过报刊、报告、出访等方式学习和宣传苏联体育的经验，当时还邀请了许多苏联体育专家等来华访问讲学。随苏联青年代表团访华的达拉索夫是第一位来华访问的苏联体育专家。达拉索夫生于1918年，是苏联功勋体育家，擅长冰球，亦任过卡基尔的足球队长。在华期间他与首都体育界进行了两次座谈，作了一次演讲。主要介绍了苏联体育事业的建设情况，如体育师资的培养、体育宣传、大众体育等问题，并特别介绍了苏联实行的“劳动国防制度（成年组）”和“准备参加劳动国防制度（未成年组）”，阐述了体育与政治的关系，以及体育与卫生保健的关系等理论[3]。1950年7月，新中国在北京清华园举办了首期“全国体育工作者暑期学习会”，专门邀请了苏联体育专家戈尔节拉则作演讲，主题是“关于苏联体育运动的性质、目的、组织形式”。戈尔节拉则还就苏联体育在学校中的地位、苏联体育的宣传与出版、苏联体育社团情况等分别作了介绍，使参加学习会的全体人员对苏联体育有了更深刻和

---

[1] 贺龙. 苏联的体育运动是推动共产主义建设的力量. 新体育，1954（48）：4，6.

[2] 《新体育》社论：进一步学习苏联的体育理论和经验. 新体育，1955（51）：3.

[3] 本社. 达拉索夫同志在首都体育座谈会上谈苏联的体育. 新体育，1950（2）：7.

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1953 年，中央体育学院成立不久就设立了研究部，聘请苏联体育专家凯里舍夫为研究生讲课和指导，从而培养了新中国的第一批体育理论研究生。凯里舍夫是莫斯科中央体育学院的讲师，他在中央体育学院研究部的讲稿《苏联体育教育理论》于 1956 年 11 月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凯里舍夫是对中国体育理论影响最大的一位苏联专家。

凯里舍夫的体育教育理论体系，基本上移植自苏联中央教育科学院院长凯洛夫教授的教育学体系，理论上并没有多少创新，对体育问题的说明也失于表浅。但对长期只知道日、美体育思想的中国体育界来说，却十分新鲜，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波。它结合当时正在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促使中国体育界对体育，特别是对体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学习和思考，促进了中国体育理论学科的形成，对中国体育，特别是对中国学校体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联体育教育理论》全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体育教育理论的一般原理”，主要讲授了体育教育的思想基础和自然科学基础，阐述了苏联体育教育制度的本质及特点，说明了劳卫制和体育教育的基本手段，讲述了体育教育过程的基本原则，即教学、教育和教练方法、作业的组织形式和其他问题等；第二部分是“学龄前及学龄儿童体育教育的理论和教法”，主要是根据体育教育理论一般原理，阐明了幼儿园和中小学体育教育的组织、教学法，以及内容等；第三部分是“高等学校体育教育的理论和教法”，主要讲授与高等学校体育教育特点有关的各种问题；第四部分是“业余体育组织体育教育的理论和教法”，主要是根据苏联体育教育理论的一般原理阐述志愿体育协会和企业与机关体育团体的体育教育问题。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它对我国后来建构“体育理论”体系确实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表 1–1 是凯里舍夫《苏联体育教育理

论》讲稿与我国1962年出版的体育学院本科《体育理论》讲义[1]内容的比较。

表1-1 凯里舍夫体育理论体系与中国体育理论体系的比较

序号	凯里舍夫“体育理论”内容	1962年中国“体育理论”内容
1	苏联体育教育理论的对象	绪论
2	体育教育在苏联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国体育运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3	苏联体育教育制度	服从全局、结合各项工作开展体育运动
4	苏联体育的准备劳动与卫国综合制度	群众路线是开展体育运动的根本方法
5	身体练习的特征	“两条腿走路”、普及和提高相结合是多快好省地发展体育运动的方针
6	苏联体育教育制度中的游戏、体操、运动和旅行	组织领导和措施
7	体育教育过程中及运动教练中的教学与教育	教学和训练
8	体育教育中作业的组织形式	教学、训练的组织和计划
9	教学教育和教练工作的计划与考核	运动竞赛
10	家庭的儿童体育教育	我国的体育科学研究工作
11	学前教育机关的儿童体育教育	学前教育
12	中小学体育教育	学校体育
13	高等学校中体育教育的目的和任务	厂矿、企业、机关体育
14	高等学校中体育教育的领导	农村体育
15	高等学校中体育教育工作的形式和内容	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16	高等师范学校中体育教育的内容和组织的特点	国际体育活动

（接续表）

[1] 凯里舍夫. 苏联体育教育理论.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62.

（续表）

序号	凯里舍夫“体育理论”内容	1962年中国“体育理论”内容
17	医学院中体育教育的内容和组织特点	
18	大学生的体育教育作业的组织与方法	
19	体育教研室的科学研究工作与科学教学法工作	
20	高等学校中的群众体育工作	
21	工会系统中业余体育运动的组织和领导	
22	业余体育组织中的教学运动工作	
23	志愿体育协会中的群众体育工作	
24	公共休息场所的群众体育工作	
25	生产过程中的体育措施	
26	组织乡村体育工作的特点	

新中国的体育理论学科体系是在苏联体育理论指导下创建起来的。这个体系的总体特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基础，以巴甫洛夫学说为自然科学基础，并依据教育学原理来指导。具体表现为：第一，从阶级性、工具性方面来界定体育的社会性质和社会职能；第二，强调体育的国家性、统一性和人民性；第三，突出了体育和其他社会现象的不同之处就是发展人的体质，并确定体育是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手段；第四，重视教学过程以及运动技能技巧传授❶。凯氏体育理论学科体系由于较好地解说了体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解说了党和国家关于开展体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以及贯彻方针、政策的根本方法和措施；解说了体育教学、训练工作的基本规律，以及体育运动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解说了开展厂矿、机关、企业、农村、学校等基层体育运动的基本方法等，因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所以后来一直被作为我国体育专业

❶ 陈融．新中国体育思想的阶段特征．体育文史，1999（1）：4-9.

教育的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程。

1953 年 9 月，苏联多次绝对冠军获得者、功勋运动员纳·谢里以苏联体育代表团总教练的身份来访，并作了《苏联的体操运动》的演讲。他介绍苏联体操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卫生体操，一类是辅助性体操，一类是器械体操。卫生体操一般是在早晨根据广播或独自进行的一种体操，一般称为“早操”，由 8 节到 12 节练习组成，时间 10 ~ 15 分钟，分为妇女体操和老年体操两种。辅助性体操主要是运动的辅助性体操，对各项运动员都有益处，又可分为生产体操和医疗体操。器械体操除包括竞技器械体操外，还包括了艺术体操和技巧运动。

纳·谢里还向中国体育同仁介绍了体操的现代训练方法，讲解了全年训练计划和训练课，并介绍了运动员分级标准，即关于体操运动员的三级、二级、一级和运动健将的标准[1]。纳·谢里讲学的内容，对我国后来的“工间操”制度和运动员等级制度都有一定影响。

2. 选派运动员赴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深造

20 世纪 50 年代，加强与苏联及东欧国家体育交往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我国选派了部分年轻运动员赴这些国家学习深造。在贺龙同志率中国体育代表团访苏时，就派遣运动员赴苏学习与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达成了协议。1950 年 8 月 28 日，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副主任徐英超为团长的赴苏联体育访问团前往苏联访问，成员有王克（副团长、解放军代表）、李一青（秘书长、西北区代表）、轲犁（副秘书长、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秘书）、杨钟秀（东北区代表）、陈镇华（中南区代表）、胡理和（西南区代表）、黄狮（华东区代表）、杨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宋君复（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全运设计委员会主任）、吴功俊（天津体育分筹会秘书长）、魏云峰（翻译）。

[1] 纳·谢里. 苏联的体操运动. 新体育，1953（10）：18-19，（11）：20-21.

1953 年 6 月，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在去布加勒斯特参加第 1 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途经苏联时，在莫斯科逗留了两个星期，向苏联运动员学习，改进了自己的训练，在测试中 100 米仰泳成绩缩短了 5.2 秒。1954 年 10 月，吴传玉又被派往匈牙利继续学习和深造。

1954 年 5 月 9 日—8 月 24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男子篮球队，由领队王克率领于 5 月 9 日—6 月 1 日访问了匈牙利，6 月 3 日—22 日访问了波兰，6 月 26 日—7 月 26 日访问了保加利亚，7 月 28 日—8 月 24 日访问了罗马尼亚。

1954 年 4 月和 10 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我国先后派出两批共 25 名足球选手赴匈牙利学习、训练。当时的匈牙利足球队是世界足坛霸主。1952 年，匈牙利国家足球队创造了“四前锋”阵形，并运用该阵形获得了第 15 届奥运会足球赛冠军。1953 年匈牙利两次大胜英国队，震动了国际足坛。1954 年，匈牙利队获第 5 届世界杯足球赛亚军。匈牙利足球界给了中国无私的帮助，在匈牙利专家安姆贝尔·约瑟夫的精心培育下，中国运动员在匈牙利打下了良好的技战术基础。两批运动员于 1955 年 10 月回国，他们中的张俊秀、张宏根、年维泗、陈成达、曾雪麟等人，后来都成了中国足球的骨干力量，不少人成了足球界的领导和教练员，为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 月 29 日—12 月 13 日 中国青年足球队由领队柯轮率领，于 9 月 29 日—10 月 19 日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1 月 26 日—12 月 13 日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

1954 年 7 月 13 日—8 月 17 日中国体育代表团 15 人，由团长贺龙率领，访问了苏联，并参观了苏联体育节。7 月 23 日—8 月 2 日，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代表张鸣等 2 人，以观察代表身份参加了在保加利亚举行的第 8 届黑海旅行活动。7 月 31 日—9 月 8 日 中国学生体育代表团（包括男女篮、排球、游泳、田径、乒乓球队）

[1] 朱永和，等. 世界体育大事典.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1993：344.

128人，由团长张之槐率领，参加了7月31日—8月8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第12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排球队于这次运动会前后曾访问苏联，8月11—15日访问了匈牙利；篮球队于8月17日—9月8日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乒乓球队于8月24日—9月4日访问了保加利亚。8月24日—10月8日 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代表团3人，由团长任超率领于8月24日—9月29日在苏联参观了航空模型比赛和国际摩托车友谊比赛，10月3—8日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参观了国际射击比赛。

1954年4月和1955年5月，我国又先后两次派出24名男女游泳运动员赴匈牙利布达佩斯体育学院接受游泳专门训练[1]。匈牙利派出了著名游泳教练员沙罗什·伊姆切负责中国运动员的训练。赴匈牙利时，我国游泳水平很低，男运动员还游不过匈牙利的女选手，当时我国既无比较科学系统的游泳教学和训练方法，又缺乏专业人才，因而在这批运动员中抽调了熊开发、涂广斌、潘静娴、吴旭新4人为助理教练，逐渐学习和掌握了一整套游泳教学和训练方法，他们回国后都成了我国著名的游泳教练员。中国游泳队在匈牙利学到了先进的游泳技术，增长了见识，竞技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赴匈训练前，我国的蝶泳运动员均采用蛙式蹬夹腿，当见到匈牙利运动员采用海豚式腰腿动作，并创造出较好的运动成绩时，立即模仿并采用了这一先进技术，比之蛙式蹬夹腿，这种技术在动作结构上更趋于合理，可大大减小阻力，从而大幅度地提高了成绩。在匈牙利训练期间，中国运动员多次参加国际比赛，他们学成回国后，均成了中国游泳队的中坚力量，其中吴传玉、穆祥豪、陈运鹏、穆祥雄等人，后来为中国游泳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排球界在20世纪50年代主要也是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排球在亚洲经历过十六人制、十二人制和九人制。1927年由十二人制改为九人制后，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

[1] 国家体委文史委，中国游泳协会. 中国游泳运动史.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74.

流行的仍是九人制排球，并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打法。50 年代，世界高水平的排球队都集中在苏联、东欧等国家，“世界青年联欢节”“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高水平的排球赛及国际性排球比赛都采用六人制。为了适应国际比赛的需要，1954 年 6 月至 9 月，中国男女排球队在参加“第 12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排球比赛的前后，在苏联学习和访问了两个多月。苏联选派了功勋运动员、莫斯科大学体育教师达玛娜和苏联航空学院男排教练员卡里洛夫担任中国女排、男排指导。后者所执教的苏联航空学院男排是全苏男排锦标赛冠军队，以“后排插上”快速配合的技、战术为特长。卡里洛夫将此技、战术传授给了中国男排，并给中国男排在比赛中运用的一些独特打法起了“学名”，如“交叉”“梯次”等。中国男女排在莫斯科、里加、基辅、明斯克、哈尔科夫、第比利斯等城市边学习、边训练、边比赛。女排共打比赛 16 场，胜 9 场；男排共打比赛 18 场，胜 5 场。技、战术水平均有了提高。运动员开阔了眼界，进一步了解了六人制排球的技、战术和比赛特点，既看到了自己灵活快速的长处，也找到了技术片面攻强守弱的问题。回国后，教练员和队员讨论、整理出版了《六人排球技术》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六人制排球的几项主要技术和基础攻、防战术。这是新中国较早的一本排球专业书籍。

为了迅速提高我国举重运动水平，1955 年 5 月，我国选派了 9 名青年举重选手去苏联学习[1]。其中有陈镜开、黄强辉、赵庆奎等人。苏联选派了著名教练员普斯特沃依特和奥西波夫负责中国青年举重队的训练工作。中国运动员虚心好学，刻苦训练，较好地掌握了推举、抓举和挺举技术，并了解了竞赛规则，丰富了比赛经验，运动成绩大大提高。在回国前与苏联运动员进行的友谊比赛中，先后有 8 人 36 次打破 18 项全国纪录。苏联教练员对中国运动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预言将在他们中间出现世界纪录创造者。奥西波夫

[1] 国家体委文史委，中国举重协会. 中国举重运动史.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

教练还在赠给陈镜开的照相簿上写道："祝你在最近两年内，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举重运动员，并创造挺举世界纪录。"1955 年 10 月 21 日，中国青年举重队在苏联经过 5 个多月的训练后，返回北京。10 月 28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我国新建的第一座大型体育馆——北京体育馆，观看了刚从苏联归来的中国青年举重队的表演。仅仅 7 个多月后，于 1956 年 6 月 7 日，陈镜开就以 133 公斤的成绩，打破了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成了我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这个成绩冲开了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第一个突破口，掀开了中国体育冲击世界纪录的第一页。

1955 年 6 月 10 日—10 月 21 日，我国派体操队去莫斯科斯大林体育学院学习。赴苏学习的有陆恩淳、郭可愚、戚玉芳等 17 名男女运动员和教练员宋子玉、李民英（女），领队吴江平、陈风平[1]。苏联体委选派了优秀体操教练员普洛特金、阿历山大洛夫、伊万洛娃、维列耶姆以及技巧教练员和钢琴伴奏帮助中国体操运动员训练，苏联著名的体操运动员朱卡林、季托夫等也常来与中国运动员共同训练。学习期间，中国体操选手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体操理论和训练法。对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运动技能形成理论也有了初步了解。苏联体操训练中关于多年规划、年度训练计划、周期训练法、大运动量训练法、蒸气浴控制体重等方法，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中国体操的训练实践有着重要影响。在苏联学习期间，中国体操队参加了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第 2 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的体操比赛。这是中国体操队员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他们第一次看到体操台和单杠下面的草坑保护设备，回国后，在中央体院的练习馆里也挖了个草坑，成了以后海绵坑的前身。这些在苏联学习的队员后来都成了我国体操队的骨干，为推动我国体操技术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赴苏的运动员在苏联还掌握了国际体操联合会制定并

[1] 陈镇华，等. 中国体操运动史.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280.

公布的第 16 届奥运会体操比赛规定动作。1956 年 4 月，我国将此套动作当做全国体操比赛中甲组比赛的规定动作，即我国体操运动健将的规定动作，这是我国体操向国际化、正规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三、体育管理体制的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基本建成了较完备的体育管理体制，其基本特点是：以团中央为主管领导，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具体负责，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等部门系统协作工作的体育管理模式。

（一）创建新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

1. 体育行政管理体系的建立

1952 年 7 月，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 15 届奥运会。在这届奥运会上，首次参赛的苏联代表团获金牌 22 块，奖牌 71 块，金牌数和奖牌数均居第 2 位，总分与美国并列第一。这给中国代表团很大刺激。回国途中，代表团参观了苏联的体育设施，并全面考察了苏联体育运动，特别是体育管理方面的情况。回国后，于 8 月 21 日，团中央军体部部长、全国体总秘书长荣高棠上书党中央，汇报我国参加奥运会的情况，并就加强体育工作提出四点建议。9 月 6 日，教育部长马叙伦又把内容相似的建议上呈政务院。

两份报告都指出：“目前我国体总只是一个群众性的体育组织，以此机构来领导我国体育运动，实不相称……加强我国体育运动的领导工作，首先应加强领导机构。因此我们建议，在政务院下设一下全国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最好请贺龙同志任主席……”报告送刘少奇批示同意并呈毛泽东主席阅后送邓小平副总理办理。几

天后，邓小平向荣高棠作了五点指示：

第一，体委现在就搭架子，暂时由你牵头具体筹备；

第二，从军队和地方招运动员；

第三，建体育场；

第四，办体育院校；

第五，准备明年开全国运动大会。

在邓小平果断明确的部署下，建立体委的各项筹备工作迅速落实。1952 年 11 月 15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19 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中央体委，1954 年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任命贺龙为委员会主任，蔡廷锴为副主任。原计划由团中央转到教育部领导的体总和国防体育俱乐部改由中央体委接管。1954 年 9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名，通过了国务院组成人员人选的决定，贺龙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1 月 1 日国务院任命蔡廷锴、蔡树藩、卢汉、黄琪翔、荣高棠为国家体委副主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部级国家体育行政机关。

中央体委在 50 年代实行的是委员制。1953 年 9 月 18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28 次会议通过任命了中央体委的第一批委员，包括政务院各部和解放军的有关负责人，以及个别体育界知名人士（如吴蕴瑞、徐英超等）。在地方，全国县以上政府也逐步设立了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它们是同级人民政府主管本地区体育的行政部门，并受同级人民政府及上级体委的领导。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体育管理的组织体系方面，逐渐形成了体育管理的三大组织系统，即形成了体育管理的国家行政部门系统、军队系统和社会组织系统。并在体制建设方面有了基本的格局，这就是中央体委所实行的委员制、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会员制和国防体育协会的俱乐部制。

国家行政部门系统主要包括两大块：一是中央体委，一是相关

部委。中央体委的组织机构是根据1956年3月23日由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组织简则》设立的，它是中央人民政府主管体育的部门，负责统一领导、协调、监督全国的体育事业。中央人民政府相关部委分别主管本系统的体育工作，并与国家体委相配合。如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是教育系统体育工作的主管部门，它所设置的体育处（后为体卫司）是负责具体管理工作的职能机构。教育部通过地方各级教育厅、局，管理各级各类学校的体育工作。卫生部主管卫生系统的体育工作，并通过地方各级卫生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体育医疗，配合做好对体育的医务监督，以及学生的健康检查和体质调查。体委和其他部委在有关体育的重大问题上，通过体委的全体委员会加以协调。

军队系统主管体育工作的是军委总政治部（后改为总参谋部，现由三总部组成的体育运动指导委员会作为管理军队体育的职能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制订军队系统体育的规划和计划；实施军事训练中的身体训练工作；管理军队院校体育工作；举办全军运动会和各类运动竞赛，组织参加全国运动会和各类运动竞赛；培养军队系统的优秀运动员；开展国际军队间的体育交往；计划和修建军队系统的体育设施；负责军队体育所需的经费和给养等。“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则是群众性的国防体育组织，它负责开展群众性的国防体育运动。

社会组织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社会体育组织：主要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它实行的是会员制，它在省、市、县建立有各级地方分会，在厂矿、机关、学校、农村等基层单位建立有体育协会。二是社会群众团体：主要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以及全国妇联、全国青联、全国学联等社会群众团体。三是民间体育组织：这是一些得到上级体育部门承认，并接受其指导、监督的体育组织。

2.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1949年4月正式成立的（1957年5月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其工作纲领中规定：“发扬青年爱好活动、团结互助和创造的精神，组织青年的文化娱乐活动，加强体格锻炼，并建立各种文化的、艺术的、娱乐体育等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年团受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托，负责组织和管理全国的体育。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同时兼任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的主任。为了使体育活动成为“有制度、有组织、有领导的运动”，从组织上保证体育工作的落实，1951年8月4日，团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县级以上各级团组织建立“军事体育部”，区及区以下设军事体育委员，大城市的区设军事体育部，作为各级团委在开展群众性的军事和体育工作中的助手。通知除提出了军事体育部的业务要求以外，还提出“帮助各级团委制订或起草有关群众性军事、体育工作的计划、决议、指示和报告。”特别要求“各级团的组织，必须十分重视群众性军事、体育工作，应即设法调派对军事和体育有经验的优秀干部，分别担任军事体育的各种职务，于1951年底以前，必须将各级军事体育部门建立健全起来，并初步开展工作”[1]。

为了使各级团组织的军事体育部和军事体育委员进一步明确军事体育工作的业务范围，以便更好地领导和组织群众性的军事体育工作，在1952年《新体育》的总第17期上，特意发了一篇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列宁格勒省委军事体育部部长乌·荷姆斯柯夫关于《青年团组织与基层体育组织》的专文，文章明确指出了团的基层组织领导与组织体育运动工作的原则和办法，以供各地团的基层组织学习和参考。

[1]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291-292.

新中国成立初期，青年团在认真贯彻党和政府的体育方针、政策，广泛团结全国体育工作者，积极组织社会力量，放手发动群众，努力建设新体育等方面，较好地发挥了领导作用。早期较大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和竞赛活动都离不开青年团的领导或参与。例如在竞赛活动中，为了配合1951年“五四”青年节（5月4—18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篮、排球比赛大会，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比赛。在这次比赛中选拔了1951年度全国篮、排球选手及候补选手。其中，男子篮球选手：么世忠、王琦、王元琪、李汉亭、余邦基、唐振声、徐仲巳、张长禄、黄柏龄、程世春、杨福鹿、赵学元、卢鼎厚、蓝文治、乐嘉洲。候补选手：刘建华。女子篮球选手：李丹阳、朱锦云、周勤邦、马申妹、徐婉秀、黄珍、许敏、彭嘉颐、郑于莲、蔡明霞、薛月华。候补选手：鲍临津、杨淑君。男子排球选手：王祖洪、江振洪、李荣国、李安格、余瑞河、沙里木江、孙志安、黄亨、黄福彦、钱家祥、卢文枬、韩延春、谭元芳、饶余榕。候补选手：孙继贵。女子排球选手：冼少梅、花桂卿、马纫华、陈梅贞、徐平、张履冰、张雷鸣、刘匡生、萧兰玉、龚雅丽。候补选手：李文秀。

同时，团中央会同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下发了《关于动员参加1951年全国篮排球比赛大会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应积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即将举行的1951年全国篮排球比赛的分区预赛，并通过这次比赛，争取在各地区建立篮排球运动经常的基层组织，使体育运动成为经常的群众性的活动，以便加强祖国的国防与生产建设的力量。”[1]并专门确定了宣传口号，如“广泛开展人民的体育运动”“将篮排球运动首先普及到学校、工厂、部队和机关中去！使体育活动成为经常的群众性的活动！”等。1951年11月4日，在群众体育工作方面，青年团中央又专门下发了《关于青年团组织参加1951年冬季体育运动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团

[1] 关于动员参加1951年全国篮排球比赛大会的通知. 新体育，1951（9）：4.

委及团的基层组织在1951年冬季，广泛“开展各种适合于冬季的、少花钱或不花钱的、为群众所欢迎的各项运动（如早操、器械操、竞走、越野赛跑、篮球、足球、爬山、国术、举重等），以及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群众性体育运动（如华北、东北地区的冰上运动，西北、内蒙古地区的骑马、打猎等；在农村中，可进行国术、石锁、沙袋、举重及其他民间流行的体育活动）。在开展上述运动条件不够的地区，则至少应开展群众越野赛跑及体操。不久即将公布实行的广播早操，各地均应大力推行。”冯文彬专门为开展体操活动题词“体育是锻炼身体的最基本的方式，应当努力加以提倡和推广，这是使国民体育普及化与经常化的重要基础。全国男女青年们！希望你们积极参加早操，参加各项体育活动，锻炼出钢铁般的体魄，培养自己具有坚毅、顽强的意志，为建设与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而奋斗。”❶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到1952年上半年，团中央鉴于全国体育的发展和团自身的特点，认为继续由团中央主管全国体育工作已不太合适，冯文彬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为了进一步理顺全国体育管理的关系，建议改由教育部主管体育。中央同意了这一建议，所以在1952年6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时，改由教育部长马叙伦兼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主席。

3.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在1949年10月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的体育组织。

1952年6月20—2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共有147名代表出席了大会，成立大会由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冯文彬致开幕词。会议听取了荣高棠《为国民体育运动

❶ 新体育，1951（15）：4.

的普及和经常化而奋斗》的报告，通过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通过了将《新体育》作为全国体育总会机关刊物并继续出版的决定。在成立大会上作重要讲话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郭沫若、教育部副部长韦悫、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全国总工会文教部部长刘子久和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部长康克清等。会议选举朱德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名誉主席，马叙伦为主席，韦悫、萧华、刘宁一、李德全、荣高棠、马约翰为副主席，荣高棠兼秘书长，黄中为副秘书长。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都为成立大会作了重要题词。毛泽东主席的题词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朱德副主席的题词是："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并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发出了《关于贯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的今后体育运动方针任务的联合通知》，通知指出："今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必将推动体育运动在全国进一步组织有领导地发展。"❶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其成立时通过的章程中明确写道："本会宗旨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共同纲领第48条'提倡国民体育'的规定与人民政府有关发展体育的政策，协助政府组织、领导并推进国民体育运动，为增进人民身体健康及为国防与生产服务。"其任务是："制定全国体育运动计划，并领导与督促全国各体育组织实施之；制订并公布各种有关体育运动的制度及规则；负责国际间体育运动事务联络的工作；举办全国性的运动竞赛会，选拔并训练各项运动的国家选手；编审体育运动的书刊；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体育运动的宣传教育工作；培养体育工作

❶ 新体育，1952（21）：8.

干部；设计并审查全国重要运动场地建筑设备及运动用品。”❶

在机构设置方面（图 1–1），规定总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会主持委员会闭会期间的日常工作。常务委员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国际联络处、秘书处、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各项专门委员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各大行政区设体育总分会，在省、市、县设体育分会，在各基层单位设体育委员会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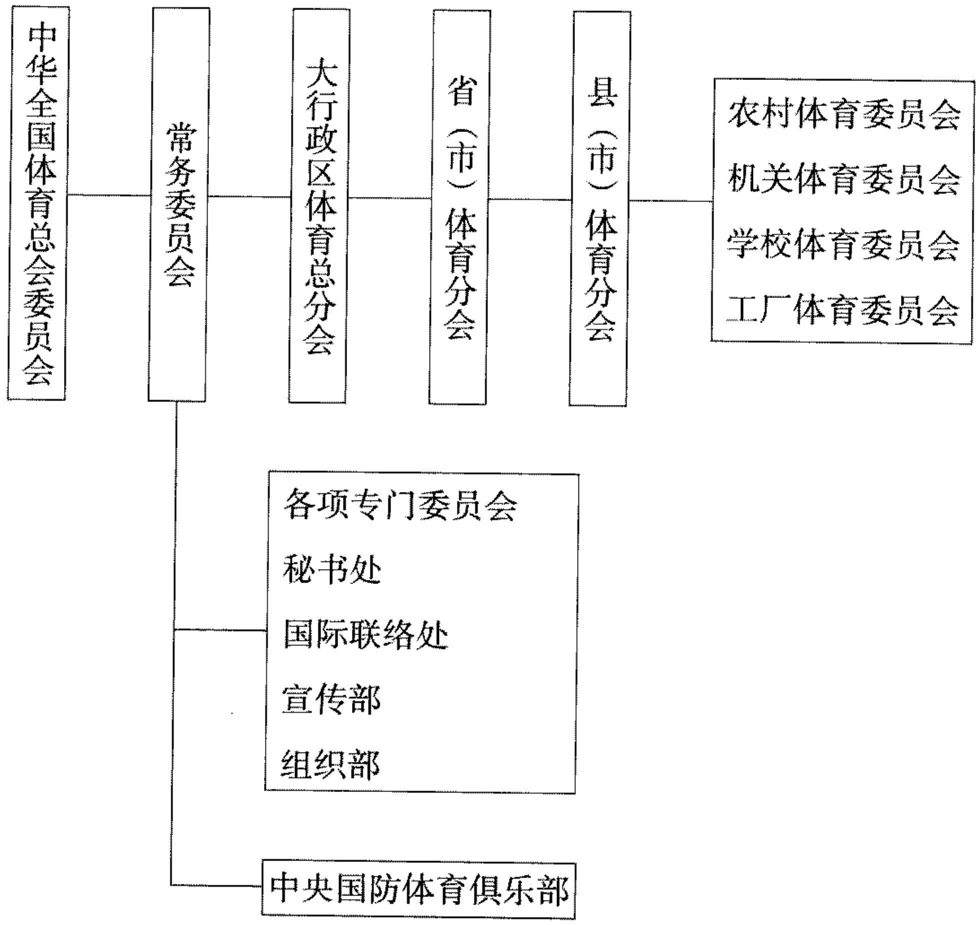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机构设置

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

❶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 新体育，1952（21）：18.

❷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 新体育，1952（21）：18.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第二条　本会宗旨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共同纲领第四十八条“提倡国民体育”的规定与人民政府有关发展体育的政策，协助政府组织、领导推进国民体育运动，为增进人民身体健康及国防与生产服务。

第三条　本会工作

一　制订全国体育运动计划，并领导与督促全国各体育组织实施之。

二、制订并公布各种有关体育运动的制度及规则。

三、负责国际间体育运动事务联络的工作。

四、举办全国性运动竞赛会，选拔并训练各项运动的国家选手。

五、编审体育运动的书刊。

六、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体育运动的宣传教育工作。

七、培养体育工作干部。

八、设计并审查全国重要运动场地设备及运动用品。

第二章　组织

第四条　本会最高权力机关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会，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选举主席一人、副主席六人、委员六十五至七十人组成之；并由主席、副主席及委员中互选之常务委员若干人、秘书长一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主持委员会闭会期间之本会经常工作。

常务委员会下设：

1．组织部

2. 宣传部

3. 国际联络部

4. 秘书处

5. 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

6. 各项专门委员会

本会各部门工作人员由秘书长提请常务委员会聘任之。

第五条 本会在各大行政区设体育总分会，省（市）、县（市）设体育分会。各级体育机构可设组织、宣传、运动竞赛、秘书等工作部门。

第六条 本会在各基层单位中（如工厂、学校、机关、农村等）建立体育基层组织——体育委员会，体育委员会下可组织各运动小组。

第七条 本会根据工作需要得建议各职业系统逐级设立群众性体育组织，其组织章程由该系统领导机构与本会共同制订之。

第三章 经费

第八条 本会各级组织所需经费及事业费统由国家预算开支。

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 本章程解释权属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马约翰先生1951年所作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八个月来的工作报告》统计（表1-2），当时在各地人民政府和青年团工委的领导与协助下，已经有北京、山西、松江、旅大、哈尔滨5省市成立了正式的体育分会；东北和中南二区成立了总分筹会；天津、察哈尔、内蒙古、辽东、西安、上海、济南、青岛、徐州、武汉、湖北、长沙、江西等13省市成立了分筹会。此外，兰州、宿县、衡阳、无锡、齐齐哈尔、沈阳、鞍山等地也有体育会的组织。在辽东省则有三分之二的县市建立了支会组织。

表 1-2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各级组织统计表

分会名称	成立日期	会　址	负责人			
			主　任	副主任	秘书长	副秘书长
察哈尔分筹会	1949-12-02	张家口东山坡	王宇辉	周　围、李　伟、许　铭、郭　真、王在民	康益之	
济南市分筹会	1949-11-15	经纬七路青山公园内	李澄之	彭振光、黄　狮、王志安、郭长深	胥　瑞	
长沙市分筹会	1949-11-29	中山公园团市工委				
西安市分筹会	1949-12-20		韩夏存	王耀东、李一青	余鼎章	
青岛市分筹会	1950-01-08					
湖北省分筹会	1950-01-19	武昌人民体育场	江　硖	范宗先		
武汉市分筹会	1950-01-28	汉口江汉路 24 号	陈　先	李岚篑、杨　月、新　有、葛燕璋	徐家成	樊积安
松江省分会	1950-02-03		会长俞时模	陈　模、王昭文、王立疆	王立疆	
哈尔滨分筹会	1950-02-03	道里地段街 177 号	会长陈模	王立疆	关静涛	
天津分筹会	1950-02-14	迪化道 52 号	何启君	康　力、罗爱华、李清安		
辽东省分筹会	1950-03-09	东安市	刘澜波	杨海波、赵正洪		
旅大区分会	1950-03-19	大连市团区工委	刘南生	蒋守全、韩国儒		
内蒙古分筹会	1950-03-19	乌兰浩特市	克力更	包　彦	喀萨巴塔尔	
北京市分会	1950-04-09	地安门内黄化门 5 号	侯俊岩	张大中、李凤楼、段炳辰	田　晖	杨正彦
山西省分会	1950-05-11	太原杏花岭人民体育场	王中青	席炳午、武汝杨	陈盛甫	毛明远、李子康、张成德
江西省分筹会	1950-06-01	南昌青年团工委转	吕　良	吴清明、章瑞麟		
徐州市分筹会	1950-01	徐州民主路 28 号团市工委转				
上海市分筹会		陕西北路 128 号	李　昌	朱　良、纪　康、梁兆安、蔡演雄、吴邦伟		

附注：中南区总分筹会、齐齐哈尔市分筹会、吉林市分筹会、新疆省分筹会、兰州市体育会筹备会，均在 1950 年上半年成立。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建设新体育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做了大量的工作：

培养了大批体育干部。体总成立以后，通过举办各种学习会、培训班等，培养了大批体育干部和体育骨干。1950年7月，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就在北京清华园主办了“全国体育工作者暑期学习会”。在通知中强调“各地分会、分筹会，在可能条件下，与当地人民政府、青年团工作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体育工作者暑期学习会，包括工厂、部队、农村等各有关干部参加学习”[1]。1950年11月，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又和北京市体育分会共同举办“首都体育工作者时事报告会”，到会者有500多人。特别是1951年7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又下发了《为各地体育总分会、分会在暑期举办体育工作者学习会和业余体育干部训练班的通知》。通知认为：“根据体育运动在全国各地日益广泛开展的需要，提高现有体育工作者的水平和培养大批的业余体育干部已成为当前开展体育运动极重要的环节。”因此，“建议各地体育总分会、分会利用暑期，协同当地教育行政机关、卫生部门、青年团、工会、学联等有关单位，结合实际情况举办体育工作者学习会和体育业余干部训练班”。通知还具体地提出体育工作者学习会的学员，“应以中、小学体育教员为主，并吸收大学、工会等其他部门的体育工作者参加”。“学习期间一般为15天至20天”。而业余体育干部训练班，则主要是“组织各大中学、工厂、部队中爱好体育运动和运动技术优良的积极分子参加，学习体育运动方针任务和体育基本知识，并训练体操（包括徒手和器械）、田径、游泳、球类等单项或几项运动的技术和初步的指导、裁判方法。使他们学习后成为本单位开展体育运动的骨干”[2]。

---

[1]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为举办体育工作者暑期学习会的通知. 新体育，1950（1）：15.

[2]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为各地体育总分会、分会在暑期举办体育工作者学习会和业余体育干部训练班的通知. 新体育，1951（12）：5.

根据1952年5月的统计，当时全国专业体育干部的人数很少，远远跟不上全国体育形势发展的需要。所以提出了要大力培养业余体育干部的任务，并且强调培养业余体育干部必须是有计划的、速成的和切合实际需要的。培训时间不宜过长，办法要多，教学的内容要能够解决当地各基层单位中体育工作存在的实际问题。可以选择多种形式，例如组织积极分子与专家的会见，请专家讲述体育知识，或有计划、有系统地组织体育政策报告或体育讲座，学校中的体育教师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培养小先生、业余体育短训班等。当时普遍采用的形式是“业余体育短训班”。短训班在培养具有基本体育知识和体育工作方法的业余领导骨干（组织者、宣传者）和技术指导员方面，既不费很多时间（可以完全利用业余时间），不影响业务工作，又不需要大笔经费，也不受场地设备校舍的限制，效果最好，收效最大。

开展国际体育交往。1950年8月28日，应苏联部长会议全苏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的邀请，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组建了新中国的第一个赴苏体育访问团，以筹委会副主任徐英超为团长的13人访问团，到苏联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考察和学习。1951年2月27日，应印度全国体育协会的邀请，体总又组建了以国际联络处处长吴学谦为团长的中国体育观光团，赴印度参观了1951年在新德里举行的第1届亚洲运动会。1952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派出了以荣高棠为团长的40人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赫尔辛基奥运会是新中国运动员首次参加的奥运会大赛，也是五星红旗第一次出现在奥林匹克赛场。它向全世界人民宣告：新的伟大的中华体育已经崛起，不管今后会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她将是奥林匹克赛场上不可缺少和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

组织各种体育比赛。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的一些体育大赛都是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组织承办的。为了选拔参加柏林第3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出国球队，1951年5月举行了“全国篮、排球

比赛大会”，这是新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性运动会。1951 年 12 月又在天津召开了全国足球比赛大会，这是新中国诞生以后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性的比赛大会。1952 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又在广州举办了全国游泳比赛大会，在北京举办了全国乒乓球比赛大会。

公布和推行《劳卫制》试行条例。1952 年 5 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向社会公布了《〈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试行条例》（草案）、《〈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试行项目标准》（草案），以及《〈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试行项目测验规则》（草案）。推行《劳卫制》的目的，是使国民体育运动广泛地、经常地开展，并保证运动技术不断提高；使每一个国民通过劳卫制的训练获得全面发展，以培养成为健壮、勇敢、坚毅、乐观的祖国保卫者和建设者。这是在当时条例还未经国务院批准正式颁布，人们就已形成的共识。

贯彻新民主主义的体育方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从一开始就注意利用自己比较健全的组织网络，全面贯彻新民主主义的体育方针，特别强调“全国的体育工作者应该不分南北、不分男女老少地团结起来，不要像过去那样闹派别，把自己困在一个小圈子里，彼此不合作，互相瞧不起”。而应该“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与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统一的目标——为国民的健康，为祖国的建设，为保卫祖国巩固国防，毫无界限地团结起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求进步，全心全意地为新民主主义的体育事业而努力奋斗”[1]。要求“各地都应当而且可以在各基层单位如工厂、学校、机关中，广泛建立起运动小组和各种运动队”。并要求“在建立这种组织的时候，首先必须注意它的领导问题，使建立这种组织及其以后的活动有领导地进行；其次要注意培养运动小组和运动队的领导骨干，将体育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加以特别的训练和培养，使他们担任组长、队长或指导、裁判，真正能够领导和指导群众进

[1] 冯文彬. 关于开展人民体育的几个问题. 新体育，1950（3）：5.

行运动。”❶

创办机关刊物《新体育》。1950年7月，新中国第一本体育专业杂志《新体育》创刊，它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主办，由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毛泽东主席为《新体育》杂志亲笔题写了刊名，朱德、郭沫若、马叙伦等为《新体育》创刊分别题词。1952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又通过决定，将《新体育》作为体总的机关刊物，并继续出版。

4. 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

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是1952年仿效“苏联支援陆海空志愿协会”（简称“苏支协”）建立的军事体育领导机构。“苏支协”是当时苏联国防部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的军事教育、训练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根据国防需要训练会员掌握一定的军事技术。1950年11月—1951年1月，中国青年访苏代表团对“苏支协”进行了全面考察。1月18日，刘少奇给部队有关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关于训练航空员、坦克手及其他军事技术人员问题，我记得苏联曾经有过全国航空化学协会，作为民间一般这种训练的组织，不知这种经验如何？……请你们研究一下苏联的经验。”依据刘少奇的建议，由团中央会同解放军总政治部等有关部门研究，并向中央提交了《现阶段开展军事教育的初步意见》，建议试办“中国人民国防自愿协会”，经费由国防经费支出。冯文彬提议用名为“人民国防俱乐部”。9月，周恩来批示：因为国家初建，暂不单独建立全国自上而下的各级协会。同意试办“中央国防俱乐部”，但组织上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合一，经费与体总预算一起处理。遵照周总理的批示，1952年2月，团中央组建了“中央国防俱乐部”，由于俱乐部隶属全国体总，就改名为“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加上了“体育”二字。由团中央军体部部长、全国体总副秘书长黄中兼

❶《新体育》社论：广泛建立各基层单位群众性的运动组织. 新体育，1952（16）：3.

任“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主任。

5. 教育部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是于1949年11月1日在原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和高等教育委员会机构的基础上建立的，首任部长是马叙伦。作为主管全国学校体育工作的体育处是1952年开始在教育部设置的。1952年6月20—2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最后选举马叙伦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教育部副部长韦悫兼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部对全国体育工作的领导可归纳为两方面：

第一是政治思想上的领导。在1950年的全国体育工作者暑期学习会上，马叙伦部长就曾指出：“开展新民主主义体育，是一个艰苦的工作，需要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他要求认真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体育工作者的团结问题，一是体育工作者的学习问题。关于团结问题，他说：“我们务须清除门户之见、宗派思想，不分地区、不分信仰、不分性别，完全团结在一起，新干部要和老干部团结，本地干部要和外来干部团结，学校干部要和社教干部团结，大家都要取长补短，自助助人，把团结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来认识。在方向上、作风上，大家都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才能把体育工作做得更好。”关于学习问题，马叙伦说：“学习问题在我们体育工作者说来也是相当重要的，在过去把锻炼身体的体育科学庸俗化，造成简单的技术科学，使某些体育工作者，自以为置身政治之外，或多或少地沾染了只好运动不好其他学习的不良习气。在解放之后，已经开始有所改进，但仍须继续努力。”[1] 在1951年全国篮排球比赛大会期间，马叙伦又鼓励“青年男女们为了搞好自己的身体，以便更好地为祖国的建设与国防服务，应该经

[1] 马叙伦部长在全国体育工作者暑期学习会上的讲话. 新体育，1950（3）：6.

常地参加体育活动。伟大的祖国的建设与国防是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所有青年男女来参加的”❶。1952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马叙伦在大会的闭幕词中说：“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从实际出发，积极地稳步地把国民体育运动普及和经常化起来。我们要面向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和机关等基层单位的广大群众，采用各种形式，提倡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使全国的体育活动在现有基础上向前发展一步，以锻炼和培养出更多的体魄坚强、智勇双全的祖国保卫者和建设者。”❷

第二是部门系统内的领导。如1951年，为配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举行的“全国篮排球比赛大会”，教育部会同团中央等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动员参加1951年全国篮排球比赛大会的通知》，明确要求全国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应积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即将举行的1951年全国篮排球比赛的分区预赛，并通过这次比赛，争取在各地区建立篮排球运动的基层组织，使体育运动成为经常的群众性的活动，以便加强祖国的国防与生产建设的力量。又如1952年，教育部又会同团中央等单位，下发了《关于贯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的今后体育运动方针任务的联合通知》，指出：“体育运动是一种广泛性经常性的群众活动，也是国家的一项长期的重要的建设事业，对于增强人民体质、加强国防和经济建设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必须在全国各有关机关、团体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得到健全的发展。”所以“我们完全同意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所确定的体育运动的方针任务，并愿积极协助其实现”❸。

6.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体育工作是由总政治部负责的。1950年，

❶ 新体育，1951（11）：5.

❷ 新体育，1952（21）：10.

❸ 新体育，1952（21）：8.

总政治部提出"要大力开展部队体育活动"。1951年总政治部会同教育部等单位，共同下发了《关于动员参加1951年全国篮、排球比赛大会的通知》，要求在人民解放军中提倡与普及体育运动，并使之成为经常的活动，以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同时决定派人民解放军代表队参加1951年全国篮、排球比赛大会。1952年，总政治部又会同教育部等下发了《关于贯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的今后体育运动方针任务的联合通知》。在1952年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上，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还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并在大会上代表军队作了重要发言，他说："我们特别感谢体总筹委会，他们从一开始就对'体育应为国防服务'这一方针规定得很明确，这和人民解放军的'体育服务于部队建设'的方针是一致的。在体总筹委会的指导与帮助下，人民解放军的体育运动得到很大的发展。体总正式成立后，我们更希望在过去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指导我们，帮助我们，尽快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把各地人民国防俱乐部建设起来，大力开展新国民体育运动，以配合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国防军的建设。"[1] 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举办了新中国的首届全军运动会。

1955年，在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下设立了管理全军体育训练和体育工作队的体育局。1957年，军队中的群众体育工作也划归体育局统一领导。以后管理全军体育工作的职能部门是三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组成的体育指导委员会。

（二）建立体育规章制度

国家体委在建立运动竞赛制度的同时，也逐步建立了优胜奖励制度。1956年3月，国家体委就在各级运动会中试行奖励。1957年3月13日，国家体委正式公布了《关于各级运动会给奖方法的暂行规定》，从而建立了我国最初的运动会奖励制度。《暂行规定》

[1] 新体育，1952（11）：13.

强调了实行运动会奖励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激发广大运动员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不断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以推动我国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开展”。奖励的具体对象是：“各级运动会各种竞赛项目的团体奖及集体竞赛项目（如篮、排、足球等）的个人奖均奖前3名，其他项目的个人奖奖前6名。…… 各级运动员各种竞赛项目每名团体奖的最高价值规定为：全国运动会80元；省、自治区、直辖市运动会30元；省辖市运动会15元；县运动会5元。……各级运动会对于成绩特别突出，进步特别快的优胜队或优胜运动员的教练员应给予适当奖励。每人奖品的最高标准为：全国运动会50元，省、自治区、直辖市运动会及以下各运动会20元。”同时还明确规定：“在国际竞赛中获得较大成绩之运动员及其教练员，由国家给予更高的特殊奖励。”❶

配合运动竞赛制度的建立，1956年4月28日国家体委还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等级制度条例》（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裁判员等级制度条例》（草案），1957年3月27日又公布了《关于如何审查与承认省（自治区）、市最高纪录的几点规定》。这样，初步形成了从运动人才培养到运动竞赛的竞技运动体制。

四、初创体育新闻出版事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我国体育新闻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体育的宣传与普及工作。为了贯彻党的体育方针与政策，宣传与普及体育运动，

❶ 国家体委关于各级运动会给奖办法的暂行规定//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752-753.

增强人民健康，《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大型综合性报纸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辟了体育专栏，对体育运动发展的最新消息进行及时报道。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媒体都把宣传与普及体育运动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

例如，194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对北京市人民体育大会的召开进行了报道。1950年7月，《新体育》杂志创刊，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新体育》题写刊号，朱德同志为该刊题词，从而揭开了新中国体育新闻事业的新纪元。

1951年由“新体育社”编辑、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审订、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新体育小丛书》一套共6本，分别是《九人排球规则》《足球规则》《田径赛规则》《器械体操规则》《游泳及跳水规则》《六人排球规则》。同时出版的《新体育丛书》一套5本，分别是《苏联体育运动的“准备劳动与卫国”制度》《游戏自学法》《体育舞蹈》《人民体育运动的方针和任务》《反动堕落的美国体育》。

除了文字图书以外，为了配合广播操的普及和宣传，中国邮政还于1952年6月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套体育邮票——《广播体操》特种邮票。它将广播操的10节动作分为40个图案，每一图案印制为一枚邮票，共40枚，成为世界上所有体育邮票中张数最多的一套。

1954年1月，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体育专业出版社——人民体育出版社正式成立。它是国家体委领导下的全国性体育专业出版社，主要依据党和人民政府关于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发展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需要，为推动体育运动的普及和促进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编辑出版各种体育图书，传播与体育有关的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加强体育思想理论建设。人民体育出版社为推动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5年4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了体育专题节目——《体育谈话》，每周两次（1956年改为每周3次）。1958年，《体育

谈话》节目更名为《体育运动》节目，每天都有固定的播出时间，主要是及时报道中国体育的情况和成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一些重大的国内外比赛，还办有实况转播节目，著名播音员张之就是当时广大体育爱好者所熟悉的体育实况广播和电视转播评论员。1956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辟了《体育爱好者》专题节目，主要报道外国体育团、队的来访活动，并通过专线向来访国作专题节目广播[1]。

1958年9月1日《体育报》出版发行。《体育报》是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直属的机关报，每周两刊，是一张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适应各行各业体育爱好者需要的专业性报纸。主要内容是及时报道国内外重大体育比赛和各种群众体育活动，报道中国运动员创造优异成绩、为国争光的事迹，介绍国内外体坛明星、优秀教练员和体育界知名人物，刊登各项体育比赛的好成绩和新纪录等资料，开展有关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的一些问题研究专栏等。从创刊始，《体育报》为宣传与普及体育运动，推动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二节　新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

学校体育是现代体育的基础。从旧中国接管过来的学校体育，依然受到欧美学校体育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学校体育工作的领导，使学校体育很快进入正常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学校体育，不仅从形式上对旧的一套进行改造，更是依据教育方针，从根本上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同时加速了新中国学校体育的建设。

[1] 郝勤. 体育新闻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6-37.

一、对旧中国学校体育的全面改造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了清除旧中国学校体育的影响，对旧中国学校体育进行了全面的改造的工作。学校体育与整个体育事业的发展一样，很快获得了较大发展。

（一）对旧中国学校体育的改造

旧中国的学校体育体制是本世纪初仿照日本“军国民体育”建立起来的，内容主要是兵式体操。五四运动以后，美国的“自然体育”逐渐在我国学校中占统治地位。虽然当时的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也曾颁布过许多体育教育方面的规章制度，但最终也未能实现体育教学的规范和统一。有的体育专家把旧时代的学校体育形容为“无头无尾的教学”，所谓无头，就是各年级的体育要达到什么具体的目标、各年级的体育有什么不同之处等，均无具体明确的规定；所谓无尾，就是每年教学以后，学生究竟从体育课程中得到什么益处，很少见有具体的证明，所给的体育分数究竟代表什么、有什么意义，是极其含糊的[1]。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加剧了对美国学校体育的否定。《新体育》发表短评提出：要“彻底认清美帝，消除盲目崇拜美国体育的错误思想，肃清反动堕落的美国体育道德作风对于中国的残余影响”[2]。

由此，体育学术界出现了对美国体育，特别是对美国学校体育的全面批判和否定。有文章批判说：“在美国，学校的体育教育是以培养个人的自私自利为目的，一切的学习与研究都是为了发展个人的名誉地位与攫取金元，一切问题的考虑都是唯我是从……现在美国学校体育已将原子弹与战争的宣传与训练列为正课

[1] 苏竞存. 对于中小学体育改造的几点意见. 新体育，1950（1）：16.

[2]《新体育》短评：加强目前学校的体育. 新体育，1950（6）：3.

的一部分”[1]。也有文章批判说：“在美国虽然也把体育活动说成为一种教育的方式，但是它不是教育广大人民锻炼健康的身体，而是教育少数的运动选手与体育商人如何的去赚钱、去做生意。大资本家们利用体育活动麻醉人民，企图使得人民脱离反抗压迫与剥削的政治斗争，永远做他们的奴隶。”[2]“我们鄙视美式体育，因为它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摧残青年与侵略人民的工具，是资本家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品与摇钱树。”[3]这种批判和否定，有助于建立面向全体学生的新的学校体育，有利于向主智主义教育的转变[4]。但由此而完全否定了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与实践，对我国体育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批判旧学校体育的基础上，一些专家学者提出应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唯物论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建立起新的中小学体育教学的主要骨架”[5]。其基本构思是，首先是明确新中国学校体育的任务，要分析体育课程在学校中所能完成的特殊任务和公共任务，明确具体地列出来。并确定每一任务所包含的事项，再按每一事项的重要性和各年龄学生的需要，分配完成该任务所需要的教学时间。其次是根据那些明确的具体任务，选择能达到该项任务完成的各种教材。最后要进行是否完成教学任务的考核工作。考核不是一个抽象的分数，而应是每个学生一张详细的事实报告，包括生长发育情况、疾病与缺陷、内脏机能情况、基本运动能力、集体习惯与行为、体育和卫生的常识与习惯、娱乐运动技能，以及国防需要的

---

[1] 马启伟：我对美国体育的认识. 新体育，1950（6）：10.

[2] 管玉珊. 我认识了美国体育. 新体育，1951（7）：15.

[3] 黄启宇. 我看到的美国体育. 新体育，1951（8）：17.

[4] 主智主义：是20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种教育学说，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其主要特点是认为教育过程应以知识传授和智能教育为主，主张在教学活动中以教师、教材、教学为中心。主智主义体育教育极大地促进了体育和体育教学的规范化，对于我国体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5] 苏竞存. 对于中小学体育改造的几点意见. 新体育，1950（1）：17.

基本技能等各方面。而且还应有该生与其他同学的比较、进步情况、有何优缺点、应当怎样注意等内容，使每个学生都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有明确的了解。

（二）对新中国学校体育任务的探索

新中国建立之初，青年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很差，许多学生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完成学业或不能就业。加强学校体育，使更多的学生重视并积极锻炼身体，就成为当时学校体育的首要任务。1950年和1951年，毛主席先后两次写信给教育部长马叙伦，提出了“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指示。“提倡体育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锻炼人民健康的身体，为祖国的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经常地从事体育锻炼，使身体各部门器官正确的发育和发展，增进健康，并培养坚毅果敢、一往无前战胜困难的精神，随时都能担任起保卫祖国的任何艰巨任务，这就是体育为国防服务的伟大和实际的意义”[1]。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1951年7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15届代表大会决议提出：要“积极开展学校中的体育和文化、娱乐活动，努力改进全国同学的健康状况，要使每一个同学都具有强健的体魄，能够胜任紧张的学习和繁重的工作”。1951年8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指出：“目前全国各级学校的学生健康不良的状况，颇为严重。许多学校由于功课过重，社团活动过多，加以伙食管理不尽得法，卫生工作注意不够，以致影响了学生的身体健康。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改变。应该指出：增进学生身体健康，乃是保证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并培养出有强健体魄的现代青年的重大任务之一。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及各级学校教职员必须严肃注意这一问题，立即纠正忽视学生健康的思想和对学生健康不负责任的态度，切实改善各级学校的学生健康状况。”《决定》

[1] 《新体育》短评：加强目前学校的体育. 新体育，1950（6）：3.

中提出了六条措施：一是调整学生日常学习及生活的时间；二是减轻学生课业学习与社团活动的负担；三是改进学校卫生工作；四是注意体育娱乐活动；五是改善学生伙食管理办法；六是学校经费的支配，应适当地照顾保健工作的需要。《决定》中特别指出："学生每日体育、娱乐活动或生产劳动时间，除体育课及晨操或课间活动外，以一小时至一小时半为原则。"要求"活动方法应多种多样，以适应学生不同的年龄、性别和身体状况，并防止锦标主义及运动过度损害健康的倾向"[1]。

为了配合这些指示和决定的实施，《新体育》杂志还辟出专栏，开展了"怎样使学校同学每天运动坚持下去？"的讨论。人们认识到：学生运动不经常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既有"同学们对体育认识不够，运动的时间没有保证，没有足够的场地与设备"等原因，也有"缺乏一定的组织与领导"等方面的原因，"不是一个单纯的能够用一种有效的方法去求得解决的问题"，而是要从多方面着手。讨论提高了广大师生对体育活动重要性的认识，促进了学校体育的制度化建设。

随着对毛泽东指示和政务院《决定》的贯彻实施，体育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步得到确立。在学习苏联学校体育和中小学的体育教学的课程结构、教材教法等基础上，开始了我国学校体育的规范化建设。

1951年开始试行的"劳卫制"（全称是"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是新中国实行的第一个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也是当时学校体育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劳卫制活动是从北京第四中学开始的。1951年新学期开始，北京四中的体育教师就提出了试行劳卫制的建议，教导处研究后决定根据本校条件慎重试行[2]。1951年暑假，青年团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体育分会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本市实际，

[1] 政务院：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 1951-08.

[2] 龚北. 北京市第四中学试行《准备劳动与卫国制度》. 新体育，1951（12）：18.

制定了《北京市暑假体育锻炼标准》，由7000多名大、中学校的学生组成500多个锻炼小组试行。经过一个多月有组织的锻炼，有1400多人分别达到各级锻炼标准，获得纪念奖章。北京市第四中学有95名学生获得了暑期体育锻炼优秀奖章。1951年冬季，又有北京、上海、天津制定并在学校中试行了《冬季体育锻炼标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及时地肯定总结了这些做法，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公布试行项目及标准，并在1952年安排了重点试行《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

1956年2月16日，高等教育部也会同国家体委、卫生部和团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领导进一步开展高等学校体育运动的联合指示》，从而确立了我国高等学校有关学校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例如《联合指示》中要求："各高等学校在作全面规划以保证所要培养的人才的质量与数量时，必须把体育运动看成整个学校工作的重要的方面，予以足够的重视。"要求"各校对体育工作贯彻校（院）长负责制"，要在"校（院）长的统一领导下，由一位副校（院）长对体育工作负具体领导的责任"。为了在高校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和运动竞赛工作，要求"应积极地在高等学校建立群众性的体育团体——体育协会"。而各"省、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对本省、市内的高等学校的体育工作，应负监督和指导的责任"。《联合指示》还对高等学校体育师资的培养和提高问题、卫生监督问题、场地设备问题等作了具体的规定要求。如对高校体育运动的场地要求是："4000人以下的，平均每人有15平方米，4000人以上的平均每人有12平方米。"凡"不能满足规定要求的学校，必须积极设法增设体育运动场地"。对"风雨较多和寒冷季节较长地区的学校"，要求"在不可能建筑体育馆时，可修建简单的能避风雨的体育场"，以保证体育教学和训练工作的正常进行。

这些有关学校体育政策措施的出台虽然对保证学校体育工作的正常开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相当一部分学校把劳卫制达标作为衡量学校体育工作的主要指标，致使劳卫制达标冲击了正常的

教学秩序，再加上各地学校领导对体育认识及客观条件的千差万别，使得一些地区贯彻落实不力，未能达到预期的理想目标。

还在1954年，国家体委就会同高教部、教育部、卫生部、团中央和全国学联，共同发出了《关于在中等以上学校中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联合指示》，其中明确指出："当此我国已进入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的历史时期，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各中等以上学校，积极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体育运动是德、智、体、美全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能改善学生健康状况，又能培养学生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同时还是学生最爱好的文化活动之一。"所以，指示要求："为了积极而正确地开展学校群众性体育运动"，"各级学校均应结合具体情况，积极开展多种多样的为广大学生所喜爱的体育活动和举行适当的运动竞赛，并应尽可能培养、训练各种运动队，把体育运动的普及和提高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❶1955年，国家体委又专门发出了《关于积极开展暑假学生体育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体委应会同教育部门、青年团、学联等有关单位"，在暑假期间，"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很好地组织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坚持早操和劳卫制锻炼，并注意积极开展军事体育和其他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❷1957年，清华大学的师生们喊出了"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的口号。1958年，共青团三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提出的1958年共青团工作任务中，也明确指出："共青团要以最积极的姿态，去倡导青少年的体育活动，努力增强我们民族的体质。"❸正是在这一系列指示精神的指引下，我国学校的课外体育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

❶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文件汇编（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55：78-79.

❷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文件汇编（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55：86.

❸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1）：精华本上册.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18.

（三）建立新的学校体育管理体制

学校体育是国民体育的基础，是国家体育事业的重点，新中国一诞生就表示了对学校体育工作的特殊关注。1950 年和 1951 年，毛泽东先后两次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指示。1951 年 7 月，中华全国学生第 15 届代表大会决议也提出要“积极开展学校中的体育和文化、娱乐活动，努力改进全国同学的健康，要使每一个同学都具有强健的体魄，能够胜任紧张的学习和繁重的工作”。特别是 1951 年 8 月 6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其中指出：要切实改进体育教学，尽可能地充实体育娱乐的设备，加强学生体格的锻炼；规定“学生每日体育、娱乐活动或生产劳动时间，除体育课及晨操或课间活动外，以一小时至一小时半为原则”。从此，学校体育开始走向了全面建设的道路。

1952 年，教育部开始设置体育处。1953 年，各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也相继设立体育机构。它们负责学校体育的管理，颁布各种有关学校体育的规定、检查和监督学校体育工作执行情况。

二、学校体育教育的规范与要求

为了进一步发展学校体育，在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基础上，确立了学校体育的基本目标，对学校体育教学进行了规范，为了“向劳动人民进行全面的体育教育，培养人民成为健康的、勇敢的、乐观的祖国保卫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在全国推行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

（一）学校体育的基本目标

1952 年，教育部和中央体委联合颁布《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其中明确指出我国学校体育的基本目标是："促进学生身心发展，增强体质，并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的教育，使他们能够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教育部于 1952 年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计划》中正式规定：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二年级，均开设体育必修课，每周两学时，以保证学校体育目标的实现。1953 年 5 月，教育部发出《关于中学体育成绩暂时考查办法的通知》，又指出体育课是中学课程的一科，其成绩与其他各科成绩相同，按一门学科计划。

（二）制订颁布学校体育教学大纲

在明确体育在学校教育中地位的同时，还注意了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学校体育教学活动。为了提高体育课的教学质量，1953 年教育部组织翻译了《苏联十年制体育教学大纲》，向全国教师进行介绍。1956 年 7 月和 11 月教育部分别颁布了《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中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师范学校体育教学大纲》（草案），1956 年高等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普通体育课教学大纲》，1954 年 5 月 4 日由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并于 1956 年 2 月 29 日由国家体委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卫国"体育制度条例》（修改草案）。这些文件对规范学校体育工作均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如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的姜亦强等人在学习了《苏联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后说："苏联体育教材是以培养儿童全面发展为原则的，不仅要使儿童们身体各器官正常发育、体格受到锻炼，并且要使儿童们的品质也得到良好的发展。"认为大纲规定的教材和措施，使儿童"不仅在体育上，而且在智育、德育、美育上都要有良好的收获"。大

纲具有一定的思想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1]。又如北京市一些中学的体育教师，也曾在《新体育》杂志社于1954年3月7日举办的“学习苏联中学体育教学大纲座谈会”上说：“苏联中学体育教学大纲是先进的，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巴甫洛夫学说为自然科学基础的。因此，它具有崇高的目的性和完整的科学性。”[2]学习苏联体育教学大纲，更重要的是能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正是在这一认识指导下，全国有不少省、市结合学习苏联体育教学大纲，纷纷编订了适合本地区情况的体育教学大纲、教材或参考书。如北京市编订了《小学体育教学参考资料》，天津市编制了《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东北地区编辑出版了五年一贯制《小学体育教材》和《体育试用教材》。

1956年7月，教育部在总结各地自编体育资料、教材经验的基础上，以苏联十年制体育的教学大纲为蓝本，分别制定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新中国第一套《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和《中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大纲规定，我国学校体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为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保卫祖国做好准备。我国学校体育的基本任务是：促进学生身体的正常发育，锻炼性格，增进健康；教给学生体育教学大纲中规定的教学内容；发展他们的身体素质；培养卫生习惯和锻炼身体的习惯；向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大纲还提出了选编教材的原则是：全面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健康性，以及教材应与《劳卫制》相结合。

对于第一套体育教学大纲的颁布，教育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如1956年7月，教育部曾专门组织了“全国中等学校体育教学大纲学习会”。在这个学习会上，韦悫副部长就实行教学大纲的几个原则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大纲的实行必须根据各地方和各学

[1] 姜亦强，等. 我们学习《苏联小学体育教学大纲》的几点体会. 新体育，1953（37）：13.

[2] 新体育，1954（42）：27.

校的具体情况来逐步贯彻。这就是说要采取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逐步贯彻的方针。”又说：“这个大纲的实行，必须以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政策为依据”，既反对忽视体育、将体育看做无关重要、可有可无的东西，也反对把体育突出，以致妨碍了青少年其他方面的发展。韦悫还说：“实行体育教学大纲、推行劳卫制和其他运动比赛等体育活动，必须根据青少年的年龄、身体状况、营养卫生等各方面来考虑”，不能造成伤害事故。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加强对各级学校体育工作的领导、督促、检查教学大纲的执行情况，改进体育各方面的工作。总之，韦壳指出：“这个大纲是根据我国中等学校培育年轻一代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建设者和保卫者的任务而制定的。”大纲中各年级教材是根据青少年的年龄特征，按照全面地发展他们的身体各部分和各种运动能力，以保证循序渐进地达到劳卫制标准的原则来规定的。因此，“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贯彻实行国家的体育教学大纲。”[1]1957年，教育部在《关于1957年学校体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又进一步提出要“保证体育教学大纲（草案）的贯彻执行”，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要督促和领导体育教师钻研教学大纲和改进教学法”，要利用暑假的一部分时间，“组织中、小学体育教师学习。学习的内容，建议以体育教学大纲的教材及教法作业为主。”凡“1956年还没有组织中、小学体育教师学习体育教学大纲的，仍应组织学习”[2]。目的是使一般学校都能按照教学大纲有计划地来进行教学。除了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以外，1956年教育部还制定了《师范学校体育教学大纲》（草案）。高等教育部亦于1956年制订了第一个全国统一使用的《高等学校普通体育课教学大纲》。这些体育教学大纲的颁布，虽然使各级各类学校的

[1] 韦悫. 在全国中等学校体育教学大纲学习会开学式上的讲话//学习资料汇编. 1957：1.

[2] 教育部. 关于1957年学校体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文件汇编（3）.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58：60，61.

体育教学工作有了统一的规范要求，并初步建立起了我国学校体育教学的课堂常规，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不顾各地主客观条件不同的"一刀切"的弊病。

为了统一认识，使各项教学要求得到切实贯彻，有关部门还组织了对体育教学工作的讨论。1953 年，《新体育》杂志连续在 9 月号、10 月号和 11 月号上开辟《体育教学经验》的专栏，引导和发动广大体育教师开展对体育教学工作问题的研究和讨论。1954 年，《新体育》杂志又继续在 1 月号、2 月号和 3 月号上开辟了《体育教学经验》的专栏，讨论的内容涉及体育课的备课工作、体育课基本部分的分组方法、基本部分组织形式的运用、直观教学法的运用、教学中学生小组长的培养、学生学习体育的积极性的启发和调动，以及室内体育教学问题等诸多方面，对促进学校体育教学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此外，《新体育》杂志还在 1954 年开辟过《体育教师》专栏，在 1957 年开辟过《体育教学》专栏，特别是在 1958 年和 1959 年，在 20 多期上开辟了《小学体育》栏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小学体育的研究和讨论。这些讨论，对消化、落实体育教学大纲产生了积极影响。

加强体育教师的业务进修是落实学校体育教学任务的重要环节。国家教育部曾多次强调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是提高教师的水平。为此，1953 年 2 月，《新体育》杂志专门发表了《建立体育教师的业务学习》的社论，社论认为："体育教师们加强业务学习，已经成为保证学校体育教育工作胜利完成的决定性的环节。"因此，"根据各校当前的情况和需要，提高体育教师的业务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 1956 年 3 月 30 日国家体委又会同高教部和教育部专门下发了《关于 1956 年体育教师业余进修的办法和要求的联合通知》。通知进一步强调了各级体委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切实做好体育教师的业务学习的领导和组织工作，以提高他们的政治

[1] 《新体育》社论：建立体育教师的业务学习. 新体育，1953（27）：4.

和业务水平。对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体育教师的进修内容分别作了不同的明确规定。在进修要求上则提出应注意结合工作，联系实际，批判资产阶级的教学观点，以提高教师的政治和业务水平，改进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的工作，从而提高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质量。

（三）“劳卫制”的制订与实施

劳卫制的正式颁布和推行。在1951年起的部分地区和学校试行了劳卫制的基础上，于1954年5月4日正式颁布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简称劳卫制）。劳卫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教育制度的基础，其目的是向劳动人民进行全面的体育教育，培养人民成为健康的、勇敢的、乐观的祖国保卫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1] 劳卫制根据体能、技术及当时我国体育发展的情况，共分三级，即劳卫制预备级、劳卫制第一级和劳卫制第二级。同时根据性别和年龄分为“男子第一组：15—17岁。第二组：18—28岁。第三组：29岁以上。……女子第一组：14—15岁。第二组：16—23岁。第三组：24岁以上。……项目分必测与选测两种”。涵盖了耐力、速度、灵敏、力量等多种身体素质。我国推行劳卫制活动的重点是学校，所以在教育部和中央体委颁布的文件中曾多次指出：要“在全国中等以上学校中有准备、有计划地推行‘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的预备级，并选择其中条件比较好的学校重点试行劳卫制。”[2]而针对小学的特殊情况，考虑到小学因一般学生的年龄还小，体育设备、师资、医务监督等条件也不够，不推行劳卫制。

---

[1] “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218.

[2]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218，219，217.

劳卫制在推行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项目偏多、标准偏高、伤害事故增多等等。所以，当时社会上曾有人对要不要搞劳卫制提出了疑问，其中包括郭沫若先生。后来由于周总理说了劳卫制还是要搞的，因为“开展劳卫制运动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身体健康，而且是为了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但前提条件是要更科学、更合理、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所以 1956 年在项目标准方面作了适当修改，同时由国家体委公布了《劳卫制条例实施细则草案》，使这项群众性的体育测试活动向能够更有利于健康的方向发展。

在全国小学生中推行少年广播操活动。如果说中等以上学校的课外体育活动主要是推行劳卫制的话，那么推行少年广播操便成为小学课外体育活动的主要特色。1954 年 8 月 24 日，中央体委会同教育部、卫生部、广播事业局和青年团中央，共同发出了《关于在全国小学中推行少年广播体操的联合指示》。《联合指示》认为：“少年儿童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保卫者，培养他们具有健康的体质和活泼、勇敢、富有集体主义的精神，是我们当前重要任务之一。”因此，“为了使全国少年儿童更广泛地参加体育锻炼，以进一步提高健康水平”，特“根据 9—12 岁少年儿童的生理特征，编制了少年广播体操”。《联合指示》强调：“这套体操包括全身各主要部分的动作，有适当的运动量，具备促进身体全面发展的功能，可以作为小学体育教学和少年儿童进行体育锻炼的基本方式之一。”因此，要求“从 1954 年度上学期开始，在全国各小学中推行这套体操”。为了保证推行工作的贯彻和落实，《联合指示》要求：“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各小学行政领导，必须重视和关心这件工作，结合本地区、本校实际情况，有领导有计划地在各小学中推行。”❶

适当组织课余运动竞赛活动。在 1957 年教育部下发的学校体育工作意见中，曾明确指出：“中小学生除了一般的课外体育活动

❶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353.

外，还需要适当地开展校内和校外的各种运动竞赛，以鼓舞学生从事各种运动的兴趣，提高他们的运动技术水平。"文件认为："目前学生的校内外运动竞赛还缺乏一定的制度，有的举办过多，有的很少举办。运动竞赛的项目（特别是小学和初中学生的）和比赛方法也有不适当的地方。因此，需要逐步建立学生的运动竞赛制度，特别是校内的和城市中校际间，区的和市的学生运动竞赛制度。"文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要进行研究拟订和创造经验，从而使我国学生的运动竞赛能够适当地合理地开展起来。

在开展课外体育工作中，防止伤害事故的发生也是政府有关部门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早在 1953 年 10 月 14 日，高教部、中央体委、教育部就曾下发过《关于正确发展学校体育运动、防止伤害事故的联合指示》，要求学校行政领导必须"把学校体育工作真正领导起来，经常地、有计划地督促体育教员在体育正课、课外体育活动与运动竞赛中进行体育运动的思想教育和生理卫生知识教育，使学生正确而深刻地认识体育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要求"体育教员必须把体育正课和课外体育活动都很好地负起责任来，积极加强运动技术指导和安全保护工作。"要求"体育教员和场地管理人员，必须合理地划分运动场地和设置警戒标志，并根据具体情况规定运动秩序和规则。对于场地设备，应经常检查和及时修理"❶。总之，要有效地防止伤害事故，以保证学校体育的正常开展。

三、新中国体育专门人才的培养

要更好地发展学校体育，体育专门人才的培养是关键。为此，国家为了适应学校体育及运动训练的需要，加大了对体育专门人才

❶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385.

的培养力度。

（一）体育师资的培养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体育专业教育也是在旧体育专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48 年 7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要求“对于原有学校要维持其存在，逐步地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文件解释说：“所谓要维持其存在，就是每到一处，要保护学校及各种文化设备，不要损坏。”“所谓逐步地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就是在开始时只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其余则一概仍旧。教员中只去掉极少数分子，其余一概争取继续工作”[1]。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旧学校体育事业的接管，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政策进行的。当时被接管的旧体育教育专业主要有河北师范学院体育系、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体育系、南京大学体育系、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以及上海市体育专科学校等。

院系调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它最早开始于 1949 年年底，如当时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1950 年 6 月 1 日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马叙伦首次明确提出了院系调整的任务，即“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1951 年下半年，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重点的院系调整。特别是 1952 年，全国高校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的方针指引下，又一次进行了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从此奠定了我国高等学校的基本格局”[2]

[1]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政策汇编. 1949-05-05.

[2] 胡绳.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00.

在院系调整中，我国依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单科制的体育学校。1952 年 11 月 8 日，新中国的第一所体育学院——华东体育学院（1956 年改名为上海体育学院）在上海成立，它由原南京大学体育系、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体育系合并而成，并由政务院任命吴蕴瑞为首任院长；1953 年 11 月 1 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央体育学院（1956 年改名为北京体育学院，1993 年 12 月 11 日年改名北京体育大学）；同年 11 月 8 日在南昌成立了中南体育学院（1955 年迁至武汉，1956 年改名为武汉体育学院）；1954 年 3 月 10 日、9 月 1 日、9 月 20 日又分别在成都、沈阳、西安成立了西南体育学院（1956 年改名成都体育学院）、东北体育学院（1956 年改名沈阳体育学院）、西北体育学院（1956 年改名西安体育学院）。六大体院的建立，大大缓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体育师资需求的矛盾，加快了对新中国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事业发展人才的培养。

苏联体育专家对我国体育院校的建设进行了全面的帮助。中央体育学院聘请的苏联莫斯科中央体育学院讲师凯里舍夫于 1953 年 12 月 12 日到校，担任学院顾问；10 位苏联专家还指导制定了学校各个专业的教育计划、教学大纲、主要教材、教学组织与制度、教学作业的方法方式等一系列教学文件，对建立健全教学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1955 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央体育学院应届毕业生 500 余人到天津市几十所中小学进行教育实习，对我国学校体育教学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华东体育学院聘请的三位苏联专家也分别担任了院长顾问、教务顾问和竞赛顾问，他们帮助制定了教学文件、培养体育师资计划，到上海市各级学校、工厂、农村了解并指导体育活动的开展。

我国的学校体育专业教育在这一期间有了很大的发展。

为了保证培养出数量多、质量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体育专业人才，全国各体育学院和系科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开设了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课程，并结合各个时期的重大政治活动和日常的时事学习，通过多种方式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不断提高

社会主义觉悟。从 1953 年，根据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注意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和实际经验，制定了新的体育专业教学计划和大纲，建立了教研室或教研组，加强了运动竞赛的组织工作，并逐步开展了科学研究工作，加强了实践环节，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1954 年我国还开始了体育专业的研究生教育，截至 1959 年 10 月，北京和上海体育学院，已培养体育理论、运动生理、人体解剖、田径、体操、足球、篮球、排球等研究生 200 多名[1]。

由于国家对体育和体育专业教育的重视，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基本建成了从研究生到大学、大专、中专的多层次学制形式。当时的研究生专业有体育理论、运动生理、人体解剖、篮球、排球、足球、田径和体操，大学本（专）科专业当时有体育教育专业和运动训练专业。此外，还有非正规学制的在职进修的短期培训等等。

师范院校体育专业与单科制体育学院的教学计划和学科设置略有不同。师范院校的培养目标主要是中等学校的体育教师，表 1-3 是师范学院体育系四年本科的教学计划方案，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师范院校体育专业的学科设置情况[2]。

表 1-3　1955 年师范学院体育系四年本科的教学计划方案（单位：学时）

编号	学年 / 学期 / 每周学时 / 课程名称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总计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学期	
1	哲学	4	4							8
2	政治经济学			3	3					6

（接续表）

[1] 任思治. 成长中的我国体育干部培养工作. 体育文丛. 1959（10）：10.

[2] 陶德悦. 谈师范学院体育系的教学计划. 体育文丛. 1958（6）：49.

（续表）

编号	学年 / 学期 / 每周学时 / 课程名称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总计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学期	
3	社会主义概论					3	3			6
4	中国革命史							3	3	6
5	教育学			3	3					6
6	心理学							2	2	4
7	外国语	3	3	3	3	（3）	（3）	（3）	（3）	12
8	人体解剖学	4	4							8
9	人体生理学			6	6					12
10	卫生学					2	2	2	2	8
11	体育理论					4	4			8
12	体育组织学							2	2	4
13	运动裁判法		2	2	2	2				8
14	活动性游戏						2			2
15	体操	4	4	4	4	2	3	2	3	26
16	田径	4	3	4	3	2	2	2	2	22
17	球类	2	2	2	2	2	2	2	2	16
18	舞蹈					2	2			4
19	重竞技					2	2	2		6
20	专项运动选修					（4）	（4）	（4）	（4）	（16）
21	教育实习							6周		6周
22	整修时数	21	22	27	26	21	22	17	16	172
23	选修时数					（7）	（7）	（7）	（7）	（28）

注：括弧内的数字是选修时数。

1955 年，中央体育学院开始停招二年制的专科学生，而改招四年制的本科生。从表 1–4 中可以了解到当时体育学院的教学计划和学科设置情况。

表 1–4 中央体育学院 1955 年本科教学计划草案（单位：学时）

课程名称 \ 学时	总计	讲授	实验实习	实习讨论练习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学期
中国革命史	102	68		34	3	3						
马列主义基础	136	102		34			4	4				
政治经济学	122	84		38					4	5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120	85		35							5	5
俄语	204			204	3	3	3	3				
化学	102	56	46		3	3						
解剖学	170	68	102		5	5						
生理学	208	118	90				4	4	4			
卫生学	94	66	28						3	4		
医务监督	72	24	48								2	4
医疗体育	112	42	70							4	2	4
心理学	110	90	16	4	3	2					2	
教育学	102	85		17			3	3				
教育史	66	52		14					2	2		
体育教育理论	166	142		24			3	2	2	2	2	
体育史	72	54		18							3	3
体操	356	60		296	3	2	2	3	2	3	4	6
田径运动	296	60		236	3	2	3	2	2	4	4	
球类运动	275	50		226	3	3	3	3	4			
水上运动	126	30		96		3		3		3		
冰上运动	108	18		90	3		2		2			
中国武术	102	12		90	3	3						

（接续表）

（续表）

课程名称 \ 学时	总计	讲授	实验实习	实习讨论练习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学期
拳击	36	6		30			2					
击剑	48	8		40				3				
举重	32	6		26		2						
摔跤	32	6		26			2					
活动性游戏	54	10		44					3			
自行车	36	6		30			2					
专门选修术科	256	30		226					4	4	6	6
论文												
总时数	3716	1438	400	1878	32	31	33	30	32	31	30	28

选修课题	学期	学时	实习	学期	周时	国家考试科目
体操、田径、球类、武术、游泳、拳击、举重、击剑、摔跤、自行车	1–8 学期	每周 4 学时，共 480 学时	1. 中小学教育实习 2. 高等学校教育实习	6 7	6 6	1. 马列主义基础 2. 生理学 3. 体育教育理论 4. 专选：理论及历史、实习及教法
俄语	5、6	3				
逻辑学	5	2				
运动建筑	7、8	3	总周数		12	国家考试日期

在 50 年代初，各体育院、系的教学缺乏统一的要求，教学大纲和教材都不统一。学习苏联以后，一些学校借用了苏联的教材和教学体系。1957 年，国家体委在《关于体育学院 1957 年的工作要求》中指出：根据几年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自己已经积累的一些经验，应着手编写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部分课程教学大纲。1957 年要求完成体操、田径、球类、体育理论、活动性游戏等 5 种课程的教学大纲，并争取编写出生理学、解剖学、教育学、心理学 4 种

课程教学大纲初稿。1958年要继续完成9种课程的教学大纲，即卫生学、游泳、医疗体育与医务监督、击剑、摔跤，以及化学、拳击、举重和滑冰。这些教学大纲，经有关教研组研究后，即作为各体育学院统一的教学大纲，所以我国体育专业的体育教学大纲是从1957年起开始逐步建设的。

（二）教练员的培训与优秀运动员的培养

在我国，各级体育院校和师范院校是培养体育人才的主要基地，短期培训和在职进修也是我国体育人才培养的重要形式。国家体委强调体委部门要"会同教育部门努力办好体育学院、体育学校和师范学校的体育系科，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各级体育师资和专业干部。"[1]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在社会体育人才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在职进修和短期培训可以说是当时多快好省培养体育专业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此，1955年国家体委曾发布了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在职干部业务学习的指示》，一是《关于短期体育干部训练工作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的业务学习，《指示》要求，学习的内容应包括"体育理论、体育业务知识和运动生理卫生常识"三部分。学习方法"主要应结合业务工作，通过研究、检查和总结工作对干部进行教育。体育理论的学习，应以自学为主，适当地组织讨论、报告或问题解答。学习的时间安排，则要求是'经常性的'，行政上应保证每周抽出一定时间进行学习"[2]。关于短期体育干部训练，《指示》强调主要是"利用短期速成方式，为建立体育协会、推行劳卫制和为厂矿、学校、青年团、体委、体育场馆等基层单位培养训练专职或兼职的组织领

[1] 国家体委关于1958年体育工作的通知//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31.

[2] 国家体委关于在职干部业务学习的批示//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164.

导干部”。因而“训练班的学员，基本上应由各单位保送，训练后仍回原单位工作”。学习内容主要是“体育常识、生理卫生常识和工作方法三个部分”。学习方法“必须使理论结合实际，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要将“讲解、讨论、学习和课外辅导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并应抽出一定时间组织参观”。在具体组织上，要求知识班的单位不宜过多，时间不能太长，训练方法应多种多样，举办的地点应尽量适中，以尽可能提高短训班的办学效果和质量。

体育专业教育的发展，也带动了我国的体育科学研究。1954年，首先在中央体育学院设立了研究部，开始培养研究生和开展体育科学研究工作。以后，其他5所直属体育学院也都先后设立了研究部或科学研究办公室，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艰巨任务。党和政府在恢复生产、组织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竞技体育在振奋民族精神、唤醒民族意识、维系民族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上的独特作用。

1951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工作大队成立。此后，各大军区相继成立大军区体工队。

1952年2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决定成立“中央体训班”，其任务是为国家培养优秀运动员，迅速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争取在国际竞赛中的胜利，为国家争取荣誉，并以他们技术上的成就来推动和影响群众体育的开展。

1953年，各大行政区都相继成立了体训班（即后来的各省体工队的前身）。

这些队伍就是后来的优秀运动员队伍。

我国优秀运动员队伍从成立之日起便纳入了国家集中管理的体制，运动员自进入专业队起便成为国家正式职工，为所在运动队“单位”所有，退役后的工作由体工队（政府）统一安置。这种高度集中和封闭的运动员训练和管理体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在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干预下，曾有力地保障了我国各级运动队伍的稳

定，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各项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体育事业的发展。但也应看到，长期以来，在这种体制下，运动员从业余体校到运动学校再到体工队，他们需要承担超负荷的训练竞赛任务，他们的学习时间和精力难以保证，学训矛盾突出，开展正常的文化教育工作难度较大，这一世界各国体育界共同面临和致力解决的国际性问题在我国体育界显得十分突出。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我国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运动员的文化学习，在业余体校、体育学校、体工队都安排了一定比例的文化课学习。1958 年国家体委提出体育师资、教练员和优秀运动员“三位一体”的体育院校培养目标。在运动训练专业中突出强调了提高学生运动技术水平，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出现了我国历史上运动员文化学习与运动训练相结合较好的一段时期。

以广东为例，1953 年成立广东第一支优秀运动队（广州市游泳队）时，教练员是从学校体育教师中选调来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优秀运动队的不断壮大，教练员大多数是从优秀运动员中培养提拔起来的。这些人的特点是实践经验丰富，文化水平不高。

1954 年 6 月，中南体院竞技指导科在广州越秀山仲元图书馆（今广州美术馆）成立，由广州市体委管理。除了此前已设立的游泳队（在沙面）外，增设了篮球、足球两个队。1955 年 8 月，原中南军区体工队女子篮球队并入竞技指导科。同年，由原台山青年排球队和粤西军区排球队组成的省体训班排球队（即中南排球队）亦划入该科。1956 年 7 月，中南体院竞技指导科更名为广州体院竞技指导科（因中南体院改称武汉体院，故更名。其实当时广州体院尚未成立），9 月迁入刚建成的广州二沙头体育俱乐部。此时该科共有 8 个班队，即男篮、女篮、足球、体操、游泳（跳水）、水球、乒乓球、田径，运动员 148 名。这批运动员分别来自中南地区和港澳地区，还有部分从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归来的华侨学生。

1957 年 8 月，广东省体委建立广州体育学校专修班（后改称广州体校专修班二部），地址在广州东较场（今较场西路 16 号）。

该班设排球、足球、乒乓球、游泳4个队。1960年该班并入广州体院运动系。

1958年10月广州体院成立。广州体院竞技指导科改名为“广州体院运动系”，王立中任系副主任，仍属广州市体委管理。同年6月，省政府成立广东省参加第1届全运会筹备委员会，由陈郁省长担任筹委会主任。10月，经过广泛选拔，选调了1728名运动员和144名教练员，分6个片进行集训。通过1959年3月第2届省运会，对集训队进行了调整，留下979名运动员。9月，在北京举行首届全运会，广东有319名运动员参加25项比赛，共获27枚金牌（其中运动系获25枚），金牌数居全国第四位，并有62人31次打破20项全国纪录。

在50年代后期，运动系个别运动员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1957年5月1日，戚烈云打破男子100米蛙泳世界纪录，成为中国第一个游泳世界纪录创造者；1959年3月，容国团夺得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

第三节　群众体育的兴起

1949年4月17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第二章第七条团员义务的第二项，要求全体团员“努力学习军事，锻炼体格，随时准备以无限忠诚，献身祖国，保卫人民利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纲领》第五项第二条规定：“发扬青年爱好活动、团结互助和创造的精神，组织青年的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加强体格锻炼，并建立各种文化的、艺术的、娱乐体育等团体。”第六项第三条规定：“与职工会和民主妇联会以及人民教育机关共同组织儿童的野营、儿童俱乐部、儿童体育场……等”。1949年9月2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第 48 条规定："提倡国民体育"。将群众体育纳入到国家发展的轨道。

一、职工体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厂矿机关职工的人数约有 1.1 亿以上，他们担负着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科学文教和机关事务等方面繁重的生产和工作任务，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因此，积极开展厂矿机关职工的体育活动，促进厂矿机关职工体质的增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件大事。

（一）厂矿机关职工体育的管理

主要负责职工体育活动领导工作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全总成立于 1925 年 5 月，1927 年被迫转入地下，1948 年 8 月恢复。全总恢复初期，由文教部负责管理职工体育，在文教部内设有一名专职体育干事。专门的体育部建立于 1955 年 10 月。

在对职工体育的领导中，全总特别注意了职工是以发展生产为第一任务的，因此在职工中开展体育运动就必须密切地配合生产，使体育为生产建设服务，才能使职工体育运动得到正常的顺利的发展。他们根据职工体育的特点提出了四点工作方针：

第一，必须面向基层，以工矿基层组织作为开展职工体育运动的中心场所；

第二，在方式方面必须灵活，应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工作性质、工作时间、具体条件）开展多种多样的轻巧灵便的体育项目，以便尽可能地从多方面来满足职工群众的体育需要；

第三，活动要经常，克服过去的职工体育活动中所存在着的那种突击现象，以开展经常性的体育运动，使其成为职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第四，在不妨碍生产的前提下，应提倡厂与厂、车间与车间之

间的小型业余的体育竞赛，以提高职工群众对体育的兴趣，吸引大量的职工参加。

1951 年 11 月 24 日，新闻总署广播事业局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联合决定在全国广播电台开办广播体操节目，同年，体育总会、教育部、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青年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青联、全国学联 9 单位发出《关于推行广播体操运动的联合通知》，号召全国的体育工作者、各级人民政府、军事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文化教育部门积极推行并动员所属各单位以及广大人民参加体操活动，为普及国民体育、改善我国人民的健康状况而奋斗。

这是新中国公布的第一套广播体操，它的出台进一步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群众体育的广泛开展，很快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个做广播体操的热潮。据 1952 年 5 月统计，仅北京就有 23 万学生经常做广播体操；雁北全区 8 个县有 3300 多名县区干部每天做广播操，很多城市都成立了“广播体操推行委员会”。

除了推行广播体操活动以外，各产业系统亦根据本身特点，努力使职工体育活动群众化和经常化。铁路部门提出：要加强对职工体育的宣传，真正明确认识；要建立健全铁路系统的各级体育协会，保证对职工体育的统一领导和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要注意培养和配备体育工作干部，并适当解决体育活动的经费和设备问题。为此，铁道部等于 1952 年 1 月下发了《关于开展铁路系统中体育运动的联合决定》，要求在铁路员工中“首先普及几项简单易行对锻炼身体、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价值较大的运动，如田径赛、体操、国术、游泳、刺枪、射击、投掷手榴弹等。只有这样才能锻炼好广大员工的身体，更好地为建设人民祖国和巩固国防而服务”[1]。他们还组织了“中国铁路体育卫生宣传列车”活动，在 13 天的宣传中，动员了 3 万多人参加广播体操。截至 1952 年上半年，全国

[1] 铁道部，等. 关于开展铁路系统中体育运动的联合决定. 新体育，1952 (16)：6.

铁路员工参加田径、篮球、排球等各项体育运动的共 20 余万人，有球队 3200 多个，队员 2 万余人，1200 余铁路单位有了运动场和简单的体育设备。

在工业城市沈阳市，从 1949 年开始到 1952 年 3 月，各产业系统举行了 55 次运动会，“各产业系统的工厂，大都把举办运动会和运动比赛提到必办的工作日程上”。市总工会也从 1950 年起每年举行全市性职工运动会和运动比赛。据 1951 年 10 月的统计，沈阳市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职工达 1 万多人。其中有男子业余职工篮球队 346 个、女子篮球队 53 个；有男子业余职工排球队 281 个，女子排球队 132 个；有工人业余足球队 4 个，职员业余足球队 8 个。这些业余运动队对开展和提高沈阳市职工体育活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51 年在群众中普遍掀起了一个订立“爱国公约”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一些厂矿机关的职工把进行爱国主义体育运动，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纷纷写在自己的“爱国公约”中，从而成为这些职工自觉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的鞭策力量。

天津注意针对不同的群众对象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以动员更多的群众加入到体育活动的行列中。“如工人们对篮球运动的热情很高，但工人不熟悉篮球规则，大家爱玩球，就怕闹规则”。因此，他们就注意在工人中普及和宣讲篮球的基本知识，特别是规则和裁判法，以提高工人的篮球水平。店员的体育活动较难组织，他们就先找一些较开明的店主，先将这部分人的体育活动开展起来，再带动其他店员。对码头搬运工人，则根据搬运工人最喜欢举重和摔跤的特点，配置石担、石锁、砂袋和摔跤衣，广泛开展民族形式的体育活动，并专门在搬运工人中开办了举重班和国术班。

（二）职工体育的蓬勃开展

1954 年 1 月 8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的指示，明确指出：“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中央的指示特别强调：“特别是当前国家已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人民有健康的身体。”因此，“各级党委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加强领导”。党委应“协助政府配备必要的干部，建立和充实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要“根据中央体委党组所提出的方针和任务，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领导和推动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使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首先在厂矿、学校、部队和机关中切实地开展起来”。中央的指示还要求：“青年团应该把它（群众体育）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并在这个工作中起骨干作用。工会应具体领导厂矿、企业中的体育工作，使之得到正常的开展。军委总政治部亦应在全军中注意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中央认为：“当前我们国家正在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而奋斗的时期，加强体育工作就有更重大的意义。”[1] 1954年，周恩来《在政务院第205次政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示：“要在工厂、学校和农村中提倡和开展体育运动”，“只要坚持开展体育运动，五年、十年、十五年，中国人民的体质就会大大改变”[2]。他说：体育运动开展得好坏，“关键在于领导，不仅是体委，两个教育部、各个行政部门也有责任”[3]。机关干部的身体好坏，部门行政领导，起码是办公厅主任要负责任。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也明确写道：“在全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厂矿、学校、部队和机关的青年中，广泛地开展体育运动，以增强人民的体质。”[4]

❶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体委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的指示//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3-4.

❷ 周恩来. 为祖国锻炼身体（1954年2月21日）//周恩来选集：下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0-131.

❸ 伍绍祖. 热情的关怀，亲切的教诲——为周总理诞辰100周年而作. 体育文史，1998（1）.

❹ 罗时铭，等. 中国体育简史.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167.

1954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积极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的重要社论，其中指出："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宝贵的资本，健康的身体和坚强的意志，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而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则是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方法。"因此，"必须广泛宣传，使人民普遍认识体育运动和生产建设、国防建设的密切关系，了解增强体质不仅是关系自己，同时也是关系后代的一件大事。只要大家认识了体育的重要性，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便会逐渐开展起来。"社论提出了如下要求：首先，"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要使体育运动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其次，"各级工会应该重视对厂矿企业体育活动的具体领导，根据需要和可能，通过积极分子，紧紧掌握'有准备，有计划，逐步推行'的由点到面的工作方针，使厂矿体育活动得到正常的发展。"第三，"为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部队体育活动"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在全军中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第四，"机关工作人员体质一般都不很强，机关行政和党的支部和青年团支部，应该组织、推动全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经常的体育锻炼。"❶只有各部门切实担负起推动本部门体育活动的责任，才能"使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首先在厂矿、学校、部队和机关中切实地开展起来。"❷

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发了《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运动的通知》。通知指出："在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体育运动，是改善干部健康状况，增强体质，提高工作效率的最积极的有效的方法之一；也是一种很好的文化活动。"正式规定在每天上午和下午的工作时间中各抽出10分钟做工间操。要求"做操时，应动员所有工作人员参加。领导干部应负责组织领导，

❶《人民日报》社论：积极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 新体育，1954（39）：4.

❷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体委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的指示//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3-4.

并应带头参加，使之能够组织起来，坚持下去”。除工间操以外，通知还要求，“亦应提倡早操和球类等多种多样的体育运动”，“应把体育运动与文娱活动密切地结合起来，利用工余、假日等机会，组织运动竞赛、文娱体育晚会、郊游以及其他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❶。

同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发出了《关于开展厂矿企业中职工群众体育运动的指示》，强调要“在厂矿企业中有计划、有领导、有准备地开展职工群众的体育运动”。提出了职工体育工作“从增强职工体质、减少疾病，保证出勤率、提高劳动效率等方面，来保证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要求“厂矿企业中的工会组织，必须根据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原则，在业余时间内开展职工群众的体育运动，以及有准备有计划地推行劳动前后或工作间隙时的体操。”❷为了使厂矿企业的职工体育运动健康地、正常地、有序地开展起来，1955年1月1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制定了《关于开展职工体育运动暂行办法纲要》。纲要就我国厂矿企业职工体育的方针任务，组织建设工作，宣传教育工作，运动竞赛工作，运动场地、设备的修建、保管和利用，体育运动经费，奖励七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1956年7月1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就职工体育问题又发了《关于职工参加体育活动或锻炼时受伤者的工资发放问题的答复》，规定凡代表本企业或某单位参加运动会比赛负伤者，可参照劳保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按因工负伤待遇处理。若是平时参加体育活动或锻炼受伤者，可按照职工病假待遇处理。这些规定，有效地保证了厂矿企业职工体育的健康正常发展，保护了职工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遵照政务院与全总的指示，各行业系统分别对本部门、本系统的职工群众体育进行了规划，作出

❶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272.

❷ 全国总工会．关于开展厂矿企业中群众体育运动的指示．1954-01-26.

了具体的安排。如铁道部和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等就曾下发过《关于开展铁路系统中体育运动的联合决定》，二机部和中国第二机械工会全国委员会也对本系统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开展职工体育运动的联合指示》等等。1956年2月15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单位发起组织了春节期间的北京市胜利杯环城赛跑，共有1400人参加了全程12000米的长跑活动，对社会起到了良好的宣传和示范作用。

建立职工体育的组织领导体制是开展职工体育活动的组织保证。早在1954年10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职工体育工作会议”上，刘子久在大会报告中就提出要加强职工体育的“组织建设工作”。刘子久说：“凡是职工体育运动开展的地方，职工体质即有所增强，出勤率有所提高，对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起了一定的保证作用”，“今后职工体育工作应继续贯彻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方针，达到增强职工体质，提高劳动效率及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的目的。决不能因为开展体育运动而妨碍生产和损害职工的健康。根据目前的情况，在职工体育运动的具体工作上，应采用‘积极领导，逐步发展’的方针。今后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1]根据这次会议指示精神，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55年10月建立了管理体育工作的职能部门——中华全国总工会体育部。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国总工会领导下，制订开展全国职工体育运动的方针、计划，推动地方工会及各产业工会吸引和组织广大职工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以增强体质。此外，铁路、航空、煤矿等部门系统也纷纷建立行业体育协会，作为负责领导和管理本部门系统职工体育的职能部门。在我国，最早建立的行业体育协会是成立于1952年的“火车头体育协会”，后来又有了银鹰体育协会（1955

[1] 中共中央批复全总党组和国家体委党组关于全国第一次职工体育工作会议的报告//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274-275.

年)、水利电力体育协会（1955)、煤矿体育协会（1955)、前卫体育协会（1956)、林业体育协会（1956)、重工业体育协会（1956)、邮电体育协会（1957)、电力体育协会（1957）等。

(三) 第1届全国工人体育运动大会

1955年10月2—9日，全国第1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体育运动大会，是对新中国成立后职工体育运动成果的一次大检阅。毛泽东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分别为运动会题词。刘少奇的题词是："开展体育运动，增强健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周恩来的题词是："开展职工体育运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朱德的题词是："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运动会设有田径、自行车、举重、篮球、排球、足球等比赛项目，来自全国17个产业系统的1709名运动员参赛，有10名运动员打破了4项田径、2项自行车、5项举重的全国最高纪录[1]。

二、农村体育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非常关注农村体育的发展。可以说，农村体育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

(一) 新中国农村体育工作的方针

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展农村体育的基本思路是："服从生产，坚持业余、自愿原则，开展简单易行的体育活动。"[2]如1953年6月24日，胡耀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1] 中国体育百科全书.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55.

[2]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1）：精华本上册.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12.

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青年团的组织必须发动和组织青年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运动竞赛，在农村应倡导和组织民兵和青年喜爱的体育活动。"[1] 如1951年河北省怀安县团委，为了贯彻华北区军事体育工作会议精神，他们以台寨村为体育试点单位。没有场地，青年们自己开辟；没有器材，青年们自己动手制造。活动根据各人的爱好和特长，编成各种运动小组来进行。由团支书、民兵队长负责领导，小学体育教师和复员军人担任技术指导。开始时，全村参加体育活动的只有43人，后来逐渐增多了。1952年，台寨村组织20多个男女青年民兵参加了区的"五一"庆祝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广播体操表演。安徽巢县炯黄区，在土地改革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就组织了37个男子篮球队和两个女子篮球队。中庙区参加体育活动的农民一度多达3000余人。广东台山县的排球活动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活跃的地区。吉林延边朝鲜族人民每年在庆祝自治州成立的日子，都要举办规模宏大的运动会。1954年参加全州农村基层运动会的运动员多达27178人，约占全州青年总数的1/3。这个州的足球活动遍及城乡，1953年他们的足球队曾取得全国青年足球赛亚军。延吉县第三区的运动会就有30个农村足球队参加比赛。这个县还建立了120个农村俱乐部，领导体育和文化活动。黑龙江省有51个县举办过运动会[2]。一些地方的农村还结合本地的文化传统开展体育活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地方体育特色，如河南登封县成为著名的武术之乡、山西忻县成为著名的摔跤之乡、广东梅县成为著名的足球之乡等等。

1956年6月，国家体委和青年团中央在北京首次召开了"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会议肯定了在农村中主要结合民兵训练，利用农闲季节开展体育活动的做法。会议强调，农村体育必须依靠青年团组织，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坚持业余、自愿、简便易行的

[1] 关于加强青年业余文化工作的决议. 1955年2月26日青年团二届二中全会通过.

[2] 张咏勇. 农村体育. 体育史料：第11辑：24.

原则，结合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农村体育活动。会议认为，在农村应大力提倡有利于增进农民健康的民族形式体育。会议还要求，要迅速建立县一级的体育运动委员会，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干部，以加强领导。同时还要继续依靠青年团组织领导和开展农村体育工作。这次会议曾使中国农村一度出现过前所未有的体育新气象。根据 22 个省、市、自治区不完全统计，当时已建立 436 个县级体委，配备有 554 个专职体育干部。青年团也在 261 个县级团委中配备了 268 名专职体育干部。全国共建立了 30505 个体育协会，发展会员 915150 人。如天津市共建立 75 个农村体育协会，会员 5000 余人。随着高级农业社的发展，农村体育在平原和经济作物区、文化发达的地区广泛开展，基本达到了乡乡有体育活动，其中尤以篮球活动为普及。据 11 个省的 54 个县的统计，共有各种运动队 16244 个，其中篮球队就有 1423 个。江苏的泰县、武进、仪征、上海等县，普遍推行了田头广播体操。浙江永嘉县郭桥乡有 90%的农民参加广播体操活动。山东省有 63 个县和 3 个市郊的 6 万多农民参加了武术、摔跤、骑马、射箭、举石锁、举石担等民间传统体育活动。据辽宁省 9 个县的统计，有 1781 个球队，队员 4 万多人。其中金县 187 个村有 89 个足球队、212 个篮球队和 64 个排球队。该县 11 个区共举行 13 次运动会。其中红星渔业生产合作社还举行了海中拔河、划船等 15 个项目的海上运动会[1]。

（二）农村体育的兴起

新中国的农村体育方针是："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普遍提倡，重点扶持，以点带面，逐步发展"。新中国的农村体育工作主要是由青年团组织负责的，并结合民兵训练开展体育活动。

1956 年 6 月，国家体委和青年团中央在北京首次召开的"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肯定了在农村中主要结合民兵训练，利用

[1] 张咏勇. 农村体育. 体育史料：第 11 辑：25.

农闲季节开展体育活动的做法。这次会议曾使中国农村一度出现过前所未有的体育新气象。

1958年，中共中央在国家体委党组《关于体育活动十年规划的报告》批语中说："在组织了人民公社的地方，体育运动应在人民公社的统一安排下，结合劳动生产，使之成为广大群众热烈喜爱的事情。"

后来又有了毛泽东的指示："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1]这就使农村体育在结合民兵训练的活动中得到更大的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67个县普遍推行了"劳卫制"，有10多万人达到了劳卫制各级标准，有2000多万人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约占当时全国农村人口总数的5%。辽宁、山西、湖南等省农民约有40%参加体育活动。农村体育开展较好的山西长治专区以及山东高唐，河南禹县，湖南湘潭、东安，四川纳溪、叙永、江北，甘肃西和，云南腾冲等地，都有70%以上的农民参加体育锻炼。

北京地区农民以拳术、摔跤等为主的传统体育活动源远流长，自元代就有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民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改善为体育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50年，京郊农民历史上首次参加了北京市第2届人民体育大会的田径、拔河比赛。1958年，北京郊区和各县陆续建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还配备了专职的农村体育工作干部。

1954年之后，湖南省按照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和"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要求，将体育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首先完善体育组织领导机构和人员。1954年2月7日，任命张经、肖敏颂任省体委副主任，6月8日任命唐麟为省体委主任。1956年4月，省体委机关由1953年的二科一室一场调整为四科一室，即运动竞赛科、

---

[1] 人民日报，1958-10-01.

群众体育科、干部训练科、计划财务科和办公室。行政编制由 37 人增至 64 人。1957 年 5 月成立湖南省国防体育协会。1959 年 3 月，国防体协合并到省体委，机关设八科一室，即人事科、宣传科、运动科、群体科、陆上科、航海科、航空科、器材科、办公室，行政定编 66 人。1955 年 4 月之后，程星龄、何能彬先后担任省体委主任。各市、专署（州）、县的体委，至 1958 年除嘉禾和常德县直到 70 年代初才成立外，其他均设立了机构和人员，实施委员制，地、州、市体委行政人员为 2 ~ 7 人。县级体委 1 ~ 2 名专干，与文化或教育合署办公。

这一时期，湖南省各条战线也加强了对体育工作的组织领导。1954 年，省总工会配备专职体育干部。翌年，经过试点，普遍建立了基层职工体育协会。1957 年底统计，全省共建立基层职工体育协会 2166 个，会员 18.48 万人。其中，1953 年 1 月成立了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株洲分局理事会，1957 年 3 月成立了中国邮电体育协会湖南理事会，1959 年 1 月成立了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长沙局理事会。

在学校田径、球类、武术等项运动普遍开展，小型多样的竞赛活动经常进行的情况下，竞技体育运动队的组建提上了议事日程。1954 年，湖南省体委为中南区体委选招了 14 名湘籍运动员，代训女子排球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湖南组建的第一支运动队。1956 年开始组训省运动队，至 1957 年，先设了女子体操、女子排球和男子篮球 3 项，集训运动员 20 余人。1959 年 9 月，湖南省组成以何能彬为团长，有 396 名运动员的体育代表团，参加了第 1 届全运会 29 个大项的预决赛，获得团体和单项的 1—12 名 52 个，其中金牌 3 枚、银牌 2 枚、铜牌 4 枚。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民生活的改善，劳动组织的变迁，党和政府的重视，农村体育有了长足发展。1954 年 1 月， 贺龙代表中央体委作了题为《在总路线的照耀下，为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而奋斗》的报告，提出“在农村中，主要应结合民兵训练，利用

农闲季节，重点试行一定项目的经常锻炼；另方面也可一般地提倡农民中固有的、有利于增进农民健康的民间体育”。同年广东省体委的农村体育工作以抓中山县民兵试点工作为重点，总结经验，指导其他县的民兵工作，并照顾原有基础较良好的台山排球、梅县足球、东莞游泳等重点体育项目，以及有重点地进行民间体育项目的调研、整理、推广工作。

三、军队体育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体育活动有着光荣的历史，新中国的军队体育是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切关怀下，伴随我军现代化建设逐步发展起来的。毛泽东、邓小平同志的建军思想对新中国军队体育的发展产生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新中国军队体育的发展历程中，折射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思想。人民解放军继续发扬优良传统，使体育运动得到更广泛的开展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军事体育管理制度的正规化

军事组织领导机构有了新的发展。1950 年，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大力加强部队体育活动”的指示，对管理机构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各级文化部门负责领导群众性体育活动，各级训练部门负责部队军事体育训练。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设立体育委员，负责连队体育工作。团以上单位成立体育运动指导委员会，加强了对体育工作的领导。1955 年，训练总监部设立了管理全军体育训练和体育工作队的体育局。1957 年，群众性体育工作也划归体育局统一领导，形成了正规化的系统的管理体制。

（二）体育列为军队正规化训练课目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军区和各军兵种首先在组织上落实了对军

队体育活动的领导，西北军区在各级文化部门中配备了体育干部，华北军区则制定了部队体育实施方案，空军也成立了自己的体育机构，制定了体育工作规章条例，总后勤部团以上单位都配备有负责体育工作的干部。全军各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中都设有体育委员，以负责本单位的体育工作。

在总政和各级体育部门的领导下，全军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得非常普及，很有特色。江西军区直属部队在开展部队体育活动中，十分注意“由上而下地组织领导与推动。负责同志重视和亲自领导，与这运动开展有着决定性的关系，它不但可以解决练习时间和一些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掌握思想教育，培养成为集体英雄主义的精神”。在开展体育活动时，先机关后连队，先干部后战士。“因为机关是固定性的，有着集中的便利条件，可以通过机关干部的组织取得经验后，推及全军。”[1]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机关和首长，都十分重视体育工作，号召指战员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并设法购置了大批球类和其他运动器具分发到连队中去。志愿军战士根据本身战斗和工作上的需要，各自选定体育锻炼的重点，结合实际需要进行体育活动和劳动锻炼，使战士们的体质都大大增强，这对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与劳动效率，起了莫大的作用。华北军大通过举办体育文娱运动会师生广泛参加体育活动，他们认为“运动项目的多样性，最利于发动群众”，“运动会的项目，是从军事技术到一般体育运动，以至歌咏、戏剧、体操、游戏、舞蹈等多种项目，使全校员生都有可能参加一二项目卷入运动的浪潮中去”。此外，也应有“选手运动项目”，因为这“是发挥个人积极性，提高技术的旗帜”[2]。

❶ 四十八军政治部宣传部建团办公室．江西军区直属部队开展体育运动的初步总结．新体育，1950（4）：11.

❷ 全校第一届运动大会指挥评判科．华北军大第一届体育文娱运动大会的几点经验．新体育，1950（4）：12.

早在1950年，军委总政治部就提出要“大力加强部队体育活动”，确定各级文化部门负责领导体育活动，要求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设立体育委员，负责本单位体育工作。1952年，经中央和军委批准的总政报告中明确地把广泛地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锻炼指战员的体质作为军队训练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1953年，中央军委决定把体育列为人民解放军正规化训练的一个基本课目。

1954年，国防部颁发体育教令，编写参考材料，摄制刺杀、器械体操、田径运动、足球和早操等军教影片下发全军，用以指导部队体育训练和体育活动。训练总监部颁布《体育训练大纲》《体育工作指南》和《干部战士年度体育训练规划》。当时的体育工作者还翻译了大量苏联军事体育制度与规范，在吸收苏联经验的基础上，编制出版了适合我国人民军队军事体育发展的《劳卫制》《体育教范》《体育教令》和《体育训练教材》，以及《体育竞赛、考核制度》等指导性文件，使军事体育教育训练有了基本依据，训练方法得到规范，考核标准得到了统一。

（三）试行“劳卫制”

从1953年开始，人民解放军开始试行“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劳卫制先在华北军区和华东军区进行试点，然后逐步在全军推广，成为衡量军队体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1957年，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叶剑英又在军事院校会议上提出了“红、专、健”的口号，要求全军指战员都应成为既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又有专业知识技能，并具备非常强健身体的合格军人。这一要求进一步强化了军人的体育意识，促进了军队体育工作的开展。在1957年的体育正课训练中，全军百分之百地完成了规定练习，总评成绩达到“良好”标准。

人民解放军在广泛、活跃的群众性体育活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体育运动尖子，成为提高我国运动技术水平的生力军，如新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就是解放军举重运动员陈镜开；第一次战胜

外国国家队的是解放军女子排球队，她们于 1955 年战胜了保加利亚国家排球队；解放军男子排球队，于 1955 年也曾以 3∶0 战胜了当时的世界亚军罗马尼亚队；1958 年，解放军足球队以 1∶1 逼平苏联国家队；1959 年解放军男子篮球队战胜了全苏冠军第比利斯狄纳莫队。这些胜利又大大地鼓舞了全军的锻炼热情，使部队体育的普及与提高相得益彰。1959 年 5 月 6—16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 2 届全军运动会。这届运动会计有 16 个代表队的近 1 万名运动员参加，除设有第 1 届全运会规定的所有比赛项目外，还结合部队特点，增加了武装泅渡接力和军事实用项目，共设 43 个大项 390 个小项。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领导人出席观看了比赛和表演。在这届全军运动会上，先后有 28 人次超过 16 项世界纪录，有 101 人次和 6 队打破或创造了 50 项全国纪录。是对部队体育工作的一次大检阅。

（四）军队体育专门人才的培养

1953 年，为培养解放军体育骨干和体育管理干部，进一步推动全军体育工作的开展，在广州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体育学校（1961 年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属解放军总参谋部建制。训练任务、学员选调与分配、训练计划审批，由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负责；党政、教学工作、后勤供应，由广州军区领导、管理。学院的任务是负责培养全军院校的体育教员、部队体育参谋人员和基层体育骨干。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军事体育教育”的正式形成。

1953 年 7 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学校管理部的指示，建于 1950 年 7 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25 步兵学校，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体育学校（简称军体校）。学校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多数从 25 步校选留，体育教员则以长春军事师范学校体育系为基础，另从部队选调体育尖子经培训后充实教员队伍。军体校设训练部、政治部、干部部、物资保证部、队列处、财务科和

6个学员队及练习连。全校定编905人（不含练习连）。任务是为全军培养军、师、团的体育主任、基层体育骨干和院校体育教员。学制3~10个月。办校期间，共招收5期3026名学员。

1957年8月，军体校因整编而撤销，由留下的轮训队组成总参体育干部轮训大队。1958年7月，轮训队扩编为训练大队，共办了5期，轮训了学员2200名，并代训越南留学生两期共85人。

运动系共设11个专业运动队：男篮、女篮、足球、手球、田径、体操、举重、游泳、射箭和击剑（和“八一”体工大队双重管理）、军事三项（和“八一”军体大队双重管理），共300多人。还招收青少班。至1965年底，运动系培养的优秀运动员有：射箭，李淑兰、王锡华、徐开才；举重，黎纪源；军事三项，韩贵山、谢荣章、李忠娃、任全福等。射箭队10名运动员213次打破24项全国纪录，其中5人25次打破12项世界纪录；举重、田径、自行车共有29人打破51项全国纪录，8人打破8项全军纪录，举重打破1项世界纪录。

同期，学院的体育交往也较频繁。接待国内外运动队来访比赛共21次；接待15个国家体育代表团参观访问共31次。军事三项队4次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友军比赛，获团体冠军两个、个人冠军4个。

“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2月）军体院被撤销。

（五）首届全军运动会

为了检阅全军体育运动的成果，1952年8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举办了新中国首届全军运动会。参加大会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直属单位，还有抗美援朝前线的志愿军代表团，计男女运动员1823人。共进行了军事（包括通过障碍、投掷手榴弹、500米全副武装越野跑等）、田径、球类、体操、举重等44个项目的比赛，以及航空、摩托车、马术、水上、团体操等42个项目的表演。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幕式，朱

德副主席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并为运动会题词："锻炼自己成为铁的体质，保卫我们最可爱的国家。"

1952 年，西南军区成立了拥有 200 余名运动员的"战斗体育工作大队"。这一支新型运动队伍，夺取了西南区首届运动会 12 个项目中的 11 项冠军；参加首届全军运动会获女排冠军，破 3 项田径全国纪录。

首届全军运动会不仅创造了男子跳高、女子跳远、男子 800 米接力、男子 1600 米接力、女子 400 米接力、女子 800 米接力 6 项全国最高纪录，更重要的是参加这次大会的运动员是从解放军各个部队、各个兵种中由下而上逐级选拔出来的，运动员中包括许多战士、各级指挥员和高级干部；有功勋卓著的老红军、战斗英雄、工作模范，也有参军不久的青年学生。他们都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体育积极分子，充分说明部队体育的广泛性和群众性。

四、民族体育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19 条中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少数民族的民族传统体育是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体育的重要基础，这些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传统体育表现形式已成为各民族欢庆节日的重要内容。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为了推动少数民族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有关部门还通过体育学院和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体育专业人才，调拨了一定的体育经费和运动器械，修建了一些体育场地。

（一）武术的继承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武术作为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蓬勃的发展。1950 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在北京

召开了武术座谈会，就新中国武术如何发展进行讨论。参加座谈会的有张文广（天津）、徐致一（上海）、田镇峰（北京）等。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对发展新中国武术充满了信心。认为武术作为传统体育项目，应该得到不断的继承与发展，希望广大体育工作者投入到对武术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中来，以推动武术的普及和发展。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这项活动在工人、农民和学生中很快得到了开展。那时，天津市一些棉纺厂、铁路和建筑单位都建立了武术队。山西太原市郊区有20多个村子的青年农民经常在晚上练武术，哈尔滨工业大学有几百名学生坚持武术锻炼。

1952年，荣高棠同志在全国体育总会第2届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对于那些为群众所熟悉和爱好的武术、摔跤、石锁、砂袋、举石担、骑马、跳绳等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改进，去掉其不科学的部分，使之成为广泛开展劳动群众中的体育活动的有效形式之一。"[1]由于体总有明确的指示，因此各地厂矿、企业、学校和机关中的武术锻炼小组迅速增加，社会上一些拳社也开始恢复和发展。

中央体委成立后，为了推动武术及其他民族形式体育的发展，1953年11月8—12日，在天津举行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武术是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仅拳术就有罗汉、八极、猴拳、绵拳、查拳、八卦、太极、通臂、螳螂等139项。大会还进行了散手和短兵的比赛，在武术对抗项目的竞赛上作了尝试。

大会期间，政务院副总理兼体委主任贺龙在接见记者时对武术工作发表了精辟的意见。他说："民间流传的武术套路是很多的，不仅汉族有，各少数民族也有，这是要花费力气去发掘的。譬如一座宝山，要探明情况发掘出来，这是头一件要做的事。被挖掘出来的东西是真宝还是假宝，又得花费力气去淘洗、整理。要剔出其违

[1]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167.

反科学的东西，打开人们的眼界，还复它固有的健康的形体。如何使它符合科学原理，使它们更易于掌握，收到增强体质的效验，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件事。要提高拳艺，不外两个方法：一是从现有基础上开拓新境界，一是博采他人的擅长。只有经过刻苦认真的揣摩，道路才能越走越宽，习前人这习，也才能在自己手里发扬光大，取得更大更多的成效。这是第三件事。”❶实践证明，贺龙同志所提出的发掘、整理、发扬光大武术的主张，对新中国武术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全国民族形式体育大会后，还组织了赴京武术表演团。表演团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了汇报表演。朱德同志看了表演后说：“要重视祖国几千年的传统。”表示支持发展武术运动。表演团还在一些部委和高等院校作了表演，受到了热烈欢迎。

在这次大会的推动下，各地武术组织和活动发展很快。中央体委和一些省、市体委设立了专门工作机构，配备了干部。不少地方参加武术活动的青少年迅速增加，各种武术组织恢复和建立起来。1954 年成立了国家武术队。由于党和政府对武术的重视，武术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的被选为人民代表，有的被选为全国体育总会委员，有的成为高等院校的教师。这一年，各地体育院系也把武术列为了正式课程。

武术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产物，它既有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博大精深的内容，又混杂着一些消极落后、陈腐虚妄的尘埃。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上有些武术社团情况复杂，有些还有推行一些封建迷信、对健康有害的东西，有的借武术为名做坏事。“考虑到这些方面的情况，1955 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对武术工作采取了暂时收缩加以整顿的方针”，国家体委副主任蔡树藩在当年 5 月 31 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十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说：“武术工作根据主观力量和客观情况，目前只能进行一些整理和研究工

❶ 荣高棠. 当代中国体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50-151.

作；提出一些与体育有关的、对健康有益的、又能推行的项目。”还指出“厂矿、企业、学校、机关原有武术小组，要加以整顿；没有的，暂不建立。农村中坚决停止发展，原有的武术活动，可由区乡政府、青年团加以领导，不要被坏分子利用做坏事”。[1]当时的这一方针“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存在‘左’的影响，对武术发展中的阴暗面看得过重，以致停了一些不该停的武术活动，有些老武术工作者受到了不正确的对待。这是一个教训。”[2]

回族武术传统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扬。从20世纪50年代始，山东、河北等地回民，在清真寺内成立“回民武术研究所”或各种武术协会，广泛开展群众性武术活动；请老一辈武术大师挖掘整理濒临失传的传统技艺；八卦、劈挂、查拳、华拳、二郎、弹腿等各门派的拳师名将纷纷收徒授艺。一代武林新秀茁壮成长，一批回族武术健将涌上全国及省、地、市、县各级武坛。

（二）民俗活动的开展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以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在自己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更是表现了各自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传统文化特色，如蒙古族的摔跤、赛马；藏族的打马球；锡伯族的射箭；高山族的竿球；拉祜族的打陀螺；傣族的划龙舟；彝族的斗牛；朝鲜族的秋千；哈萨克族的姑娘追；塔吉克族的叼羊；回族的武术等。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认为这是增强体质、造福少数民族人民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贯彻民族政策、增进民族团结的一项重要任务。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9条中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

[1]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 中国武术史.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365.

[2] 荣高棠. 当代中国体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51-152.

展和繁荣民族文化。”少数民族的民族传统体育是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体育的重要基础，这些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传统体育表现形式已成为各民族欢庆节日的重要内容，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白族的“三月街”、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藏族的“望果节”，其中都要举行诸如摔跤、赛马、射箭、斗牛、划龙舟等项体育活动。

（三）民族运动会

为了推动少数民族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有关部门还通过体育学院和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体育专业人才，调拨了一定的体育经费和运动器械，修建了一些体育场地。1953 年 11 月 8—12 日，国家为了交流经验，示范和推广少数民族的民族传统体育，在天津召开了规模盛大的“1953 年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民族形式体育大检阅，也是民族形式体育界第一次大会师。参加比赛的有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傣族、朝鲜族等十个民族的 397 名优秀选手，他们分别来自华北区、东北区、西北区、中南区、西南区（包括西藏）和内蒙古自治区、解放军及铁路系统等 9 个单位。竞赛项目有举重、拳击、摔跤、短兵和步射，表演项目有武术（分拳术和器械等）、民间体育（分石担、石锁、弓箭术、弹丸、爬杆、跳板、木杠、皮条、沙袋、地转、跳桌、筋斗、叠罗汉、大武术、五虎棍、打术、跳术、跳绳、飞叉、中幡等 22 项）、骑术（各种马上技巧表演 9 项）3 大类，特邀表演有马球、蒙古式摔跤、舞狮、杂技等。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武术，是这次大会最丰富的表演项目，145 名运动员共表演了 332 个节目[1]。其中维吾尔族的达瓦孜（踩绳）、蒙古族的摔跤、朝鲜族的跳板、回族的武术以及内蒙古骑兵的马术等少数民族项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1] 武原. 记 1953 年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 新体育，1953（37）：8.

竞赛项目中有10名举重运动员创造了国家新纪录。来自全国各地及天津市的观众有12万人次。运动会闭幕后，又挑选了90名优秀运动员进京连续表演了31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1984年，国家体委、国家民委将这次“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定为第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第四节　竞技体育的初步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参加国际体育比赛对于维护和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增进新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打破帝国主义的国际封锁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国家十分重视竞技运动的发展。

一、积极与友好国家进行体育竞技交流

经过新中国初期的艰苦开创，我国竞技体育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国际体育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

作为世界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应是世界体育事业的一部分。由此，我国为积极加入各种国际体育组织、建立与国际体育组织的正常联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首先是一些单项运动协会加入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例如中国游泳协会在1952年4月就加入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中国排球协会在1952年10月加入国际排球联合会为临时会员，1954年1月被批准为正式会员；中国乒乓球协会于1953年加入了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中国摔跤协会于1953年5月25日加入了国际业余摔跤联合会，为临时会员，1954年5月20日被批准为正式会员；中国体操协会于1956年8月加入了国际体操联合会等等。

其次是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地位进行了有

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52 年 2 月 5 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就曾致函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声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体育组织，任何其他团体不能作为中国的合法代表参加国际奥委会及其活动，并排除一切困难参加了第 15 届赫尔辛基奥运会，以示我们对国际奥委会的尊重与诚意。尽管国际奥委会曾多次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1954 年 5 月 14 日，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 49 次会议上，还是以 25 票赞成 21 票反对通过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国家奥委会，是国际奥委会的成员，但是，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美国的布伦戴奇却同时将中国台湾的体育组织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列入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中，搞起了“两个中国”的把戏。在国际奥委会的文件中不断出现“北京中国”和“福摩萨中国”的字样[1]。对此，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董守义先生和中国体育代表荣高棠等人曾一再提出抗议，指出台湾体育组织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体育组织，无权代表中国，希望国际奥委会不要制造“两个中国”。然而，布伦戴奇却坚持错误立场，反诬中国在“搞政治”，甚至称台湾过去“不是属于中国的”。1956 年以后，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也陆续用“中华民国”的名义接纳了台湾的体育组织，允许他们占据我国的合法席位。在这样的情形下，为了维护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有关单项运动协会，于 1958 年 8 月 19 日毅然宣布了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同时中断了与国际游泳、田径、篮球、举重、射击、摔跤、自行车联合会及亚洲乒乓球联合会 8 个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先生也同时声明：拒绝与布伦戴奇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很注意通过体育活动发展与友好国家的交往。1949 年 8 月 14—28 日，中国学生篮球队就参加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第 2 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和

[1] 罗时铭. 奥林匹克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57.

第10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活动更加频繁。1950年，中国学生男子篮球队、排球队参加了8月14—23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学生第2次代表大会的体育比赛，比赛结束后，篮、排队继续访捷，篮球队指导为宋君复，排球队指导为马启伟。8月27日—9月11日篮球队访问了罗马尼亚。

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个外国体育代表团，是1950年12月24日由苏联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体育学校部部长罗曼诺夫率领的苏联体育代表团，其篮球队于12月28—31日分别和北京的京联、学联、体联等队进行了友谊比赛。1952年7月15日—8月30日，波兰男女篮球队也访问了我国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城市，共进行了10场男、女篮球友谊比赛，观众达10多万人。友好国家体育代表队的来访不仅给当时我国体育运动以很大的鼓舞，同时也使我们在某些项目上了解到了世界体育发展的水平以及我国存在的差距，对加快新中国成立初期竞技体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最重要的国际体育活动是观摩亚运会和参加第15届奥运会。1951年，中国体育观光团在体总筹委会国际联络处处长吴学谦团长的率领下，应邀访问印度并观摩了3月4—10日在新德里举行的第1届亚洲运动会。当时中国还不是亚洲运动会联合会（1949年成立）的成员。1952年7月29日—8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派出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荣高棠为团长的包括足球、篮球和游泳选手在内的40人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7月29日，中国代表团抵达芬兰时，奥运会比赛已进行了10天，足球、篮球等项目的预赛均已结束，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参加了一项男子仰泳比赛。中国篮球队与芬兰国家篮球队等进行了几场友谊赛。

在群众体育广泛开展的基础上，我国运动技术水平也得到极大提高，创造了一批优秀的运动成绩。1953年8月9日下午，我国著名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1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100米仰泳决赛中，以1分8.4秒的成绩，为

新中国获得了国际体育比赛中的第一枚金牌，使鲜艳的五星红旗首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吴传玉是1951年10月回国的印度尼西亚华侨青年，是新中国第一个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优秀运动员。吴传玉还曾在1954年的第12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中，获得过100米仰泳和100米蝶泳的亚军。不幸的是他在1954年10月去匈牙利学习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罹难，当时年仅26岁。吴传玉的成绩大大地鼓舞了新中国运动员为国争光的斗志，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号召体育界向吴传玉学习，"超过吴传玉"，在运动员中掀起了一个破纪录、创造优秀成绩的比、学、赶、帮、超的训练热潮。

二、为加入国际体育组织不懈努力

伟大的新中国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是国际大家庭不能缺少的一员，同样她也应该成为国际体育组织的一员。由此，我国为积极加入各种国际体育组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一）加入单项国际体育组织

1952年3月23日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致函国际业余篮球、田径、游泳、足球、自行车等联合会，声明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已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体育组织，并愿继续参加各个国际体育联合会的组织、会议与体育活动，决不允许台湾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盗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名义进行任何活动。4月25日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致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表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该会会员。5月7日国际业余篮球联合会致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代表中国篮球界的组织，并为该会会员。6月14日国际足球联合会致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替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该会会员。

10月12日亚洲乒乓球联合会致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接纳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该会会员。10月28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加入国际排球联合会为临时会员。1953年3月20—29日举行的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被接纳为该会会员。8月4日国际草地网球联合会致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替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该会会员。10月25日国际业余摔跤联合会接纳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临时会员，1954年1月11日国际排球联合会来函，接纳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正式会员。1954年3月6日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替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该会会员。5月20日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业余摔跤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该会正式会员。8月24日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在瑞士伯尔尼召开的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该会会员。9月8日国际射击联合会致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接纳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该会会员。1955年10月12日，国际举重与健身联合会在1955年的代表大会上通过接纳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该会会员。1956年6月4—6日，国际滑冰联合会理事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冬季运动协会为该会会员。1956年8月28—9月1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国际体操联合会第35届代表大会上，通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体操协会为该会会员（表1-5）。

表1-5　1949—1956年间我国单项运动协会加入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情况

序	项 目	承认为正式会员的国际体育组织	致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或代表大会通过时间	说 明
1	游 泳	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	1952-04-25	
2	篮 球	国际业余篮球联合会	1952-05-07	
3	足 球	国际足球联合会	1952-06-14	

（接续表）

（续表）

序	项 目	承认为正式会员的国际体育组织	致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或代表大会通过时间	说 明
4	乒乓球	国际乒乓球联合会	1953–03	1953–03–20—29 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 20 届世乒赛期间举行的联合会代表大会上被接纳为会员。1952–10–12 被亚乒联接纳为会员
5	网 球	国际草地网球联合会	1953–08–04	
6	排 球	国际排球联合会	1954–01–11	1952–10–28 为临时会员
7	自行车	国际自行车联合会	1954–03–06	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
8	摔 跤	国际业余摔跤联合会	1954–05–20	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1953–10–25 为临时会员
9	田 径	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	1954–08–24	在瑞士伯尔尼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
10	射 击	国际射击联合会	1954–09–08	
11	举 重	国际举重与健身联合会	1955–10–12	1955 年代表大会通过
12	滑 冰	国际滑冰联合会	1956–06	1956–06–04—06 联合会理事会议通过
13	体 操	国际体操联合会	1956–08	1956–08–28—09–01，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第 35 届代表大会上通过

（二）争取中国奥委会应有的合法地位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最为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为体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也给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开始了新的历程。

1949 年 10 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基础上，改组建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简称全国体总）。1952 年全国体总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代表大会。此后，各地陆续建立了体总的地方分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对外代表中国的国家奥委会。体总的主要任务是举办（或与有关单位部门联合举办）全国性的体育竞赛和运动会，负责加强与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举办或代表中国参加国际体育竞赛活动；体总地方分会负责各自区域内的体育竞赛活动。与体总的前身全国体协相比，全国体总成员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组织系统也更加完善和健全。

1949 年以后，中国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经过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1952 年 2 月 5 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致函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宣布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决定派出运动员参加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第 15 届奥运会。2 月 13 日，盛之白代表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出席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第 46 届国际奥委会，会上再次表达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立场和愿望。然而，当时国际奥委会中的一些人却违背《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拒不邀请我国参加。为此，中国奥委会秘书长荣高棠致电国际奥委会主席埃德斯特隆，申明我正义立场和要求，赢得了世界舆论、国际奥委会中正义之上及芬兰朋友的广泛支持。在经过激烈斗争后，7 月 18 日晚，中国接到第 15 届奥运会组委会主席、赫尔辛基市市长佛伦凯尔的邀请电。国际奥委会终于在第 15 届奥运会举行前夕，作出了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参赛的决定。

但是，第二天的 7 月 19 日，奥运会就开幕了，赫尔辛基远在万里之外，中国，去还是不去，周总理当机立断，于 7 月 19 日晚批示：要去。

时间太仓促了，中国临时组织参赛队伍。

7月23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组成。一支篮球队，一支足球队，外加一名游泳选手，全团共40人。荣高棠为团长；黄中、吴学谦为副团长；董守义为总指挥；李凤楼为足球队指导；牟作云为篮球队指导。

7月24日深夜，出发的前夕，周总理不顾一天的疲劳，在中南海接见了这支待发的队伍。他关切地询问了准备情况，又亲切地指出：此去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会就是胜利。正式比赛赶不上，可与芬兰的运动员进行比赛，积极参加友好活动。

7月25日凌晨，中国体育代表团乘三架飞机，从首都西郊机场起飞，日夜兼程，赶到赫尔辛基时已是29日11时了。大会虽近尾声，但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到来，仍受到芬兰人民的热烈欢迎。特别是董守义，当他走下飞机时，立即受到前来欢迎的、熟识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拥抱。“董守义早已死在大陆集中营”的谣言不攻自破。

12时半，在奥林匹克村举行了升旗仪式，数百名外国的运动员和新闻记者赶来参加，气氛十分热烈友好。曾参加过第14届奥运会的足球选手张邦伦，荣幸地成为升旗手。只见他轻轻地、缓缓地拉动绳索，五星红旗伴随着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奥林匹克盛会上，又扬起一面新生民族的风帆。同时，奥运会主会场及重要赛场、中国代表团驻地和赫尔辛基街道两旁，中国国旗和其他国家的国旗一起高高飘扬。

但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来得实在太晚了，大多数比赛项目已经结束，唯有吴传玉赶上参加第二天的百米仰泳预赛。但由于旅途疲劳和时间差，吴传玉没有进入决赛。

遗憾的是，国际奥委会同时也邀请了台湾的体育组织参加，并对中国席位问题予以“保留”。

此后，国际奥委会在几次会议上，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1954年5月14日，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

届会议上终于以 23 票对 21 票通过了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国家奥委会，但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却将中国台湾的体育组织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列入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中。在以后的国际奥委会一系列有关会议上，董守义、荣高棠等人一再提出抗议，指出台湾的体育组织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体育组织，无权代表中国，希望国际奥委会不要制造“两个中国”。但布伦戴奇却坚持错误立场，反诬中国在“搞政治”，甚至称台湾过去“不是属于中国的”。1956 年以后，陆续有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同意用“中华民国”的名义接纳了台湾的体育组织，允许他们占据我国的合法席位。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体总和有关单项体育运动协会不得不在 1958 年 8 月 19 日宣布中断与国际奥委会和承认了蒋介石集团所谓“体育组织”的国际游泳、田径、篮球、举重、射击、摔跤、自行车联合会和亚洲乒乓球联合会 8 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联系，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也声明拒绝与布伦戴奇合作。从此，中国和国际奥委会的正常联系被迫中断。

为了寻求中国问题的合理解决，国际体坛，特别是国际奥委会中的一些人士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在 1979 年 3 月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上指出，在国际奥委会的档案中，确实查不到任何会议讨论承认台湾“奥委会”的记录。在 1979 年 4 月国际奥委会全会上，中国奥委会代表何振梁明确表示：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只应该承认一个中国奥委会，即设在北京的中国奥委会；考虑到让台湾的运动员亦有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可允许台湾的体育组织作为一个地方机构，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义留在奥林匹克运动内，但它的旗、歌和章程等应作相应的变动。1979 年 11 月 16 日，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以通讯表决方式（62 票赞成、17 票反对、2 票弃权）通过决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会址北京；设在台北的奥委会的名称是“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其新的会旗、会歌和会徽均须

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批准。这就是以后大家所说的“奥运模式”。各国际体育组织也都循此解决了我国的合法席位，同时允许台湾作为我国的一个地方性组织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有其席位。“奥运模式”的创立，为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地位铺平了道路，使我国全面登上国际体坛，成为中国体育全面走向世界的新起点。

三、体育竞赛制度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开展运动竞赛作为促进体育运动普及和提高的重要措施，1956 年国家体委公布了《运动竞赛制度的暂行规定》（草案），以后几经修改完善，使全国竞赛纳入统一规划之中。

（一）建立竞技体育体制的初步探索

为了适应参加奥运会等国际体育活动的需要，中央体委成立后，迅速建立了新时期体育协会的组织。除了 1949 年已经成立的篮球协会以外，又新成立了中国摔跤协会（1953 年）、中国网球协会（1953 年）、中国排球协会（1953 年）、中国自行车协会（1953 年）、中国田径运动协会（1954 年）、中国体操协会（1954 年）、中国足球协会（1955 年）、中国乒乓球协会（1955 年）、中国举重协会（1956 年）、中国射击协会（1956 年）等，这些单项协会，在各自的领域内团结广大体育工作者，致力各运动项目技术的提高和各项运动的发展。

与此同时，在人民军队体育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又借鉴了苏联等国的模式，逐渐建立起了中国的竞技体育体制，即主要由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和省级、国家级常设运动队构成的训练体制和以全国运动会为核心的竞技体制。1956 年，国家体委公布了《青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草案）和《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草案），

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各级青少年业余体校，它们是国家优秀运动员的主要人才资源培养和储备基地。

各项目的国家队一成立，有关部门就注意了对训练加强领导。1957年，中国足球协会根据足球技术训练的特点，首先提出了关于足球训练工作的一些要求。例如要求各队都要在足球训练中“加强身体训练”，足球的“技术训练要符合比赛的要求”，训练中要注意“提高射门命中率”，“正确理解攻防技术”。训练中还要求能“在对方禁区组成强大的突击力量”。足协要求全国甲、乙级足球队通过训练，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1957年，中国篮球协会也针对篮球技术训练的特点，提出了关于篮球训练的一些要求。如要求甲、乙级篮球队的训练工作必须在全面训练的基础上，有重点地提高中、远距离投篮命中率和防守能力。1957年，中国排球协会也指出：“从全国甲、乙级排球联赛和参加国际比赛的情况来看，我国许多排球队中存在重攻轻守的思想，突出表现在拦网、接发球的第一传和由防守转为反攻的技术动作远远赶不上比赛的需要。”要求各排球队在今后的训练中尤其要加强拦网训练，加强接发球的一传训练，加强在对方扣球后由防守转为反攻的训练。

我国竞技体育的比赛活动虽然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了，但作为比赛制度稳定下来，则是从1956年开始的。1956年国家体委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的暂行规定》（草案）是新中国比赛体制确立的最早雏形，其中规定：在我国实施竞赛制度的运动项目共43个，它们是田径、体操、篮球、排球、足球、棒球、垒球、花样滑冰、冰球、滑雪、近代五项、举重、拳击、摔跤、击剑、射箭、技巧运动、爬山、武术、马术、棋类、旅行、自行车、帆船、舢舨、划船、水上摩托、射击、汽车、摩托、飞行、滑翔、跳伞和航模等。篮、足、排各项设“全国甲、乙级队联赛”制度，每年举行一次，每次比赛两轮，甲级赛的后两名降为乙级，乙级的前两名升入甲级队。全国设“综合性运动会”，每4年举行一次；在综合性运动会里包括的项目，当年不另举行单项的全国锦

标赛。此外，对地方的省、市等各级的竞赛制度也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从而使全国的各种竞技体育比赛活动都纳入到了一个有序的管理系统。例如，1956年国家体委发出文件，规定综合性的运动应成立组织委员会，在大会期间设立主席团，组织委员会下设秘书处、总务处、宣传处、保卫处、医务处、裁判委员会等；大型单项竞赛会应设组织委员会或组织处，下设处（或科），如秘书、宣传、裁判委员会等；联赛、对抗赛等则只设组织处，小型表演则由竞赛部门直接举办，不另设机构。在运动会的仪式方面，文件也明确规定大型运动会应有较隆重的开幕式，即奏乐、奏国歌、运动绕场一周持单位旗受检阅、升旗、讲话等，还要有与开幕式相同的闭幕式。大型竞赛会会场应挂横标、彩旗、宣传画等。对裁判工作、竞赛方法等也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在建立运动竞赛制度的同时，国家体委也逐步建立了优胜奖励制度。1956年3月，国家体委就各级运动会试行奖励作出了相关规定。配合运动竞赛制度的建立，1956年4月28日国家体委还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等级制度条例》（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裁判员等级制度条例》（草案），1957年3月27日又公布了《关于如何审查与承认省（自治区）、市最高纪录的几点规定》。

这样，从运动人才培养到运动竞赛的竞技运动体制就初步形成了。

（二）国内比赛的广泛开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的体育比赛活动，除广泛举行的各种群众性比赛以外，还举办了一些全国性的单项比赛。1951年5月4—18日，为了选拔赴柏林参加第3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球队，在北京举办了全国篮、排球比赛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举行的第一个大型全国性体育比赛。参赛单位有华北、东北、西北、中南、华东、西南6大行政区，以及人民解放军和中国铁路工会，共593名

运动员。竞赛项目分男女篮球和男女六人排球。比赛采用单循环制，13 天共举行了 130 场篮排球比赛和表演，最后华东队双获男女篮球冠军，中南队获男子排球冠军，东北队获女子排球冠军，58 名运动员获“全国篮排球选手”称号，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央体训班”（国家队的前身），59 名运动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队的首批队员。

1951 年 12 月 1—9 日，在天津举办了第一次全国足球比赛大会。参赛单位除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 6 大行政区外，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铁路工会的足球代表队。最后华北足球队获得冠军，并有 31 名运动员获“1951 年度中华全国足球选手”称号。

1952 年 9 月 14—16 日，在广州首次举行了全国游泳比赛大会。

上述比赛的目的主要是促进各单项技术水平的提高，同时注意发现和培养国家级优秀体育选手。1951 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向全国颁布了《国家体育选手条例》，这是我国后来出现《等级运动员制度》的最早雏形。在选手条例中，不仅公布了成为国家选手的条件，而且公布了国家选手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对违反条例的选手进行处理的意见等。根据这个条例的精神，并结合全国性篮、排、足球比赛情况，我国先后公布了 1951 年度全国篮排球选手 58 名（其中含候补选手 5 名）。其中，男子篮球选手：么世忠、王琦、王元琪、李汉亭、余邦基、唐振声、徐仲巳、张长禄、黄柏龄、程世春、杨福鹿、赵学元、卢鼎厚、蓝文治、乐嘉洲。候补选手：刘建华。女子篮球选手：李丹阳、朱锦云、周勤邦、马申妹、徐婉秀、黄珍、许敏、彭嘉颐、郑于莲、蔡明霞、薛月华。候补选手：鲍临津、杨淑君。男子排球选手：王祖洪、江振洪、李荣国、李安格、余瑞河、沙里木江、孙志安、黄亨、黄福彦、钱家祥、卢文枏、韩延春、谭元芳、饶余榕。候补选手：孙继贵。女子排球选手：冼少梅、花桂卿、马纫华、陈梅贞、徐平、张

履冰、张雷鸣、刘匡生、萧兰玉、龚雅丽。候补选手：李文秀。足球选手：徐福生、高秀清、邢桂福、庄文权、姜杰祥、陈成达、钱允庆、方纫秋、何家统、郑德耀、张杰、张邦伦、曹桂明、邵先凯、李朝贵、史万春、年维泗、王礼宾、郭鸿滨、王政文、王寿先、金秉奎、丛安庆、李逢春、崔曾石、金龙湖、孙福成、萧子文、高保正。1952 年又公布全国乒乓球选手 19 名，包括姜永宁、冯国浩、杨开运、欧阳维、陆汉俊、李宗沛、王传耀、岑淮光、李仁苏、夏芝仪、王吉禄、李锵、孙梅英、李麒书、柳碧、蔡秀娱、方亚珍、邱钟惠和黄文秀，总教练是来自广东的梁焯辉。

为了促进新中国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适应参加国际比赛的需要，全国体总筹委会曾组织部分专家学者，对国际篮球规则与我国当时篮球规则不同点和六人制排球运动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关于篮球规则不同点的研究，一共涉及到篮球活动中的 14 个方面，它们是：罚球区域问题、遮板问题、球的标准问题、请示暂停问题、暂停次数问题、界外指导问题、侵人犯规问题、跳球地点问题、球回后场问题、判决时的鸣哨问题、聚众犯规问题、运球问题、放弃罚球权问题，以及比赛中球员更换球衣号码问题。

1949 年以前，在我国普遍流行的是九人制排球，六人制排球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接触的。当时对六人制排球，除了全面介绍它的运动方式、一般技术和战术、裁判规则以外，还特别注意了对六人制排球特点的研究，如将它的合法击球分成了四大类，即弹击、拍击、拳击、拦挡。专家们特别注意六人制排球运动项目的优点，如它可以使每名队员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运动量较大、易引起观众的兴趣等等。对六人制排球的研究和广泛的宣传，使它很快地便被国人所接受，并在全国流行起来。

中央体委成立之后，逐步加强了对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领导，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都发展较快。为规范对运动技术成绩的管理，国家体委按国际惯例于 1956 年 1 月 11 日公布了 1955 年的 102 项

全国纪录，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公布全国纪录，标志着我国运动竞赛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中 78 项是在 1955 年创造的，18 项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其他年份创造的，只有 6 项是在旧中国时创造的。

20 世纪 50 年代，竞赛制度尚在形成过程中，主要以单项运动为主，多属于表演、测验或冠军赛之类，但参加面比较广，如 1953 年 5 月 2—12 日，在天津举行了“全国篮、排球比赛和网、羽毛球表演大会”，参加大会的有 6 大行政区和解放军、火车头体协及内蒙古自治区的男女篮、排球队，共进行了 44 场比赛，解放军队囊括了男女篮、排球冠军。网球、羽毛球共进行了 175 场单、双打表演赛。1954 年 8 月 25—28 日，在广州举行了“全国游泳竞赛大会”，令人兴奋的是这次比赛结果，将 1952 年全国游泳比赛大会的纪录全部刷新，并且在 20 项游泳竞赛中，又创造了 8 项全国最高纪录（其中有两项以往没有全国纪录）。

1955—1956 年的单项比赛和测验情况如表 1-6 所示。

表 1-6　1955—1956 年的单项比赛和测验

（不算分区赛、阶段赛、表演赛、城市对抗、单位对抗、运动大会）

1955-02-01—05	全国冰上运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
1955-03-04—11	全国举重测验比赛在北京举行
1955-04-09—10	全国田径测验在上海举行
1955-08-20—23	全国游泳竞赛大会在上海举行
1955-10-08—26	中国人民解放军射击竞赛在北京举行
1955-10-25—11-10	全国篮球联赛在北京举行
1955-11-15—18	全国体操测验在北京举行
1955-11-26—28	全国游泳测验在北京举行
1955-11-27—12-07	全国排球联赛在北京举行
1955-12-25—27	全国举重冠军赛在北京举行
1956-01-26—30	全国冰上运动会在长春举行

（接续表）

（续表）

1956-04-01—15	全国足球联赛在西安、沈阳举行
1956-04-27—29	全国体操单项个人冠军赛在北京举行
1956-05-02—12	全国排球锦标赛在上海举行
1956-05-13—14	全国越野跑、竞走冠军赛在北京举行
1956-05-20—06-05	全国排球联赛在天津举行
1956-05-23—27	全国举重冠军赛在北京举行
1956-06-03—16	全国足球锦标赛在青岛举行
1956-08-05—09	全国体操冠军赛在天津举行
1956-08-10—24	全国航空模型竞赛大会在北京举行
1956-08-17—21	全国航海多项运动竞赛在青岛举行
1956-08-17—28	全国篮球锦标赛在郑州举行
1956-08-26—28	全国水上运动会在广州举行
1956-09-01—10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在武汉举行
1956-09-10—15	全国摔跤（中国式）比赛在北京举行
1956-10-02—18	全国产业体育协会足球联赛在武汉举行
1956-10-13—17	全国射击竞赛在北京举行
1956-11-10—27	全国篮球甲级队联赛在重庆举行
1956-12-15—27	全国象棋（中国象棋）锦标赛在北京举行
1956-12-17—18	速度滑冰选拔测验比赛在哈尔滨举行

四、组建国家队

国家队和省级体工队基本上是按照原八路军战斗体育工作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 1951 年组建国家篮球队的基础上，1953 年组建了国家田径队，1954 年组建了国家乒乓球队、游泳队和羽毛球队，1955 年组建了国家体操队，1956 年组建了国家排球队等。组建国家队的目的，是为贯彻“在适当范围内提高”的精神，以尽快形成优势运动项目，努力在竞技体育上有所突破。

五、华侨华人对祖国体育事业的贡献

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体育的建设中，海外华人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报效祖国，为国争光

海外华侨体育优秀选手回国效力，可以说是为迅速提高祖国的竞技体育水平，缩短与国际体育强国的差距，形成项目特色和优势，在技术上和人才上作出了基础性的巨大贡献。我国的羽毛球运动从无到有，成为国际羽坛上的一支劲旅，是一批由印尼回国的运动员、教练员呕心沥血，奋力拼搏的结果。如驰骋羽坛的名将王文教、陈福寿、侯加昌、汤仙虎等大批运动员都是归国华侨，又如游泳、举重、自行车、乒乓球等运动项目，也有不少优秀运动员是归国华侨。如出生于印尼的吴传玉，从香港回来的傅其芳、容国团等等。在1959年的新中国第1届全运会上，福建队的66名华侨选手，有27人获得了44枚奖牌，夺得11项个人和团体比赛的冠军。出生于印尼的吴传玉，1951年回到祖国，1953年8月9日在第1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获100米仰泳冠军，为新中国夺得第一枚重大国际比赛的金牌，使五星红旗在异国随着国歌乐曲冉冉升起。

20世纪50年代，大批华侨将子女送回祖国读书，其中有不少孩子的体育基础较好，回国后他们的体育才得到充分的发挥。以厦门集美村的一所华侨补习学校为例，仅50年代，就培养出10名运动健将，其中有在国际比赛中屡获优异成绩的女游泳运动员傅翠美，全国拳击冠军陈伟勇，自行车运动员李景莹、洪椒彬等，都曾创造过很优秀的成绩。田径运动员廖国侨、梁熊枢，举重运动员许丽水、郭一、高铭顺等，都曾打破过全国纪录。

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的发展能够具有更高更新的基础和起点，很多项目能够很快接近或领先国际的先进水平，与华侨的贡献

和努力是分不开的。如1958年成立的湖南省羽毛球队，男队队员全部为归侨，即赖家椿、谢炳炎、卢文轩、赵传豹、侯加昌；女队3名运动员中两名是归侨，即周宝梅、钟金昭[1]。50—60年代中期，是华侨选手在国内大赛和代表祖国参加国际大赛中取得优秀成绩的辉煌时期[2]。

（二）资助体育场馆设施的建设

捐献巨额资金，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为新中国兴建了一大批体育场馆，是华侨华人为祖国体育事业作贡献的又一特色。尤其是侨乡的体育基础设施，主要都是由华侨助建的。在泉州，华侨华人捐资修建了大批学校篮球场、排球场和其他运动场。例如有400米跑道和固定道牙、固定看台、能容纳6000多观众的国光中学体育场和占地17300平方米、有400米跑道的荷山中学体育场，就在这一时期由华侨李光前先生和刘玉水先生捐资兴建。南安华侨中学体育场、泉州华侨大学体育场（旧）、南安五星中学运动场及晋江、惠安、泉州、南安一些中、小学运动场，也在20世纪50年代由华侨捐资建成的[3]。特别是晋江，50年代有篮球场705个，其中76%是由华侨捐资修建的。50年代初期，陈嘉庚先生筑堤围垦集美南国的海滩建成宽300米、长800米的龙舟池，每逢端午节，即在此举行龙舟赛。

第五节　国防体育的产生与发展

从战争中走出来的新中国，始终将国防体育作为体育发展的重

❶ 华侨华人与体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97.

❷ 傅砚农. 华侨参与振兴祖国体育事业的历史过程探析. 体育文史，1995（6）：16-18.

❸ 华侨华人与体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01.

要内容，也重视体育为国防服务。“人民的体育训练与体育运动，对于国防事业、生产劳动及其他各种建设事业都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与作用”[1]，是使体育“成为人民在自己伟大的建设事业和国防事业中获得胜利的一个有力因素和保障”[2]。根据新民主主义体育的方针，冯文彬在1950年7月20日的体育工作者暑期学习会上作了《关于开展人民体育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了新体育的目标：“为了增进国民的健康，为了发展新中国的建设和巩固新中国的国防。”冯文彬说，我们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目标，是因为“要发展生产、建设祖国、巩固国防，必须使我们的人民有健康坚强的体魄。需要我们以体育来锻炼大家的体格，以体育来发扬人体劳动的能力，培养锐敏的智慧、高度的创造性、坚韧的意志和勇敢坚强的革命品质，使我们的人民个个都是身体强壮、精力充沛、不怕困难、勇往直前，具有大无畏精神，这样才能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祖国和捍卫祖国的任务。”[3]

一、国防体育的产生

国防体育是指与军事训练密切结合的部分体育项目。苏联曾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展了，40年代在卫国战争中，由于青年业余学习军事技法，事先受过国防体育的训练，迅速掌握了各项特种兵技术，并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在战争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苏联在战后把这一工作作为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并给予高度重视。

（一）国防体育的产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同志率领青年代表团访问苏联时，斯

[1] 冯文彬. 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 新体育，1950（1）：8.

[2]《新体育》发刊词. 新体育，1950（1）：6.

[3] 冯文彬. 关于开展人民体育的几个问题. 新体育，1950（3）：4.

大林介绍了他们开展国防体育的经验，并得到我国领导人的重视。根据这条经验，在 1952 年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同时，周恩来总理批准建立中央人民政府国防体育俱乐部，并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展活动。1955 年 4 月，中共中央在批转的国家体委一份报告中就指出："在各大城市选择不同重点，开展航模、射击、滑翔、划船、航海、摩托车等活动。"[1]同年 7 月 4 日，国家体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北京、天津、上海、武汉、西安、重庆、沈阳、广州、成都、长春、呼和浩特、哈尔滨、青岛、南京等 14 大城市的体委，应着手建立领导国防体育的机构"[2]。1956 年 3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议"成立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接受国防部和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双重领导"[3]。4 月份，国务院又批准了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及省市协会的编制。6 月份，中央批准李达担任国防体协主席。至此，我国把国防体育从苏联系统地移植过来。

这一阶段，其工作任务是广泛宣传国防体育的目的意义，开展群众性的射击、跳伞、摩托车、航海模型、航海、滑翔、无线电、航空模型等活动[4]。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国防体育以国防为主，由于当时国内经济水平的限制，国防体育开展的层次较低，多以普及初级知识与军事技术为主，器材也是因陋就简，土洋结合。但这一时期，国防体育普及的广泛程度是以后任何时期都无法相提并论的。

---

❶ "六五"时期全国体育事业统计资料.

❷ 国家体委、总政治部、青年团中央关于在青年中开展国防体育活动的联合指示//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588.

❸ 体育报，1985-03-08.

❹ 苏肖晴. 对福建省开展国防体育的几点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153-156.

（二）国防体育与中央国防俱乐部

国防体育是指与军事训练密切结合的部分体育项目，如射击、摩托车、无线电、摩托艇、航海多项、军事航海、跳伞、滑翔、航海模型、军事野营等。苏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全国开展，并在卫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苏联成立了“支持陆海空军志愿协会”，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国防后备力量。

我国的国防体育事业创办于1951年，是在刘少奇、周恩来的关怀下和贺龙的直接领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主要任务是对广大群众进行军事知识教育和军事技术训练，以培养后备兵员，为国防建设和生产建设服务。创建国防体育是适应抗美援朝，人民解放军向多兵种方向发展，为了解决急需技术兵种兵源问题而提出的。1950年底至1951年初，中国青年访苏代表团对“苏支协”进行了考察。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之际，访苏代表团回国后就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国人民国防志愿协会”，1952年2月，周恩来总理批示，先组建“中央国防俱乐部”，进行试办。6月，改名为“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并与6月24日在北京成立。尽管加上了“体育”二字，但从其创建的最初目的看，国防的意义要远大于体育的意义。

中央国防俱乐部正式成立后隶属体育总会领导，经费由文教费中支出，俱乐部主要领导由体总有关领导兼任。国家体委成立后，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隶属国家体委领导。1954年8月俱乐部机构调整，陆续从部队抽调了干部担任俱乐部的领导和负责航空、航海、陆军、计划财务、人事等方面的工作。1955年中央批准由国家体委副主任蔡树藩兼任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主任。

中国摩托车运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军事体育项目，于1952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随着体制机构的改革，这一现代体育运动，已是我国体育运动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952年至1955年，国防体育主

要是在北京、上海、青岛、重庆等十几个大城市成立单项俱乐部及以点带面的活动小组：利用课余、假期及节假日为青少年举办各种国防知识与单项技术的短训班。经过 3 年试办，国防体育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1956 年 11 月 1 日，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改组为“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李达为主任，赵均一、林恺为副主任[1]。

国防体育俱乐部开展活动的基本方针是：重点试办，吸取经验，学习业务，培养干部，准备物质条件，以达到重点开展。根据这一方针，我国首先在北京组建了射击俱乐部，在青岛组建了航海俱乐部，在成都组建了滑翔站，在重庆试办了伞塔跳伞。同时还在北京、天津、上海、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呼和浩特等 13 个城市，开展了射击、航空模型、军事野营、摩托车、伞塔跳伞、航海多项、航海模型等比较简易的军事技术训练活动。1951 年 11 月，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航空模型训练班——北京市业余航空模型训练班。为了重点解决飞行员来源问题，1955 年从波兰引进了成套的滑翔技术，在张家口建立了我国的第一所滑翔学校，由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负责开展滑翔训练和滑翔机生产。同时接受苏联“支协”的建议，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兴建了射击场。据统计，这一期间我国共建立各种国防体育活动场所 163 个，有 11.9 万多人参加了活动，培训出 9500 多名业余辅导员，成立了跳伞、航海多项、摩托艇、无线电 4 个项目的国家运动队，举办了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射击友谊比赛。

（三）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

1956 年 1 月，国家体委向周恩来总理报送了《关于建立中国人民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的请示》，认为在中央国防俱乐部 3 年

[1]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1）：精华本上册.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14.

试办的基础上，结合义务兵役的实施，把这种协会建立起来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并建议这个协会直接受党中央（军委）领导，具体工作由国防部负责。11月，国务院会议批准成立协会，定名为："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设立办公厅、干部部、组织部、宣传部、陆上运动部、航海运动部、航空运动部、物质保证部、国际联络部和计划财务部，定编256人。同时，也批准了各省、市自治区成立相应机构。6月，经军委建议和中央批准，任命李达任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主任。国防部和国家人事局同时向各省、市、自治区、军区发出指示，由军队有关首长兼任地方国防体协主任。1958年5月，周总理提出体育和军事训练相结合，中央决定将国防体协与国家体委合并。合并工作首先在机构上统一了体制，由国家体委设置陆上运动司、航海运动司等。国防体协原有的厅、部则并入体委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亦进行合并工作。为了便于国际交往和对外联系，合并后，"国防体协"名义仍被保留。

二、国防体育的初步发展

我国的国防体育虽然起步于1951年，但真正开展活动是从1955年开始的。以后发展较快，在1959年召开的第1届全国运动会上，已有射击、摩托、无线电、航海多项、航海模型、滑翔、跳伞、航空模型等列入了比赛项目，并有6人3次打破射击、跳伞、航空模型3项世界纪录。安阳航空运动的发展主要依赖于航校。安阳航校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北郊，其前身是1955年6月12日正式建立的张家口滑翔学校，隶属于中央国防俱乐部；1956年11月8日迁至安阳，定名为"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滑翔学校"。

在江西，人民国防体育协会原名"中国人民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江西省协会"，1956年4月4日，在南昌市成立。邓克明为主任，周韦志、邹日晴为副主任，委员6人，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编制25人。同年6月19日，协会改名为"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江

西省协会”，负责全省军事体育项目活动的开展和管理工作。同年10月19日，为节省人力、物力，减少工作层次，省国防体协与南昌市国防体协合署办公，下设机构有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陆上运动部、航海运动部、计划供应部，共19人。1959年6月5日，依据国家体委《关于将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各级组织与工作合并到体委的通知》，撤销省国防体协，在省体委内增设国防体育科，行使省国防体协的业务职能。在杭州，1957年时经杭州市人民委员会批准，成立了“杭州市国防体育协会”，陈礼节任主任，与杭州市体委合署办公，负责管理军事体育项目。1960年机构精简，市体委设军事体育科管理全市军体工作，国防体育协会保留对外名称。

福建省国防体育工作自1956年由省体委党组决定将体育事业管理科改为国防体育科开始后，就着手开展国防体育活动和省国防体协的筹建工作，并于同年10月省政府决定省国防体协设独立的办事机构，归党委管理。为支援地方开展国防体育运动，福建省军区还抽调了一批军政干部转业到省体委和福州、厦门、漳州、泉州四市体委担任省、市国防体协的领导和专业干部。1958年7月正式成立了省国防体协，省军区副司令员毛会义兼任主任，省体委副主任李威任副主任。之后，各专署、市和部分县国防体协也相继成立，由各军分区、人武部领导干部兼任各级国防体协主任，贯彻协会接受部队和体委实行双重领导的原则。[1]

[1] 苏肖晴. 对福建省开展国防体育的几点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153-156.

第二章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体育（1957—1966年）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开始转到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热情空前高涨。在前进的道路上探索的过程中，出现了在政治领域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经济工作中盲目“大跃进”；同时，还承受着反华势力的压力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曲折的道路上顶住了压力，克服了困难，改正了错误，在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体育事业也探索着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第一节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体育的曲折前进

1956年，新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体育事业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环境条件的变化呈现出波浪式曲折前进的态势。

一、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从1956年到1959年，随着新中国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体育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体育事业发

展的高潮。

（一）社会主义体育方针的确立

在 1952 年 2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的关于《选拔各项运动选手集中培养的通知》中就已经提出“体育工作如果只有普及而不在适当范围内加以提高，就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需要，必须使普及与在适当范围内提高体育运动水平相结合”[1]，但并没有真正作为工作方针确定下来。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当一部分人将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与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相对立，片面地认为搞提高是为少数人服务，是资产阶级的锦标主义思想，是单纯技术观点等认识分不开。这种思潮一直影响着抓提高工作，使抓提高工作的同志顾虑重重。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提出了使体育运动“普及和经常化”的体育方针，中央体委成立初期继续执行了这个方针：“结合实际情况，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并逐步地使之普及和经常化。”[2] 1956 年以后，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工作任务的内涵有所扩大，除了继续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以外，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成为体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周恩来总理在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作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指出：“我们应该在广大群众中进一步开展体育运动，有效地增强人民的体质，并且提高我国体育运动的水平”[3]。在这里，“提高体育运动水平”第一次与“增强人民体质”并列。1958 年则更明确地提出了“克服右倾保守思想，鼓起革命干劲，继续贯彻开展群众性的

---

[1] 熊晓正，等. 从普及提高相结合到各类体育协调发展. 体育文史，1997（5）.

[2]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17.

[3]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1）：精华本上册.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14.

体育运动和加速提高运动水平的方针，争取更多运动项目的成绩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积极准备 1959 年全国运动大会，迎接建国 10 周年”[1]。

1959 年 4 月 18 日，周恩来总理向二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才明确、完整地提出了新的体育方针：“在体育工作中，应当贯彻执行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逐步提高我国的体育水平。”这就是我国体育“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方针的正式出台。

这样，便形成了“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基本任务，以“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为基本方针的体育发展思路。

（二）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1. 学校体育

(1) 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与学校体育地位的确立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 11 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演讲，其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同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党的教育方针的确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它明确规定了中国教育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指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基本要求。

党的教育方针的提出，使我国学校体育的应有地位得到了确

[1]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30.

立和巩固，澄清了人们对学校体育的糊涂认识，即体育在学校中的地位不仅仅是开设的一门课程，而且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正像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教育方针的制定保证了学校体育的实施。1957年5月21日，高等教育部曾针对当时少数人"可将四年制专业二年级的体育课改为选修，借以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的意见，专门下发了《关于高等院校一、二年级学生体育课不能改为选修课程的通知》，强调指出："高等院校一、二年级学生的体育课是必修课程，各校应根据本校条件，积极加强体育课的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凡已经把体育课免修或者选修的院校，应即在今年暑假开学时恢复起来。"[1] 1958年3月，教育部、卫生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保健工作领导的联合指示》，明确指出："加强领导，明确职责，保障学生健康是教育和卫生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要求把学校保健工作纳入工作计划，指定人员专管或兼管，经常督促检查；要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采取积极措施，改善学校的卫生不良状况。

1958年4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合并，体育机构合并为体育处，由办公厅代管。1964年3月，又分为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再次分设军体处，主管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

这一时期，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贯彻落实教育方针和中央指示精神，积极配备体育卫生管理人员，推进体育卫生机构的建立，加强对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领导，取得了新的进展。

(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急需大量合格的体育师资，为了解决好这一紧迫的问题，1959年8月，教育部、国家体委联合发出的《关于培养中等学校体育师资工作的意见》中提出：现有高等师范院校

[1] 国家教委体育卫生司. 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文件选编.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的体育系、科应予保留办好，不再调整出去；高等师范院校的体育系、科凡已调整出去的，今后可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地适应恢复；目前还没有一所高等师范学院设置体育系、科的省（市），可以根据需要和具体条件，逐步添设体育系、科；为了加强领导，今后体育学院、体育专科学校和高师体育系、科的教学工作，由教育行政部门和体委共同领导。体育学院、体育专科学校和高师体育系、科培养中等学校体育师资的教学计划应当一致；研究制定出今后一定时期内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体育师资培养规划[1]。

根据《意见》要求，1959 年高等体育院校从原有的 6 所，增至 18 所，1960 年发展到 29 所。各省、市根据《意见》的精神和要求，加强了对体育师资的培训，如湖南省 1958 年新办湖南体育学院，长沙师专体育专修科并入该院以加强体育师资培训。

这一时期，迅速恢复和建立了一批师范院校的体育系科，如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杭州大学体育系、延边大学体育系、河南大学体育系、山西大学体育系、湖北大学体育系。同时，地、市级师范学校也相应地办起中等师范体育班。

(3) 新颁体育教学大纲，提高教学质量

1956 年，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相继制定颁发了《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中学体育教学大纲》和《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教学大纲》（草案）。1956 年 11 月，教育部发出指示，要求从 1956—1957 年度第一学期开始在全国试行。

为与新颁大纲相配套，使中小学体育教师更好地学习、贯彻大纲，由王占春等编著的《中学体育教学参考书》和《小学体育教学参考书》于 1957 年 7 月出版，供全国通用。这套参考书根据大纲编写了各年级的体育教学内容、教学要点、教学方法等，还阐明了中小学体育教学目的、任务，中小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体育教学原则与教学法原理，体育课的类型与结构，体育课的组织与分

[1] 李晋裕. 学校体育史.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57.

组教学，体育课成绩考核与五级计分法等。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较全面的体育教材教法的重要参考书，对体育课教学起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为了规范体育课教学，提高教学质量，1957年3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1957年学校体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对试行体育教学大纲，提高教学质量等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并明确规定：体育课每周两学时，要按大纲要求认真上好。高等教育部于1957年5月发出了《关于高等院校一、二年级学生体育课不能改为选修课程的通知》，明确指出："高等院校一、二年级学生的体育课是必修课程，各校应根据本校条件，积极加强体育课的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凡已经把体育课免修、或者选修的院校，应即在今年暑假开学时恢复起来"[1]。

1956年7月，教育部举办全国体育教学大纲讲习班后，各地层层仿效办大纲讲习班，组织体育教师学习大纲，帮助体育教师掌握大纲的内容，有力地促进了体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如辽宁省于1957年8月在熊岳高中举办了全省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学习班；四川省于1957年2月在成都举办了中学和师范的体育教学大纲学习会，培训体育教师780人。至1958年4月，四川全省有80%的中学和师范、大部分完小和中心小学试行了大纲，体育课教学质量显著提高。

由于全国认真贯彻教育方针，执行全国统一新的体育教学大纲，努力上好体育课，改变了以往体育教学无章可循、随意进行的状况，为我国体育课教学走向制度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 学校课外活动和业余训练的蓬勃发展

在规范教学的同时，学校的课外活动和业余训练也蓬勃开展起来。自1954年政务院批准公布施行《准备劳动与卫国制度》暂行条例以来，学校以《劳卫制》达标作为体育课和课外活动的

[1] 李晋裕. 学校体育史.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57.

主要内容，推动了学校课外活动的开展。尤其1958年，在劳卫制锻炼的群众运动热潮中，出现了730多所大、中、小学校百分之百达到劳卫制标准的情况。在9个月达标的500多万人中，绝大部分是中学生。大学校长带头参加长跑，各级各类学校采取种种措施和手段，调动和要求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地处西北边疆的八一农学院90%的学生参加了“男子百日百公里，女子百日50公里”的长跑运动。❶

在地方政府组织的大型群体活动中，青少年学生也是主要人员，如北京市10万人群众性乒乓球比赛和几十万人的冬季锻炼、济南市发动的30万青少年参加的“百日万米”接力长跑运动和哈尔滨市组织的50万青少年参加的冰上运动等等。当时，全国“难以计数的学生在宽广的操场上做各式各样的运动。”❷合肥矿业学院、北京矿业学院、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徐州三中等学校，是当时通过劳卫制学校的典型。

1957年，拟定16万～18万人参加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学习，到1958年11月底统计，全国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学生达到了400万人。

2. 竞技体育

(1) 竞技体育高潮的形成

从1956年到1959年，竞技体育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高潮。

1956年6月7日，我国著名举重运动员陈镜开，在上海陕西路体育馆举行的“中、苏举重友谊赛”中，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了美国运动员C.温奇保持的最轻量级挺举132.5公斤的世界纪录，成为新中国创造的第一个世界纪录。同年11月11日和29日，

---

❶ 各地掀起冬季体育锻炼热潮. 新体育，1958 (2)：19.

❷ 庄平. 全民的事业. 新体育，1959 (17)：7.

陈镜开又分别在广州和上海，以135公斤和135.5公斤的成绩，两次刷新他自己保持的这项世界纪录。但在国际体坛，一些对中国抱有偏见的人对陈镜开在国内取得的成绩持怀疑态度。1957年，陈镜开在莫斯科举行的第3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举重比赛中，尽管身体情况不好，腰疼发作，在抓举时肩又受伤，在推、抓举比赛中，被对手哈里苏落下了15公斤，但他强忍伤痛，顽强拼搏，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的实力。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陈镜开由于降体重影响了体力，加之前两项比赛消耗体力过大，腿部抽筋。经过临时处理后，他忍痛进行了第2次试举，130公斤成功了。下一步要看第3次试举能否举起他从未举过的重量140公斤。如果举起的是137.5公斤，就只能破世界纪录而拿不到冠军，因为哈里苏的总成绩已是320（102.5＋95＋122.5）公斤，而陈镜开这时的总成绩只有312.5（95＋87.5＋130）公斤。陈镜开决心举140公斤。试举的重量数字一公布，立即引起观众的一片惊讶声。一位西方举重权威甚至轻蔑地说：中国人是不敢举的。就连熟悉陈镜开的苏联教练员也认为这种勇敢精神是过分的。比赛主持者也认定大局已定，冠军一定是苏联选手了，竟先把苏联国旗挂在了冠军的升旗位置上。然而陈镜开想到的是祖国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沉着地走上举重台，用下蹲式提铃技术很有把握地将杠铃翻了起来，猛然一个箭步分腿上挺，140公斤杠铃高高举过了头顶。联欢节期间的第一个世界纪录诞生了。中国人用事实创造的奇迹使一年前污蔑陈镜开第一次破世界纪录是假的、是撰写出来的人惊得目瞪口呆。尽管在再次核查杠铃重量时发现它不是140公斤，而被判定为创造139.5公斤的世界纪录，还是以322.5的总成绩战胜苏联名将哈里苏，夺得冠军。1959年，陈镜开又创造了3次轻量级挺举的世界纪录。陈镜开共9次打破世界纪录，以后改任中国举重队教练员，又指导训练了包括陈满林、陈伟强在内的一批打破世界纪录的选手，为新中国举重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了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奖励，荣立一等功。国家体委也为他记了一等功和特等功。陈镜开5次获体

育运动荣誉奖章，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际举重联合会和亚洲举重联合会为表彰他对世界举重事业的贡献，也分别授予他金质奖章。

陈镜开的成功，像打开了创纪录的闸门。1957 年 5 月 1 日，我国著名游泳运动员戚烈云在广州“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泳表演赛”中以 1 分 11.6 秒的成绩，打破了由捷克斯洛伐克运动员 V.斯沃齐尔保持的 100 米蛙泳 1 分 11.7 秒的世界纪录。这是新中国创造的第一个游泳世界纪录。戚烈云生于 1934 年，广东台山人，自幼喜爱游泳。1955 年考入广州体育学院，次年转入北京体育学院，并入选国家游泳队。戚烈云在 1957 年 5 月创造了 100 米蛙泳世界纪录以后，又曾于同年 8 月在莫斯科第 3 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获得男子 200 米蛙泳的亚军。他曾任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副主席。

1957 年 11 月 17 日上午，我国著名田径运动员郑凤荣在北京市田径运动会上跳过了当时世界上女子从未跳过的高度——1.77 米，从而打破了美国运动员 M.麦克丹尼尔在 1956 年墨尔本第 16 届奥运会上创造的 1.76 米的世界纪录。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打破女子世界纪录，也是继陈镜开、戚烈云之后所创造的第 3 项世界纪录。这不仅给全国体育工作者和人民以极大的振奋，而且也引起世界体育界和舆论界的高度重视和注意。正像当时路透社所评论的：“这件事强调说明了中国的田径运动有了惊人的全面提高。”美联社则说：“中国人不会永远是落后选手了。”[1]郑凤荣成了“宣布中国体育运动春天降临的一只燕子”。郑凤荣生于 1937 年，是山东省济南市人。在 1954 年的全国田径运动会上，她曾以 1.45 米的成绩打破女子跳高全国纪录。1957 年 7 月，她在德国柏林的一次国际田径比赛中，曾以 1.72 米的成绩获得女子跳高第 1 名，并跨入当时女子跳高的世界先进行列。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

[1]《新体育》社论：党培育出来的花朵. 新体育，1957（23）：3.

1959年4月5日，我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过关斩将，其中包括1位世界冠军、1位欧洲冠军、两位国家冠军，最终在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240多位优秀选手参加的单打比赛中获得冠军。这是新中国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祖籍广东中山，出生于香港，15岁时便代表香港工联乒乓球队参加比赛，1957年进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1958年入选广东乒乓球队，同年获全国锦标赛男单冠军。在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又为新中国第一次获得乒乓球男子团体世界冠军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他指导的中国乒乓球女队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女子团体冠军。根据容国团在乒乓球事业中的表现和贡献，国家体委曾两次给他记特等功，多次授予他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和奖状。

陈镜开、戚烈云、郑凤荣创造的3项世界纪录，给中国的整个体育界，尤其是给竞技体育领域以极大的鼓舞。体育战线上的成绩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表现了跃进氛围下人们争放“卫星”的激情。著名作家郭沫若赋诗《举重》说：“六亿人民的力量聚集在一身，我们的举重成绩已超美超英。请看，体育战线上插上了红旗，我们为力争上游，鼓足了干劲！谁能把太阳和月亮串成杠铃？我们要举起来在太空中固定，使地上无昼无夜永远是清晨，使地上无冬无夏永远是阳春。❶

为了在多个项目上有所突破，各省、市、自治区加强了重点项目运动队的训练，同时，乘1958年“大跃进”之风，新组建了专业优秀运动队。并以破省、市纪录，破全国纪录，破世界纪录作为训练的目标，各项目、各层级的竞技比赛不断，在“向建国10周年献礼”、为“在1959年召开的第1届全国运动会取得优异成绩”的口号鼓动下，形成了新中国建国后的体育高潮。

上海市在1958年，尤其是从下半年开始，整个体育工作以准

❶ 郭沫若. 举重. 新体育，1959（1）：7.

备参加全运会为中心展开，为了迅速大面积提高优秀运动员的成绩，采取了“政治、体力、技术三结合的方针”进行训练。同时，将竞赛与训练相结合，促进训练、提高成绩。1958 年，上海市、区、基层共举办了 5303 次竞赛，参加者达 92 万多人次。在市秋季运动会上，“有 45 项，4 队，85 人，105 次刷新市的纪录，11 项，1 队，38 人次打破全国纪录，两项 3 人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

安徽省在 1957 到 1958 年期间，先后组建了田径、体操、技巧、排球、男子足球、手球、乒乓球、网球、举重、摔跤、国际摔跤、拳击、游泳、划船、航海模型、摩托艇、跳伞、滑翔、射击、象棋、击剑、马术、摩托车、自行车、无线电、射箭等运动项目的队伍[2]。在 1959 年“为检阅全省解放 10 周年体育运动成就和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1 届运动会”所举行的安徽省第 1 届省运动会上，有 7 个单项打破全国纪录，239 人次刷新了安徽历史上全部运动纪录。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当时竞技体育发展的迅猛势头。

湖南省 1956 年开始组织训练省运动队，至 1957 年，设有女子体操、女子排球和男子篮球 3 项，集训队员 20 余人。1958 年至 1959 年 2 月，为迎接第 1 届全运会，组训的运动员扩展到 300 余人，运动项目增至 27 项。

为迎接第 1 届全运全，各省、市都举行了运动会，以检阅体育队伍的成绩，选拔参加全运会的运动员。

到 50 年代末，我国运动员不仅全部刷新了 1949 年以前的全国纪录，而且在举重、女子跳高、男子蛙泳、男女跳伞、射击、航空模型等 18 个项目中，有 39 人 31 次打破世界纪录，取得了旧中国难以想象的成绩，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竞技体育发展的高峰。

(2) 第 1 届全国运动会

1959 年 9 月 1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1 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

---

[1] 张振亚. 积极准备，为全运会作出最大贡献. 新体育，1959 (5)：4.

[2] 袁伟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地方卷.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295.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出席了开幕式。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龙致开幕词。8万名观众出席了开幕式。

第1届全国运动会，“是在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反右倾，鼓干劲，掀起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为提前在今年内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以辉煌的成就迎接伟大的国庆十周年的欢腾气氛中”，是在“我国的体育事业，由于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的方针，十年来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1958年以来，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全国人民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全民皆兵运动的鼓舞和推动下，无论是群众体育的普及，或是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都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和显著的成绩”的背景下召开的[1]。第1届全运会共设有比赛项目36项（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网球、羽毛球、手球、棒球、女子垒球、水球、马球、田径、公路自行车、体操、技巧运动、举重、游泳、跳水、赛艇、武术、中国式摔跤、射箭、中国象棋、围棋、赛马、障碍赛马、射击、摩托车越野、摩托车环行公路、无线电收发报、航海多项、航海模型、滑翔、飞机跳伞、伞塔跳伞、航空模型），表演项目6项（赛车场自行车、击剑、自由式摔跤、古典式摔跤、国际象棋、水上摩托艇）。共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30个单位的10658名运动员参加了各项比赛。除部分项目的比赛是在外地进行外，到北京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有7707人。

早在1958年，中央就指示说：“为庆祝建国10周年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将推动我国体育运动进一步发展，对国际上也有很大意义，因此必须开好。”[2]参加第1届全运会的1万多名运动员，是从全国5000多万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和部队官兵中，

---

[1] 贺龙.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开幕词. 新体育，1959（18）：1.

[2] 中共中央对体育工作的批示. 新体育，1959（1）：1.

经过从基层、县、市、省层层选拔出来的。由此，形成了全国人民参加体育活动的高潮。第1届全运会有7人4次打破4项世界纪录，有664人844次打破和新创106项全国纪录。有2000多人次打破各省、市、自治区的最高纪录。运动会从9月13日开幕到10月3日闭幕。宋庆龄、董必武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出席了闭幕式。运动会上还向新中国10年中曾打破过世界纪录和得到过世界冠军的40名运动员颁发了“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3. 群众体育

(1) 职工体育

继1955年10月2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后，从1956年至1959年，以迎接1959年在北京举行第1届全国运动会为中心，尤其在1958年全国大跃进氛围的促动下，全国职工掀起了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和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热潮。1958年，全国有成亿人参加体育活动，几千万人参加第1届全运会的选拔，其中大多数是职工和干部。中共中央在1958年9月19日批转国家体委党组1958年9月8日关于体育运动十年规划的报告中批示：“体育运动的根本任务是增强人民体质，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根据这一任务，体育运动的方针是：适应生产大跃进中广大劳动人民对增强体质的要求，大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1]这个批示得到了迅速的贯彻执行。尽管在1959年初，“大跃进”中的工作失误和自然灾害造成经济上的困难已露端倪，但仍提出了在“群众体育方面，必须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进一步开展基层群众体育活动”。“1959年的群众体育工作，必须在1958年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再来一个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2]。所以，在1959年第1

[1] 中共中央对体育工作的批示. 新体育，1959（1）：1.

[2]《新体育》评论员的话：群众体育继续大跃进. 新体育，1959（2）：3.

届全国运动会召开的推动下，体育工作跃进的态势一直延续到年底。全国职工的群众体育活动保持了3年左右的高涨势头。

为了推动和引导职工体育活动的开展，许多省、市、自治区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全民体育跃进月""全民体育活动周"，把职工体育从广度上进行扩展，同时，在全国树立了仿效的典型。

天津绒毛加工厂结合生产开展职工体育活动，使全厂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中共天津市委推广了绒毛加工厂的主要经验：第一，群众性体育活动与思想工作相结合，讲清体育锻炼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使工人自觉参加活动。第二，充分发动与依靠群众，动员大批体育骨干、积极分子，自编自创锻炼项目，自制训练器材，自己组织竞赛。第三，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群众参与、广泛普及的基础上，组建高层次运动队，不断提高、指导、推动普及。1958年5月，国家体委在天津召开了全国职工体育工作现场会，推广天津市绒毛加工厂的经验。会后，全国职工体育掀起了"学绒毛，赶绒毛"的高潮。[1]其他各省、市、自治区在推动和开展职工体育活动上，也都颇有声势，不断涌现出典型单位。河南省1957年建立的基层体协达1813个；湖南省总工会和省体委联合调查统计，从1956年至1959年，全省职工（含机关干部）达到《劳卫制》及格标准的有12.45万余人。还于1958年9月举行了全省首届工人运动会。河北唐山开滦煤矿由于组织职工体育活动取得突出成绩，国家体委于1958年在开滦煤矿召开了全国职工体育工作评比会。四川省体委、省总工会多次召开职工体育现场会，提出了"全民体育"的口号。甘肃省在1957年已建起省、市及产业体协11个，基层体协756个，建立各项球类运动队2432个，并修建了各类体育运动场1348个。西藏自治区设置较晚，也在1960年，工交系统率先举办了首届体育运动大会。至"文革"前，拉萨、山南、昌都、日喀则、林芝等地机关和企事业职工广泛开展了篮球、

[1] 袁伟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地方卷.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32.

足球、乒乓球等项目的体育活动和竞赛。

当然，全国掀起的职工体育活动热，不可避免地带有“跃进”的色彩，很多统计数据并不真实可靠。如四川省依据1958年的统计，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职工占职工总数的70%。许多厂矿大搞“四红”运动（达到一级、二级《劳卫制》、等级运动员、普通射手标准），要求限期通过《劳卫制》标准；为追求职工参加体育活动的数量，搞形式化、浮夸比较普遍。这些不良现象在以后得到了纠正。

(2) 农村体育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村整个生活状况的改善，一些生活和生产条件好的乡镇，逐渐开展起体育活动。在1956年至1959年，随着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化的进程，在“大跃进”中，农村体育得到了普及性的推广和开展。

1958年，农村体育运动开展得很有声势。在《新体育》刊载的《马上动手大搞农村体育》一文中，特别强调“体育工作如果离开了农民，那么，所谓提倡体育，所谓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也将近于空谈。5亿农民也是我们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主要依靠。只有把农村体育广泛开展起来，才能多里求精，很快提高运动技术。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必然只能维持冷冷清清少数人单干的局面；要想10年左右在主要项目上赶上世界水平，就会有一定困难。因此，开展农村体育运动，是当前在体育工作上贯彻总路线的一个根本问题”[1]。农村体育的迅速开展的确“是我国体育运动史上一个新的特征”[2]。1958年，“全国农村已建立了16万多个体育协会和30多万个运动场，组织了180多万个运动队和锻炼小组，举办乡一级运动会5万多次，全部普及体育的县有160多个，共有1亿多农民经常参加体育活动。许多偏

---

[1] 方越. 马上动手大搞农村体育. 新体育，1958（17）：3.

[2] 蔡树藩. 中国体育运动的春天. 新体育，1958（19）：4.

僻的山村开农民运动会，还是破天荒的喜事”[1]。

为了推动农村体育大普及，以山东省的高唐县作为典型，用他们的体育“大跃进”的事实，说明农村体育完全可以多快好省地开展起来。高唐县本是山东省体育工作基础很差的一个县，1958 年年初时全县只有 3 个农业社建立了体育协会，运动队也只有 96 个。但是在 3 月 29 日到 4 月 1 日短短的 3 天内，全县 20 个乡，127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都建立起了体育协会，发展了会员 32281 人，做到了“乡乡社社有体协”。仅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 4.1 万人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占到全县青年的 60%，青壮年的 40%，并且有 2.6 万多人按照山东省农村体育锻炼标准进行锻炼。全县乡乡社社都建立了小型运动场，在村内和村外的辽阔的田野里，到处都有群众在锻炼。全县体育工作的面貌焕然一新，真正做到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当时，总结出的高唐县体育活动能多快好省地开展起来的经验主要有三条。第一，体育和生产必须紧紧地拧成一股绳。体育与生产密切结合，体育工作面向生产，带动体育运动的迅速发展，体育运动的迅速发展又必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生产主要在田间，就把体育活动带到田间，利用休息时间进行田间活动，保证了社员更好的休息和更好的劳动，这是他们开展体育活动的一大特色。第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他们的做法是：全党动手，书记挂帅，体委当好参谋，有关部门一齐动手，大搞群众运动，依靠群众勤俭办体育。高唐县党委在领导方法上采取了很多措施，他们在布置生产的同时布置体育，检查评比，总结生产的同时也检查评比、总结体育，采用县长、乡长、社长、队长四长负责制，在体育工作上抓规划、抓思想、抓检查评比，发动全党做好体育工作。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全县体育工作的跃进。再加高唐县体委的干部取得有关部门的支持合作，不断反映情况和问题，及时提出先进、具

[1] 蔡树藩. 中国体育运动的春天. 新体育，1958（19）：4.

体的规划和措施，并搞试验田，重点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全县体育工作就得以迅速而广泛地开展起来。第三，大搞群众运动，依靠群众勤俭办体育。高唐县发动群众进行体育活动，首先是从思想发动着手，“当群众认识到参加体育锻炼的意义和好处后，就高唱着‘体育运动如锻钢，身体锻炼强又壮，精神饱满搞生产，建设祖国有力量’，争先恐后地参加到体育活动中来。并且亲自捐献和制作体育用品，义务劳动修建了385个小型运动场”[1]。

为在农村推行《劳卫制》，把辽宁北票县龙潭农业社作为第一面红旗树立起来。据报道，辽宁北票县龙潭农业社在一个“九沟十八岔，岔岔有人家”的山区，体育活动基础很差，业余时间只有数量很少的青年打打篮球，技术水平也很低。1958年，县里举行了体育跃进誓师大会以后，才建立了社和队的体协，开展了广播操、劳卫制及其他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开始时，个别领导和群众对劳卫制锻炼还存在着很多不正确的认识。通过辩论，解放了思想，提高了觉悟，大家体会到开展体育活动是党和政府对自己的关怀，都愿意参加锻炼了。

什么叫“劳卫制”，一开始大家都不懂。社体协的干部就用农民的话来给大家解释说：“劳卫制就像生产一样，国家给规定一个锻炼身体的目标，达到就是好样儿的，国家发给牌牌奖励。”后来为了使群众更容易了解，索性就编成一个顺口溜，让大家都来唱：“劳卫制，好明了，各个项目有指标，跑、跳、投、爬，达到目标就叫好，证章胸前挂，证书装在腰，身体练好劲头大，建设祖国立功劳。”同时，各队都设了一块黑板报，作为体育园地，把劳卫制标准写在上面。有些体育器材上也写有标准，比如在跳高架的1.2米处贴了个纸条，写上“合格”二字，在爬竿上也标出了合格的记号。这样做以后，大家很快就领会了，知道劳卫制并不是什么很复杂的东西，都积极参加了锻炼。

[1]《新体育》社论：学习高唐县，力争农村体育大普及. 新体育，1958（12）：3.

“社体协根据勤俭办社的方针，发动群众，开展了一个‘献方、献计、献工、献料’的运动。通过‘四献’运动，大家动手修建了两个中心运动场，62个篮球场，52副篮球架，挖沙坑69个，还做了很多简单的单双杠、石球（代替铅球）、爬竿、石担、石锁、跳高架、手榴弹、标枪等410多件，新买篮、排、足球66个。现在基本上做到了队队有场地器材。锻炼时间很少，大家就把简单的运动器具带到田间、工地上，在休息时间活动”。全社推行了劳卫制后，“在‘七一’前夕的一次测验中，有283名社员通过劳卫制，成为我国农村推行劳卫制的第一面红旗”[1]。

在先进典型的带动下，各省、市、自治区的农村体育工作迅速展开。安徽省和县十集公社在1958年组成的体育代表队，参加全国基层单位田径、举重通讯赛，获农村组田径男、女团体第1名，男子举重团体第2名。1959年，又获全国基层单位田径、举重通讯赛农村组田径团体总分第1名；1960年获农村组举重第1名。为此，省政府授予该公社“体育红旗”乡称号，出席了国家体委召开的体育先进单位代表大会。湖北省农村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传统体育项目，竞赛活动频繁举行，并涌现出汉阳四合公社、天门小库存公社、汉川马口镇等一批体育先进单位。甘肃省体委根据中共甘肃省委发出的《关于加强体育工作的指示》精神，在西和县召开了全省农村体育现场评比会。同年，农村公社纷纷建立基层体育协会，组织开展体育活动。青海省委于1959年发出《关于大力开展农村体育活动的指示》。同年，省体委召开了农村体育现场会。会后乡镇一级的组织普遍成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大队成立了体育协会，书记任主任、队长任主席。每逢比赛，农牧民群众赶着牦牛和羊群带上帐篷从几十里乃至几百里赶来观看比赛。

大跃进年代的群众体育活动，的确是波澜壮阔。1958年加拿大体育家班·维德访华后颇有感慨地对加拿大体育报记者说：“在

[1] 农村推行劳卫制的第一面红旗. 新体育，1958（14）：4.

中国，男男女女，异常众多的人在搞体育，组成了世界上极为壮观的场面，几乎是幻觉的画图。……中国人抱住了体育”[1]。体育成了全民的事业。

由于农村开展体育活动的条件不及厂矿、机关、学校，农民的生活水平不高，加之“大炼钢铁”等跃进性劳动量大，所以，整个农村体育活动从面上有了大的发展，形成了热潮，但形式主义和浮夸比职工体育更为严重。这也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境况。“在三天或一周中，迅雷闪电般普及了全民体育”的典型[2]，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3）国防体育的广泛开展

我国有组织地大范围大规模开展国防体育起于1955年。此后，国防体育活动发展较快。1958年，国防体育活动得到了广泛的开展。

在当时，必须完全符合党中央所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广泛开展国防体育活动，既是保卫国家的需要和进行经济建设的需要，又是这项活动本身通过扩大规模，显示跃进的需要，体现出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的方针的需要。在1958年《新体育》杂志上，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组织宣传联络部撰写的《广泛开展国防体育活动》一文中，强调了这项活动对我国国防建设和生产建设的重大意义。第一，能为国家经济地培养大量的航空、气象、航海、潜水、跳伞，各种军事工程、无线电、摩托等技术人员，因此这项事业是为祖国培养大量后备兵员的事业。第二，是一项能增强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警惕性、组织纪律性的教育。第三，能加强和提高现役军人的训练和保持复员军人军事技术水平。第四，可以进一步密切军民团结，尤其可以使青少年在活动中学习人民解放的优秀品质、作风、技术、

[1] 庄平. 全民的事业. 新体育，1959（17）：7.

[2] 蔡树藩. 中国体育运动的春天. 新体育，1958（19）：4.

精神。第五，对巩固社会治安起重大作用。第六，可以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促进文化、技术革命，对促进生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很大作用。这实际上是推动和促进国防体育活动的号令。

1957年，广东省国防体育协会成立，设有航空、航海、无线电、摩托车、伞塔跳伞、航空模型、射击7个俱乐部。以广州为主，分别在汕头、湛江、海口、潮州、韶关、佛山、石歧、江门、梅县、琼山、南海9个市、3个县的职工和学生中举办了30多次训练班，训练辅导员4492人。1958年以后，军事体育活动从职工、大中学生扩展到农村社员和一部分小学生。贵州省1959年5月成立了国防体育协会，省军区司令员兼任主任，设专职副主任，下设航空俱乐部、射击俱乐部、无线电俱乐部、水上俱乐部、伞塔俱乐部、摩托俱乐部。全国其他省、市的国防俱乐部的设置和活动的开展状况与广东、贵州相似。

“在人民军队里，体育被列为军事训练科目之一，从朱德元帅到百万雄师的普通一兵，很难找到与体育无缘的人，即令在福建前线，也出现了体育红旗连或劳卫制连”[1]。

由于军队实行劳卫制，加之青少年对学习军事技术的爱好，国防俱乐部在全国发展很快。1958年，全国参加国防体育活动者达到近千万人。1959年，参加活动的人数有了较大的增加，同样体现了跃进年代的特点。

(4) 民族体育的发展

1953年11月17日《中央体委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的民族形式体育如武术等，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几千年来我国劳动人民锻炼体魄的良好方式”，要“着手研究和整理民族形式体育”[2]。

[1] 庄平. 全民的事业. 新体育，1959 (17)：8.

[2]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体委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的指示//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8.

1956年3月9日，刘少奇同志在同国家体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要加强研究，改革武术、气功等我国传统体育项目。研究其科学价值。采用各种方法，传授推广。"这一指示促进了武术运动在研究改革中发展。同年4月28日国家体委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的暂行规定（草案）》中，有把"武术列为表演项目，定期举行"的条款。当时，人们考虑如何运用竞赛的方法来推动武术运动的发展，于是加以实验。1956年11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12单位武术表演大会上，首先试行打分的方法，以区分出运动员技术水平的高低。尽管这种做法只是一种尝试，但毕竟使武术套路的比赛向前迈进了一步，为后来制订武术竞赛制度打下了基础。大会期间，贺龙、蔡树藩（时任体委副主任）分别接见了参加大会的老武术家。荣高棠主持了大会，并指出："在武术项目推广上，从实际出发，首先抓住全国发展比较普遍的项目，作为研究发展的重点，逐步整理武术技术，建立运动制度。"同年，成立了中国武术协会，第一任主席为李梦华。从此，武术开始了有组织有步骤地发展。❶

1957年1月17日通过的国家体委《关于1956年体育工作总结及1957年工作的要求》中说："武术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应当根据党和政府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方针来对待武术工作，同时作为一个运动项目继续推行。过去在这一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就是缺乏领导和没有团结更多的人共同来做，发生了一些混乱和自流现象。这是应该改进的。""今后，不论工人、农民、学生或机关干部，凡是爱好武术的，都可以像其他项目一样，自愿地组成锻炼小组或单独进行锻炼。各地可以举办武术表演，或将武术表演和体操表演结合举行，以互相观摩和提高。"❷同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体育运动部在1957年职工体育工作计划要点中指出："根据

---

❶ 林伯原. 中国武术史.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4：449-452.

❷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文件汇编（3）.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58：11-12.

厂矿企业的具体条件，积极开展……武术、摔跤等多种形式的体育活动，……逐步扩大各种运动队和锻炼小组。[1] 1957年6月16—21日，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武术评奖观摩大会，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把武术列为国家体育竞赛项目。参加大会的有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83名男女运动员。结果有30名运动员得分在8分以上(各项武术表演和比赛项目的最高得分均为10分)，获一等奖。从1958年开始，中国武术协会邀请了一些经验丰富的武术工作人员，反复讨论研究，起草了中国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1959年由国家体委批准公布施行。这个规则是以长拳（规定拳、自选拳)、短器械（刀、剑规定与自选）和长器械（枪、棍规定与自选）为竞赛对象制定的。它对统一的长拳套路的推广有积极作用。特别是规则允许创编自选套路，发挥了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创造性，使套路动作、组合、难度、布局都有了新的突破，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适应青少年锻炼的武术体系。

1958年9月7—16日，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武术运动会，有27个队260名运动员参赛。大会试用了《武术竞赛规则》。1959年3月22—27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青少年武术运动会和1959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1届全国运动会武术比赛，均正式按这个规则执行。[2] 1959年的第1届全国运动会，还把少数民族爱好的摔跤、赛马、马球列为正式比赛项目，有13个省、市、自治区的各族运动员参加。随着少数民族体育的日益广泛发展，运动技术水平也明显提高，并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少数民族运动员，如活跃在20世纪50年代的著名回族游泳运动员穆祥雄，曾3次打破100米蛙泳的世界纪录；朝鲜族足球运动员金龙湖、李逢春、崔曾石；体操运动员金虎石等，都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国手”。在50年代末期，又有一批藏族运动员成为我国登山运动行列的中坚力量。

---

❶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文件汇编（3).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58：16.

❷ 林伯原. 中国武术史.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4：453-454.

二、前进中的失误与挫折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的浮夸风，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国际反华势力对我国经济上的扼制和封锁，诸多因素使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在前进中出现了挫折。

(一)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对体育事业的干扰

1. 对武术发展的不适当限制

(1) 武术问题讨论的发端

关于中国武术问题，涉及最早的是1955年国家体委的工作报告。报告中指出：由于武术工作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贸然提倡，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为了加强对武术工作的领导，国家体委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如在组织领导方面提出：“只在中央体委成立武术研究室，省、市体委人少事繁，无力照顾，不建立这方面的机构，也不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对基层武术组织采取的措施是：“厂矿、企业、学校机关原有的武术锻炼小组，要加以整顿。没有的，暂不建立。农村中坚决停止发展，原有的武术活动，可由区乡政府、青年团加以领导。”至于“社会上的一些拳社和武术联谊会等组织”则要求“必须停止发展。其中，有些借武术为名，实际上教人偷盗，强奸妇女，发展会道门，隐藏反革命等，应该由政府加以取缔，这些罪犯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国家体委的报告中还提出了对当时整顿和研究武术工作所要达到的目标，主要是“提出一些与体育有关的、对健康有益的、又能推行的项目”[1]。毫无疑问，这些措施和要求当时对武术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

[1]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24.

在客观上对武术发展有一定的消极影响。1957年，中国体育界展开了对武术问题的学术讨论，这一讨论首先发端于1957年《新体育》第2期和第4期发表的《我对武术的看法》和《武术是锻炼身体的方法》两篇文章。继后，《体育文丛》编辑部邀请部分武术专家于1957年6月19日和20日召开了“关于武术学术问题的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郑怀贤、温敬铭、蔡龙云、吴图南等21名学者。会上着重讨论了“关于武术的性质问题、关于统一武术教材和百花齐放的关系问题”。接着，1957年第6期《体育文丛》又发表了马辉的文章《武术的性质和它当前的任务》。在这一段讨论中，争论的中心主要是关于武术的健身、技击、艺术价值问题，因为人们还是较为集中于学术观点上的不同看法的讨论交流，产生争论是正常的。

（2）武术讨论的转向

从1957年10月开始，体育界有关武术问题的学术讨论出现了转向，逐渐把原本的学术问题引向了政治问题。其中最早进行政治发难的是1957年第7期《体育文丛》刊发的题为《对于王新午〈开展武术运动的一些意见〉的意见》。文章中将王新午提出的“武术究竟不同于一般体育”的学术观点，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认为“这是严重地在挑拨‘武术界’与‘体育界’的关系，企图把武术从体育中割裂出来”[1]。正是在这样的误导下，1957年第8期《体育文丛》又刊登了一篇题为《驳王新午的谬论》的文章。与前一篇文章相比较，这篇文章带有了更强烈的政治批判倾向。文章指出王新午所说的“在今天的社会里，武术已经不像过去受人重视了”，“这实质上是诬蔑新社会和共产党不重视武术”。并认为王新午的学术观点“都是武术中封建的反科学的思想表现，与新的科学的为人民服务的武术运动是两种不同道路的斗争”。[2]

[1] 刘玉华．对于王新午《开展武术运动的一些意见》的意见．体育文丛，1957（7）：10.
[2] 陈捷．驳王新午的谬论．体育文丛，1957（8）：11.

(3) 提出武术中的路线斗争

如果说武术讨论中的转向还只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自发行为和个别行为的话，那么，1957年底《武术工作中的两条路线》文章的发表，则明确提出了武术中的路线斗争问题，从而将新中国的一场武术问题的学术讨论，最后以政治结论划上了一个很值得后人深刻反省的句号。文章对武术讨论的结论是："另有一种争论，是假借武术之名，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故意颠倒黑白、混淆视听，造谣挑拨，猖狂进攻。武术云云，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企图混水摸鱼，乘机树立个人势力，实现个人野心，为资产阶级复辟扫清道路。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要造反。这场斗争是右派和其他利用武术做坏事的分子所挑起的。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坚决予以反击，把他们彻底打垮，否则，对人民不利，对武术也不利"[1]。

2.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对体育工作的消极影响

(1) 学术问题政治化

1952年3月，首先由《新体育》杂志发起了"向体育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坚决斗争"的运动。后来国家体委又决定从6月起，在《新体育》上设置《批判体育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专栏，"组织和吸引各地体育教师、体委干部、青年团和工会的干部、体育积极分子、运动员以及有关社会人士写稿，批判、揭发、检讨均可，要求从实际问题出发，进行批判"，并"准备在年内大体告一段落"，故"希望各级体委、各体育学院，给予大力支持"。正是这次在结合"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开展的批判体育工作中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中，发生了将学术问题当做政治问题处理的思想倾向。国家体委点名批判了吴蕴瑞、袁敦礼合著的《体育原理》和方万邦的《体育原理》。

[1] 张非垢．武术工作中的两条路线．体育文丛，1957 (9)：1.

吴蕴瑞是我国著名体育家和教育家，1918 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1924 年赴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东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的教育、体育系主任，是旧中国“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常务理事，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常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体育系主任、上海体育学院院长，以及国家体委委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体操协会主席、上海市体委副主任等职。吴蕴瑞是我国最早从事运动生物力学研究的学者，20 世纪 30 年代即编著了中国第一部运动生物力学书籍《运动学》。其他方面的著作还有《人体机动学》《体育教学法》《田径运动》和《体育建筑与设备》等，与袁敦礼合著的《体育原理》则是他在体育理论上的重大建树。他的这些著作在当时曾被体育学科普遍采用为教科书，在我国体育界有很大影响。

袁敦礼也是我国著名体育家和教育家，学生时代就擅长田径和篮球运动，参加过 1915 年在上海举行的第 2 届远东运动会。1917 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科，留校任体育科助教兼翻译，曾任体育科主任。1923 年赴美留学，1927 年回国，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任教授、体育系主任、教务长、训导长、院长、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主任、兰州体育学院副院长、甘肃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和副校长等职。曾当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袁敦礼曾致力培养了一批电化教育人才，在体育理论方面的重大成就就是与吴蕴瑞合著了《体育原理》一书。

方万邦是我国著名的体育学者，早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科，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师从威廉姆斯，获体育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数所大学任体育理论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系任教。著有《体育原理》一书，是一位颇有建树的体育理论学者。

在 1952 年的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他们三人成了当时主要的批判对象，特别是两本《体育原理》著作，被批判为“都是

贩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体育系主任、所谓美国权威体育家威廉姆斯的理论”，“宣传体育超政治、超阶级，体育为了发展个人、培养领袖”；宣传了体育是消遣娱乐，以及彻头彻尾的崇美、媚美观点等；宣传了杜威和胡适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政治和教育思想。认为“目前很多体育工作者存在的‘单纯技术观点’‘为体育而体育’等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就是这种超政治、超阶级的反动观点的流毒。”所以体委决定在《新体育》杂志上以他们为目标，展开对体育工作中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主义的批判[1]。

吴蕴瑞、方万邦等人的《体育原理》确实反映了威廉姆斯的体育思想，确实存在体育超政治、超阶级的思想观念。对这些思想观点的批判，在建国初期是必要的。但将学术问题与政治观点简单地划等号，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批判，影响了正常的学术讨论，制约了新中国体育理论建设。

(2) 体育界的“大鸣大放”

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初步成就，一些党员干部日渐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和特权思想，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作风也有蔓延之势，从而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影响了人民内部矛盾的顺利解决。为此，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根据“八大”精神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1957 年 3 月，中央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强调整风运动要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4 月 3 日，《人民日报》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的社论，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在“放”的方针上的抵触情绪。4 月 27 日，中央又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开展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发布后，广大群众响应党的号召，对党政工作和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这

---

[1] 伍绍祖.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96.

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善党的领导，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密切党群关系，起了很好的作用。

体育界的整风运动当时相对滞后于全国形势，正像1957年第9期《新体育》编辑部文章中所说的："自从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以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成为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体育工作者都在议论纷纷，迫切地要求在体育界迅速地展开讨论。在这方面，本刊显然是落后了。现在，我们决心以最大的努力跟上去。"❶1957年5月，体育界进行了整风动员，《新体育》发表了题为《坚决地"放"，大胆地"鸣"》的编辑部文章。文章指出："我国的体育事业，在短短几年内，有了迅速的发展，拍手叫好的人很多，正是这样，也就容易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宗派主义的作风，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往往不能及时警惕。"另一方面，"体育运动是一种群众文化的活动，也是一门新的科学，决不能只靠行政命令办事，必须团结全国的体育工作者和广大的社会力量，共同努力"。文章指出："目前体育界'争鸣'的空气之所以比较沉寂，是因为不少的体育工作者发言还有顾虑。"然而，"党已明确指出，'放'和'鸣'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党的长期的根本方针"，"各方面的问题都应该允许大家进行自由讨论"。"体育界目前已经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急切需要展开'争鸣'。毫无疑问，这对于进一步改进体育工作，推动我国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将有着很大的益处"❷。

5月3日《新体育》又就体育界的"鸣""放"问题，邀请首都的一部分体育专家、体育工作者举行了座谈会。并在《新体育》1957年第10期上发表了座谈会记录，从而促进了体育界"大鸣大放"的兴起。《新体育》杂志和《体育文丛》杂志先后都刊

❶ 本刊编辑部. 坚决地"放"，大胆地"鸣". 新体育，1957（9）：3.

❷ 本刊编辑部. 坚决地"放"，大胆地"鸣". 新体育，1957（9）：3

登了很多有利于中国体育事业进步和发展的批评建议文章。

就在广大群众根据党的方针，在会议上、报刊上，纷纷提意见、进行批评的时候，社会上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招牌，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在“大鸣大放”的口号下，散布一些煽动性的言论，力图把整风运动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去。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地方的群众举行辩论会，贴大字报，一些报刊发表了不少过火的和错误的言论，一时形成了相当紧张的气氛。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对于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对于右派分子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5 月 15 日，毛泽东发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认为右派进攻已成为当前主要危险，要求全党做好准备，进行反击。同时，中央指示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在一个时期内，对于错误的意见不要反驳，要让他们畅所欲言，并把这些错误意见不加粉饰地发表出去，以便群众了解他们的面貌。6 月 8 日，中央正式发出《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要求人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问题，得出结论。所以，体育界的“大鸣大放”实际是刚刚开始马上就转调了。1957 年第 12 期《新体育》就发表了《划清界限大鸣大放》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贯彻党的大鸣大放的方针，目的在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克服党员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加强党的领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右派分子所散布的反动谬论和采用的卑鄙手段，已经背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危害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果不进行坚决的揭露和驳斥，就容易使这些谬论和各种善意的批评混淆起来，界限不清。”第 13 期《新体育》上又发表了《学习毛主席讲话，坚决反击右派分子》的专稿。在第 14 期的《新体育》上，发表了《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反击右派分子》的社论。社论明确指出：体育界也有右派分子。“以体育部门和体育院校的整风过程而论，就有人和其他方面的右派分子相呼应，到

处点火，造谣煽动，夸大缺点，否定成绩，诋毁党的各项政策，诬蔑党的干部，攻击党的肃反和人事工作，挑拨党群关系，反对学习马列主义，甚至散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转业军人不懂体育’等迷惑群众的谬论，提出党员领导干部退出体委，党委退出体育院校等等”。因此社论要求人们:“反击右派，必须克服温情主义。”后来在《体育文丛》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斥赵釜生右派谬论》❶、《批判张咏的右派言论》等反击文章❷。

在体育界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回击，对严重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错误言论进行批判，在体育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判断失误，采取了一些不适当的策略，致使反右派斗争也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导致体育界把一些善意的批评意见上纲上线一概划为“右派向体育事业的进攻”，“是企图全部否定几年来体育运动的成绩，从而达到篡夺党对体育事业的领导的目的”，“企图使人民体育事业变质”。正是出于对体育界这样的一种形势估计，加之没有能正确理解和执行 1957 年 10 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党内指示，致使体育界一大批人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并对他们采取了严厉的组织措施。许多好同志、好干部以及与党长期合作的老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能的体育专家、教授、学者受到严重伤害，使他们遭受长期的委屈、压制和不幸，不能在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体育“大跃进”造成的严重损失

1. 体育界的持续“大跃进”的境况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体育界仍然对 1958 年后的“大跃进”

---

❶ 斥赵釜生右派谬论. 体育文丛，1957（5）：1.

❷ 批判张咏的右派言论. 体育文丛，1957（7）：6.

持肯定的态度，如在《国家体委党组关于1960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中，就有这样一段阐述："1958年和1959年，我国体育运动在党的总路线和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以开好全运会为中心，大搞群众运动，加强优秀队伍的训练工作，使体育运动的普及和提高，都有了飞跃的发展。"[1]基于这种认识，仍然坚持"在社会主义建设进入高速度持续跃进的1960年，体育工作也面临着空前未有的大好形势"[2]，即"大跃进"态势。这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是相适应的。1959年在全国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使许多干部对国民经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和困难三缄其口，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1960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确定要在本年度继续"反右倾、鼓干劲、把职工体育运动推向新的更高阶段"，"掀起体育锻炼的热潮"[3]。并再次提出了1958年"体育大跃进"的模式，开展以普及广播操、长跑和冰上运动为中心的"冬季体育锻炼运动"，以普及乒乓球为中心的"万人乒乓球赛"，要使锻炼的热潮"一浪推一浪，波浪式前进"。共青团中央也提出要求："让青少年们用更健壮的体魄迎接60年代"，要求共青团和少先队积极推动青少年体育锻炼活动，配合体委、教育部门广泛组织比赛[4]。《新体育》杂志在1960年第1期的首题栏目《本刊专论》的《迎接新跃进》一文中，更是强调了"1960年将是体育运动继续跃进的一年"。

在1960年1月12日至22日的全国体工会议上，国家体委确定了"1960年的体育工作，应继续贯彻党的总路线，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贯彻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围绕和结合生产

[1] 国家体委党组关于1960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48.

[2] 培养身体康强朝气蓬勃的建设者．新体育，1960（8）：4.

[3] 栗树彬．反右倾，鼓干劲，把职工体育运动推向新的更高阶段．新体育，1960（3）：1.

[4] 鲁钊．让少年用更健壮的体魄迎接60年代．新体育，1960（3）：4.

大搞群众运动，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使体育运动更好地为增强人民体质，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提出了1960年要“大力开展群众体育运动”“大抓训练工作、迅速提高体育运动水平”的工作任务[1]。

1960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亲拟的《中共中央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到“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把卫生工作看做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4月25日，国家体委下达了《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精神，大力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的意见》，要求各级体委认真学习并坚决贯彻这一指示，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体育运动高潮，以更大的成果向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献礼。要求广泛地向群众宣传，“务求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扩大影响，造成声势”。对工厂、农村、学校提出要求，“促使群众体育运动的热潮一浪高一浪地发展下去”。此前，4月20日，国家体委、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还发布了关于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田径运动竞赛的联合通知，期望出现全国更好的体育跃进形势。

然而，至1960年，城乡人民的生活实际上已非常艰苦。虽然在各级体委拟定的工作方针指导下，在全国“反右倾、鼓干劲”宣传舆论氛围的迫使下，克服了很多困难，开展群众体育活动，抓运动训练，但是，在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下，事实上已根本无法普及性地开展群体活动和继续进行大运动量训练，故形式主义和浮夸虚报的不良现象又再次抬头。其典型表现就是在城市和农村自上而下地插红旗、树标兵。上海市评选了各项体育先进单位30多个，其中上海肉联厂为全市榜样；湖南湘潭县乌石人民公社全社“4万多社员中，除少数外，基本上都参加了体育锻炼”；有的人民公社“在每个生产大队和公共食堂门口，放些体育运动器材，社员在吃

[1] 国家体委党组关于1960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51，52.

早饭前，先集合做套广播操，再根据各人爱好搞些体育活动”。为显现一个“声势浩大、速度更快、内容更丰富的体育运动高潮正在席卷全国”的局面，山西、安徽、陕西都有800万人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山东各地广泛组织了“体育运动宣传日”“体育电影宣传周”“全民体育活动竞赛月”等活动，有1000多万人参加了四球（篮、排、足、乒乓球）一短（短跑）一射（射击）运动，并涌现出5万多个“体育之社”“体育之乡”“体育之家”。河北、湖南出现了1000万人踊跃做操的动人场面。另外，还出现了北京的万队篮球赛、广西的万人田径赛、南京的万队排球赛、旅大的万队足球赛、大同的万人射击团体赛等等❶，形式主义泛滥成灾。根据国家体委群体司《1960年前9个月群众体育工作总结》中的有关资料，1960年仅广东、上海、山东、黑龙江、广西等16个省、市、自治区，参加春季体育锻炼的人数达1.2542亿，比1959年冬季体育锻炼人数增加了63%。

以上数据，显然是层层虚报的结果。还有一些地区，在反右倾运动的政治压力下，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为了凑数字不得不靠一平二调集中人力搞突击、搞形式主义。尤其是农村，抽调青壮年为造声势开展所谓的体育活动，在当时十分困难的生活条件下，影响了农业生产，也极不利于参加者的身体健康。

2. 经济困难使体育事业受到严重影响

“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中的错误，使经济建设受到了严重破坏。从1959年起，我国农业又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的袭击，加之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撤走专家、停止经济援助、催逼还贷的影响，致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2年间，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实际上，在号称大丰收的1958年冬季，全国粮食紧张的状况已初露端倪。从1959年开始，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最

❶ 晓明. 突飞猛进，绮丽多采. 新体育，1960（10）：1.

明显地表现在人民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品严重短缺，吃不饱饭的现象随处可见。1960 年，人均消费量比 1957 年减少 35.3%，猪肉人均消费量下降 64.9%。在粮食和副食品极为缺乏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号召采取多种办法，包括大搞瓜菜、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即实行所谓“低标准”“瓜菜代”，并于 1960 年 9 月，区别不同地区降低城乡居民口粮和食油的定量。在农村，很多地方用玉米棒粉、玉米秆粉、橡子面粉、蕨根粉等各种代食品补充口粮不足，克服困难，度过灾荒。尽管全国人民千方百计艰苦奋斗，咬紧牙关与经济衰退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但由于连续自然灾害，尤其“左”的错误政策不能放手使群众生产自救，所以，1960 年经济状况极度恶化，粮食大幅度减产，许多人饥饿瘦弱，不能正常出勤，疾病流行，人口非正常死亡剧增[1]。据统计，1960 年，全国人口净减少 1000 万[2]。

人民的生活状况与体育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普及性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高水平大强度的专业竞技运动训练，必须有物质作保障，“一日无粮千军散”，精神支撑是有限度的，这个最根本的条件绝不可能用形式主义来替代。在全国性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的情况下，体育事业也必然地受到很严重的制约和影响。专业运动队伍由于粮食不足和营养不良，不得不减小运动量，缩短训练时间。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有的运动队因违背科学训练规律，造成了运动员伤病人员增加；城市职工、居民，因粮食、食油定量降低，副食品严重缺乏，除开展工间操和消耗体力很小以调节精神的活动外，体育比赛自行消失。在农村，除少数没有受到自然灾害侵袭的地区还继续开展群众体育活动，部分在“大跃进”期间树立的典型社、队，为迎合“反右倾、鼓干劲”的需要，为了批判“体育大跃进影响生产，生产大跃进不能搞体育”，证明“开展体育，

[1] 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

[2] 中国统计年鉴.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103-104.

人寿年丰”“体育上开了花，生产上结了果”[1]，而搞一些临时性形式主义的表演外，绝大多数农村社队，事实上已不可能再组织体育活动。在校学生也因营养严重不够，使很多学校甚至停了体育课。严酷的现实使更多的人头脑清醒下来，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了事实上的调整。

（三）《体育运动十年规划》的产生及影响

1.《体育运动十年规划》产生的时代背景

与其他领域相比较，体育界的“大跃进”思想实际上早在1956年就出现了。在1956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已着重讨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体育运动的问题，确定在广泛的群众运动基础上，努力提高运动技术，争取两三年内，在若干项目上分别接近或赶上世界水平[2]。1958年2月25日—3月11日，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了《体育运动十年发展纲要》。提出了大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在体育运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争取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运动项目上，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的奋斗目标。纲要提出的主要指标是：“要求10年内4000万人达到劳卫制标准，800万人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出现5000个运动健将”[3]。

然而，就在这个纲要提出以后不久，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成都会议[4]。这是发动“大跃进”的一次会议。接着5月份又召开了

---

[1] 广泛开展农村人民公社的体育活动——评论员的话. 新体育，1960（6）：1.

[2]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1）：精华本上册.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11.

[3] 国家体委档案：关于体育运动十年规划的报告. 1958-09-08.

[4] 成都会议，是1958年3月8日至26日召开的。会议决定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实行两本账办法。第一本账是公开宣布，必须完成的；第二本账不公开，是争取完成的。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的提出，体现了党的工作重心已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缺点是“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1]由于总路线是在不断反右倾和发动“大跃进”的气氛中提出的，加之在贯彻执行时片面强调它的灵魂是高速度，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这就进一步助长了急躁冒进的“左”倾思想的发展。以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为例：2月份全国人大通过的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是6.1%，成都会议上已提高到16.2%；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也由2月份提出的10%提高到了成都会议的33%，八大二次会议又提出了要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正是在这样的国内形势下，国家体委认为：“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的目标和要求”，也“鼓起了体育事业大跃进的干劲”，“尤其是成都会议和党的‘八大’第二次会议公布国家建设时间的总路线以后，各地在迎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高潮的鼓舞下，出现了全民参加体育活动的热潮”。“体育大跃进的新形势，说明我们原定的十年规划指标已不能适应群众的冲天干劲，必须修改”。1958年9月，国家体委对原纲要提出的各项工作指标作了较大的修改，产生了《体育运动十年规划》。规划中的主要指标是：“10年内通过劳卫制标准的人数，第一本账1.5亿，第二本账2亿；等级运动员第一本账5000万，第二本账7000万；运动健将第一本账1万人，第二本账1.5万人。”[2]由此可见，在当时整个社会流行的“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推动下，体育界也不得不在《体育运动十年规划》中体现“大跃进”精神。

当然，《体育运动十年规划》的产生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的影

---

❶ 李茂盛.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163.

❷ 国家体委档案：关于体育运动十年规划的报告. 1958-09-08.

响。根据 1958 年 9 月国家体委已经掌握的材料，当时全国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已有 1 亿多；达到劳卫制标准的 267 万多人；有 22.5 万人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这个统计数字还不包括军队；有运动健将 410 人；有青少年业余体操学校 1.6 万多所，学生 77 万多人；有体育院校和中等体育学校 95 所，还有一些业余的体育大学和系科；普及农村体育活动的县有 160 多个 ❶。特别是以郑凤荣为代表的一些优秀运动员，连续在 1957 年打破 3 项世界纪录，更给体育界以巨大的鼓舞。当时体育界掀起的“运动技术、战术、训练方法，以及学校体育课教学法、体育科学研究、体育运动器具的革新和创造等等”❷技术革新运动及其成果也是到处捷报频传，人们已经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发动和依靠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创造”❸，“体育运动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飞跃局面”。受体育本身形势发展的鼓舞，加上各行各业一个更胜一个的“大跃进”指标的影响，《体育运动十年规划》便产生出来了。

2.《体育运动十年规划》的主要内容

（1）关于竞技体育

竞技体育的总体要求是：“在 10 年左右，争取主要运动项目赶上世界水平”❹。当时的主要运动项目是指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田径、体操、举重、游泳、滑冰、射击 10 个项目。为解决运动员后备人才问题，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求发展到 700 所，学生 14 万。第三个五年计划发展到 1200 所，学生 36 万。

---

❶ 国家体委档案：关于体育运动十年规划的报告. 1958-09-08.

❷《新体育》社论：展开一个体育运动的技术革新运动. 新体育，1958（13）：1.

❸《新体育》社论：展开一个体育运动的技术革新运动. 新体育，1958（13）：1.

❹ 国家体委档案：关于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十年（1958—1967）规划的建议. 1958-02-09.

(2) 关于学校体育

对高校的要求是：① 劳卫制达标。一类高校 1959 年时毕业生全部达到二级。二类高校 1960 年时毕业生全部达到二级。三类学校（约占高校数的 30%），1961 年时毕业生全部达到二级。② 等级运动员达标。一类高校 1962 年前有 20%、1967 年前有 25%的毕业生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二类高校 1962 年前应有 15%、1967 年前有 20%的毕业生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三类学校 1962 年前有 10%、1967 年前有 15%的毕业生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在等级运动员中，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要有 10%为一级，50%为二级，40%为三级；第三个五年计划内要有 20%为一级，60%为二级，20%为三级。此外，在 4000 人以上的高等学校的一级运动员中，要求有 3%的人达到运动健将级标准。3000 到 5000 人的学校要举办一所少年业余体校，学生不少于 50 人。5000 人以上规模学校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的学生不少于 100 人。并要求每 10 个等级运动员中应培养出相当于三级裁判员水平的指导员或裁判员 1 人，共 19530 人。

其次对高中（包括师范和中技）和初中学生，也按照学校的类别，分别就劳卫制达标、等级运动员达标等提出了过高的指标[1]。

(3) 关于职工体育

主要以“扩大职工体育活动的群众性和经常性”为原则，“在体育活动内容上应着重开展田径、体操、举重、游泳、速度滑冰、滑雪、手球、射击、象棋、围棋、中国式摔跤、技巧运动及篮球、排球、足球、羽毛球、武术、自行车、爬山、旅行等 21 个项目。”1962 年达到的要求是：全国 3000 万职工要建立 93 万个运动队，拥有队员 930 万人。约有 80%的基层单位推行劳卫制，279 万人达到标准。等级运动员 27.9 万人，三级裁判员 2.8 万人，初级指导员、裁判员 93 万人。基层运动会每年召开约 20 万到 26 万次。到 1967 年，开展体育运动的基层增加 7 万个，即达到 27 万个基层单

[1] 国家体委档案：基层单位体育运动的十年规划. 1958-02-09.

位。除继续开展21个重点项目外，再增加棒球、垒球、冰球、国际象棋、划船、摩托6个项目。10年累计，要使“全国4000万职工中有运动队172万个，参加运动锻炼的人数为1720万，劳卫制将在95%的基层单位中推行，及格者为714万人。等级运动员71.4万人，运动健将200人，三级裁判员71400人，初级指导或裁判员172万人。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职工业余体育学校各50所，少年业余体育学校150所，基层运动会每年约54万次”❶。

(4) 关于农村体育

农村体育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单位，主要是“开展劳动前操或工间操、手榴弹、中（长）距离跑、跳高、跳远、举重、单杠和双杠、摔跤、爬竿（绳）、游泳10个近代体育项目，以及各地民间固有的体育活动”。1962年实现的指标是：“在全国农村中有132万个各种运动队，队员1320万人；基层体育协会45万个，会员约1181万人；经过业余训练的初级指导员或裁判员132万人，约有67500个基层推行劳卫制，40万人达到一级标准（占参加锻炼人数的10%）；基层运动会每年约40万次。”到1967年，“要求开展体育活动的基层增加15万个，即达到60万个社开展活动，占总社数的80%”。活动内容除原有10项外，再增加标枪、铅球、自行车、手球4项。10年累计，要使“全国农村中有各种运动队300万个，队员3000万人；基层体育协会60万个，会员2790万人；经过业余训练的初级指导员或裁判员300万人；30万个基层推行劳卫制，372万人达到一级标准，50万人达到二级标准；等级运动员42万人；基层运动会每年约129万至277万次”❷。

❶ 国家体委档案：基层单位体育运动的十年规划《职工体育十年规划（草案）》. 1958-02-09.

❷ 国家体委档案：基层单位体育运动的十年规划《职工体育十年规划（草案）》. 1958-02-09.

（5）关于军队体育

对军队体育的要求是："除国防前线、边防地区和身体有病的官兵以外，要求在 10 年内所有的复员官兵，均应在现役期内达到劳卫制标准，其中 20%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1]

（6）关于体育场地

规划要求："从 1958 年起，到 1967 年为止，全国省辖市以上公共性体育场地将由 1957 年预计达 434 个，发展到 1023 个。省辖市以上城市均将具有可供竞赛用的体育场地一个以上。"[2]

（7）关于体育科研

规划提出了 10 年内需要研究的主要课题 10 个，即体育理论与体育制度、运动技术与训练问题、体育运动的卫生学和生理学论证、体育运动的医学与医务监督问题、体育运动的心理学、中国体育史、组织领导与工作制度之研究、培养体育干部与学校体育问题、关于体育场地和运动器材的科学研究、外国体育运动。[3]此外，在《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第 55 项任务第九中心问题说明书》中，提出了关于体育的 1956—1967 年的 5 个研究题目，分别是"中国民间体育经验的研究、运动生理和运动训练方法和生理基础的研究、某些兴奋药物（如人参、五味子）对体育活动的影响、中国运动员的适宜营养问题、各种疾病及外伤在运动员中的发病率的调查统计和分析研究"[4]。

3.《体育运动十年规划》的影响

《体育运动十年规划》就其出发点来说，应该得到肯定。作为

---

❶ 国家体委档案：基层单位体育运动的十年规划《职工体育十年规划（草案）》. 1958-02-09.

❷ 国家体委档案：关于体育场地十年规划的建议（草稿）. 1958-02-10.

❸ 国家体委档案：关于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十年规划的初步建议.

❹ 国家体委档案：关于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十年规划的初步建议：附件（一）.

管理活动中的一项计划措施，制定相应的体育发展目标，无可非议。而且规划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查研究和论证。但是由于《体育运动十年规划》是全国“大跃进”形势背景下的产物，所以它有明显的脱离实际的浮夸，必然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特征的烙印。就体育界自身而论，在体育事业取得了辉煌成绩面前不冷静，过分夸大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严重违背了体育运动发展的规律，脱离了国家民族的实际。《体育运动十年规划》的制定给体育界造成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首先，在思想方法上，对是和非的判断形成误导。凡实事求是、讲求实际的人和事往往被视为“右倾保守”，而脱离实际、浮夸虚假的人和事则常常受到肯定和表扬。如1958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安徽省就被批评为“规划太保守了”。上海也被批评为“总的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而河北省提出的竞技体育规划明显脱离实际：10年内田径、自行车、篮球、足球、举重、体操“6个项目赶上世界水平”；毕业生达到劳卫制标准的数字是97%，比国家体委规划中的95%还高出两个百分点；在农村体育设施上，提出了“乡乡有运动场，社社有篮球场”。竞技体育部门提出的国际比赛指标是：“19届奥运会要求重点项目达到前三名、前六名，就是意味着这些项目已经达到世界水平了。举重1960年赶上美国，体操1964年赶上日本，居第二位。篮、排球前三名，足球前六名。”“进入前三名、前六名，就是说甲级队都达到世界水平了”[1]。这些明显的浮夸倾向却受到了表扬和宣传，从而破坏了党所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作风。

其次，在工作上误导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在浮夸的影响下，为了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只能是弄虚作假。所以，学生为了达到劳卫制标准，可以在跑步的时候“抄近路”；下级为了完成上级任务，可以根据“需要”修改统计数据。弄虚作假的另一表现

[1] 国家体委档案：1958年2月全国体育工会会议记录稿.

就是制造假典型，人为地树立体育“样板”、“红旗”单位，大搞形式主义。出现了群众体育“白天千军万马，晚上灯笼火把”“体操城里万人做操”“劳卫制县里全达标”的虚假现象。

第三，表现为认识上的盲目蛮干和不要科学。如在运动员培养上完全依靠自然淘汰和广种薄收，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源，而且还造成了许多的运动伤害事故。在学校体育方面也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等“左”的错误。比较突出的是大搞“四红”运动，即所有的学生（除病残者外）都要达到劳卫制一级、二级和等级运动员、普通射手的标准。有的体育教师怀疑这样做能不能保证质量，是否合乎科学，结果被看成是“保守思想、干劲不足”。为了达到“四红”，有的搞突击夜战，学生白天上课打瞌睡，影响了学习；有的追求数字，限期通过，用各种办法使体育基础差的学生在短时间内勉强达到标准，违背了体育锻炼的客观规律；很多地方组织锻炼，采用了累计成绩的比赛办法，将个人或单位锻炼的总成绩逐日登记下来，在限期内达到了总成绩，就给予一定的奖励。于是，很多人搞突击锻炼。比如有的学生早上 4 点就起床跑步，男生有一天跑 1.6 万米的，女生有一天跑 9900 米的。有的学生把饭带到操场上，跑饿了就吃，吃完了马上又接着跑，损害了学生的健康。在教学方面否定了 1956 年编订的教学大纲，有的搞单项提高，有的编军体教材。在课的形式上，有的初二就开始上单项提高课，而且 90 分钟连上，运动量大，技术性强，不符合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学生感到过于疲劳。破坏了教学的科学性、系统性，打乱了教学秩序。

1958 年的 5 月 12—15 日和 8 月 11—16 日，国家体委分别在山东高唐和辽宁北票召开了全国农村体育工作现场会和经验交流会，想通过树立“红旗”掀起学、赶、超运动，推广农村体育和生产拧成一股绳的经验。但是，随着后来“体育大跃进”口号的越喊越响，使农村体育受到了不良影响。如关于农村体育场馆建设，提出在 5 年内每乡要有两个体育场、1 个体育馆和 1 个游泳池的标

准。这种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一些地方体育浮夸风的蔓延，从而影响了农村体育的健康发展。加之接下来的3年经济困难，不仅使不少农村地区一度停止了体育活动，而且有些县甚至撤销了体育运动委员会。

其实，早在1956年周恩来总理就曾告诫："在开展体育运动的时候，必须根据人民群众的生产、工作、学习的具体情况和体质条件，有区别地和有步骤地进行，避免要求过高过急和一般化的毛病。"[1]体育界的"大跃进"这一现象直到1960年底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才逐渐有所扭转和改变。

三、体育事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面对1957年以后出现的失误和挫折，党中央及时地确定了"八字"方针进行全面调整。体育事业经过调整，很快走入了发展的轨道。

（一）体育界对"八字方针"的认识与理解

1960年冬，针对人民生活极其困难的严峻形势，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主持下，果断地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使国家经济建设发生了重大转变。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全会正式通过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全会上作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八字方针"是中共中央为战胜困难而采取的重大改革，它表明国民经济的

[1] 周恩来.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1956-09-16.

指导方针已经由“全面大跃进”转变成一个全新的方针。各个部门、各个方面开始了以调整为重点、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的工作。

八届九中全会以后，各行各业为了制定贯彻“八字方针”的具体政策，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领导人和各中央局、各省、市主要领导人纷纷深入基层，如实了解和反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提出进行调整的办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调整农业为基点的同时，在其他各条战线上，也认真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制定了一系列工作条例和规章，这是中国共产党恢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思想路线的重要标志，对纠正各条战线的“左”倾错误、贯彻“八字方针”、战胜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1962 年 1 月，为了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坚决执行“八字方针”，战胜经济困难，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贯彻了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整个会议过程充满了浓厚的民主气氛，对当时的经济形势、经济困难和工作上的错误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确认，基本上统一了对 1958 年以来所犯错误的认识。这次会议对统一全党认识，加强党的团结，坚持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七千人大会”后，“八字方针”得到全面贯彻，各行各业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整。

实事求是地对过去的工作进行总结，认真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体育战线能否全面贯彻“八字方针”、顺利地进行调整的前提和关键。

1961 年 2 月《国家体委关于 1961 年体育工作的意见》中，首先充分肯定 1958 年以来体育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根据中央的“八字方针”精神，初步地反省和认识了“体育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主要是对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学习不够，对形势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认识不够，优秀运动队伍和运动竞赛偏大偏多，

占用了过多的劳动力和生产时间；体育宣传中存在着片面夸大体育的作用和不切实际的浮夸风，锦标主义思想近来也有所滋长”。这些总结性认识触及了“左”倾错误在体育战线产生的一些影响和表现，但未能分析确认1958年以来，尤其在1960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状况下，体育战线仍然提倡继续跃进的思想根源及所造成损失的客观事实。因此，1961年，调整的步子迈得不大，但有一定效果。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八字方针”得到了坚决、全面、有力的贯彻执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过1961年的调整工作，加深了对“八字方针”精神的领会，同时，在“七千人大会”后，党内民主气氛的增强，使其对1958年以来，体育工作的失误进行了客观的总结，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首先认识到体育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为经济基础所决定，体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必须与经济建设相适应，不能超越生产力水平所许可的限度，必须根据人民生产和生活状况不断加以调整。第二，在贯彻体育为政治、为劳动生产服务的方针中，曾经一度有某些主观片面的、错误的提法和1958年以后的一些错误做法。第三，从国家形势、经济基础出发考虑不够，认识到国家体委1958年提出的十年规划，指标高、要求急，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第四，对训练工作客观规律认识和掌握不够，把一些必要的、科学的制度当做迷信破除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事故，影响了运动成绩的提高。在当时，虽然不可能彻底认识到这是由于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必然结果，并在工作中予以纠正，但比较客观地对1958年以来导致体育工作中出现偏差的思想根源和表现进行了分析总结，认识比较深刻。因此，1962年，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效果非常明显。

1961年初，体育战线随着全国整个国民经济指导方针的转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八字方针”开始了调整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962年，体育战线继续贯彻并加大了调整的力度和步伐，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为1963年以后，体育战线形成新的体育高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体育工作任务的收缩

1. 对体育发展规模和重点的调整

尽管1960年体育还是摆出“跃进”的姿态，全国体育工作者也在为实现“跃进”的目标努力工作，但是，从1959年下半年以来，因国家经济出现困难而给竞技体育的训练和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带来的严重影响，国家体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及各级体委、各部门体育管理干部、学校教师都有着直接的了解和深切的体会。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可能摆脱“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做到实事求是，确定完全切合实际的工作方针和目标，但是，迫于形势，在实际工作中作了相应的收缩。比如1960年1月11—22日，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到会代表在肯定了1958年、1959年“体育运动的普及和提高，都有了飞跃发展”的成绩的同时，也正视了体育工作由于国民经济困难而受到严重影响的现实，提出应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对原有的体育工作目标、任务，作相应的收缩。在呈报中央的《国家体委党组关于1960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虽然没有提及在1959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国民经济困难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给体育事业带来的不利影响，但也没有受全国性“反右倾、鼓足干劲”的口号左右，提出体现“继续跃进”新的高指标。从对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等方面的任务看，表现出全面收缩的态势。在运动训练上，要求“认真总结训练工作经验，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革新运动，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创造出一套适合我国运动员的训练方法。为提高训练质量，各个运动项目在不同时期应有不同的训练要求和奋斗目标”。提出以10个主要运动项目为主，“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大规模的群众性活动和竞赛，力求提高运动水平”。对群众体育确立了“围绕生产、结合生产，根据各种劳动生产的不同特点，开展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是群众体育运动的根本原则”。

并根据“广大职工和农民因为生产、工作都比较繁忙，业余时间又要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现实，提倡每天坚持10分钟体育活动，活动时间、活动方式做到灵活多样，“学生正处在长身体的时期，锻炼内容主要是身体的全面训练”。

1960年上半年，由于全国反右倾运动政治氛围的进一步强化，体育界不得不动辄组织万人、百万人参加体育活动、比赛，以摆出继续“跃进”的架势。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可说是大势所趋的无奈行为。但实际工作中对体育事业发展速度与目标，已开始进行局部的收缩和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体育事业由于缺乏经济保障和高指标而形成两头牵扯的困难程度，更重要的是为196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打下了基础。

2. 缩短战线，保证重点，积极休整

根据《国家体委关于1961年体育工作的意见》，为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各项工作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确定了对现有事业进行调整、充实，巩固已有成就，着重提高质量”。根据全国一盘棋的精神，确定对优秀运动队的整顿工作，以缩短战线、保证重点、积极休整为中心进行。

各省、市、自治区体委按照有关整顿的精神和部署，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对现有优秀运动队进行了精简、调整，尽可能地做到少而精，省一级撤销了国防体育项目的优秀运动队；射箭、马术等具有区域性和民族性特色的项目，由于器材和条件的限制，国家体委指定少数地方负责，保留优秀运动队。专区、县以下和基层，坚决执行不成立优秀运动队的规定，一律取消了那些以业余为名，实际上脱产或变相脱产的运动队。经过整顿，全国的优秀运动队伍从整体规模上大大缩减，以10个主要项目为重点进行了部署和调整，保留的优秀运动队在物质条件方面有了相对较好的保障。

在训练上，采取循序渐进、分别对待，身体全面发展和运动量大中小结合的原则，为了优秀运动员训练工作的需要，适当地举办

了一些单项的运动竞赛，以提高竞赛的质量，为节约人力、财力、物力，全国和省一级只举办专业运动员参加的运动会。专、县以下，在 1961 年上半年都未举办运动会。

1961 年的调整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由于受当时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对“八字方针”的贯彻还不够坚决，1958 年以来“大跃进”的态势和“左”的思想，给调整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干扰和压力。因此，1961 年的调整工作没能根据实际情况，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把困难和问题全部摆明，一步“退够”。在 1961 年国家体委的工作意见中，强调了“优秀运动员是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主要力量，应大力加强领导，大抓训练工作”，要“把运动队建设成一支政治纯洁、技术优异的红专队伍。在训练工作中，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训练上没有从物质供给条件的角度去考虑，果断地作适当调整。相当多的运动队仍然坚持大运动量训练，使 1958 年以来，尤其 1960 年经济困难以后，由于训练造成运动员伤病面和程度更进一步扩大。据调查，1961 年 10 月底，国家体委直属运动队的 691 名运动员中，伤病共 408 人，占总人数的 59%，其中受伤 348 人，占总人数的 50.3%，伤病较重不能参加训练的占 22.3%。一些较严重的班、队，伤病人数竟达总人数的 90%以至 100%。一些优秀运动员伤病情况较为严重。在国家集训的田径、游泳、举重、射击、跳伞等项打破世界纪录的 24 名运动员中，有 6 人被迫停止了训练，有的不能参加专项训练，有的运动员成绩不但没有提高，还有所下降。一些新补充进集训队的运动员，由于训练中对出成绩要求过高过急，医务监督跟不上，缺乏节奏，缺乏休整，参加训练不久就成为伤号。如国家队田径班青少年组 13 人，都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新手，训练一段时间后，9 人有伤，1 人有病，严重影响了后备力量的补充[1]。运动员伤病的严重情况，在各省、

[1] 1961 年体育工作会议报告//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70.

市、自治区运动队中也较普遍地存在。对优秀运动队伍的压缩和精简也没有完全到位。1962年，国家体委在总结了1961年调整工作成绩和不足的基础上，加大力度继续贯彻中央的“八字方针”政策，使调整工作基本到位。

1962年，优秀运动队人数再次进行了精简，除解放军、各产业系统由各有关部门批准建立外，只限在国家体委和省（市、自治区）体委两级设立优秀运动队，省一级可以委托市一级承担一部分训练任务。

在调整运动队伍时，贯彻了缩短战线、确保重点、猛攻尖端的原则。全国继续以田径、体操、游泳、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射击、举重、速度滑冰10个运动项目为重点。各地根据国家需要、地区传统以及必须保存的特色等因素确定保留项目，报国家体委综合平衡。如速度滑冰是国家重点项目，由于没有国家队，东北几省就必须保留；考虑到田径人数只占优秀运动队人数的1/10，田径基础差，对其他项目水平的提高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对田径队采取充实的方针政策。

1960年，在中国登山队攀登了珠穆朗玛峰后成立的西藏登山营队伍，1961年，根据上级通知，从120多人减到50多人；1963年，从50多人减少到40多人。

1962年，确定了运动队“积极进行休整”的原则。针对运动队伍中伤病问题严重，确实需要一定时间进行休整的现实，利用国际国内重大竞赛活动较少，为积极休整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和机会，“要求在一年内伤病情况基本好转，新的伤病率要减到最低限度。”根据运动员的具体情况，采取“伤病较重的，必须全休治疗；较轻的以治疗为主，适当进行少量训练；身体健康的进行正常训练”[1]。

---

[1] 1961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1962-03-09下发）//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61.

1962年，训练工作的调整效果最为明显。1962年训练工作的转变，主要体现在比较注重从实际出发，一些假、空、浮夸的东西少了。整个以思想教育、技术训练、战术训练、身体训练相结合的全面训练方针，比较正确地处理了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身体训练的关系，使训练按比例有节奏地进行，使训练与比赛相结合，并围绕训练统一安排文化教育和其他各项工作。尤其在处理政治与训练的关系上，明确了运动队的主要任务是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必须以训练为中心。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主要精力应放在训练上，用于训练的时间每周一般应占4/6至5/6。思想政治工作要渗透到训练中去，密切结合训练，保证训练任务的完成。

在训练方法和训练量方面，为了防止伤病，达到“显著地增强身体素质和提高基本技术”的目的，注重训练的规律和特点，强调训练节奏和训练周期，使大、中、小运动量训练结合起来，避免了由于运动员长期处于紧张状态，造成劳损转变为其他伤病，或者由于缺乏大运动量训练，影响了提高技术水平的速度以及优秀成绩的保持。

在训练工作中，改变了由于存在片面性、一般化，在指导思想上往往出现偏差和极端的状况。以往，在强调大搞身体训练时出现了丢了技术训练的偏向；强调基本技术时一些球类项目又忽视了战术训练；在针对运动量普遍过小的情况下提出大运动量时，又把运动量增加过大而出现了过度疲劳的现象，甚至对这种现象笼统地说成是消极情绪的反映，致使运动量再普遍增大；有的还提出不需要过渡期，这样，就把训练、比赛之后必要的休整反掉了，把训练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科学原则也反掉了。

1962年，在训练中开始重新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培养不同流派、风格，提倡不同技术观点的自由辩论，以促进运动技术的发展和训练方法的不断改进，以鼓励大胆创造新技术。要求“各级体委不要用行政力量推广或禁止某一种流派、风格的训

练方法，也不要用行政命令去解决不同技术观点的争论”[1]。这样，使我国的竞技运动训练从50年代主要学习苏联、仿效苏联，转变为学习和吸收世界上主要的技术类型和优秀的技术、战术、训练方法，同时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大胆进行技术革新和风格独创，以形成更先进的技术、更高的风格和一套科学的训练方法。这是在摆脱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等“左”的错误思想指导，在整个社会政治氛围相对宽松、思想相对解放的环境条件下，训练指导思想和方法的明显转变，中央的“八字方针”在训练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落实。

加强领导，协调好领队与教练员、运动员，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也是调整工作的重要内容。

专业运动队设置的班主任（领队）与教练员的团结，是带好运动队的关键所在。由于“左”的思想的指导，在工作中不协调的情况很普遍，有的甚至比较严重。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完成训练和比赛任务，1961年体育工作会议后，国家体委提出了在运动队中必须加强党与非党的团结，正确处理领导与被领导、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并明确班主任（领队）全面负责班（队）工作，教练员在班主任领导下，主要任务是负责运动员的训练工作和比赛的指导工作。班主任要很好地团结和使用教练员，树立他们的威信，培养他们独立工作的能力，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鼓励他们钻研业务，要求他们成为精通本行业务的专家。同时，要求班主任努力钻研业务，变外行为内行，在工作中不要包办代替教练员的技术指导作用，要尽可能地把发挥教练员在训练中的主导作用和调动运动员的自觉性、创造性结合起来。

在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上，要求运动员尊重教练员，服从教练员的指导。要求教练员发扬技术民主，互教互学，做到教学相

[1] 1961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1962-03-09下发）//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76.

长，共同提高。在比赛中，把教练员的统一指挥，与培养运动员独立思考的能力及运动员在必要情况下果断应变的能力结合起来。

要求班主任、领队与运动员同吃同住，遇事一起商量，一道观摩训练、比赛，及时发现问题。对运动员的教育，既要严又要活，建立一套严格的训练管理制度，养成优良作风，把运动队建成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同时又思想活跃、作风顽强、充满朝气的战斗队伍。

3. 对国防体育的调整

1960 年，国防俱乐部从 1957 年的 174 所增加到 1408 所，很多专区、县也建立了国防俱乐部。1961 年，国家体委对国防俱乐部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后，充分肯定了国防体育活动在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国防教育、增进科学知识、培养国防后备力量方面的重要作用。根据中央“八字方针”精神，针对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对国防俱乐部条件的限制，以及由于上得急、摊子大、浪费大、效果受到影响的具体情况，确定国防体育活动主要放在城市开展。在有条件的中等城市，可以有单项或综合性的国防体育俱乐部，专区、县以下不建国防俱乐部。到 1962 年初，又根据国防体育比赛项目中以滑翔、射击、无线电为重点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将国防俱乐部调整为 500 所。这样，既保证了国防体育的普及面，又保障了重点项目和训练设施条件的改善。

4. 减少国内国际赛事，低谷中呈现奇峰

1961 年，国家体委决定，为了检查和保持优秀运动队的训练水平，举办一些单项运动竞赛。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1961 年和 1962 年，国内和国际赛事大为减少，全国和省一级比赛大都围绕 10 个重点项目，并在一定规模的限度和范围内进行。

根据国家体委公布的材料，1960 年创造了 197 项全国纪录，其中有 16 项世界纪录（游泳 1 项、跳伞 7 项、航空模型 8 项）；

1961 年创造了 107 项全国纪录，其中有 9 项世界纪录（射箭和举重各 1 项、跳伞两项、航空模型 5 项）；1962 年创造了 79 项全国纪录，有 1 项（男子 4×100 米自由泳接力）是创造的新纪录。破全国和世界纪录情况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虽然整个竞技体育成绩处于低谷中，但也应该看到，在经济困难时期，我国竞技运动员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最突出的有：1960 年 5 月 25 日，刚刚组建 5 年的中国登山队，在苏联队撕毁协议，缺乏经验和必要设备资料的情况下，取道北坡，超越外国登山运动员不敢问津的“第二台阶”，攀登上了海拔 8882 米（当时的高度）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

1958 年 12 月，根据中苏两国谈判协议规定，两国运动员将于 1959 年组成中苏珠穆朗玛峰登山队，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

1959 年 3 月，由于西藏发生了武装叛乱，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协议，当年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活动被迫停止。4 月，中方登山队转移到新疆，决定攀登慕士塔格峰，部分选入中国登山队的藏族男女运动员参加了这次登山活动。7 月 7 日下午 6 点 20 分，中国国家登山队和藏族的部分队员登上了这座被称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顶峰。4 名藏族女队员齐米、西绕、查姆金、潘英和队友王义勤、王贵华、周玉英、丛珍胜利登顶（7546 米），打破了由法国女运动员克·郭刚在 1955 年登上尼泊尔境内海拔 7456 米的加澳斯峰，创被称为“世界上最高的女人”的纪录。为攀登更高的山峰积累了经验，培养了登山技术骨干，训练了运动员。

在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协议后，国家体委决定中国登山队单独攀登这座世界最高峰，1960 年初，中国登山队首先派出以罗志升、张俊岩为正副团长的先遣组来到拉萨，从驻藏部队中挑选了一批战士进行集中训练。同时，在日喀则集中培训了近百名农牧民青年，这两组集训的军工和民工的任务，是为登山队运输登山物资。

中国登山队能否单独攀登珠峰，对于缺乏经验和技术，组队时间不长的年轻登山队来讲，是非常严峻的考验。3月初，中国登山队到达珠峰脚下的大本营，建起了世界最高的一座“帐篷城”。登山队员和担负运输任务的军工和民工，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一步一步地接近了顶峰，5月25日4时20分，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3人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实现了全国人民的期盼。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登山运动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国家体委授予了中国登山队“勇攀高峰运动队”的光荣称号。1961年4月9日和14日中国乒乓球队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继1959年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夺得男子单项世界冠军后，又夺得男子团体和男子单打（庄则栋）、女子单打（邱钟惠）三项世界冠军，中国健儿从此“走向世界”，揭开了中国运动员称雄世界乒坛的辉煌一页。中国乒乓球队被誉为“人民功臣”、“祖国之光”，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称中国“乒乓球长城难以攻破”。

5. 从实际出发，稳妥地开展群体活动

从1961年初开始，国家体委群体司响应中央的号召，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一二月份，主要以天津、唐山等地为点，了解工厂、学校体育活动情况，通过调查、分析，总结怎样有针对性地在职工中开展小型多样、简便易行的体育活动；大、中、小学面对当前经济困难的情况在不搞大运动量活动的原则下，怎样有节奏地安排教学、课外体育活动和业余体育活动。二三月份以河北为主，了解农村体育活动情况。在调查方法上，采取了有点有面，既注重过去的典型单位，也注意了对普遍性情况的掌握，为在群体工作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找到了可靠的依据❶。

1961年2月11日，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下达1961年体育工

❶ 国家体委档案：1961年《群体司全年调查研究活动的初步计划》.

作意见的通知，正视了在全国开展群体工作面临的困难，根据中央“八字方针”的精神，确定了1961年群体工作的原则是：“应根据为生产劳动服务的方针和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原则，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的指示，使群众体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更加切合生产劳动、工作、学习的需要，更加有助于劳逸结合，更加有利于逐步增强人民体质。”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前，其他行业仍然存在着高指标和浮夸风的影响。体育战线在1961年贯彻“八字方针”是比较迅速和及时的，尤其群众体育工作，很快就摆脱了“继续跃进”的“左”倾思潮，使1961年的群众体育的调整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城市职工体育：1960年下半年，职工粮食标准降低，加之副食品供应匮乏，很多职工出现了浮肿病和营养不良引起的并发症。针对这种状况，群体活动从数量和强度上进行了严格的控制，根据群众的需要，本着自愿的原则，开展了一些运动量小、简便易行、为广大群众所熟悉的活动，如广播操、生产操、武术、乒乓球、象棋等活动，以达到锻炼身体、丰富文化生活、活跃气氛、焕发精神的目的，在有条件的单位，组织一些小型比赛活动。当时，根据行业特点，由各单位组织做生产操是职工体育的主要活动形式，如天津市，各单位普遍坚持开展了两操（广播操、生产操）、一拳（太极拳）、一球（乒乓球）、一棋（中国象棋）等消耗体力不大、有益健康的活动。有的厂矿、企业、单位还结合卫生保健工作，组织了慢性病人进行体育疗法。

学校体育活动：1961年，由于营养不良影响，部分学校的体育课减为每周一节，有的停上体育课。城市学校基本上坚持了早操和课间操，有少量的课外体育活动。乡镇农村学校的课外活动基本取消，采取了由学生自发进行课外活动的方法。

农村群体活动：1961年，农村粮食继续减产，大面积的灾害，

使农村因食品匮乏而浮肿生病的现象比较普遍。在农民体力不支的情况下，农村“除个别生活极好的地区有活动外，基本上暂停活动”[1]。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全国各行各业更加深入地贯彻执行了“八字方针”。国家体委在对1958年以来造成的工作偏差进行反思前提下，以更大的力度对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调整。针对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和人为的错误已经造成的经济困难，针对群众身体状况，继续贯彻了中央的“八字方针”。确定开展适度的群众体育活动，作为贯彻劳逸结合、组织群众、振奋精神、增进健康的一项措施。

1962年，国民经济状况比1961年稍有好转，人民生活困苦程度有所缓解，但仍然不具备普遍开展群体活动的条件，因此，群体工作坚持了尊重群众的意愿和爱好，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开展活动，使活动内容更加切合生产、工作、学习的需要。在具体工作中，为使群体活动同卫生工作密切结合，研究、提倡和推广群众中行之有效的健身方法，收到恢复体力和防病治病的效果。

在厂矿、企业、机关中，结合生产和工作，除了坚持工间操、劳动前后操，开展一些小型多样的体育活动，活跃群众业余生活外，仍然不搞规模较大的运动会，不组织运动量大的体育锻炼，如长跑、劳卫制，不进行等级运动员测试，不组织单位间体育活动开展情况的评比。

在农村，除在生活条件较好的社队组织体育活动外，由群众自发地开展一些娱乐性活动，总的原则是“少搞或不搞体育活动”。

学校群体活动主要抓早操和课间操。对课外活动，贯彻完全自愿的原则，根据城市、乡村以及各个学校的不同情况，适当地安排和组织一些小型运动竞赛，仍然不举行全校性的运动会。

---

[1] 国家体委档案：国家体委群体司《1961年群众体育工作总结和1962年群体工作意见》.

从现在各省、市、自治区及地区、市、县所编纂的地方志中可以证实，1961 年、1962 年的群体活动整个处于低潮状态，其主要原因就是“国民经济暂时困难”。因此，在客观条件不允许开展群体活动的情况下，坚决地进行调整，采取“少搞或不搞”的措施，是切合实际而且有积极效果的，使群众能得以“休养生息”，为经济形势好转后群众体育的全面复兴积蓄了潜力。

6. 精简体育院校、重点业余体校，重点提高质量

在 1958 年的“大跃进”和 1960 年初的“反右倾”、体育“继续跃进”的潮流中，全国体育院校发展迅猛。1957 年，全国共有体育院校 6 所；到 1960 年，发展到 29 所，中等体育学校发展到 79 所。1958 年还成立了近百个业余体育大学、系科。在辽宁北票县龙潭社，建起了“龙潭体育大学”。特别在 1959、1960 年，经济状况已十分困难，有的省、市还在新建体育专业院校。这实际上是不顾经济基础，不考虑国家和地方财力、人力，急于兑现 1958 年提出的 10 年规划中培养人才的高指标而产生的现象。由于很多新建院校师资、设施、场地、器材等严重不足，学生来源、校舍、设备较差，不可能达到预期的培养目标。到 1960 年，实际上很多体育院校，因不具备起码的办学条件和受到种种限制而处于难以为继的窘况。

1961 年，根据《国家体委关于 1961 年工作意见》，决定按中央“八字方针”的精神，在当年暂不新建体育学院和体育学校，也不升格，有计划地按一定条件，按一省一所的原则进行调整。对领导力量弱，师资差，生源不好，基建、设备落后的进行降格。对中等体育学校分别情况进行整顿。从整体上根据领导力量、师资、学生来源、校舍、设备等条件，保留一些骨干和条件好的院校，通过合并撤销一些学校。确定县以下不办体育学校。加强保留院校的领导力量，充实教师队伍，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经过 1961 年的调整，到 1962 年初，全国体育院校缩减为 20

所，中等体育学校数量也大大压缩。保留的体育院校在1961年开始缩减人员，减少招生人数。如北京体院，1960年招收本科生258人、研究生53人、预科生110人。1962年招收本科生215人[1]；西安体育学院1960年招生662人，1961年招收本科生40人，1962年则停止招生一年，并精简了教职工共303人[2]。

经过调整后，国家体委加强了对体育院校的领导，有专人分管体院。体委党组每年至少讨论两次体育学院的工作。

1958年到1960年，体育学院为迎合"体育跃进"，片面强调提高技术，强调通过等级创造纪录，忽视基础理论的学习，忽视教学能力的培养，使学生专业技术面太狭窄，偏离了体院的培养目标。1961年，明确了体育院系以培养中等以上学校的体育师资为目标，以提高质量为侧重点，严格执行教学计划。强调了在教学中必须既要重视专业知识，又要重视基础理论；既要重视运动技能，又要提高教学工作能力。在全面完成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各门主要专业课程的基础上，有所专长，改变以往那种重技术、轻理论，重训练、轻教学，重专修、轻普修的状况。各体院根据培养目标，调整了专业设置和系科体制。

在调整中，国家体委提出"体育院校应该努力培养理论与实际统一、高度的革命性与严格的科学性统一的学生，集中力量抓好教学"。并要求"每年必须保证8个月以上时间用于教学，学生参加劳动的时间一般在1个月至1个半月"。正确地处理了教学工作与生产劳动、社会活动和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坚持以教学为主。纠正了过去生产劳动、社会活动占用时间过多和学生学习时间得不到保障的现象。

---

❶ 北京体育学院校史编写组. 北京体育学院校史.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3：39.

❷ 西安体育学院校史编写组. 西安体育学院校史（1954—1976年学生、教职工统计表）. 西安体育学院，1994.

1961年，各体育院校还加强了教材建设工作。3月6—15日，国家体委召开北京、上海、西安、武汉、沈阳、成都6所体育学院院长座谈会（有关的体育学校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对编写体育学院教材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成立了体育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和任务分工，在1962年，基本完成了体育学院包括新设课程在内的所有教材，同时着手编写教学参考书。

1961年至1962年，国家体委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根据“八字方针”和“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强调了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要求充分评价和积极估计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进步和工作上的作用，恰当地摆正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改变过去那种简单粗暴、随便搞思想批判，滥用大会斗争，用惩办代替教育的工作方法。在政治上肯定他们的进步，给予他们应有的信任和支持，在团结的基础上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思想。各院校根据中央的有关政策，对历次运动中受到不适当处分和结论的，在慎重复查和甄别的基础上，对部分人进行了平反、“摘帽”。如北京体院对1958年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296名师生员工进行了甄别；西安体院对从1958年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双反交心、红专辩论、拔白旗、教育革命、反右倾、反坏人坏事、新三反运动）受批判和处分的干部、教职工、学生共166人进行了甄别。当时虽然不能完全清除“左”倾思想的错误影响，把知识分子整个摆在恰当的位置上，作出正确的政治和价值评价，但通过这次大范围的甄别，宣传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相当一部分教师卸掉了思想包袱，调动了他们的工作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还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必要的学习工作条件，鼓励他们钻研业务，提高技术，力图培养一批专心致志的学术专家。在生活上给予必要和可能的安排照顾，认真办好伙食，保证了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虽然生活非常艰苦，但是由于整个调整工作能符合学校实际，使广大教职工从各种政治运动的阴影中脱离了出来，心情舒畅，所以，1962年，体育院校的教学工作基本走上了正轨，确实取得了充实、巩固和提高的效

果，为1963年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大跃进”中，很多青少年业余体校大量扩招学员，一些地方不具备训练条件的也挂牌成立了业余体校。1960年，业余体校的生源和训练已经受到经济困境的严重影响，有的实际上已是徒有虚名了。但在“反右倾”的压力下，业余体校的数量还在增加，有的则不得不勉强支撑办下去。1961年，在贯彻了“八字方针”以后，对全国的业余体校进行了以提高质量为立足点的调整。各地基础好的青少年业余体校仍坚持上课，针对学生的身体素质基础和营养状况，很多采取了适当减少上课次数和时间的办法，在取得学生家长同意的前提下，坚持自愿的原则进行活动。

1962年，在继续落实“八字方针”的情况下，国家体委提出了对运动队人数的进一步精简，但同时提出了要更进一步抓好业余训练的工作，以加强后备力量的培养，保证各项运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使优秀运动员队伍不断得到充实。要求重点业余体校配备专职的教练员，有场地设备和其他必要条件的保障。从国防俱乐部、少年宫的积极分子、学校代表队中发现和选拔有运动才能的人加以培养，并利用优秀运动队以抓训练为主，运动量不大的机会，协助和辅导青少年训练。

经过调整，明确了青少年业余体校的定位：其主要任务是培养未来的优秀运动员，使那些具有运动才能的青少年在业余体校经过系统训练之后，源源不断地补充到优秀运动员行列中去。因此，应以提高为主，取消了大批不合格的业余体校，各重点业余体校都能立足于抓质量，从长远发展着眼，平衡和循序渐进地进行系统训练；根据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严格掌握运动量；从训练注重进度，改变为讲究动作的规格质量，加强了技术指导和医务监督，适当地安排参加比赛，没有过高过急地要求他们出成绩。这样，使青少年运动员得到了全面的身体锻炼，为进一步提高运动技术打下了基础。其间，也涌现出一批优秀运动员的苗子，为我国1963年以后竞技体育形成发展的高潮，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二节　计划经济体制下体育发展模式的形成

从“一五”计划开始实施，尤其从1958年掀起的人民公社热潮以后，以“一大二公”为标志，全国性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明显和加强。在1960年至1962年的经济困难时期，中央确定了以调整为主的“八字方针”，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计划性指导和调控，最终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一整套计划经济体制。体育在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和加强的过程中，通过调整，也逐步形成了计划经济指导下发展模式的雏形。

一、高度集中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

从1957年以后，体育社会组织管理系统的功能和作用逐渐削弱。1960年开始，全国各个行业在依据中央“八字方针”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受计划性和行政性指令，各产业体育协会、社会群众体育组织在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组织管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职能作用。国家体委实际包揽了国家体育事业各个方面的工作。由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体委主要进行指导，国家和社会力量共同办体育，变为集权于体委，对体育进行独家领导和管理的模式。这是在整个国家处于完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必然。在一定历史时期，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通过统一规划、调配、布置，来保证部分重点项目形成优势，攻克尖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管理模式对一直习惯于在组织的领导安排下以搞运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国群众体育的发展来说，无疑是等于放任自流。同时也不利于调动和发挥其他行业部门系统的体育积极性。

二、专业化的训练、竞赛体制

进入60年代，有关我国体育的发展道路问题，仍然继承了50年代后期的指导思想，即一方面是体育大众化、普及化，一方面是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然而，由于经济困难的国内形势，再加之国际反动势力对我国采取的封锁、孤立政策，我们只能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优先保证竞技体育的发展，优先保证竞技项目中几个重点项目的发展，以实现重点体育项目的突破。所以，当时国家体委的实际操作就是：在群众体育工作上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和原则，而不可能进行更具体的组织实施措施；在竞技体育上，为了达到预定的目标，则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竞技体育尽快发展的管理制度和措施，从而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比较完善的竞技体育发展管理模式。

（一）培养人才的三级训练网

1960—1962年间，对青少年业余体校从数量上进行了压缩。1963年，青少年业余体校在调整的基础上，着重巩固提高并略有发展。根据全国体工会议的要求，将全国青少年业余体校的数量控制在350所以内。实际上，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体委，都根据专项优势特点，扩大了业余体校办学规模。1964年，全国体工会议上要求各地“要充分运用各种业余训练形式进行训练，尤其要办好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为优秀运动队伍培养后备力量”。

为了使业余体校走入规范化轨道，为提高业余训练质量提供可靠的保证，1964年9月14日，国家体委颁发了《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试行工作条例（草案）》。《条例》分8章共36条，对举办业余体校的条件、项目、学制、教学训练、思想政治工作、教练员与学生、组织领导、运动保健、设备和经费等方面作了较详尽的规定。根据《条例》的要求和精神，各级体委、体育场、国防体育

俱乐部、少年宫、少年之家和条件较好的学校、厂矿，很多都举办了业余体校。各省、市、自治区体委，主要抓重点业余体校的训练。1965 年的全国体工会议上，确定采取多种业余训练形式，大力抓好业余训练工作，“广泛建立基层的运动队、代表队、训练点等等，办好重点青少年业余体校、中心青少年业余体校”。1965 年6 月 28 日—7 月 10 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了“各地都应集中力量办好重点青少年业余体校，一定要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一些优秀运动员，向专业队输送。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可以建一所半天读书、半天训练的中心青少年业余体校，作为专业队的预备队”。从 1963 年至 1965 年，逐渐形成了一个从基层单位业余体校，到重点业余体校、中心业余体校和专业运动队的，有广泛的普及面、层层衔接的业余训练三级人才培养网络和体系。

（二）强化对优秀运动队的政治思想管理和行政管理

1963 年，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优秀运动队的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提高训练质量和运动水平，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试行运动队伍工作条例（草案）的通知》，这个《条例》的初稿，曾于 1961 年 11 月下发征求意见，经过 1961 年和 1962 年两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讨论和在运动队干部、教练员、运动员中广泛讨论，并在少数运动队中试行，以及征求了很多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形成的。《条例》除总则外，分 10 章共 60 条，包括优秀运动队的训练、比赛、思想政治工作、文化教育、教练员、运动员、后备力量的培养、医务监督、行政管理、组织和领导 10 个方面。《条例》确定“以政治为统帅，以训练为中心，思想教育和技术训练、战术训练、身体训练相结合”作为运动训练工作的方针；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必须遵循的一个根本原则；强调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尊重科学、解放思想、革新技术，切忌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技术、学术上的争论；要求把训练和比

赛有机地结合起来，运动员要划清力争胜利和锦标主义的界线，在比赛中表现出良好的风格，充分发挥技术水平。《条例》对运动队的组织领导、医务监督、运动员工资待遇和出路等作了明确的规定。特别强调了在运动队伍中必须保证党的绝对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各地体委根据要求，在认真传达、贯彻《条例》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和各个运动项目的特点，作了补充规定或制定了细则规定。1964 年 8 月，经中央批准，国家体委颁布了《运动队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决定在体委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构。颁布这项《条例》的依据和出发点是：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必然要反映到运动队伍中来。因为运动员大部分是青年知识分子，缺乏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锻炼，运动队的技术性和竞技性很强，胜负和荣誉问题很突出，人的精神状态对运动技术的影响大，优秀运动员担负着创造优良运动成绩、为国争光的责任，面临国际和国内比赛的考验，因此，必须不断加强运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培养他们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条例》共 7 章 44 条，对各级体委设置专门机构，配备人员，政治理论学习的时间、学习和内容，以及劳动锻炼的时间、地点，作了很明确和详尽的规定。两个《条例》的颁布，都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后，旨在加强运动队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优秀运动队伍的管理而制定的。其中有"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突出政治而搞的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但在当时历史背景条件下，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对加强优秀运动队的管理和思想作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形成了从运动队的设定、人员配置、政治思想工作、训练、学习、比赛一直到运动员饮食起居等一揽子完全由国家负责的全方位计划管理的模式。

（三）"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

1963 年，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国家体委提出了由休整

性训练转入正常的全面训练和必须严格保证训练质量的要求。在下发的全国体工会议纪要中指出："1963年，应要求凡能坚持正常训练的运动员奋发图强，勤学苦练，努力提高运动成绩。"全国各优秀运动队根据会议纪要精神，在贯彻全面训练方针的基础上，狠抓技术训练和身体训练。按要求"细致地研究技术训练、身体训练的措施和手段，精雕细刻地改进技术动作和方法"，使技术训练和身体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运动员在快速运动中和困难复杂情况下运用技术的能力，使运动员的体力适应连续的激烈比赛的需要。1964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家体委党组关于召开第2届全国运动会的请示报告，并作了批复："为了更广泛地开展群众运动，培养大批有才能的新生力量，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争取在新运会和其他国际比赛中创造更好的成绩，获得更大的胜利，以加强国际体育斗争，扩大我国的政治影响。"实际上，是对优秀运动队的训练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国掀起学习解放军和大庆油田精神的热潮中，3月19日，国家体委发出了《关于组织阅读向解放军学习的文章的通知》。为了加强对优秀运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定了《运动队政治思想工作条例》，并很快在运动队中掀起了学习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大庆油田艰苦创业的"铁人"精神和郭兴福教学法的热潮。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中，结合专业运动队的训练，开展了对"娇骄"二气的批判。对某些运动员在取得一点成绩就骄傲自满、遇到困难就灰心丧气、怕吃苦等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对于培养运动员具有艰苦朴素的作风，在困难的环境下坚持训练和比赛，像解放军那样能吃大苦、耐大劳，掌握过硬本领，使之成为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的又红又专的运动员，起了很大作用。当然，也由于大讲阶级斗争的影响，出现了将一些运动员在训练中正常的情绪反复，也上纲上线地进行批评，甚至联系家庭出身进行分析的现象[1]。但从总体上来讲，结合学习解

[1] 本刊评论员. 坚决扫除娇骄二气. 新体育，1964（11）：1.

放军，学习大庆油田精神，学习中国乒乓球队勤学苦练的精神，正确对待荣誉，培养不怕困难的思想作风，效果是明显的。

1964年12月4—15日，国家体委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训练工作现场会议，共有320人出席。会议学习了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关于训练工作的指示，看了日本女排的训练、比赛，研究了当时我国训练中的问题。要求各地进一步反对训练工作中的保守思想、教条主义和娇骄二气；坚决贯彻“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的训练原则；在运动队中树立“三不怕”（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和“五过硬”（思想过硬、身体过硬、技术过硬、训练过硬、比赛过硬）的作风；改进训练工作的领导，做到领导、教练员、运动员三结合，实现训练工作的革命化。被誉为体育战线典型和旗帜的中国乒乓球队，为总结出“三从一大”训练原则和“三不怕”“五过硬”作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范例。这个队长期坚持勤学苦练，反对娇骄二气，运动员能以高度的自觉性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每次练习，挥臂上万次，跑动几千米，手指磨起泡，贴上胶布再练；脚掌结了茧，垫上海绵再练；练得精疲力竭时，以“再坚持一下”的精神尽可能多打上几板。运动员的球板上磨出了一道槽和两个指印坑。他们钻研技术能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能带着敌情练兵，进入比赛状态。“三从一大”训练原则和“三不怕”“五过硬”的思想作风，是我国优秀运动队对多年训练实践进行摸索和总结的结果；是针对我国竞技运动的实际状况，结合专业项目特点，吸取国外先进训练经验，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彻底改变我国体育运动的落后面貌，向世界先进水平大踏步前进的需要；是在全国掀起学习解放军热潮的直接促进下形成和提出来的。“三从一大”训练原则和“三不怕”“五过硬”作风，成为我国运动员长期克敌制胜的法宝。

（四）“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竞赛战略模式

1961年，为贯彻中央的“八字方针”，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

上，强调了要抓好优秀运动队伍的整顿工作，根据全国一盘棋的精神，缩短战线，保证重点。为了适应优秀运动员训练工作的需要，应适当举办一些单项的运动竞赛，提高竞赛的质量。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运动竞赛是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以达到取得和保持较好的运动成绩的目的。1963 年，全国性的竞赛，主要根据重点项目的优秀运动员提高运动技术的需要来安排，以检查和提高训练效果。1965 年 1 月，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力争在 3 到 5 年内实现由 1958 年提出的，10 年左右在 10 个主要项目上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的奋斗目标。为迎接第 2 届全国运动会的召开，争取实现在本届全运会上打破一批全国纪录和一些项目的世界纪录，达到促进训练的目的，要求各优秀运动队要树立“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思想，加强团结，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从 1961 年至 1965 年，实际上所有的竞赛都是围绕“国内练兵，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一致对外，猛攻尖端”来组织安排的。根据“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思想，形成和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竞赛制度。

（五）“缩短战线，确保重点”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

针对 1958 年以后，竞技体育“大跃进”造成的战线过长、摊子过大，造成人力、物力、财力极大的分散和浪费，又不利于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状况，从 1961 年开始，在贯彻中央“八字方针”中，提出缩短战线、确保重点、猛攻尖端的原则，对运动队进行了精简、调整，以 10 个主要项目为重点进行了部署，使保留的优秀运动队在物质条件方面有了相对较好的保障。1962 年，全国继续在保持 10 个运动项目的前提下对优秀运动队人数再次进行了精简。1963 年至 1966 年初，很多在调整时期停止训练的运动项目，又开始重新恢复训练。但仍然以 10 个重点项目为中心，以此来带动其他运动项目技术成绩的提高。全国性的竞赛项目，主要还是根据重点项目的优秀运动员提高运动技术的需要来安排，适当照顾多年来举行全国比赛的一般项目。特别加强了足球、田径等重点项目中的

相对弱项。1964 年、1965 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继续强调调整优秀运动队伍，集中优势兵力攻尖端。在首先服从国家需要，同时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原则下，由国家和省、市、自治区两级设置优秀运动队，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保证重点。要求省一级的优秀运动队，要集中精力主攻在 3 到 5 年内可能攀上世界高峰的项目，兼顾几个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能够赶上世界水平的项目。在统一部署和规划下确定的重点项目，根据都是基础比较好、接近或达到世界水平的强项，有的是运动基础性项目和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项目。保证重点，有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攻尖端，防止了战线长、摊子大带来的很多漏洞和弊端。实践证明，这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起到了预期的作用。

（六）竞技体育规章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1963 年以后，经过对整个运动队伍的调整，为了适应体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国家体委建立和完善了一批有关竞技体育的规章制度，对恢复训练后的优秀运动队伍迅速提高技术水平，同时加强对优秀运动队的管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63 年 3 月 31 日，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试行运动队伍工作条例（草案）的通知》，明确规定了优秀运动员的基本任务；运动员的培养目标；以政治为统帅，以训练为中心，技术、战术、身体训练相结合的方针；以及运动队统一规划、两级（国家和省一级）管理、全面安排、保证重点，以保证运动队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1963 年 5 月 30 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体委下发了《各项运动全国最高纪录审查及奖励制度》，以使对全国最高纪录的审查能规范化、科学化，奖励有章可循，起到了鼓励运动员不断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创造新纪录、推动竞技体育发展的作用。

1963 年 10 月 10 日，国家体委在 1958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裁判员等级制度条例（修订草案)》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和补充，重新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等级制度》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裁判员等级制度》。以上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国家体委对竞技体育的完全行政性、计划性管理，起到了很重要的保证作用。

三、小型多样的群众体育体制

20世纪50年代，在开展群众体育工作的实践中，就提出和采用了在自愿的基础上，引导群众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开展小型多样活动的方法。但在1958年，为了突出规模大、人数多的“跃进”景象，常常利用行政手段来组织群众参加体育活动。1959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困难已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事实上已不可能组织大规模的群体活动。因此，在1960年1月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就群众体育提出了围绕生产、结合生产、贯彻需要和自愿、因时、因地制宜，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各种各样体育活动的原则。由于1960年初全国处于“继续跃进”的氛围之中，全国体工会上仍然要求“充分利用工前、工后、工间、节日、假日和深入车间、田间、工地开展活动”。“采取把技术送上门（送到工厂、生产队）的办法，在组织竞赛上按照生产班次、相同休假日来进行”。

1961年初，体育战线开始贯彻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针”。在《国家体委关于1961年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今年的群众体育工作应根据为生产劳动服务的方针和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原则”，“使群众体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更加切合生产劳动、工作、学习的需要，更加有助于劳逸结合，更加有利于逐步增强人民的体质”。经过两年的调整，将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群众体育的问题，自然地提上了体委的议事日程。1963年，国家体委根据1962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确定的工作安排，要求“各级体委，从国家体委起，要加强群众体育工作的领导，使群众体育活动积极切实地开展起来，根据生产（工作、学习）的需要与客观可能，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坚持业余、自

愿，开展小型多样的活动”。所以，从 1963 年以后，体委加强了对群众体育的行政性领导，“业余、自愿、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小型多样”成为指导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的方针，这是从 1960 年以来在对群众体育工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而形成的。根据这个方针，城市、农村、学校、军队又形成了各自开展群体活动的模式和特色。

（一）农村体育与民兵训练相结合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农村体育活动与民兵训练就有了联系。1961 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应结合民兵工作的要求。1963 年，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展开，阶级斗争这根弦逐渐绷紧，“占领农村青年业余阵地”成为当时农村的一项政治性工作。同时，也由于“备战”工作的加强，全国很多公社团委配备了专职军体委员抓民兵训练和体育活动。农村民兵组织体系的完善，为组织农民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在 1964 年国家体委号召开展的游泳、通讯、射击、登山 4 项活动中，农村结合民兵训练，开展游泳、登山活动。在春节、假日进行的很多体育活动和竞赛中，民兵组织常常是组织和参与的基本单位。农村群体活动与民兵训练相结合，是人民公社化条件下开展农村群众体育活动的普遍形式。

（二）城市职工体育与备战、生产相结合

在整个调整的过程中，城市职工的社会性群众体育团体的组织管理功能逐渐消失，职工群众体育活动在行政性管理下开展。1960 年至 1963 年间，国防体育的重点放在大、中城市，强调了开展业余国防体育活动，“应很好地配合民兵训练”[1]。1964 年全国大力提

[1] 1961 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1962-03-09 下发）//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63.

倡游泳、射击、通讯、登山 4 项活动与“备战”有很紧密的联系。城市职工结合民兵训练，在各单位的行政性管理和组织下，经常性地组织开展 4 项活动。同时，各行业部门还根据生产的特点，推行各种徒手操，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和小型比赛。行政管理对城市职工群体活动和民兵训练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组织作用。

（三）部队体育与练兵相结合

军队练兵与体育活动相结合，这在我军体育史上可追溯到红军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体育的很多项目、训练手段和内容被大量用于军事训练中，它活跃了部队的气氛，丰富了战士的业余文化生活。部队中广泛开展了多项目的体育活动。在连以上单位组织运动队，参加军队的各级比赛，并经常与驻地的地方运动队开展竞赛。为使战士在体育活动中达到提高身体素质、提高军事技能的目的，必须使军队练兵和体育活动很好地结合起来。周恩来总理对军队体育活动紧密结合军事训练的问题明确提出了要求。他说：“要向老红军学习，经常打球、跑步、爬山，过去老一辈爬雪山，今天我们爬高山，锻炼身体，锻炼意志，一个人就是要全面锻炼。”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全国备战的氛围中，部队加强了军事训练，增加了训练科目。1963 年，国家体委根据军队体育活动开展的情况提出：“军队体育活动应积极、深入开展。”1964 年和 1965 年，结合国家体委要求，基于全民备战需要提出在全国开展登山、游泳、射击、通讯 4 项活动。为配合练兵，积极开展了军队内、军队和地方民兵间进行的全副武装登山、泅渡、射击、通讯等训练和比赛。体育活动结合练兵，成为促进军队中军事训练和官兵身体素质提高的一种可行模式。

（四）体育科技体制

20 世纪 50 年代，以北京、上海两所体育学院聘请的一批苏联专家培养研究生为起点，开始了新中国体育科研事业的建设。1956

年 3 月，北京体育学院（当时称“中央体育学院”）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体育科学讨论会。1958 年和 1959 年，又先后成立了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和北京运动医学研究所。此后，在上海、黑龙江、广东、成都等省市也分别成立了体育科研机构。许多体育科研工作者深入实际，努力钻研，在研究增进人体健康、治疗运动创伤、掌握科学训练方法等方面都研究出一些成果。1964 年 11 月 2 日—12 月 1 日，在北京举行了第 1 届全国体育科学报告会。会上报告了有关运动训练、体育教学、运动生理、运动医学等方面的论文 109 篇，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欢迎。北京体科所搜集翻译了几百万字的世界乒乓球运动技术资料，为我国乒乓球运动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受到贺龙同志的表扬。体育院系的科研工作，在 1960 年至 1962 年调整期间，围绕以教学为中心，对科研工作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提出了科学研究要密切联系教学，为教学服务。要求科学研究要与调查研究、编写教材、建立健全新的教学秩序和提高教学质量相结合。在这一阶段，除完成了一批国家重大科学技术项目研究课题外，主要抓了体育院系教材编写工作。特别强调了教师在科研中的主导作用，提高了教师对科研的重视程度，并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对教师从事科研给予时间上的保证，明确规定将参与科研的时间计入总的工作日中。1963 年以后，很多院校不定期地召开了论文报告会。由于改变了以往那种“献礼”式的突击性科研工作，各体育学院更加重视科学研究与实际需要紧密结合。同时为科研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高了课题的质量。大多数体院课题的主要方针围绕培养目标、面向中学进行调查研究；结合教学，围绕修订教学大纲，修改充实教材；研究改进教法；充实有关教学资料等，取得了不少成果。形成了从国家到各省、市体育科研所和各体育院、系科研室、所相结合的体制。体育科研所专职人员主要针对与竞技项目有关的基础理论、技术和战术方法、训练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体育院、系兼职科研人员侧重于体育教育、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

第三节 学校体育的进一步规范与发展

反右扩大化，尤其“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对学校体育造成了冲击。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使学校体育受到了很大影响。中央的“八字方针”在学校得到认真的贯彻后，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学校的体育工作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迅速的发展。同时，学校体育教育工作也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

一、学校体育工作的调整与规范

学校体育在贯彻“八字方针”进行调整的同时，教育部制定了各级学校的工作条例，使学校体育工作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

（一）学校体育工作的规范

1961年，根据中央确定的“八字方针”，教育部门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出《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中学五十条》）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简称《小学四十条》）。中共中央于1961年9月发布《高教六十条》，1963年3月发布《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并同时下达《关于试行条例的指示》。《指示》阐述了《条例》的主要内容，指出：提高教育质量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应该把这个问题摆在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三个《条例》都对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提出了规范性要求，在

[1]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059，1149．

总则中提出：使中、小学生身心得到正常的发展，具有健康的体质，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劳动习惯；使大学生具有健全的体魄。要求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统一规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进行教学；教育行政部门应该积极地有步骤地帮助学校改善校舍和教学、体育、卫生、生活等方面的设备等。

《条例》还在“体育卫生和生活管理”章节中明确指出：中小学阶段是学生身心发育成长的重要时期，必须加强体育卫生工作，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锻炼身体的习惯；要求坚持早操和课间操。体育课的要求应该适当。要开展课外的体育、文化娱乐等活动，以增进学生身心的健康，大学生要注意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要经常对学生进行卫生常识教育，使他们养成卫生习惯。努力改善环境卫生，加强疾病防治工作。有条件的学校还应建立定期检查体格的制度。要特别注意保护学生的视力。要指定女教师管理女生的生活，对女生进行妇女卫生常识教育。贯彻“劳逸结合”的精神，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使学生养成按时作息的习惯。学生个人的习惯和爱好，凡是不影响学习和健康的，不妨碍集体利益的，不要加以限制和干涉。保证学生睡眠时间；要加强安全教育。学校要定期进行安全检查，采取必要的措施，预防食物中毒、溺水和体育活动中的伤害事故等。

三个《条例》的颁发，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学校教育和体育卫生工作的重视与关怀，对学校体育工作的规范化与健康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

如山西省在1963年4月召开了重点中学体育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学校都要抓好每周的两节体育课，有步骤地贯彻新教材，建立健全学校体育成绩考核制度，提高教学质量。1964年，全省中小学重点推广长安县中学体育管理工作经验，即一查（查两课两操）、

[1] 李晋裕. 学校体育史.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42.

二比（比出勤早、比出勤全）、三落实（年级人数、运动量、班主任具体组织落实情况）和进行评比，摆正学校体育的位置。浙江省在1963年暑期，组织力量，按1961年国家颁布的体育教学大纲和教材，编订了《浙江省中学体育教学计划》之后，学校体育有了明显的改善。四川省在1964年初，省体委、省教育厅组成联合调查组赴温江、铜梁和江津三县，深入7所中小学，就学生健康及体育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部分学校不重视体育课，课时和内容不足，质量不高，课外活动时间被占，师资和场地缺乏，小学情况更为严重。在同年的省体工会上对以上情况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取得了成效。

（二）加强中、小学体育师资队伍建设

随着中、小学校体育的恢复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急需大量合格的体育师资。为了解决好这一问题，在1961年、1963年减少体育院校数量的同时，迅速恢复和建立了一批师范院校的体育系、科。同时，各地、市的师范学校也相应地办起中等师范体育班。1961年后，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的精神，各体育院校和系、科在认真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培养体育师资的任务。1963年11月，教育部、国家体委下发的《关于七所省属体育学院领导关系、培养目标等问题的通知》中，确定了沈阳、哈尔滨、天津、南京、广州、成都、西安7所省属体育学院的培养目标为中等学校体育教师，这在整个体育师资队伍建设上，基本上解决了骨干的问题，但从整个对体育师资需求的面上看，数量上的绝对差距仍很大，尤其县级以下的中、小学，体育师资力量更为薄弱。很多中、小学设有专职体育教师，可是兼职体育教师都未受过专业的训练。

为了加强中小学体育师资队伍的力量，各地除尽量保证体育师范院校毕业生分配到中小学任教外，把提高在职体育教师的业务水平作为了一项很重要的补救措施，以缓解体育师资严重不足的状

况。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根据《学校暂行工作条例》中“应该有计划地组织教师进修，建立和健全教师的进修制度，保证教师进修时间”的要求，对中、小学体育教师进行短期培训。教育行政部门立足于本地区的实际需求和体育教师的业务水平，挑选出一批专职教师作为短期培训班的师资，从复员军人和社会青年中挑选有一定文化基础和体育专长的人，通过短期培训后，充实到中小学，担任体育教师。

通过教师进修和短期培训班的办法，从数量上解决体育师资的同时，体育学院利用寒暑假培训骨干体育教师、研讨学习教学大纲规定的教材内容和要求；成立校际教研组、中心站，开展教研活动。然后通过辐射的方式，带动其他体育教师钻研业务。河北省教育厅、省体委在1963年组织重点中小学、部分完全中学和师范学校的体育教师举行了暑假业务培训。当年，全省全日制中学1232所，配备体育教师1089人，其中高中247人，初中842人。安徽省从1961年以后，为尽快提高体育教育质量，经常组织体育教师进修和进行集体备课。通过各省、市采取相应的措施，基本解决了体育教师在数量上的急需，也有效地提高了在职教师的业务水平，保证了体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学校体育工作的改进

1. 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

1963年以后，学校的体育工作恢复正常，尤其将群众体育活动的重点确定放在学校以后，在体育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努力和配合下，学校的体育运动有了比较广泛的开展，学生的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但从整个状况看，由于国民经济刚刚好转，学生的营养还跟不上去，三年困难时期造成青少年在体质上的欠账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恢复时间。从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服兵役或者继续升学的要求看，学生的体质还不符合要求。

"据 17 个省市高中毕业生升学考试者健康检查的统计看，身体不合格的占报考总人数的比重有所下降，1961 年是 3.1%，1962 年降为 2.56%，1963 年为 2.04%。又据陕西省在西安、咸阳市和三元、耀县 9 年中学的调查，学生患病率 1962 年为 20%，1963 年下降为 8%；因病休学、退学的学生 1962 年为 2.1%，1963 年下降为 1.1%。"[1]

学生的健康仍然不够好的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学生的身体发育，一般仍未恢复到 1959 年以前的水平。据北京市 1963 年对 9000 名中、小学生调查，7—18 岁男、女学生各个年龄的平均体重，都低于 1959 年，男生低 0.14 ~ 1.64 公斤，女生低 0.03 ~ 1.27 公斤。"广大农村中小学校的学生体重，由于生活改善的水平低于大城市，体重差距更大；学生患常见病的人较多，神经性头痛、失眠、头昏等现象比 1961 年有了发展。城市大部分学校，患近视眼的学生呈发展的趋势。以天津市为例，通过对 2 万多名中小学生视力检查，发现小学生近视"1961 年为 17.9%，1962 年为 19.8%，1963 年为 20.8%；初中学生 1961 年为 23.5%，1962 年为 25.1%，1963 年为 26.7%；高中生 1961 年为 28.5%，1962 年为 31.5%，1963 年为 33.8%。""1963 年山西省太原、大同两市 17 所学校 1000 名学生参加兵役体格检查，身体不合格的达 43.6%"。[2]

学生健康状况不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学生的体质恢复还有一个过程，而学生的伙食较差和营养不

---

[1] 教育部、体育运动委员会、卫生部. 关于中、小学生健康状况和改进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报告（1964 年 6 月）//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283.

[2] 教育部、体育运动委员会、卫生部. 关于中、小学生健康状况和改进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报告（1964 年 6 月）//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283，284.

足，是一个重要的因素；1963 年学校教学恢复正常后，学生因课程增多，作业多，考试多，学习负担过重，挤掉了应有的睡眠、休息和体育锻炼的时间，尤其是在营养跟不上的情况下，必然影响学生的身体健康；学校的体育课、课间操和必要的课外活动没有得到保证；学校卫生保健工作做得不好。这种状况，引起了中央及教育、体育、卫生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国务院 1964 年批转教育部、体育运动委员会、卫生部关于中、小学生健康状况和改进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报告中，指出了“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一般号召多，具体指导少，对体育、卫生工作有些学校只要不发生严重的疾病和伤害事故，就很少过问，完全依靠体育教师和卫生人员去做。”批评了有的学校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甚至提出“体育要为学习让路”的做法，同时批评了那种只重视少数学生运动员的训练和运动竞赛，强调争夺冠军，而忽视对一般学生的体育活动的指导，把少数运动员的比赛成绩，视为衡量学校整个体育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的错误做法。

1964 年 9 月 9 日，卫生部、教育部、文化部、建筑工程部、国家体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下发了关于试行《中小学校保护学生视力暂行办法（草案)》的联合通知，要求做好学生的视力保护工作保护学生健康。

1964 年，毛泽东就教育工作的“春节谈话”，“三一指示”和 1965 年的“七三指示”，都涉及到学校体育工作。因此，从 1964 年以后，学校的体育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进，出现了一个新的兴盛局面。

2. 学校工作的改进

(1) 上好体育课

要上好体育课，首先要使学校领导和教师明确学校体育的目的和任务。各级学校根据上级指示的精神，认真学习体育教材纲要，真正认识体育课不是为发展某几个方面的身体素质和几个项目的技

术而进行训练，而必须是为增强学生体质服务，既要着眼于掌握体育的基本知识、技能打基础，又要为培养学生对体育的兴趣、爱好、习惯打基础，不但要收到在校时期的效果，还要对学生有长远的积极影响。

各级各类学校，尤其中、小学在课程设置上，注意了确保每周两节体育课；在授课内容上，按照体育教材，从实际出发，进行选择，根据教材的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学生的接受能力、现有基础等特点，分清主次，突出重点难点，把最基本的内容教好、学好。为配合搞好体育教学改革，积极推广了一些学校的先进经验。如华东师大第一附属中学，组织体育教师反复学习中学体育教材纲要，弄清各年级教材要求与课时任务，由低到高，由简到繁，明确列出，使体育教学规范化，改变了过去体育教学随意性很大、没有系统和阶段性目标的状况，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各地中、小学参照典型经验，从学生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情况出发，根据学生的年龄、性别及体质状况，适当地照顾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制订教学计划，按程序授课。基本纠正了要求过高过急强求一律的弊端。

(2) 认真坚持做好两操

根据中央8部委的联合通知，各级学校认真学习了新公布的第4套广播体操，专门排出课间时间，让学生做广播操（中小学加做眼保健操），这种制度一直沿用至今，这对于调节学习生活，增进学生健康，起到了很大作用。

(3) 广泛开展课外活动

各级学校根据主管部门的要求，在上好体育课的同时，积极组织开展学生的课外活动。中、小学课外活动由过去利用课余时间改为正式排入课表，每周两次，每次1节课的时间，活动的内容因地制宜，多种多样。大专院校的课外活动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发进行，公共体育教学组（室）负责指导、组织和提供器材，中小学主要依靠班主任、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班干部和体育积极分子促进开展班际体育活动。

1964年，国家体委提倡大力开展游泳、射击、爬山、通讯4项活动的通知发出后，得到了各级各类学校的积极响应，组织学生游泳、爬山等活动形成热潮，很多学生学会了游泳。

1963年以后，由于中国乒乓球队在国际大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的影响，全国掀起了乒乓球热，学生打乒乓球成风。单是中、小学参加乒乓球活动的学生就数以千万计。1964年6月1日，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国家体委《关于在男少年中开展小足球活动的联合通知》下发后，很多有条件的中、小学开展了小足球活动。

在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基础上，各级各类学校根据具体条件，在学生自愿的原则下，组成了班、年级、校级业余运动队，由体育教师指导，在课外活动和课余时间进行训练。各地中、小学组成的乒乓球、小篮球、小足球代表队活动非常频繁，经常组织班、年级和校际比赛。大专院校在春季、秋季组织的校运动会以及单项系级比赛，逐渐形成了定制。业余运动队的组建与比赛，满足了体育积极分子的需要，提高了部分学生的技术水平，推动了学校群众活动的开展，同时也活跃了学校的气氛。

(4) 试行体育锻炼标准

1964年，部分有条件的学校和单位，试点性推行了《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逐步取代了“劳卫制”达标制度。《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的实施，使对我国青少年体质和体能的测定有了指标依据。各级学校根据《标准》指导学生进行锻炼，使体育教学得到加强，也促进了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

(5) 大专院校课外活动内容和强度的调节

高等学校的体育课和广播操比中、小学恢复要早。1963年以后，课外活动的恢复和发展较快，校内班、年级、系建立各种项目的代表队，组织比赛活动比较频繁。高校体育课外活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为适应备战的要求，组织了不少爬山、军事野营、军训等活动。在学习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热潮中，很多学校组织了不太适宜的大运动量锻炼和较长时间的野外活动，在当

时学习负担重、社会活动多的情况下，增加了学生的压力，有的高校组织的运动队，模仿日本女排大松教练员的大运动量训练，造成损伤[1]。1965年，毛泽东“七三”指示传达后，各高校进行了认真的对照检查，加强了体育课教学，调整了课外活动的内容，使高校整个体育工作进入到正常的发展状态。

二、体育专业教育的恢复与发展

体育专业教育经过调整，很快得到了恢复，规范了教学、明确了教学目的和培养目标，在规模上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一）明确体育专业培养目标

1963年5月20—30日，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学院工作座谈会。会上讨论了办学思想，明确了体育系的培养目标，并草拟了体育系4年制本科教学计划（草案）。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了体育学院自开办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对办学指导思想、教学计划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研究。指出了自1958年以来，由于培养目标不明确，又因“以全运会为纲”“向世界纪录进军”和“四红”等社会影响，强调学生单项技术和运动成绩的提高，忽视了基本技能、基本知识的教育，使学生“专得过窄”，采取了按运动项目分系的教育组织体系，在教学计划中技术课程学时分配偏重于一个单项，如田径系的学生，4年学习田径课1468学时，其中用于提高单项百米跑技术的占880余学时，有的学校用于单项教学时数达70%。使用一个教学计划培养不同的体育专业人才，混淆了培养教师和运动员的界限，特别是不切实际地要求本科毕业生达到一级运动员的水平，有的学校对“一专多能”理解把握得不好，又提出了“教师、教练员、运动员要统一”的口号。不适应中

[1] 国家体委档案. 1965年全国群体工作会议简报：第3期.

学体育教学的需要，社会反映很强烈。

会议通过讨论研究，确定培养中等学校体育教师是体育院、系共同的、主要的任务。对于培养其他体育人才，如专项教师、教练员和研究生，则应根据国家需要和学校条件进行安排。明确了对中等学校体育教师的规格要求：必须全面地、扎实地学好并掌握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使学生能够适应中等学校教学和开展群体活动、业余训练的需要；修订了1960年前的本科教学计划。

1963年8月，教育部颁发了《体育专业教学计划（草案）》，规定体育专业的基本任务是培养中等学校体育教师。《计划》规定的必修课程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概论、中共党史、思想政治教育报告、外国语、心理学、教育学、人体解剖学、人体生理学、体育理论、运动保健、田径、体操、球类、技术专修（田径、体操、球类选一门）、武术、举重（男）、艺术体操（女）、游泳、滑冰；选修课程有中国语文、哲学、政治经济学、音乐和舞蹈、生物力学、体育史、学校卫生、体育统计与测验、运动心理学等。这个计划总学时是2659～2715。专业技术课是1470，约占54%；基础理论课是1123，约占42%；选修课是66～122，约占4%。这个教学计划对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体育师资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二）专业体育教学改革与社教运动

1963年11月，教育部、国家体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高等学校专业调整会议的报告》中有关体育学院的任务及领导关系的意见，下发了《关于七所省属体育学院领导关系、培养目标等问题的通知》，确定了“全国需要的教练员等由国家体委直接主管的北京、上海、武汉3所体育学院来培养。沈阳、哈尔滨、天津、南京、广州、成都、西安7所省属体育学院本科的培养目标规定为中等学校体育教师，不培养其他体育人才”。“学校只设体育专业，不设各运动专业。这7所体育学院今后应认

真贯彻执行高等师范学校的有关规定，并按照高师体育专业教学计划安排教学工作。”体育学院的领导关系随任务的改变而作相应的调整，“由有关高教（教育）厅（局）直接管理。”这次调整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和指导作用。

根据座谈会和专业调整会议的精神，全国各体育学院和体育系、科，在认真传达的基础上进行了对照检查。西安体院把会议精神的传达与“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教学为主、思想第一，面向中学，采取措施，提高质量，培养合格的体育教师”的努力方向。在教学工作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是抓稳定教学计划，改变以往教学计划每年不稳定的状况；明确各门课程的基本要求，精选教材内容；成立运动部、培养学生运动训练、竞赛组织与裁判能力；组织培养领操与队列队形训练能力；提高教练室（组）领导水平，加强教练室（组）工作；研究教学大纲；认真备课；教学工作的基本操作规程与要求；教师的进修和培养方法；组成以教学副院长为首，教务长参加的工作组，轮流到各班蹲点听课；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教学管理制度，选择中学、组织老中青教师蹲点，提出各门课程面向中学生的改进方案，编写中学体育教学法参改书，提高教学质量。1963 年下半年，由于学生注意了全面学习，各门课程成绩普遍上升。1964 年院党委提出，在教学改革中，以四大改革（学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考查制度）为重点来促进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提高。

北京体院随着培养目标的调整，全院的重点工作由专项训练和提高运动成绩转到了教学方面，教学质量受到了相当的重视。其他各学院也根据教学目标调整了教学计划，重新规定了各门课程的总时数；对专修课中教学与训练的时间也作了调整，训练时间减少。在处理教学、训练、比赛的关系上，明确了以教学为主，各级教学管理组织加强了对基础理论课及普修技术课教学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检查督促。各系成立了普修教研组，同时，为提高毕业生对社会需

要的适应能力，加强了“三基本”（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基本技能）的教学，以及对学生“六会”（会讲解、会示范、会组织教学、会分析技术和纠正错误、会保护帮助、会组织竞赛和担任裁判）的要求。

同时，各体院根据贺龙副总理“关于学习解放军过硬本领”的指示，加强了教学和训练的强度，结合学习解放军郭兴福教学法和国家体委提出的“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在教学和训练中加大了运动负荷。其中大运动量负荷的科学性不足、盲目蛮干的现象时有发生，也曾出现有的学生因过量负荷致小便带血的事例。1964 年，毛主席的“春节指示”和“三一”指示，特别是 1965 年“七三”指示传达后，体育院系有针对性地再度兴起教学改革热。这一时期主要的教改内容是：① 教材方面——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根据培养的目标，按照“三基本”的要求，突出基本内容比重，减少整个教材分量。② 教学方法方面——以思想带技术，思想教育贯彻始终；运用启发式教学法，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教学的直观性，大量运用直观教具。③ 考试方法方面——理论课采取开卷、闭卷和口试相结合的方式；技术课考试方法改革较大，采取分组个人答题与演示相结合。④ 课程组织形式方面——精简技术课的准备动作部分，把“三部分“（准备部分、基本部分、结束部分）形成统一整体。⑤ 加强课后技术辅导。由于突出了以教学为中心，学生的成绩有了普遍的提高。

从 1963 年至 1965 年，继续执行调整方针，使学校专业体育教育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的主流。但同时由于政治运动逐渐增多，对正在改进和完善的教学秩序又带来不少干扰和冲击。

1962 年 9 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全会公报在各体育院系传达贯彻后，开始在教职工和学生中开展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育。1963 年 2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接着又发出了在城市中开

展“五反运动”的指示。以“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五反”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城市逐步展开。

同年5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进一步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其后的一年中，全国各院校和体育系根据国家体委、教育部和地方党委的布置，开展了“五反运动”，举办了阶级教育展览、忆苦思甜报告会等活动。这些运动对教职工在提高阶级觉悟上有积极作用，使铺张浪费、损公利己、官僚作风等不良现象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克服。从1964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以后，体院师生分期分批停课参加农村的“社教”运动和“四清”运动。以北京体院为例，1964年至1965年共派出三批师生参加了“四清”运动。

各体育院、系还开展了学大庆、学解放军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的重要社论，贺龙副总理向体育战线提出了“学习解放军过硬本领”的要求，各体育院、系根据社论精神和贺龙副总理的号召，结合当年的“社教”运动，提倡和要求大学毛主席著作，兴无灭资、人人思想革命化，组织师生到部队观看军事表演；分批到部队参加野营活动。1965年，根据国家体委的要求，体院再次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认真学习了其中指定的10篇文章，开展评比“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举办展览和介绍经验等活动接连不断。在当时，对于强化政治思想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这种一呼百应的效果，使一些形而上学、形式主义的东西随着“左”的思潮泛滥，不可避免地对正常的教学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三）业余体校的发展与质量的提高

业余体校是各地培养优秀运动员后备力量的重要基地，也是校

外教育阵地。通过三年的调整，随着国民经济和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业余体校的规模和数量在 1963 年的基础上有了发展。全国省、市、自治区及地（市）级体委，绝大多数都根据专项优势特点，举办或扩大了业余体校。1964 年以后，业余体校采取了尽可能就近招生的办法，对运动设施较好的学校，采取由业余体校教练到学校去进行训练的办法，便利和加强了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业余体校每周训练 3 次左右（包括星期日），业余体校的学生，可以不再参加校内的课外活动，这样，保证了学生的学习时间，控制了运动强度。从 1958 年一哄而起的“跃进”，经过几年的调整，业余体校至此走入了规范化的轨道，这对于提高业余训练的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1963 年，群众体育工作以学校为重点，学校群众活动的蓬勃开展为业余体校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964 年，全国体工会议上决定要抓好业余训练。“要充分运用各种业余训练形式进行训练，尤其要办好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为优秀运动员队伍培养后备力量”[1]。1965 年，根据整个体育发展的形势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确定采取多种业余训练形式，大力抓好业余训练工作，“广泛建立基层的运动队、代表队、训练点等等，办好重点青少年业余体校、中心青少年业余体校。”1965 年 6 月召开的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了“各地都应集中力量办好重点青少年业余体校，一定要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一些优秀运动员，向专业队输送。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可以建一所半天读书、半天训练的中心青少年业余体校，作为专业队的预备队”，形成了一个从普及性体育活动、业余体校、重点业余体校、中心青少年业余体校到专业队，有广泛的普及面、层层衔接的业余训练的人才培养网络和体系。

[1] 国家体委党组关于 1964 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报告//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97.

为解决业余体校学员增加、规模扩大后教练员紧缺的问题，1965年，采取了依靠学校办青少年业余体校，按项目或年级组成班（队），自己负责教育，一般专业体校的训练工作主要由学校自己的教练员负责的办法。青少年业余体校的教练员，主要用于给学校教练员作指导，对少数尖子运动员进行重点辅导。省、市单项运动协会和单项教练员组织，组织基层业余学校的教练员进行提高性学习，高水平运动队的教练员给以训练工作上的指导。

为了加强对青少年业余体校的领导，配备了“政治强、思想作风好”的专职干部，主要对业余体校的教练员、工作人员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1963年以后，受大讲“阶级斗争”政治气候的影响，在使用教练员和招收重点业余体校学员中，因突出“阶级路线”重视家庭出身，使一部分教练员的积极性受到挫伤，未能充分地施展才能，一些体育基础较好的青少年因家庭出身的原因未能得到训练的机会。1965年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应当贯彻阶级路线和政治业务兼顾的原则，严格政治审查”，但又应“着重看表现，不要唯成分论”[1]，实际在具体执行中，由于各个业余体校领导的政策水平不同，在把握尺度上有很大差别。1965年以后，党内“左”的错误思潮影响逐渐增大，给业余训练在用人和选材上造成了一定的干扰和损失。

1964年9月14日，国家体委颁发了《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试行工作条例（草案）》，共8章37条。《条例（草案）》是积累了我国自兴办业余体育学校以来的经验，在正确确定了业余体校的培养目标和任务的前提下，充分体现了专业性教育特色，形成了一整套管理、教学、训练系统。这标志着我国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教育的科学化、规范化和体系化的初步形成。

---

[1] 1965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101.

（四）培养体育专业研究生

我国体育院系独立培养研究生，始于1960年。在这以前，主要是苏联专家在北京和上海体院为我国培养了一批研究生。1959年北京体院招收的研究生，由于召开第1届全运会的缘故，推迟到1960年2月入学。首批研究生招收了田径、体操、篮球、排球、生理、解剖和体育理论7个专业。1959年至1960年，北京体院共招收了93名研究生。由于当时的北京体院还不具有导师力量，课程设置不合理，导师管理工作薄弱，加之入学标准低、外语水平不适应研究工作的需要，直接影响了研究生的质量。

1961年，北京体院根据“八字方针”和《高教60条》，制定了《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对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培养方法等主要问题作了规定，使研究生的培养开始步入正轨。

1963年1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研究生工作会议，明确了培养研究生工作的重要性。对研究生培养目标、培养原则和方法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取得了统一的认识。根据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了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这些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了我国体育界各个方面的骨干力量，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四节　群众体育的恢复与蓬勃开展

随着中央“八字方针”的贯彻和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在1962年召开的全国体工会议上，确定了从1963年起加强群体工作，以学校为工作重点，兼顾厂矿、企业、机关以及农村，以点带面，逐步恢复。至1966年，学校、职工、农村群体活动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并逐渐形成热潮，国防体育活动得到加强，部队的体育活动配合大练兵呈现出轰轰烈烈的状况。

一、群众体育工作的恢复

1962年至1963年根据全国体工会议的精神和确定的工作重点，群众体育从点到面，逐渐得到了恢复，为群体活动高潮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以学校为主体的群众体育活动的恢复

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群众体育的问题，自然地提到了国家体委的议事日程上。1962年12月5—12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分析了自1961年贯彻中央“八字方针”、群众体育工作调整以来的状况，认为1963年要加强对群众体育工作的领导，并确定在1963年从国家体委起，各级体委都要抓群众体育工作，使群众体育运动积极切实地开展起来，根据生产（工作，学习）的需要与客观可能，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坚持业余、自愿、开展类型多样的活动。在这次会议上经过讨论，选定先将群众体育的工作重点放在学校，同时兼顾厂矿、企业、机关以及农村体育，采取由点到面、逐步恢复、扩散性发展的方法。确定了在厂矿和机关中，配合工会和基层体协开展职工群体活动，以城镇为重点逐步恢复农村群众体育活动的方针。

把群众体育工作恢复开展的重点放在学校，主要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第一，1962年，我国的经济状况只是有所好转，群众整体生活还处于艰难的困境之中。1963年，只可能有所改善。而整个社会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是学校，从家庭乃至社会，都很重视青少年儿童的健康，学生的物质生活条件相对比一般职工和农民要好。第二，入学的儿童、少年、青年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是群众体育工作对象的多数。他们的身体健康，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国防后备力量后继者的培养。第三，学生在学校掌握体育知识、技能，养成锻炼习惯，实际是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了大批体育

骨干，可以推动社会群众体育活动。第四，学校有许多有利条件：体育课、早操、课间操、课外活动时间，有体育教师指导，有场地、器材和经费。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确定的重点是实事求是、有依据和符合客观条件的，因而效果很好。

根据国家体委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精神，各级体委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加强了对群众体育工作的领导，工作中贯彻了以学校作为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的重点，体委牵头与教育、工会、共青团等有关部门在工作中互相配合。首先是体委的群众体育工作有专人负责，领导和工作人员落实，很多学校由校领导专人主管体育。如陕西省，学校大都由校长、教导主任分管体育。1963 年，全国大中城市和城镇的大部分大、中学校，把体育工作列入了教育计划，体育课由一节改为两节。课外活动列入课程表，每周一到两次。有的学校达到每周 3 次。菜地基本还原场地，并且作了修整扩建。全国有一批学校在恢复群体活动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山西的长治一中、沈阳二十七中、上海华东师大附中、无锡二中、成都市奎星楼街小学、长沙八中等等，其中长沙八中要求除了上好体育课，坚持早操、课间操活动外，每班每周安排两次课外活动，并规定由班委会具体组织，班主任经常进行检查，校行政还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学生作业负担。保证了大多数学生每天都有 1 个小时左右的体育活动时间。全校自愿组织起来的运动队有 60 多个，600 多人参加，占学生总人数的 43%[1]。

1963 年，在召开全国少年田径运动会的推动下，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浙江、陕西、黑龙江、山西、河北、辽宁等许多省市先后举行了全省、市的中学生运动会，有的省召开重点省辖市和县级的学生运动会，如武汉市有 90 多所中学，其中 70 多所开了运动会。

在群众体育运动进一步开展、运动竞赛较为活跃的推动下，学

[1] 国家体委档案：李达副主任在 1963 年全国群众工作座谈会的讲话.

校业余运动队也有了发展。根据对成都市当时90所中等以上学校统计，1961年有340多个校代表队、班级队2500多个，1963年校代表队增加到510个，班级队达到4000多个[1]。

在学校恢复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开展起来的前提下，部分学校开始试行“体育锻炼标准”。有的学校试行自己订立的项目标准，青岛、广州、唐山等市试行全市学生的体育锻炼标准。有个别学校又开始推行劳卫制。

1963年5月20—30日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了15省、市、自治区群众体育工作座谈会。会议根据各地深入学校进行调查研究后送交的材料，认为虽然由于国家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生活有所改善，学生的健康状况好于前两年，但总的来看，体质仍然较差，学生中近视眼的比例逐年升高，脊柱弯曲的现象也很严重。有些学生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而退学或休学，学生应征入伍也受到影响[2]，如辽宁本溪市，1962年接受兵役检查的学生中，因身体健康状况不良而不合格的占总数的69.3%。学生体质差，与营养不良和卫生有关，但与缺乏必要的锻炼也有很大关系。因此，在1963年生活条件有所改善的前提条件下，加强宣传和领导，在学生自愿的原则下开展学校的群体工作是完全可能的。会议认为确定学校作为群众体育工作的重点是正确的。

会议以后，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都加强了宣传教育，启发学生积极自觉地参加课外体育活动，同时，学校也尽可能地保证学生进行锻炼的时间和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开展了多种多样形式和内容的课外活动。学校根据学生的体质状况，区别对待，对少数体弱和有慢性病的学生，配合医疗，开展了一些保健性的体育活动。一些有体育基础，有场地、设备，有技术指导，或原来的传统项目学校，在体委的重点协助下组建和恢复了运动队。大多数学校恢复了一年

[1] 国家体委档案：李达副主任在1963年全国群众工作座谈会的讲话.

[2] 国家体委档案：李达副主任在1963年全国群众工作座谈会的讲话.

或一个学期开一次全校性运动会的传统。小学课外体育活动的各种形式也得到了恢复。

（二）城市职工、农民体育活动的逐步开展

1963 年，全国厂矿、企业、机关的群众体育活动在 1962 年的基础上有了发展，活动的普及面很快扩大。根据对天津市 51 个工厂、企业的调查，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职工占总人数的 15%左右，少数单位达到 30%～40%。有的物质待遇较好的国家重点厂矿，小型竞赛活动相当活跃。如西安市秦川机械厂，从 1962 年至 1963 年，举行车间、科室、工段小组、厂际间的各种竞赛达 2000 多场次。山东省在 1963 年国民经济形势好转后，各厂矿企业依照国家提倡的业余、自愿、小型、多样、因人因地制宜等原则，逐渐恢复了广播操、工间操，开展了小型多样的体育活动及医疗体育。省运动队在调整中，部分运动员下矿、下厂参加劳动，促进了职工体育活动的恢复开展。1963 年，全省厂矿企业有各种运动队 3571 个，参加的人数达 12 万余人。

1963 年 5 月的全国群体工作座谈会后，全国大中型厂矿和企事业单位、机关在党委的领导下，配合工会组织加强了对职工体育的领导，同时还健全、完善了体育协会以及其他体育组织，群众体育团体和协会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各厂矿企业、机关单位，在 1963 年开始结合民兵训练组织开展的体育活动，吸引了广大职工参加锻炼，并继续推广广播操和生产操，组织老年职工和病弱者开展保健性体育活动。

1963 年，职工单项和多个项目的运动会，在单位和系统内逐渐形成制度。利用节假日组织开展的体育活动，举办的运动竞赛，促进了职工群体活动的普及和发展。

在广大农村，通过以城镇为重点，以一些生产和生活条件较好的社、队带动扩展，使民兵训练和群众体育活动结合起来，并根据群众的生活情况，开展了群众所喜爱的、简单易行的体育项目和民

间传统体育活动，还利用农闲时节和庙会、节令日开展了一些小型比赛。农村体育活动在沉寂了三年之后得以恢复，大大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使农村显得有朝气和生气。有些地区农村体育活动面相当普及。如山西稷山县174个生产大队中，有162个大队开展了体育活动，经常参加活动的达3万多人。山东省在农村经济好转后，年节日、庙会的体育活动开展得很活跃。烟台专区多数公社的生产队建有篮球队，其中黄县北马公社52个生产队有43个篮球队；泰安专区章丘县的6个公社有150多个篮球队。有些地方结合民兵训练，在体育活动中增加了射击、投弹、刺杀等项目的比赛。利用“八一”建军节召开民兵运动会，在春节期间组织社、队间体育比赛，不仅推动了农村体育活动的普及，而且也减少和避免了一些农村青年在闲暇和年节期间因文化生活单调无味而参与一些不良活动。

在生产和生活好转比较明显，过去体育基础较好的社、队，1963年体育活动比1962年有了明显的发展。如黑龙江绥化县津汉公社，1962年有9个篮球队，1963年增加到26个；阿城县南红大队,1962年只开展篮球活动，1963年开展了18个运动项目。山西万荣县16个公社中，大部分都组织了多个项目的运动队，65%的村开展了小型比赛。

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已经开始，随着“阶级斗争”这根弦逐渐绷紧，把农村一些民间艺术活动说成是“阶级斗争在农村的一种表现”。为占领农村青年业余阵地，很多公社、团委配备了专职军体委员抓民兵训练，抓体育活动，这对农村青年积极投入体育活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二、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

1964年，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城乡人民群众在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的情况下，对参加体育活动由消极转变

为积极地要求。省、市、专、县各级体委根据1964年全国体工会议的要求，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把主要精力用于开展群众活动，加强业余训练。体委在各级工会、共青团、教育、卫生部门的积极协作和配合下，充分发挥了群众体育组织和群众中体育积极分子的作用。在“迎接第2届全运会召开”的口号鼓舞下，群众体育工作从以学校为重点，扩展至城市职工和广大农村的农民中。

按照1964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的要求，开展群体活动“必须从目前的生产、生活水平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要求过高过急”。各级体委在有关职能部门的配合下，认真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体育运动”的指示，改变了“大跃进”式订高指标、搞形式主义、浮夸数量的作风，讲求尊重实际，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因地因人制宜，使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逐渐增多，达到了增强体质，更好地生产、工作和学习的目的。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群众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又一次群体活动的高潮。

（一）城市职工体育活动热潮的形成

1964年1月15—30日，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期间，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职工体育座谈会，确定了在新的形势下，将职工体育活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以增强职工体质，促进工作和生产，并对职工体育的组织领导，体育活动的形式、内容及必要的物质条件保证等方面的问题作了政策性的规定，要求各级厂矿、企事业单位工会应积极配合体委，切实把职工体育活动开展起来。

6月11日，胡耀邦在共青团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把开展各种内容健康、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列为满足青年业余生活中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培养青年高尚的革命情操的一个方面。并在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团章中，要求团员

"努力锻炼身体"，要求基层团组织"开展体育和文化娱乐活动"。在 60 年代，团组织在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通过共青团组织的带动，对职工队伍开展体育活动，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64 年 12 月 11 日，国家体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根据冬季群众体育活动的特点，又联合发出了《关于组织越野赛跑和环城赛跑的通知》。因此，1964 年，城市职工群众体育活动在各个方面的组织和推动下，很快蓬勃开展而形成热潮。在全国大力提倡游泳、射击、通讯、登山 4 项活动中，各省、市职工以 4 项活动为中心，结合民兵训练，经常性地组织规模不同的活动。以山东为例，1964 年，济南举办了"登山月"活动，仅 11 月，参加登山活动的单位就达 332 个，共 7.5 万余人。12 月，济南市举行了"迎接 1965 年火炬接力泉城赛跑"，有 92 个单位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近 20 万群众观看了比赛。

在职工群众体育蓬勃开展的热潮中，国家体委及时抓宣传、树典型，引导职工体育工作的开展。湖南省衡阳市有 60%的职工参加做广播体操，全市基层职工运动队和锻炼小组由 1962 年的 69 个 600 余人，发展到 1963 年的 539 个 12360 人，占全市职工总数的 32%。1964 年 6 月，省体委在衡阳市召开城市体育工作现场会，国家体委转发了衡阳市《面向基层做好体育工作》的经验。次年 6 月在国家体委召开的全国群体工作会议上，衡阳市又介绍了群体工作经验。江西、湖北、广东、广西四省区的 25 个市县和武汉市的 8 个区的体委干部专程到衡阳参观学习。1964 年 8 月，国家体委转发了衡阳市体委《面向基层，做好体育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学习衡阳的经验。

1964 年，还根据全国体工会议的精神，在 30 万人以上的城市和重点县，根据需要，结合民间的传统体育，有选择地分别组织开展了一些活动，使这些城市和重点县，成为固定的群体活动项目的基地。

1965 年，在"迎接第 2 届全国运动会召开"的号召和带动下，

城市职工体育活动形成了热潮。以徒手操为内容的早操、课间操、工间操、劳动前后操、生产操、保健操等在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得到切实的推行，并形成了制度。丰富多彩的小型比赛活动广泛地开展起来，各级厂矿、机关都组织了各种代表队，经常性地开展单位间的比赛，极大地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国家体委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要求开展以游泳为中心的群体活动。全国靠近江河湖海和水库的城市职工，为达到"全国3亿人会游泳的目标"都积极响应号召，学习游泳。尤其青年职工结合民兵训练，进行了长距离的武装泅渡。

1964年和1965年，还组织开展了群体活动的评比工作，达到了总结经验、树立典型、推动和促进职工群体活动的目的。

1965年，为了解决好群体工作如何突出政治，进一步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对体育工作的指示，6月28日—7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来自全国各省、市体委主任、副主任，地、县体委主任、副主任，省、市体委处科级干部，有关部门及产业体协代表共146人参加了会议，贺龙副总理到会讲话。

会议先由衡阳、天津市体委和火车头体育协会介绍了他们贯彻执行党的体育工作方针、任务和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经验。由于衡阳、天津市体委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上处理得较好，体委领导工作方法和作风好，能深入基层蹲点，调查研究，勇于实践和创新，在了解职工生活、摸清生产生活规律的基础上，指导职工开展体育活动，所以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这次会议针对一些省市体委领导对群众体育工作重视不够、组织领导不力、措施不切实际和脱离生产、生活等问题，提出了要求。解决了突出政治不仅是加强思想教育，搞风格奖，而是落实到抓群众体育的具体工作中去的认识问题。

全国群众工作会议后，各级体委学习衡阳的经验，深入基层积极开展工作，使职工群体活动开展得更加广泛普及，形成了1965年至1966年初职工群体活动热潮中的高峰。

（二）农村体育活动的重新兴盛

1958—1960年，在农村曾出现了盲目强调体育工作、脱离实际的“高指标”现象。经过所谓“百日奋战”等“大跃进”，农村体协，青少年业余体校，篮球、排球及各种运动队，以及武术组织等一哄而起。从1960年至1963年夏，全国农村因生活困难的原因，除极少数体育活动确有基础、生活条件相对较好，或获体育红旗单位的个别生产队的群众体育活动没有间断外，绝大多数地方的体育活动完全停止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1958年开始的体育“大跃进”，对农村群众体育活动从舆论上、组织上、技术上起到了打基础和铺垫作用。声势浩大的“形式”给农村体育工作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和损失，但同时对于过去对体育活动了解不多，甚至一无所知的广大农民来讲，毕竟有启发和宣传的积极作用。1962年下半年，在全国农村部分社队，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生活有一定的改善后，在进行民兵训练的同时，开始出现了一些体育活动。1963年，全国有一部分农村在生产和生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始恢复体育活动。在1963年下发的《1962年全国体育工作纪要》中提出，根据我国经济恢复和群众生活水平的实际情况，决定在1963年把群众体育工作的重点放在学校，同时兼顾职工和农民体育活动；确定农村体育活动以城镇为重点，在方式上根据生产和生活情况适当开展，利用农闲和节日、庙会开展一些小型比赛，以点带面，逐步扩大范围，恢复农村群众体育活动。

尽管由于“左”倾错误思想和政策的影响，从1963年以来大抓“阶级斗争”，搞“社教”和“四清”等运动，使从1961年以来调整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经济更大发展、迅速恢复和较大幅度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一系列政策受到了影响和遏制，但从全国的整个状况看，由于农业的丰收，粮食产量的提高，政策的相对宽松，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比三年困难时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一些解决了温饱的农民，有了开展体育活动的需求。1963年以后，在“备战”的

气氛中，农村民兵训练普遍开展起来，这对于开展体育活动，从组织、领导、形式、内容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保证作用。1964 年以后，大批的知识青年和回乡青年下到农村，这批在学校受过体育教育、有一定的体育基础的青年，成为了开展体育活动的骨干力量，带动了农村广大青年的体育活动。

1964 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在认真分析和讨论了全国群体工作开展的条件和状况后，确立了在继续巩固和发展学校群体工作的同时，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开展工矿企业、机关单位和农村的群体活动，把 1963 年确定的农村群体活动的以城镇为重点逐步扩大到整个农村的社队，并实事求是地提出不能再犯“大跃进”的错误，必须从“目前的生产、生活水平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要求过高过急”。

1964 年，确定在农村广泛开展群众体育工作，主要出于以下 3 个条件和要求：第一，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开展体育活动有了最基本的物质保障。第二，由于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体育活动可以为培养强壮的劳动力起到很大作用；同时，农村又是国防建设兵源的主要基地。从 1962 年以后加强备战，准备打一场歼灭入侵之敌的人民战争的需要，无论从农村青年的体质与国防建设的需要，还是加强民兵训练的角度看，体育活动都有重要和积极的作用。第三，从 1963 年开始在农村搞“社教”“四清”运动，由于“左”的错误思想指导，将农村世代沿传的一些节令民俗活动视为封建糟粕加以禁止，由于“占领农村文化活动阵地，抵制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在文化方面的影响”[1]的需要，必须大力提倡开展农村群众活动。

从 1964 年开始，全国整个群众体育工作由恢复而重新兴盛起来。在 1964 年国家体委号召开展的游泳、通讯、射击、登山等 4 项活动中，农村中结合民兵训练，在很大范围内组织了游泳、登山

[1] 国家体委档案：1965 年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纪要.

活动。广大农村以球类，尤其篮球和地方性体育项目的开展最为热烈。山东省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体育活动基本停止”，“随着农村经济的好转，农村体育活动逐步恢复，特别是年节日、庙会的体育活动比较活跃[1]。”

很多地方体委为了扩大影响，促进农村群体活动的广泛开展，组织了一些专项和多项体育比赛。如陕西省宝鸡市“1964 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人民群众的生活不断改善，返乡知识青年的增多，农村体育活动又恢复和开展起来。为了促进篮球在农村更广泛地开展，进一步活跃农民的文化体育生活，宝鸡市体委于 2 月 24 日至 28 日（春节期间）在市体育场举办了全市农民篮球锦标赛[2]。”

1965 年，随着农村生产形势的进一步好转，群体活动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年 6 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开展群众体育工作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作用，要求“省体委群众工作的重点，应逐步向农村转移，加强对农村体育工作的指导；市体委在搞好城市群体工作的同时，也应加强农村体育的指导”。“应尽快把专、县体委机构恢复和健全起来，暂不能恢复的，应设专人负责，可与人民武装部门或文教部门合署办公。专、县体委的工作，应面向农村，兼顾县城和集镇[3]。”应把握好“农村经济政治形势很好，每年有大批知识青年回乡参加劳动的时机”，“只要切实加强领导，认真做些工作，农村群众体育活动是可以迅速开展起来的。”[4]

与会代表在关于群体工作的重心是否向农村转移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代表认为，农村生产形势好转，知识青年大量

---

❶ 山东地方史编纂委员会. 山东省志·体育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❷ 国家体委档案：1965 年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纪要.

❸ 国家体委档案：1965 年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纪要.

❹ 国家体委档案：1965 年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纪要.

增加，开展体育活动有了物质条件和骨干力量，是抓农村体育的时候了（当时，华北局已经指示要在农村中开展文化体育活动），因此，群众体育工作的重心应该向农村转移，城市抓职工体育、学校体育已经有了经验，省、专、县体委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农村。河北、山西、内蒙古的体委领导和与会人员基本持这种看法。北京等一些省市与会人员则认为，农村体育的重要程度应在认真调查之后再作结论。天津和太原的与会人员则认为，目前不宜提以城市或农村为重点，应一手抓城市，一手抓农村❶。

全国群体工作会议以后，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村群体工作和活动的状况，国家体委群体司加强了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总结开展农村群体活动的经验，派人配合河北省体委深入到抚宁县渤海公社官庄大队蹲点；司长亲自带工作组参加了湖南省在东安、桑植两县召开的农村体育工作座谈会，并对五五大队和洪家关大队两个先进典型进行了调查研究。同时还分派了一部分人到江苏、浙江、吉林、河北等省了解农村体育工作。根据调查研究，“认识到各行各业都下乡，体育也要面向农村或以农村为重点的想法和认识，是脱离农村实际的”。群体司根据调查研究，写成报告呈交国家体委党委，为农村群众体育的开展提供了确实的依据。在当时全国很多行业都在提出把工作重点放到面向农村的氛围中，体委能实事求是，没有盲目地追赶潮流，显示了把握全局工作特点和进行正确决策与导向的水平。

1965 年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后，省、市、专、县各级体委加强了对农村群体工作的领导，群众体育机构和组织得到了充实和健全，并明确了主要负责干部分管这项工作，市、专、县体委把开展群体工作作为重点。体委协同人武部门、文教部门和共青团组织，通过民兵开展日常活动，体委、文化馆、文化站组织一些竞赛活动。继续坚持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因地制宜、因陋就

❶ 国家体委档案：1965 年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简报：第 2期，国家体委群体司整理.

简、由点到面、由一项到多项，逐步开展的方式和方法。在运动的项目上，一方面加强了引导，有重点地提倡开展一些项目和民族民间传统项目；另一方面根据农民群众的爱好，不单打一地只开展某一种活动。农村体育活动所需的经费，基本上通过民兵组织参加劳动来解决，公社、区镇、县级组织的年节活动或竞赛，由当地政府和体委拨给少量经费。

从 1965 年开始，农村群体工作还特别注重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对武术和民间体育也进行了积极的研究整理。

总的看来，从 1963 年到 1965 年，群众体育活动在恢复而逐渐兴盛的过程中，基本上注重了结合群众实际和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原则。但从 1958 年以来，宁“左勿右”的思想在相当一部分人中仍有很深的影响，当条件和时机允许时，喜欢以“轰轰烈烈”的运动场面来显示工作成绩。因此，在 1964 年至 1966 年的整个群体工作中，一些地区追求形式主义的错误做法又再次出现，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的活动多，如济南市团委在 1965 年 5 月提出 3 个 10 万人的军事体育活动，即长跑 10 万人、登山 10 万人、游泳 10 万人；广州也组织了 10 万人渡珠江等等。这样的活动常使得群众为凑数而重复参加，如出现了 1 人 1 周内参加 3 次渡江活动的情况。齐齐哈尔市在 5 月中旬才脱棉衣而下旬又来寒流的情况下组织渡江，使不少人患了感冒。有的体委领导明知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但“对客观的影响顶不住”，如齐齐哈尔的体委领导就明知水温低不适合搞横渡，但不敢提，怕被说是“泼冷水”。湖南衡阳在 1964 年扎扎实实抓基层的游泳活动，没有发生事故，但看到各地都在搞横渡，他们也坐不住了，多次搞大规模活动，造成了淹死 10 人的严重后果[1]。还有，竞赛集中在少数人身上，选拔层次多、费时多；有些活动因时间安排不当，过于集中；有

[1] 国家体委档案：1965 年全国群体工作会议简报.

的在赛前搞集训，耽误工作和生产；有的运动会为搞团体操表演，讲形式，讲排场，劳民伤财。

在当时，还提出了一些不恰当的口号，这在1964年以后的学校群体活动中尤其突出。例如要求小学生一律参加长跑，人人参加游泳，并定出较高的指标，频繁测验成绩；上海有的学校除体育课、课外活动外，还有课外的课外体育活动；广西有的业余体校一节课上4小时，运动量过大；黑龙江有将两节体育课结合在一起，进行多项计时计分的比赛，使学生疲惫不堪；有的学校把体育课变为行军课，不讲求实际，学习解放军遇山爬山，逢水过水，结果淹死了学生；有的学校的运动队，特别是排球队，模仿日本女排教练员大松博文的大运动量训练方法，让队员反复滚爬，运动量很大[1]。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全国在形成群体运动热潮的过程中，极"左"的思想和怕被"反右倾"的疑虑仍然存在。但从总的全局状况来看，1963年至1966年初，全国群体活动的发展是基本健康的，呈现出积极向上和兴盛热烈的景象。这对于促进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三）部队体育活动的加强

为检阅全军自第1届运动会以来体育工作取得的成绩，促进运动水平的提高，选出全军的代表队出席第1届全国运动会。1959年5月6—16日，第2届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届体育运动大会的竞赛项目，除了全运会要进行的全部项目之外，增添了武装泅渡接力和军事实用两项，合计43大项。其中赛马、摔跤、武术、棋类、跳伞、航空和航海等22大项（137小项）分别在南京、武汉、无锡、开封、平凉、大连等地区进行了比赛。在北京比赛的有足球、篮球、排球、水球、棒球、女子垒球、田径、游泳、

[1] 国家体委档案：1965年群体工作会议简报：第三期.

跳水、举重、体操、技巧、射击、无线电、摩托车、自行车、武装泅渡，军事实用项目等21个大项（253小项）。大会中还进行了滑翔、飞行特技、摩托车特技、大型团体操等项目精彩表演。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将近万名运动员，1000余名裁判员，这样规模的运动会在我军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次运动会上，有18项、44人次、2队次打破了世界纪录和国际比赛纪录，有50项、101人次、6队次打破了全国纪录和创造了全国最高纪录。

第2届全军运动会是在部队的体育活动得到了蓬勃开展的基础上召开的。运动会开幕前，全军已有70多万人获得劳卫制证章，5万多人获得等级运动员称号，70人被命名为国家运动健将，并培养了6000多名裁判员，有2人次打破举重最轻量级世界纪录，201人次、5队次破38项全国纪录。1958年9月10日，在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庆祝建国10周年活动筹备委员会议上，作出了1959年5月6日在北京举行第2届全军运动会的决定。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3月这段时间里，全军各级举行运动会500多次，参加人数近百万，其中有将军、士兵、职员和随军家属。据粗略估计，1958年全军各单位共集训了运动员1.7万人，并为大会训练了各项裁判员1500余人。这次运动会之后组成的解放军体育代表团在同年9月举行的第1届全国运动会上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在参加比赛的31个大项中（其中13项男女分别计算，共44个团体奖），获得20个冠军（总分第一）、15个亚军（总分第二）、5个总分第三。400名运动员中有335人获得奖章和奖状，其中67人取得单项个人第一。第1届全国运动会共有7人破4项世界纪录，其中解放军代表团就有3人破2项世界纪录，1人平1项世界纪录，有20人（男16、女4）24次（男12、女12）打破17项（男10、女7）国际竞赛最高成绩，有79人（男55、女24）180次（男121、女59）打破65项（男42、女23）全国纪录。他们为解放军争了光，为祖国作出了贡献。

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增强战士体质、

提高部队战斗力所不可缺少和重要的方法与途径。尤其在军队机械化程度不高，在立足于防御性常规战的准备中，许多体育项目的开展，结合军事训练，有利于迅速提高战士的军事技术。1960 年至 1963 年的经济困难时期，体育战线各个方面在调整中都进行了收缩，大大减缓了发展的势头。由于军队肩负特殊任务，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变化，整个军队在积极的备战中，群众性体育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全军掀起"大比武"的热潮中，各军、兵种为了迅速提高战士的身体素质，广泛组织开展了球类、跳障碍、单杠、双杠、长跑、拔河、登山、游泳等活动。凡地方驻军，都根据不同的条件建有体育活动场地，备有体育器械。以班以上为单位的体育竞赛是练兵的组成部分，也是战士闲暇休息时间的重要娱乐活动。部队驻军还和当地厂矿、企事业、机关单位经常进行比赛，参加地方民兵的一些训练和体育竞赛活动。各大军区、省军区的专业运动队伍，尤其中国人民解放军直属运动队，在军内和国内大赛、国际友军的军事专项、竞技体育比赛中，都取得过很优秀的成绩，从而也推动了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

（四）国防体育的强化

1963 年以后，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国防体育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强化，究其原因，有其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

1960 年以后，中苏关系的分离逐渐公开化。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撤走其全部在华专家，撕毁了数百个合同，停止了供应我国急需的设备，使 250 多个建设项目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1961 年苏共 22 大以后，苏联在报刊和书籍上，连篇累牍地攻击中国的内政外交，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当年，苏联公然制造了伊犁暴乱事件。1962 年，印度军队以 10 个旅的兵力在中印边境的东段、西段同时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我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英勇反击，击退了入侵的印军。中印发生边境冲突，苏联却支持和援助印度，并在国际范围内鼓动兄弟党掀起反华浪潮，企图孤立中

国，强迫中国听其指使。在我国的西部和西南部形成了紧张对峙的局面。

20世纪60年代初，盘踞在台湾的蒋帮也鼓噪要“反攻大陆”，并频频派遣小股武装部队和特务对我国东南沿海进行搔扰和破坏，遭到我边防军民的沉重打击。1963年，美国悍然入侵越南，我国南方面临战火的威胁。国际形势和环境，造成了战争迫在眉睫的势态。

中央在分析了国际形势后，作出了立足于早打、大打的准备，并布置了三线国防建设。因此，在“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口号下，为反击侵略者，全国掀起了“全民皆兵”的练兵热潮，国防体育的军事性特点，使其必然地受到特别的重视和强化。

1962年，在贯彻中央“八字方针”，对国防俱乐部进行整顿的过程中，国防体育重点俱乐部得到充实，队伍比以前精干，技术水平和训练能力都有了提高。当年，“一共有40人29次打破了17项全国纪录。在射击、无线电、航空模型、航海模型4次全国竞赛中成绩的提高也很显著。如航海模型有6人7次打破了竞速艇模型的全国纪录，其中2.5毫升竞速艇模型的成绩，超过了第4届国际航海模型比赛的最高成绩。无线电操纵航空模型全国冠军赛的冠军成绩比1960年提高了858分，模型的性能和操纵的技巧都有较大的改进和提高，能够完成一些难度很大的特技飞行动作[1]。”

1962年，群众性的国防体育活动与其他体育活动相比较，恢复得相对较早较快。其中军事野营、射击和三防等项目开展得比较广泛。据北京、辽宁、吉林、天津、上海、广东、山东等地的不完全统计，参加这几项活动的人数约达560万人。绝大多数省、市的航空俱乐部都试办了业余滑翔训练，训练了一批三级滑翔员。

1963年，国防体育的开展仍以大、中城市为主，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各级俱乐部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国家体委直属俱乐

[1] 赵正洪. 进一步做好国防体育工作. 新体育，1963（3）：4.

部，主要做好优秀运动队的训练工作；省一级国防体育俱乐部，主要指导和推动群众活动，在抓好优秀运动员队伍训练的同时，抽出一定的力量开展业余训练；市级国防俱乐部以开展群众活动为主要任务。各级体委和国防俱乐部更加密切了同军事部门、共青团、工会、教育部门的协作关系。结合民兵训练和学生课外活动，采用训练班、活动小组、业余运动队等形式，开展了基层普及性活动，在普及的基础上，建立了各级代表队，以提高技术水平。在不妨碍生产、工作、学习的前提下，举办了以小型、简单和基层自办为主的业余竞赛。各市级国防俱乐部为了开展群众性活动，采取了以点带面、以点为“阵地”推动基层工作的方法。有计划地开办了辅导员训练班，培养基层骨干，并有重点地建立了业余代表队，作为指导普及性活动的技术力量。同时，借助少年宫、科技馆、工人俱乐部、公园等群众活动场所，增设活动点、站，提供一些必要的技术指导和物质条件，扩大了影响，便利了群众参与活动。因此，整个国防体育活动迅速地开展起来。1963 年国防体育活动无论从开展的规模、训练水平和成绩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专业的射击、摩托车、无线电、航海多项、航海模型、航空模型、跳伞、滑翔等优秀运动队相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63 年以后，由于省、市级国防体育俱乐部连续贯彻以开展国防体育活动为主的方针，积极地、切实地开展了群众性的业余训练活动，形成了国防体育融入民兵训练、与群众体育紧密相结合的特色。国防体育活动从以大中城市为主，以青少年为主逐渐扩大范围。1964 年，全国大力提倡游泳、射击、通讯、登山 4 项活动，各省、市、自治区的职工以此为中心组织了经常性的大规模活动。尤其是沿海、沿边的地区，国防体育活动结合民兵训练、备战训练，开展得很有声势。在江河湖海畔的城市，以军事航海、航海多项、船用机电、摩托艇等项目为主要开展活动；在具备条件的城市，则分别开展了摩托、汽车、军事工程、航海模型、航空模型、跳伞等项目。城市职工和大、中学校学生大多以游泳、射击、登

山、无线电作为活动的主要内容，组织了武装泅渡、登山、军事野营、射击训练等活动。1965 年，全国大力提倡开展游泳活动，使群众性游泳和民兵军事水上训练在城乡普遍地开展起来。以山东为例，1965 年 5 月至 9 月，全省参加军事野营活动的人数达 250 余万人，仅泰安地区参加野营活动的就有 40 万人。在国家体委、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团中央联合发出的《大力开展群众性游泳活动的通知》下达后，烟台、青岛、济南等地市掀起了以游泳为中心的夏季锻炼热潮。

在广大农村，从 1963 年以后，由于备战的需要，民兵组织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各级武装部组织领导民兵训练和射击、登山、武装泅渡等活动。至“文革”开始前，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国防体育活动得到了普及性的开展。

省级以上的国防体育优秀运动队的训练水平和成绩也都有了较大面积的提高。1964 年，新公布的 8 项全国纪录中，射击、飞机跳伞、滑翔、航空模型各占 1 项。在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中，射击、飞机跳伞也各占 1 项。在第 2 届全国运动会和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国防体育项目的成绩有了较大面积的提高；在第 2 届全运会上射击有 3 项、飞机跳伞有两项打破世界纪录。

第五节　竞技体育形成新的高潮

随着中央“八字方针”的全面贯彻和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竞技体育经过短暂调整，得到了全面恢复。我国优秀运动员抱着为国争光的志向和决心，在思想作风建设和技术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变化，他们敢于探索，勇于探索，走出了一条取得优异成绩、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的道路。在全国群众体育取得大发展、形成热潮的基础上，竞技体育成绩大幅度、大面积上升，第 2 届全运会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体育高潮的形成。

一、竞技体育的全面恢复

1962 年 9 月 24 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等问题的讲话。重新提出了我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

但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是在我国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召开的，全党面临的主要任务仍是调整国民经济和克服经济困难，贯彻“八字方针”仍是国家工作的主体。虽然八届十中全会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政治方向朝着错误的方面发展，但还没有发展到支配全局的程度。中共中央总结了 1959 年庐山会议后，把“反右倾运动”一直贯彻到群众中而干扰了经济调整的不适当做法的教训，采纳了刘少奇等人的意见，在传达和贯彻十中全会精神时，各地各部门把做好当时的经济调整放在第一位，没有因抓阶级斗争而放弃主要工作。这样，全会结束后，全党的注意力主要还是放在调整国民经济工作上面。1964 年 12 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三届会议上，对调整时期的工作和成就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并庄严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全国人民将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发端，国民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从 1964 年以后，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重点，“左”倾错误逐渐对经济调整和发展造成干扰，最终发展到属于主导地位而支配全局，导致了“文化大革命”10 年动乱的发生。

1961—1962 年，我国的国民经济调整，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63 年，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好转，从“低谷”稳步回升。工农业总产值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文教事业有了适当发展，基建有所扩大，商品增加，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1963 年 9 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确定从 1963 年到 1965 年，再用 3 年的时间继续贯彻“八字方针”，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 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 年）之间的过渡阶段。确定在这个阶段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一决定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抵制形势稍有好转就急于“大上”的“左”倾思想的干扰，保证调整任务的完成，具有重大意义。到 1965 年，工农业生产得到完全恢复，农、轻、重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平衡；工业内部结构得到改善；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援；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能力得以增强；加强了基础工业；兼顾了国防建设；积累、消费的比例趋于正常，财政收支平衡。

到 1965 年底，5 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全面完成。实践证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正确的，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中国的国情。

我国的体育事业，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的环境条件下从恢复过渡到发展，从而形成高潮。一方面，中央关于整个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对体育战线的导向中，使体育战线全面贯彻和执行了“八字方针”，进行调整、巩固，达到了进而充实、提高的目的，同时党内“左”的错误思想，对体育的恢复和发展形成的干扰和影响同样有所反映，不过由于体育事业本身的特点和整个体育战线各级领导、体育工作者把“左”的压力积极化解和转化成促进事业发展的动力，抵消和缓解了“左”的干扰和错误影响；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体育事业提供了必需而良好的物质基础，但同时又由于我国的国民经济基础仍然不算雄厚，要取得更辉煌的成绩，面临的困难很多，压力很大。经过近 3 年的调整，我国的竞技体育队伍得到了切实的休整，保障了重点项目，保护了特色项目，运动队伍更加精干，伤病员逐年减少。随着国民经济状况的全面好转，在全国各行各业以此为契机力图创造一个新的发展跃进局面的氛围下，国家给竞技体育队伍恢复了比较优裕的物质条件，也

对竞技体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从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经过竞技体育队伍全体的艰辛努力，竞技体育从恢复而迅速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高潮。

二、树立自己的技术风格

20世纪50年代，中国优秀运动员在技术上主要是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经过实践和不断探索，在60年代，从树立自己的技术风格着眼，走出了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

（一）强化管理和思想作风建设

1963年3月，国家体委下发的《1962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在1963年的工作安排中，首先是管好优秀运动队伍，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963年，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此后，对王杰、焦裕禄等一批先进人物的事迹的宣传，震撼了全国人民，尤其解放军以这些英雄人物为榜样，涌现出无数的优秀战士、神枪手、技术能手，解放军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大庆油田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一批先进模范，为甩掉我国依赖"洋油"的帽子，在气候极为恶劣、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艰苦创业，战胜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很快打出了油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国家体委在1964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根据全国已经掀起学习解放军和大庆精神热潮的形势，确定在本年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使体育队伍逐步锻炼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战斗队伍，在体育战线上发挥更大的革命干劲和革命首创精神"。为了使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油田更具体和落实，确定把"国家乒乓球队的先进经验和运动员的先进事迹"作为整个体育队伍学习的榜样，并要求在业余训练、群众体育、国防体育等方面都要树立起自己的标

兵，“体育报刊应该经常注意宣传报道先进经验、表扬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

从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整个体育工作始终贯穿了政治挂帅、抓思想作风建设这条主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体育工作者和优秀运动员认真阅读毛主席的著作，是国家体委多年来一贯的要求。为了使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风气浓厚起来，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1964年，国家体委从《毛泽东选集》中指定了一批文章，规定体育队伍必须经常反复阅读、检查总结、树立标兵、传播经验。1965年1月11日—2月11日，在1965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于1月17日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在京的优秀运动员，表明了党和政府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关注和关怀。这次会议，讨论明确了体育工作的若干重要问题。会议认为，目前我国体育运动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跃进局面，因此，体育工作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提倡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反对任何烦琐哲学，促进体育队伍和体育工作革命化。要求体育工作者、运动员必须首先反复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人民服务》等10篇毛主席著作。科处级以上党员干部，还应针对思想和工作中的问题，选读毛主席的其他著作。1965年，体育战线和全国其他行业一样，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优秀运动队每周坚持在规定的时间里集体学习，并结合学习先进人物谈思想、谈体会。

第二，建立和充实了政治工作机构。1964年8月18日，经中央批准，国家体委决定在体委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构。颁布了《运动队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制定《条例》的依据和出发点是：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运动队伍中来。

运动员大部分是青年知识分子，缺乏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锻

炼，运动队的技术性和竞技性很强，胜负和荣誉问题很突出，人的精神状态对运动技术的影响大，优秀运动员担负着创造优良的运动成绩、为国争光的责任，经常面临国际和国内比赛的考验，不断加强运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培养他们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是十分重要的。

《条例》共有 7 章，44 条。按照《条例》，在组织上，各级体委设置了专门的机构，配备了专职政工干部和人员，运动队配备了专职或兼职政治教员；在时间上，规定运动队（班）除重大比赛外，一般情况下保证半天至一天的政治理论学习时间；在内容上，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进行时事政策教育，进行劳动教育。运动员每年有半月至一月的时间到农村、工厂或部队去劳动锻炼。

加强运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颁布《条例》，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后，尤其是 1964 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优秀运动队开展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其中虽然有“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突出政治而搞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但是，由于《条例》的内容能最终使运动员将高度的政治觉悟落实到训练和比赛中，落实到练出过硬的本领、创造出好的成绩上，因此，执行《条例》，加强运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运动队的思想作风建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运动员能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个人的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在集体中发挥个人作用；培养了良好的运动道德作风，提倡共同进步，坚决反对锦标主义；养成了在比赛中顽强拼搏，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和“宁失一球，勿伤一人”的品格。在优秀运动队中，最突出的一面旗帜就是中国乒乓球队。

中国乒乓球队从容国团在 1959 年第 25 届世乒赛夺取第一个世界冠军后，在国际大赛中不断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当时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把一切政治思想工作与训练和比赛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运动员能具有很高的思想境界，做到“身在球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在训练中有高度的自觉性

和充沛的精力，坚持勤学苦练，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在技术上重视学习世界优秀选手一切好的东西，在以我为主的前提下，以科学的批判态度，有目的、有选择地吸取诸家之长，融会贯通，走自己的路，走在时间前面，创立了独特的风格；能坚持集体主义精神，强调个人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甘当人梯，甘当配角，为提高技术水平，战胜对手，为国家争取荣誉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的高尚风格；在比赛中能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坚定的信念，敢打敢拼，敢闯敢搏，做到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能以科学态度，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和周密的战术准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以过硬的思想和平时磨炼钻研出来的过硬技术，取得了越来越好的成绩。

1964 年，徐寅生针对中国女子乒乓球运动员存在的一些问题，结合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和认识，作了《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毛泽东主席于 1965 年 1 月 12 日对这个讲话作了重要批示。

1965 年 1 月 17 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徐寅生的讲话，并在编者按语中写道："徐寅生同志这篇讲话，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是一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好作品。"意在把这篇讲话介绍给全国从事各行各业的人阅读和学习，把学习毛主席著作与本职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解决实际问题。1965 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贺龙副总理亲自领导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对徐寅生同志讲话的批示后又作了指示，要求整个体育队伍都必须认真学习这个讲话和指示，尤其是专业运动队伍，更应该认真学习。学好毛泽东思想，掌握唯物辩证法，促进思想革命化。此后，全国各专业运动队结合实际，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使整个运动队伍的面貌，在 1964 年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在训练中贯彻"三从一大原则"，以"三不怕""五过硬"为标准，运动技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对于体育领导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提高认识和理论水平，联系思想实际和工

作实际，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上来，避免工作的盲目性，具有较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三从一大”训练原则和“三不怕”“五过硬”思想作风的形成

1961年，针对运动员由于营养不良和“大跃进”中蛮干而造成的伤病人数较多的状况，确定了运动队以休整为主的训练原则。1962年，运动队仍全面进行休整。很多运动队由于对“积极休整”把握不好，出现了训练宽松散漫、思想政治工作比较薄弱、管理上比较松散的状态。组织性、纪律性和苦干精神比过去差，锦标主义、骄娇二气等不良作风有所滋长。不少运动队把休整理解为单纯的休息，运动量一般偏小，训练工作不细、不深、不严，影响了训练的质量和成绩的提高。

1963年，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国家体委提出了由休整性训练转入正常的全面训练和必须严格保证训练质量的要求。在下发的全国体工会议纪要中指出：“1963年，应要求凡能坚持正常训练的运动员，奋发图强，勤学苦练，努力提高运动成绩。”全国各优秀运动队根据会议纪要精神，在贯彻全面训练方针的基础上，狠抓技术训练和身体训练。按要求“细致地研究技术训练、身体训练的措施和手段，精雕细刻地改进技术动作和方法”，使技术训练和身体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运动员在快速运动中和困难复杂情况下运用技术的能力，使运动员的体力适应连续的激烈比赛的需要。

任何优秀运动成绩的取得，都是科学的训练方法和苦练相结合的产物。没有相当强度的运动量，没有一定的训练水平，训练方法再科学，也不可能出现好的成绩。各运动队根据项目特点和运动员身体、技术基础，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认真制定了训练计划，妥善安排了训练周期，逐步加大了运动强度，使各运动队很快就转入了正常的训练。

1964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家体委党组关于召开第2届全国运动会的请示报告，并作了批复："为了更广泛地开展群众运动，培养大批有才能的新生力量，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争取在新运会和其他国际比赛中创造更好的成绩，获得更大的胜利，以加强国际体育斗争，扩大我国的政治影响。"实际上，对优秀运动队的训练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全国掀起学习解放军和大庆油田精神的热潮中，运动队中掀起了学习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大庆油田艰苦创业的"铁人"精神和郭兴福教学法的热潮。

1964年12月4—15日，国家体委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训练工作现场会议后，根据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关于训练工作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地进一步反对训练中的保守思想、教条主义和娇骄二气；坚决贯彻"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在运动队中树立"三不怕"和"五过硬"的作风；改进训练工作的领导，做到领导、教练员、运动员三结合，实现训练工作的革命化。

1965年，面对"我国的体育运动正在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对优秀运动队提出了"要力争三五年内实现1958年提出的，10年左右在田径、体操、游泳、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射击、举重、速度滑冰10个主要项目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的奋斗目标"。同时，要在1965年第2届全运会上创造一批好的成绩。会议再次强调了"优秀运动队必须实现训练工作的革命化"，坚持"三从一大"训练原则和"三不怕""五过硬"的思想作风。

在国家体委统一部署下，各运动队以中国乒乓球队为榜样，走自己的路，总结和摸索适合我国运动员迅速提高成绩的训练方法和技术，使各项运动竞技水平和成绩有了普遍的快速提高。

（三）走自己的路，树自己的风格

新中国成立以后，竞技体育作为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声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而受到党和国家的极大重视。但由于旧中国的竞技体育的基础差、底子薄，为了提高运动成绩，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聘请苏联专家协助搞训练。所以，整个竞技体育训练方法，基本上与苏联的相似。

从 1959 年开始，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苏联撤走了专家，而且我国在学习过程中经过不断的摸索和总结，在训练上也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已经具有了构建形成适应我国运动员的一整套训练体系的条件。

1959 年在《国家体委党组关于 1959 年体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应该制订科学的训练计划，发动运动员和教练员认真钻研训练工作中的关键问题，总结自己的经验，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发扬适合我国运动员特长的战术和技术”。并要求“各级体委要大力加强对训练工作的政治领导和技术领导，针对不同项目、不同运动队的特点，提出不同的要求和做法[1]。”

1960 年，在经中央批转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中，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要认真总结训练工作的经验，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革新运动，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创造出一套适合我国运动员的训练方法。

经过 1961 年、1962 年的全面调整，1963 年优秀运动队转入正常全面训练后，强调要继续认真总结经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加强科学研究，加强技术情报资料的收集，改变耳目闭塞的现状，更好地为训练服务。提倡尊重科学，形成钻研业务、钻研技术的风尚，鼓励不同风格的创造和发展。

在优秀的运动员队伍中，通过自己的不断摸索和总结，很快形

[1] 国家体委党组. 关于 1959 年体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1959-03-22）//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37，38.

成了适合自己的项目和运动员特点的训练方法和技术风格的应首推中国乒乓球队。中国乒乓球队从1959年取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后，坚持学诸家之长，尽可能地接纳世界各种打法，使各种流派在这个团体里“互相竞争、互相适应，互相制约、互相促进”[1]，不断进步，共同提高；同时，又形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的独特风格。在攻球选手中，坚定不移地培养“快、准、狠、变”的风格；在削球选手中，大力提倡“守得稳、削得低、旋转变化好、两面能反攻”的风格；同时也不排除其他风格，提倡百花齐放，不搞清一色、一律化，既有全队统一训练计划，又有个人训练计划，尽可能照顾每名运动员的特点，因材施教。中国乒乓球队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技术上历来反对生搬硬套和保守思想，大破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主张以我为主，走自己的路，学诸家之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将学习与创造、继承与革新有机地结合起来。独特的风格和打法构成了我国乒乓球技艺的优势。

中国乒乓队在解决技术训练中遇到的难题时，采取的是由领导、教练员、运动员三结合方式的“集体会诊”方法。使政治领导的作用、教练员在训练中的主导作用和运动员的自觉性、积极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就实现了集体基础上的个人努力，个人努力上的坚强集体。

在比赛作战计划的制订和执行过程中，也注意到从运动员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比赛的实际情况出发，并估计到客观情况的发展。运动员可以在执行原作战计划的原则下机动处理，培养运动员善于寻找和抓住战机去取得胜利的能力。

1964年，国家体委将中国乒乓球队树为一面旗帜，特别是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讲话以后，各优秀运动队在认真组织学习的基础上，对训练方法和技术进行研究和改进，使之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

---

[1] 荣高棠. 从第20届世界比赛看我国乒乓球队的成长. 新体育，1965（7）：8.

1964年，我国在优秀运动队中全面启动了训练方法改革。2月27日—3月12日，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足球训练会议工作，研究了如何贯彻国家体委发出的《关于大力开展足球运动，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决定》。3月18日—4月5日，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全国篮球训练工作会议，检查了篮球训练中的保守思想和教条主义，并研究了当时我国篮球运动的发展方向和相应的训练方法、措施；4月13—25日，全国网球训练工作会议在上海举行，要求在“快速进攻、积极上网、力争主动、狠巧结合、准确全面”思想的指导下，努力提高训练质量和技术水平。7月16—28日，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全国羽毛球训练工作会议，研究了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方向。12月4—15日，国家体委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训练工作现场会，要求各地坚决贯彻“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和“三不怕”“五过硬”的思想作风。在训练工作的领导方法上，学习中国乒乓球队，做到领导、教练员、运动员三结合，政治挂帅，实现训练工作的革命化。

我们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样，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业，要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困难很多。这里面就有一个走哪条路的问题。是跟着别人的脚印走，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挥自己的才智，去摸索和开创一条自己既能走得快又能超前的路呢？我们只有自力更生，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走自己的路，就是要靠我们自己大胆实践，自己摸索、积累和总结经验，自己认识运动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并不是排斥向外国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是能够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为我所用，去研究它、掌握它，目的是在学习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造。而不是照抄照搬，跟在别人的后面一步一趋地爬行。

打破框框，扔掉拐棍，并不是把过去的一切都推翻，否定一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体育运动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有些外国的东西已经为我所用，并有所发展。凡是行之有效

的成功经验，都应该加以肯定，需要剔除的是那些已经过时的、不切合自己具体情况、阻碍我们提高成绩的不合理的规矩和章法。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国家举重队于1964年5月27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举重教练员座谈会，会议在分析教条主义表现时指出，我国举重运动在4个级别中已14次打破世界纪录，其他国家向中国学习挺举的人很多，可是我们却在一段时间内丢了自己的长处，反而去学习别人的弱点。比如我国部分优秀运动员中存在迷信苏联和匈牙利运动员的举重技术，甚至有把一些错误动作也盲目引进来的倾向。对国外尚待完善的技术，应根据中国运动员的实际，有选择地学习。之后，国家举重队大胆提出了“以上拉为重点，加上在上拉中得不到或不能得到充分发展的肌群和辅助练习，就能有效地提高举重运动员所需的力量”的训练思想，并在运动量大幅度提高和训练内容、方法、手段两个方面改进了训练。中国乒乓球队在1953年3月20日—4月6日第一次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第20届）时，还只是默默无闻的一支弱队（男队被评为一级第10名，女队二级第3名），几经挫折，终于一跃再跃。男队能夺得并保持荣誉，女队能突飞猛进，成为国际乒坛的一支劲旅。也是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前提下，有一套好的训练方法和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走自己的路，形成独特的技术风格的结果。

三、竞技体育形成新的高潮

1963年，全国性和区域性的竞技体育比赛逐渐增加。考虑到优秀运动队从休整到进入正常训练有一个过渡，为巩固和提高技术，为转入正常训练后能尽快提高成绩打下基础，按国家体委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决定，1963年度的比赛，主要根据重点项目的优秀运动员提高运动技术的需要来安排，适当照顾多年未举行全国比赛的一般项目，并增加少量的青少年比赛。在比赛的规模上，全年控制在1万人次以内。通过篮、排、足球全国联赛进行甲乙级

的调整。建议大区举办田径比赛和其他项目多边、双边比赛，建议解放军和一些省市分别组织邀请赛。

经过一年的过渡，到 1964 年，国内和国际赛事大大增加。1965 年，以第 2 届全国运动会的召开为标志，竞技体育形成了高潮，运动成绩有了大面积和较大幅度的提高，一些项目接近和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实现 1958 年提出的 10 年目标已经是相距不远，胜利在望了。

（一）国际比赛

1963 年，我国派队参加的重大的国际赛事主要有第 27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第 1 届新兴力量运动会。

1963 年 4 月 5—14 日，我国乒乓球队去布拉格，参加第 27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再次获得团体世界冠军，庄则栋蝉联了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张燮林、王志良获男子双打冠军。

中国派队参加第 1 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 60 年代的国际形势下，对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和扩大在国际上影响都是一件大事。

自 1955 年，亚非会议发表著名的万隆宣言以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有了极大的发展。已经摆脱或正在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在维护和争取民族独立、肃清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势力的同时，迫切需要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加强彼此间经济、文化也包括体育的交流。组织新兴力量运动会最直接的原因是在 1962 年夏天，印度尼西亚拒绝台湾和以色列参加在雅加达举行的第 4 届亚洲运动会，国际奥委会、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国际举重与健身联合会等组织在少数人的操纵下，对印度尼西亚施加压力，宣布不承认第 4 届亚运会未果后，国际奥委会于 1963 年 2 月 17 日的洛桑执委会上，决定“不定期禁止印度尼西亚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于1962年提出了召开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倡议，立即得到了亚、非许多国家积极反应和支持。由于国际奥委会在少数人的把持下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千方百计地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唯一合法身份参加奥运会，因此，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印尼倡议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坚决支持。1963年4月20日，刘少奇主席在印尼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同苏加诺总统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强烈谴责了国际奥委会的专断行为，重申中国政府坚决支持苏加诺总统组织“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倡议。1963年11月10—22日在雅加达召开的实际由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参加的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取得了较大地成功。在运动会邀请函发出之后，有51个国家和地区报名参加，最终参加的国家和地区达48个，有2200多名运动员和代表参加了运动会，中国派出了348人，参与了116个项目的角逐；还有随团记者57人，电影队员17人。还派出了为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文艺演出的杂技团50人。中国政府尽了最大力量帮助印度尼西亚解决遇到的困难，受到了新运会各方面的赞扬：“中国是第一个响应新运会，第一个大的代表团，第一个来到雅加达的贵宾。”

在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朝鲜、中国的运动员打破了5项世界纪录，印度尼西亚、中国、柬埔寨、阿联酋、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7个国家的运动员共打破了60项本国纪录。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创造了较好的成绩。中国运动员在参加的14个项目的比赛中，一共取得了66项冠军、56项亚军、46项第3名，是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获得奖章最多的国家，五星红旗频频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不断奏响，印度尼西亚观众说：“我们的乐队可以不看歌谱熟练地奏中国国歌了。”在新运会上，锡兰代表团长说：“如果新运会没有其他成就的话，把六亿五千万中国公民的才华介绍给全世界，就是巨大的成就。”中国竞技体育上的实力在新运会上得到了显示，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在“三年困难”之后竞技体育的复苏和初步发展的状况。

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给苏加诺打电报说："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召开，标志着新兴国家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对国际体育事业的操纵和垄断的斗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1]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召开，表达和反映了世界上获得独立不久，经济相对落后的各国人民要求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和权利，在国际事务中要求国家间相互尊重、平等和要求发展民族文化体育事业、改变新老殖民主义长期统治遗留下来的文化落后的面貌，增强人民体质的心愿，同时也显示了这些国家举办国际运动会的信心和力量。

继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以后，举行了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代表会议，通过了成立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常设机构、新兴力量运动会章，决定新兴力量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次。但后来因为国际形势和国际间关系的变化等种种原因，新兴力量运动会只举办了1届，此后未能继续。虽然新运会没有能够成为传统的国际性运动会，但它的成功召开在世界体坛却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归来，受到首都人民的盛情欢迎。邓小平等领导接见代表团负责人和运动员代表，彭真举行招待会祝贺运动员取得出色成绩。12月30日，参加新运会的代表团举行评功授奖大会，贺龙副总理亲自向有功的运动员颁奖。

1963年2月21—24日，我国选手参加了在日本东京轻井泽举行的第57届世界男子速滑锦标赛和第27届世界女子速滑锦标赛。滑速是我国10个重点项目之一，我国选手在这届比赛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女子速滑赛中，我国选手王淑媛获得了全能第6名的成绩；在男子速滑1500米比赛中，我国选手罗致焕获得冠军，这是我国滑冰运动员在世界速滑锦标赛上夺得的第一枚金牌，王金玉和罗致焕还打破了男子速滑全能的世界纪录。在这届比赛中，我国男女速滑10项全国纪录全部刷新。

1964年10月18—21日、1965年8月1—9日在北京举办了

[1] 谷雨. 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关怀新运会二三事. 体育文史，1986（1）.

乒乓球国际邀请赛。1965年4月15—25日，中国参加了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举行的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由于中国女队的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中国队共获得5项冠军，4项亚军和7项第3名。

此外，在1963年至1966年，中国还派队参加了国际网球等比赛。中国参加和组织国际比赛呈明显增加的趋势。

（二）国内比赛

从1963年开始，国内赛事大大增加，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2次高潮。1963年1月，在北京举行了参加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选拔赛；9月，在北京举行了我国参加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体育代表队选拔赛，1000多名优秀运动员参加。在田径、举重、射击、射箭、游泳和自行车比赛中，20多名选手打破了全国纪录。其中1名男子射击选手平了一项世界纪录，6名女子自行车选手的成绩大大超过了1963年自行车选手的最好成绩。选拔赛检验了我国竞技体育经过调整后的训练状况和运动成绩，推动了竞技比赛的全面启动。

根据国家体委的安排，1963年除了全国性选拔赛外，还召开了全国田径运动会、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全国游泳比赛、全国一级健将级游泳通讯赛、全国速滑比赛，以及举重、射箭、射击、自行车、跳伞、航模等项目全国比赛，打破了一批全国纪录。同时，进行了全国篮、排、足球全国联赛，进行了甲乙级队的调整。6月，联赛拉开战幕，至11月结束。北京青年队、辽宁队分别获全国足球联赛冠亚军，“八一”男篮和新疆女篮分别获全国篮球联赛冠军，北京青年男队和四川女队分别获排球全国联赛冠军。

部分省、市和解放军还分别组织了邀请赛。2月，在广州举行了优秀足球队的邀请赛；上海体委主办了网球优秀选手邀请赛、优秀乒乓球运动员邀请赛，湛江举办了航海多项运动邀请赛、跑鹿射击邀请赛，福州举办了全国6单位羽毛球锦标赛。

1963年7月，全国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田径通讯赛评比揭晓，在25个项目中，有1项破少年全国纪录、17项成绩超过1962年。8月，举办了全国少年田径运动会。10月，王楚涛打破了少年男子铅球全国纪录。8月，在太原举办了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为促进女子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发现和选拔优秀运动员，11月，在北京举行了首次女少年乒乓球赛。同年，还举行了全国少年速滑和射击通讯赛。

此外，很多大区还举办了单项多边、双边比赛，如5单位射箭比赛，7单位自行车比赛，7单位摔跤个人锦标赛，广东、东北联队中国象棋比赛等等。一批在调整时期没有开展竞技比赛的项目，基本都在1963年、1964年，恢复了全国性比赛，如手球、羽毛球、摔跤、武术、击剑、自行车、赛艇、皮划艇、花样滑冰、滑雪、冰球、摩托艇、航海多项、跳伞、滑翔、摩托车、水球、技巧等等。1963年，共创造了94项全国纪录，其中打破12项全国纪录。1964年，我国的竞技体育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新局面，以在第2届全运会上创造更好的成绩为目标，国家体委直属优秀运动队和各省、市优秀运动队刻苦训练，在国内比赛中取得了更好的成绩。1965年，以迎接和召开第2届全运会为标志，我国竞技体育整体水平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2个高峰。

（三）第2届全国运动会的召开

经过3年困难时期后，由于认真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体育事业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为了更广泛地开展群众体育运动，培养大批有才能的新生力量，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争取在新运会和其他国际比赛中创造更好的成绩，获得更大的胜利，以加强国际体育斗争，扩大我国的政治影响”[1]，国

[1] 国家体委党组关于召开第2届全国运动会的请示报告//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体育运动文件选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883.

家体委于1964年1月18日向中共中央呈报了拟于1965年9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第2届全国运动会的报告。1月28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明年举行第2届全国运动会，但是规模不宜过大，竞赛项目和参加的人数可以考虑适当压缩。"[1]国家体委根据中共中央批复的要求和精神，迅速地进行了部署，开始进行第2届全国运动会的相关工作。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加强了优秀运动队的训练工作，积极备战第2届全运会。各专项优秀运动队落实"三从一大"训练原则和树立"三不怕""五过硬"的作风。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和运动队的整体竞技水平很快有了显著提高。为组建参加第2届全运会的队伍，很多省、市、自治区陆续召开了运动会进行选拔。河北省1965年4月前，参加层层选拔的运动员达54万余人，有1949名运动员参加了省运会，选拔出235名运动员参加第2届全国运动会。江西、内蒙古、河南等省、市、自治区在第2届全运会前，也都通过召开省运会组建了参赛队伍。山西省为迎接第2届全运会，集中力量充实和加强省专业运动队，调整全省专业运动队的格局，撤销了各地市专业运动队员编制，省专业运动队编制从1962年的290人增编为410人，并从全省选调了150人来省集训，使优秀运动队伍得以健全、充实和加强了各个项目的实力。

黑龙江省突出地抓冰上项目的优势进行训练，使男女速滑项目的成绩有了很快的提高，并由此带动抓好其他项目的训练。

湖南省为了迎接第2届全国运动会，省政府决定省优秀运动队运动员由300名增加到500名，并提出了"以跑百米的速度、跑万米的精神，把湖南体育搞上去"的口号。

青海省体委在1964年5月筹建了男女篮球队、乒乓球队，充实了田径队、射箭队，遴选了89名运动员组队参加了第2届全运会。

---

[1] 中共中央关于国家体委召开第2届全国运动会的批复//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88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迎接第2届全运会而形成了竞技体育的第一个高峰。

以备战第2届全国运动会为动力，在全国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竞技体育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同时，带动了整个体育事业的发展。学校体育，尤其课外体育活动，以及职工体育、农村体育、军队体育都开展得热火朝天。

1965年9月11日，第2届全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并检阅了体育队伍。贺龙致开幕词。开幕式上，首都几十个单位1.6万多人表演了历时70分钟的《革命赞歌》大型团体操。9月12日，第2届全运会各项比赛和表演正式开始，28个民族的5922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包括参加足、篮、排3项球类分区预赛的人数），其中女运动员2011人。比赛的项目共有22个：田径、游泳、举重、自行车、射箭、乒乓球、篮球、排球、足球、网球、羽毛球、水球、体操、击剑、摔跤、跳水、射击、无线电收发报、摩托车、飞机跳伞、航空模型、航海模型。武术作为表演项目。9月28日，第2届全运会闭幕。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闭幕式。陆定一副总理致闭幕词。西哈努克亲王、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分别向举重、射击、射箭、飞机跳伞、航空模型运动世界纪录创造者颁奖，向团体操《革命赞歌》的编导、音乐和美术设计人员颁发了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向团体操《革命赞歌》的演出单位颁发了银制团体操纪念奖杯。部分优秀运动员和团体操部分编导人员，接受了西哈努克亲王赠送的柬埔寨王国纪念章。在第2届全国运动会期间，有24人10次打破9项（举重两项、射箭两项、射击3项、飞机跳伞两项）世界纪录；有331人469次，打破130项全国纪录；数以千计的运动员打破了大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项运动最高纪录。有250万人参观了第2届全国运动

会[1]。本届运动会，显示了自贯彻“八字方针”以来体育战线取得的突出成就，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体育高潮的形成。第2届全运会与第1届全运会所设相同项目的成绩比较，除田径的男子跳远、手榴弹等极少数项目第1届全运会的成绩较好些外，其余项目的成绩全部刷新。田径、射击、射箭、举重等项目的成绩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并创造了一批世界纪录。

第2届全运会的召开，是我国体育事业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是向世界水平进军的一个新的起点。

正当我国的竞技体育蒸蒸日上，将以第二个新的局面和高潮为起点，努力攀登世界高峰，实现既定目标，跻身体育强国行列时，“文化大革命”使全国陷入全面内乱之中，体育战线遭受了浩劫性破坏，竞技体育跌入深谷，处于几乎湮灭消失的状态。

附：

表2-1　1956—1966年我国运动员获得的世界冠军统计

单位：项、人、个

年份	项数		人数		冠军（个）数	
	合计	其中：女	合计	其中：女	合计	其中：女
1959	1		1		1	
1961	3	1	6	1	3	1
1963	4		7		4	
1965	5	2	9	4	5	2

引自国家体委．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1）：精华本上册．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292.

[1] 国家体委．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1）：精华本上册．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55，57.

表 2-2　1956—1966 年我国运动员打破和超过世界纪录统计

单位：项、人、次

年份	项数		人数		次数	
	合计	其中：女	合计	其中：女	合计	其中：女
1956	1		1		3	
1957	3	1	3	1	3	1
1958	6	2	9	5	8	2
1959	14	5	29	15	17	7
1960	16	4	38	13	27	8
1961	11	5	11	5	12	6
1963	13	7	14	6	20	13
1964	5	1	12	1	4	1
1965	28	12	66	28	41	20
1966	6	1	5	1	10	1

引自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1）：精华本上册.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284.

表 2-3　1956—1966 年我国运动员打破全国纪录统计

单位：项、人、次

年份	项数		人数		次数	
	合计	其中：女	合计	其中：女	合计	其中：女
1956	92	26	180	88	671	243
1957	84	27	172	59	422	179
1958	105	35	550	161	911	307
1959	135	45	381	92	856	239
1960	151	48	303	98	587	230
1961	99	34	181	68	388	225
1962	79	20	112	33	248	72
1963	94	29	157	41	254	75
1964	94	27	157	167[1]	241	64
1965	189	62	498	259	1177	521

引自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1）：精华本上册.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298.

[1] “167”疑为 67 之误。

第六节　体育科研工作的起步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体育科研近于空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体育科研工作的开展必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20 世纪 50 年代，体育科研工作艰难起步。到 60 年代中期，体育科技工作管理系统已具雏形，建立了体育科研机构，具有一支专兼职科技工作者队伍，科研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体育科研工作已成为整个体育事业的重要方面，得到了重视和发展。

一、体育科研规划的形成

1952 年中央体委成立后，为了尽快地培养出大批的体育人才，从 1952 年至 1957 年，全国先后创办了华东体育学院（现上海体育学院）、中南体育学院（现武汉体育学院）、中央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西南体育学院（现成都体育学院）、东北体育学院（现沈阳体育学院）、西北体育学院（现西安体育学院）和 11 所体育学校，恢复了 38 所高等师范院校体育系科。1956 年在校专业体育学生是 1948 年的 364 倍[1]。体育专业人才的培养，为开展体育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我国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虽有一些体育学术论著，但体育科研的基础十分薄弱，实验研究几乎是空白，而且没能有组织地开展起来。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体育科学研究的底子薄、基础差，没有一个专门的体育科研机构，因此也没有相应的研究队伍。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国家体委在有关文件

[1] 黄汉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科技发展史.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20.

中开始注重体育科学研究工作。从1953年开始，体育科研工作开始了艰难的起步。1956年体育科研工作有了初步的发展。

1958年2月28日，国家体委邀请北京市有关的科学家和体育家、教育部和卫生部的代表、各体育学院的负责人等，座谈我国体育科学研究工作的第一个10年规划。会上体委负责人指出："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把体育科学研究工作提上了工作日程。当前体育运动大跃进的形势，以及10年左右赶上世界水平的任务，要求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加速赶上去，以便总结我国已有的经验，掌握新的技术，帮助解决当前工作中提出的迫切问题。……体育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全面规划、统一安排、分工协作，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我国体育运动的实践进行具体分析……为体育运动的大跃进服务，并建立我国体育研究工作体系。……有步骤地建立起体育科学研究机构，培养体育科学研究人才和加强体育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1]会议一致认为，制定出统一的体育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方针和规划，做到统筹安排、分工合作和建立体育科学科研机构是十分必要的。

体育科学研究10年规划提出了10年内体育科学研究的10个主要课题，包括体育理论与体育制度、运动技术与训练、体育运动的卫生学和生理学论证、体育运动的医学与医务监督、体育运动的心理学、中国体育史、组织领导与工作制度研究、培养体育干部与学校体育、体育场地和运动器材的科学研究、外国体育运动。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体委党组关于体育运动10年规划的报告，并作了重要批示。《体育运动10年规划》对这一时期我国体育科技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到1960年底，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我国体育界认识到急于求成不是体育科学研究的正确的态度，必须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实际，从长远需要

[1] 国家体委举行体育科学研究工作10年规划座谈会. 体育文丛，1958（3）：14.

着眼，从当前需要着手。1960年3月14—18日，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体育科学工作会议，对1960年重大科研课题项目计划作了补充修改，讨论了1961—1962年体育科学发展纲要。由于加强了对体育科研工作的领导，体育科研队伍已经形成，在国家编制《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增加了体育科学方面的研究课题，其中包括运动训练、运动解剖学、运动营养、运动创伤、医务监督和祖国传统体育项目太极拳、气功等方面[1]。这次会议对我国体育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经过3年的调整，体育科技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兴的体育科学被纳入了国家《1963—1973年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划》，体育科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继承体育优秀遗产和学习外国体育的先进经验是建立新体育的必经之路，由于西方国家拒绝承认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可供学习和借鉴的只有苏联和东欧的模式。苏联政府的体育文件、体育理论、运动技术、运动训练等书籍，不仅对我国体育运动的普及与提高，而且对体育科技的发展规模、速度、方向等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头10年，苏联对我国体育科技发展的影响很深，这也是当时国际环境下的必然境况。

1965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指出，要“办好体育报刊、体育学院，做好科学研究工作。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应深入第一线，密切联系实际，在普及群众体育运动、猛攻世界运动技术尖端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体育科研已有了比较全面和具体的规划。

二、体育科学研究的起步

1956年2月1—7日，北京体育学院召开了第1届体育科学

[1] 黄汉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科技发展史.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36.

研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体育科学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200多所高等学校的师生代表30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报告和讨论了体育理论、生理卫生、运动技能、运动教学和训练等方面的论文共31篇。

北京体育学院第1届体育科学研讨会的召开，对推动我国体育科学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根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有5所体育学院的373位教师和研究生、41所高等学校的250位体育教师制定了研究计划。1956—1957年全国各体育学院和其他高等学校拟定的研究课题达9项。在跃进年代，体院师生也开始参与科技大跃进。当时的科研常与“献礼”活动相联系。1958年，北京体育学院为向“十一”献礼，在一个月内组织了135个科学研究小组，完成139篇论文，全年共完成160篇论文，等于前4年的总和。1959年完成692篇，等于1958年的4倍[1]。从1956年开始的人体解剖学研究工作，根据运动实践的需要，已逐步由描绘解剖学向机械解剖学发展，初步研究了一些运动动作。运动生理学研究了各项运动的生理特点和运动训练对身体机能的影响，探讨了身体训练的生理原则，分析了中国青年运动员身体训练的指标等。在整理研究中华武术、体育文献收集与整理，以及用气功疗法、经穴按摩治疗运动创伤，继承和发扬祖国几千年优秀体育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

沈阳体育学院从1957年9月至1958年9月，在校103名教师中有22人参加了科研活动；从1958年9月至1959年9月，129名教师中有27人参加科研活动。1959年8月3日，国家体委为迎接第1届全运会的召开，为推进某些重点问题的研究，发出《关于结合训练工作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通知》后，该院参加科研活动的人数激增，仅从1959年9月到12月，在140名教师中就有81人参加了科研活动，另有107名学生也参与了活动，学院还印发了

[1] 黄汉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科技发展史.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31.

《科学研究工作的方法》以推动科研活动的开展[1]。

北京体育学院为了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的指导和管理，根据院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于1959年3月17日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要由专家组成，赵斌副院长主持工作，主要任务是研讨有关科学研究的规划、任务、设施等重大问题，向有关方面提出建议；审议各系科的科研计划，草拟有关对科研成果的奖励办法。院科委会下设各系科委员会。

4月，各系根据1959年研究工作会议精神，整顿了科研组织，全院师生90%以上组织起来，共建立268个科研小组。其中教师指导下的师生科研小组143个，教师科研小组20个，学生的科研小组105个。教师参加科研工作的占在职教师的90%，学生参加的占92%（预科学生、有比赛任务和下放劳动的教师未计在内），选定了404个研究课题。

为了实现国家体委提出的“争取在10年左右，在主要项目赶上世界水平”和在第1届全运会上“放卫星”的任务，北京体院还组织了“尖端科研小组”，专门对北京体院运动成绩优秀、可能“放卫星”的运动员，进行全面攻关研究[2]。

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全国从事体育科研的研究者除研究所有少量人员外，主要集中在高校，兼职从事科研工作。体育院系的科研工作是以教学为中心，为教学服务，要求科学研究与调查研究、编写教材、建立健全新秩序和提高教学质量相结合。在这一阶段，除完成了一批国家重大科学技术项目研究课题外，主要抓了体育院系教材编写工作，并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对教师从事科研给予时间上的保证，明确规定将参与科研的时间计入总的工作日中，教师对科研的重视程度有了很大提高。成都体育学院1960年举行了大小科学讨论会、报告会15次，完成论文200篇，其中运动医学

[1] 万怀玉. 东北体育教育之光.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40.

[2] 北京体育学院校史编写组. 北京体育学院校史.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3：31.

30篇、运动训练63篇、民间体育17篇、群众体育28篇、教学改革24篇，相当于1954年建院以来的总和[1]。1960—1961年，北京体育学院选作国家研究项目的题目43个，其中运动训练28题、体育运动生物科学10题、运动保健4题。1961年全院重点题目26个，其中14个属于编写教材和总结教法，此外还有12个专题研究。

西安体育学院进行的一项最突出的科研项目是中学体育调查研究。为了切实完成培养合格的中学体育教师的任务，1963年2月，学院抽调了17名专业教师组成中学体育调查研究组，其任务是通过对省内部分重点学校的体育工作进行全面调查研究，摸清中学体育教学的特点、体育工作的实际情况和中学学生的具体情况，以及对体育教师的要求、各校对过去毕业生的工作意见、检查过去在培养上存在问题，借以改革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为培养又红又专的合格的中学体育教师创造条件。

调查研究组自1963年4月至7月，先后调查了西安市与陕南、陕北、关中共19个县（市）95所学校（中学90所，小学5所），访问学校领导、体育教师、其他课程教师与学生324名，搜集各种资料506份，看课、参观早操和课外体育活动119次，比较全面地占有了中学体育工作的第一手资料。在当年下半年的全院教学工作会议上，中学体育调查研究组的同志向全院教师、干部作了全面汇报，对教师了解中学实际、改革教学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通过这一年半的中学体育调查研究，基本了解了中学体育实际，掌握了中学体育工作的特点，发现了过去教学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合格的中学体育教师必须具备的政治和业务条件，为教学面向中学和联系中学实际提供了依据。在第一阶段调查研究结束后，对搜集的资料及时整理研究，编

[1] 黄汉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科技发展史.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31.

印了《中等学校体育资料汇编》。在咸林中学蹲点结束后，又编写出了60多万字的中学生各年龄阶段生理解剖特征，科学体育锻炼的方法，体育教育工作，田径、体操、球类、武术教材教法等11章。这些来自亲身实践的总结材料，为教学和学生学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欢迎，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十分宝贵的有指导意义的重大成果[1]。

1963年以后，很多院校不定期地召开论文报告会。由于改变了以往“献礼”式的突击性科研工作，各体育学院更加重视科学研究与实践需要紧密结合，同时为科研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高了课题的质量。大多数体育学院的课题，主要围绕培养目标，面向中学进行调查研究；结合教学，围绕修订教学大纲，修改和充实教材；研究改进教法；充实有关教学资料等，取得了不少成绩。武汉体育学院科研的内容侧重在贯彻培养目标、基本技术规格、“少而精，学到手”原则、“三基四会”、中学体育教材教法、运动创伤预防、因材施教等方面。体操教研组自1960年起，就建立了每月一次学术讨论会的制度，就体操技术和教学训练等问题，经常组织专题研讨。这些专题有体操技术规格、教学中如何贯彻“少而精”原则、体操基本技术与教法、防止体操运动创伤等，在学报上发表论文共计16篇，其中《体操课中伤害事故及其预防》一文，提出了预防措施和安全制度，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使教学训练的受伤率明显下降，保证了安全教学，促进了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1959年3月22日，国家体委党组关于1959年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应该制订科学的训练计划，发动运动员和教练员认真钻研训练工作中的关键问题，总结自己的经验，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发扬适合我国运动员特长的战术和技术。必须加强体育学院的工作和体育科学研究工作。”1961

[1] 周敏，杨得沣. 西安体育学院校史. 1994：126.

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指出：“运动训练工作是一门新的科学，认真总结一套切合我国实际，能够充分发挥我们特点的训练方法，需要不断加强体育科学研究工作，避免片面性、一般化等毛病。努力办好体育院校，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各级体委应当加强体育院校的领导。体育院校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主，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要安排得当，集中力量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

在各体育学院积极开展体育科学研究的同时，各省市体科所也根据各自的条件，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体育科学研究。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 1961 年以 10 个运动项目为主，同时兼顾其他方面，对优秀运动员的训练、运动训练的生理特点、医务监督与运动伤病治疗以及工人生产操、少年运动训练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为配合运动训练和科研工作，还翻译整理了 166 万字的外文资料，拍摄了各项运动技术影片 5200 米，拷贝 6200 米，冲洗放大照片 1.4 万多张，收集影片资料 279 份。这些资料对于了解世界各重点国家的重点项目发展水平和吸收先进经验，起到了有益的作用[1]。1962 年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集中力量对上海市重点项目的优秀运动员的训练和技术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研究涉及短跑运动员的速度耐力和起跑、途中跑技术；跳远运动员的全面训练和技术力学分析；举重运动员的抓举、挺举技术分析等，完成论文等 82 篇，共计 20 多万字，比 1961 年增加两倍多。此外，还同上海体育学院和有关协会联合举办了 1962 年上海市体育科学年会（这种形式的年会在上海还是第一次），出席会议的体育界各方面人士达 500 多人。编印了《体育科学论文资料》12 期，约 20 万字；《体育译文》两期，3.5 万字；译文资料 50 余篇，共 34 万多字；拍摄影片 860 英尺，冲洗放大照片 1800 余张，

[1] 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 1961 年工作总结和 1962 年工作意见（摘要）. 体育科学研究资料，1962（53），33-36.

收集国内外图片150余张[1]。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室仅1962年就编纂体育史资料10多本，达40万字。1960年以来整理总结郑怀贤运动创伤经验7篇，并编写出版了《伤科诊疗》及《伤科按摩术》两书，近80万字[2]。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了加强横向联系，促进学术交流，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体育科技工作者的倡议下，1964年7月28日，国家体委科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建立中国体育科学学会，随即草拟了学会章程（草案），酝酿了理事候选人名单，后因客观原因被搁置下来。1964年11月23日—12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第1届全国体育科学报告会，大会共收到82个单位的321篇论文，其中来自专门研究机构的75篇、医学院77篇、体育学院53篇、高师体育系40篇，普通高校34篇、训练机构19篇、中学15篇、少体校7篇、教育行政机关1篇。出席会议的有20个地区和解放军系统共45个单位的论文作者，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和各体育院系负责人126人，300余名列席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报告论文109篇，其中运动训练23篇、体育教学24篇、运动生理15篇、运动医学47篇。报告会论文作者中95%以上是年轻的讲师、助教、中学教师、教练员、研究人员和医生，63%以上是非专门研究人员。会议期间各专业小组还就本次会议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发言[3]。1964年第1届全国体育科学报告会的召开，不仅检阅和交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成就，调动了广大体育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而且也积累了举办大规模、高层次体育科学报告会的经验。

---

❶ 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1962年工作总结和1963年计划要点(摘录)．体育科学研究资料，1963（120）：37-41.

❷ 国家体委科学工作委员会. 体育科学研究工作的当前情况及对今后工作的几点建议. 体育科学研究资料，1965（8）：1.

❸ 黄汉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科技发展史.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32.

三、体育科研机构的创建与专业科研队伍的形成

1954年前，我国体育科学基本上属于松散型、自发型的。1958年9月18日，以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部毕业的研究生和1955年选派出国学习归来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为基本力量，成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体育科研机构——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现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前身），标志着我国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体育科学研究正逐步形成，呈现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雏形。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设立了群众体育、运动训练、运动生理、运动医学、资料5个研究室以及摄影制片、仪器装配两个辅助工作室，对体育运动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与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为了使生理解剖的教学理论联系实际，整理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正骨科，1958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一所体育医院——成都体育学院附属医院由成都体育学院骨伤科、解剖生理教研组、卫生保健室及骨伤科训练班合并成立，1959年1月1日卫生系统又成立了北京运动医学研究所。国家专门为这些研究所拨出了足够的经费购置仪器和图书，为体育科学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在1958年"大跃进"中，"体育学院和中等体育学校已发展到95所（包括专科），此外，成立了近百个业余体育大学、系科。"[1]为了加强体育科学研究工作，除了在中等以上学校普遍设立教研室、教研组，还结合体育教学进行科学研究。进入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上海体育科研所、黑龙江体育科研所、广东省体育科研室、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室和运动医学研究室等省、市科研机构相继成立，为进一步开展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我国体育科学研究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良好势头。

---

[1] 蔡树藩. 中国体育运动的春天. 新体育，1958（19）：4.

科研机构的成立、科研队伍的发展壮大、科研工作者的努力钻研，使新中国的体育科研无论在增进人体健康还是在治疗运动创伤、掌握科学训练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如曲绵域教授主持的北京运动医学研究所、郑怀贤教授主持的成都体育学院附属体育医院，分别采用现代医学和中医结合的方法，在运动员消除疲劳和治疗运动创伤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1956—1959年，在挺举、抓举、推举三种姿势中，中国运动员挺举成绩比较突出，而推举和抓举水平较低，影响了总成绩水平的提高。1959年第1届全国运动会以后，在北京专门召开了全国举重教练员会议进行讨论，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各省、市举重队也加强了推举、抓举技术的训练和学术讨论。随后，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李岳生等人，根据生物力学原理，对推举技术进行了专业研究。1961年在《中国体育科技》发表了《推举技术研究》的文章，否定了当时普遍流行的"塌腰式"推举，提出了"含胸式发力上推""出髋上推"的技术观点，对推举技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使我国运动员的推举技术有了明显的改进，推举成绩有了提高。

1961年5月，在全国举重分区赛后的教练员会议上，就抓举落后的原因及提高成绩的方法进行了探讨。随后，著名运动员、体育科技人员黄强辉、李岳生、朱子樵、郭廷栋、陈冠湖等人发表了理论性文章，探讨了抓举技术的概念、发力、支撑及上拉力量训练等问题，提出了高臀位拉铃、充分发挥腰背肌和伸髋肌群力量、保持发力前合理的躯干前倾角以及保持上拉的合理路线、改进杠铃运动方向等意见，促进了举重界对抓举技术的理论探讨和对抓举训练方法的研究。1961年11月举行的全国举重锦标赛上，打破抓举全国纪录的人数、次数占全部破全国纪录人数、次数的一半。

从1960年至1964年，一批体育科技人员赵竹广、李岳生、黄强辉、陈冠湖、朱子樵、郭廷栋、刘慧荣等人，在举重训练理论、训练方法、举重运动员的生理、生化指标、国外著名运动员的训

练、先进国家举重训练经验介绍等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促进和推动了中国举重运动在1963年的回升，在1964年，中国举重运动迎来了第2次高潮。全年有两人打破两项世界纪录，24人51次打破22项全国纪录[1]。

四、努力探索，形成自己的风格

1962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继续认真总结经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加强科学研究，加强技术情报资料的搜集，改变耳目闭塞的情况，更好地为训练服务。提倡尊重科学，形成钻研业务、钻研技术的风尚，鼓励不同风格的创造和发展。"

国家体委明确要求："各级体委不要用行政命令力量推广或禁止某一种流派、风格的训练方法，也不要用行政命令去解决不同技术观点的争论。"我国的竞技运动训练从20世纪50年代单纯强调学习苏联先进技术，转变为在学习和吸收世界上主要的技术类型和优秀的技术、战术和训练方法的同时，形成了更先进的技术、更适合我国民族体质特点的技、战术和训练方法。在优秀运动员队伍中，通过自己的不断摸索和总结，很快形成了适应自己项目和运动员特点的训练方法和技术风格。中国乒乓球队在1959年取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后，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破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主张以我为主，走自己的路，学习与创造、继承与革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学诸家之长，提倡百花齐放，不搞清一色、一律化，尽可能地接纳世界各种打法，使各种流派在团队里"互相竞争、互相适应、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在解决技术训练中遇到的难题时，坚持领导、教练员、运动员三结合的"集体会诊"方法，使政治领导的作用、教练员的主导作用和

[1] 刘洁．中国举重运动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38-140.

运动员的自觉性、积极性、创造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实现了集体基础上的个人努力，个人努力基础上的坚强集体。训练方法和技术的研究创新使我国乒乓球始终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北京体育科研所搜集翻译了几百万字的世界乒乓球运动技术资料，为我国乒乓球运动走在世界前列作出了贡献，受到了贺龙同志的表彰。1962 年 11 月 12—28 日，中国体育科学代表团由团长赵斌率领，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运动训练科学讨论会，显示了我国体育科研工作者在运动训练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和科研队伍的一定实力。

五、“反右”对体育科研的影响

1957 年《体育文丛》第 4 辑刊登了美国学者 C.H.麦克乐《进行体育科学研究的方法》一文，文章从科学研究者的态度问题、如何发现问题、如何选题、进行研究的一般准备工作、研究的方法五个方面介绍了如何进行体育科学研究。客观地说，在当时我国体育科学研究起点还比较低的情况下，编辑部刊登此文的主导思想是可取的，但该文尚未全部发表就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认为麦克乐是美国资产阶级的体育学者，他所写的《进行体育科学研究的方法》，是一篇贯彻着浓厚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观点的资产阶级的体育科学研究方法。编辑部为此在《体育文丛》第 6 辑上公开作了书面检讨。检讨中写道：“在《体育文丛》上（特别是前四辑）所发表的文章中，关于宣传与论证党对体育方针、政策和在体育活动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方面的文章和篇幅都很少，而运动生理和运动技术方面的东西则很多，有严重脱离政治的倾向。在学习外国的经验方面，我们把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并列，有些地方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超过了苏联。例如《体育文丛》第 4 辑，发表苏联的论文才两篇，而美国的东西却有 3 篇。另外，在没有发表苏联的体育科学研究方法之前，却先发表了美国麦克乐的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对武术的学术讨论也因“反

右”运动将其政治化而中止，很多人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学术问题的政治化在体育科技文化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政治挂帅成为这一时期体育科技的主旋律。《体育文丛》先后开辟了新的专栏或专题讨论，使体育理论界学术交流逐渐减少，介绍学术观点更是由谨慎变为几乎消失，一度给体育科研工作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迟滞了我国体育科研的正常发展。

第七节　体育传媒宣传的发展

体育传媒宣传是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体育传媒的宣传工作。从50年代中期至“文化大革命”，随着我国传媒事业的发展，体育的传媒宣传队伍不断扩大，载体不断增加，为体育的普及、发展、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一、体育学术杂志和专业报纸的创刊与发行

1950年7月1日，《新体育》杂志创刊，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刊头。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体育刊物。《新体育》除刊载指导体育的大政方针和国内外重要的体育新闻、信息外，还刊载不少理论性、学术性很强的重要文章。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苏联及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体育基础理论、学校体育教育理论、运动训练的理论及方法作了大量的介绍。我国一些理论工作者，也撰写论文发表在《新体育》上，这份刊物至今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

1957年3月，《体育文丛》杂志创刊，它是在原来《体育译丛》的基础上创办的，这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个学术性刊物。《体育文丛》的办刊宗旨是：“围绕着体育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继

续介绍外国的先进的体育理论与经验；发表体育科学论文，交流体育教学研究经验；组织体育学术性问题的讨论，探讨和研究体育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并为体育科学研究提供一些参考资料”[1]。《体育文丛》从创办的一开始就坚持强调要“百家争鸣”，鼓励在文丛上“发表不同意见，以至不同观点的文章”，以“开展学术性问题的自由讨论和自由争辩”，并“容许对文丛上任何文章提出不同的意见和批评”[2]。《体育文丛》问世以后，《新体育》逐渐减弱了原有的一些学术色彩，开始向完全普及性的办刊方向转变。

《体育文丛》多次组织学术讨论，如体育“名词讨论会”，主要对“体育”“体育教育”和“体育事业”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平等的讨论。王汝英、袁敦礼、李季芳、林笑峰等发表了意见。陶德悦的研究文章，还提出了用“体育”或“体育文化”概念来规范体育文化现象的两个方案。那次关于体育概念的讨论，虽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但是通过讨论，应该说使体育理论界对什么是“体育”、什么是“体育教育”等名词概念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认识，对体育文化的多样性有了初步的印象。

在《体育文丛》问世的次月，1957 年 4 月 1 日一份主要面向国外读者的杂志——《中国体育》英文版创刊。这是一个以宣传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成就为主的刊物。主要内容是报道新中国广泛开展的群众体育活动（包括富有特色的民间体育和少数民族的体育活动、中国运动员在国内外比赛中的良好表现和优异成绩、各种训练经验）；介绍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武术和中华养生知识，以及报道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体育友好交往。

1958 年 9 月 1 日，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张全国性体育专业报纸《体育报》出版发行，每周两刊，1964 年 7 月 1 日改为每周 3 刊。这是一张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适应各行各业体育爱好者需要的专

---

[1] 改版的话. 体育文丛，1957（1）：1.

[2] 改版的话. 体育文丛，1957（1）：1.

业性报纸。主要内容是及时报道国内外重大体育比赛和各种群众体育活动；报道中国运动员创造优异成绩、为国争光的事迹；介绍国内外体坛明星、优秀教练员和体育界知名人物；刊登各项体育比赛的好成绩和新纪录等资料；开辟有关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的一些问题研究专栏等。几份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和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都辟出专栏，报道国内外体育的消息，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对普及体育和健康的知识，推动体育活动的开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传媒对体育的宣传

在这个时期，体育广播、电影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1955 年 4 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了体育专题节目——《体育谈话》，每周两次（1956 年改为每周 3 次）。1958 年，《体育谈话》节目改名为《体育运动》节目，每天都有固定的播出时间。这个节目主要是及时地报道中国体育的情况和成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一些重大的国内外比赛，还办有实况转播节目，著名播音员张之，就是当时广大体育爱好者所熟悉的体育实况广播和电视传播评论员。1956 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辟了《体育爱好者》专题节目，主要是报道外国体育团、队的来访活动，并通过专线向来访国作专题节目广播。各省、市、自治区的广播电台，在 1958 年以后，增加了播送有关体育新闻的时间，为配合职工体育活动的开展，播送广播体操乐曲。

随着新中国的电影事业的发展，大量反映体育的纪录片和故事片摄制后在全国放映。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对体育健儿和体育工作者不畏艰辛、勤劳创业所取得的成绩和荣誉所展现出来的精神风貌、高尚品德作了翔实的记录和宣传，塑造了体育工作者和中国运动员的崭新形象。

国家体委举办的历届全国运动会，是拍摄纪录片的重点题材。

1959年第1届全运会纪录片《青春万岁》、1965年第2届全运会纪录片《第2届全运会》以及我国第一部大型团体操《革命赞歌》，都再现了大型运动会的盛况，使人备受鼓舞，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好评。1963年与印尼拍摄的《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记录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新运会的盛况，这部长达12本的大型彩色片，当时在国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电影厂还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以反映我国运动员所取得的成绩和付出的努力。1956年国家体委积极开展登山活动时，拍摄了中苏混合登山队攀登慕士塔格峰的影片《冰山之父》，摄影陈德禹还随队登上了顶峰。当登山运动员直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科学考察服务时，1958年电影工作者随登山队员和科学工作者摄制了《雪山找宝》，同年又拍摄了《踏破冰川万年雪》。在新中国建国10周年前夕，即1959年7月，我国女子登山队员在慕士塔格峰创造世界登山纪录时，拍摄了《踏雪穿云上冰山》，摄影沈杰在7200米最后一号营地工作时，遇到暴风雪，身负重伤，成为二等甲级残废。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又拍摄了《征服世界最高峰》，忠实生动地记录了我国登山健儿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使五星红旗飘扬于地球之巅的过程。中国运动员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他们的业绩成为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们向高峰攀登的教材。《征服世界最高峰》一片被评选为1962年第1届百花奖的最佳纪录片摄影奖。《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一片参加了法国戛纳电影节，公开放映达一个月之久。

为促进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在中国乒乓球队未露头角之前，1955年就拍摄了《乒乓球赛》纪录片。1959年当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第一次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时，编摄了《争夺世界冠军》，把周恩来总理亲切会见容国团的情景生动地记录在影片中。1961年拍摄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再现了我国乒乓球队第一次获得男子团体世界冠军以及男、女单打冠军的情景。《国家乒乓球队在成都》拉近了乒乓球爱好者与国手的距

离，目睹了优秀乒乓球运动员的训练、比赛和生活状况。“乒乓热”大大鼓舞了我国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1963年拍摄了在布拉格举行的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乒乓球队获得三项世界冠军；1965年拍摄了我国乒乓健儿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获得五项世界冠军的场面。

篮球、排球、足球为我国广大群众所喜爱。1960年摄制的《中苏篮球赛》，记录了我国“八一”男子篮球队第一次打败苏军男子篮球队；1962年拍摄的我国男子排球队第一次打败苏联国家青年男子排球队的《中苏排球激战》，以及1957年拍摄的足球重大比赛《第二个回合》，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评。

1959年为冰雪运动拍摄的《冬天里的春天》、1961年拍摄的《冰雪健儿》、1962年我国速滑男队赴莫斯科参加世界滑冰锦标赛时拍摄的《滑进世界先进行列》、1962年邀集我国体操名将摄制的《健美体操》，以及《全国游泳跳水锦标赛》和《体操健将》等新闻纪录片都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鼓舞了运动员的士气。

1956年由刘琼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两个小足球队》，是新中国的第一部体育故事片。后来又有了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女篮5号》（1957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球场风波》（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冰上姐妹》（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水上春秋》（1959年）等。其中的《女篮5号》（谢晋编导，刘琼、秦怡、曹其纬主演）还获得了全国第1届电影百花奖。

体育新闻纪录片和故事片的上映，对宣传体育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自从1952年6月发行了第一套体育邮票——《广播体操》特种邮票以后，1955年10月又发行了纪念《全国第1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的体育邮票一套（共5枚）。1959年的“第1届全国运动会”召开，也发行了纪念体育邮票一套（共16枚）。体育邮票不仅将体育健儿的飒爽英姿凝聚在方寸之间，而且将有关体育运动的各

种知识包容在小小的画面里，内涵丰富，寓意深刻。

三、体育图书出版业的发展

1954 年 1 月 1 日，人民体育出版社在北京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的一家体育专业出版社。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国内的体育专业书籍主要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根据专门研究者以《全国总书目》《全国新书目》和《中国出版年鉴》的调查统计，从 1949 年至 1965 年，全国共出版了 1283 种体育图书，平均每年（按 16 年平均）802 种，从 1949 年至 1965 年，共出版丛书 21 种，另外还有一般丛书中收入体育内容的 9 种。

在出版的体育图书中，涉及体育科学的各个领域，在 1949 至 1965 年间，1957 年至 1959 年间形成了出版体育书籍的高峰期。

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至 1988 年，共翻译出版外国体育图书 470 种。但 1949 年至 1965 年，译自苏联的书就达到 233 种，其他国家：日本的 4 种，美国的 3 种。译自苏联的图书占这一阶段翻译体育图书的 93.9%。而翻译出版的苏联体育书籍，大部分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 10 年，而 1955 年全年出版体育书 114 种；从其中译自苏联的书就有 59 种，占全年出书总数的 51.6% [1]。在当时政治上“一边倒”的国际环境下，以苏联为榜样，翻译出版了包括苏联政府的体育文件、体育理论、运动技术、运动训练和身体锻炼等多方面的书籍，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我国体育管理体制、体育教育、科研体制、运动训练体制等方面，由于苏联模式的影响，一些不切合中国国情的做法对我国体育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也不同程度地造成了阻碍和损失。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尽快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落后的体育面

[1] 林思桐. 从体育图书的出版状况看新中国体育发展的轨迹. 体育文史，1989（6）：13.

貌，增强人民体质，为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适应和满足亿万人民在新制度下迸发出来的积极要求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情，适应以开展“劳卫制”为中心的群众性体育运动的需要，出版部门出版了大量宣传体育的方针政策、目的意义和锻炼方法的图书。同时，为满足正在兴起的各种类型的运动竞赛的需要，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介绍运动技术和运动训练的书籍，以及开展国际体育的有关著作。因此，在1959年前，“总论”“田径”“体操”“球类”“水上运动”“国防体育”6类图书的出版种数多于同一时期其他各类图书[1]。大量体育书籍的出版，为普及体育知识，推进群众体育活动和迅速提高竞技运动水平，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第八节　对外的体育交流与斗争

为了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争取我国应有的国际地位，体育作为外交的一种途径和方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了打破反华势力的封锁，体育在积极对外交流的同时，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反华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对外的体育交流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对外的体育交往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及一些友好国家和地区。50年代中期以后至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从逐渐疏远到最后破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为了打破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孤立、封锁，我国的外交战略开始转向以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为中心，与许多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形成与美苏抗衡的一种新的国际力量。中

[1] 林思桐. 从体育图书的出版状况看新中国体育发展的轨迹. 体育文史，1989（6）：15.

国的外交态势，直接影响了体育的对外交流。体育的对外交往，为实现我国的外交政策，为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一）50年代后期的对外体育交流

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已经有了疏远的迹象，但中国体育的对外交往，仍延续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学习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经验，积极邀请苏联和东欧国家体育代表团及专家访华，参加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的国际赛事。同时，组队参加我国已加入的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举办的国际比赛。

1956年8月1—26日，由国家体委副主任卢汉任团长，成员包括国家体委竞赛司、上海体委、天津体委、广西体委、武汉体委、一机部体协、轻工部体协的领导人员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了苏联，深入地了解了苏联举办综合性运动会的管理经验以及体委和行业体协工作情况，还参观了苏联各族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回国后，根据中国的国情，参照苏联的经验，筹办了1959年的第1届全运会。由此形成了全国统一的体育竞赛体系，推动了中国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

我国的篮、排、足球运动，从50年代初期以来，经过多次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互访活动，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1959年7月10日—8月3日，匈牙利国家男子篮球队应邀前来我国进行访问比赛。这支球队曾获第12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欧洲锦标赛、第3届国际青年联欢节冠军，是在国际比赛中享有较高声誉的世界劲旅。4月14日—5月4日，中国男篮访问匈牙利时，曾以71∶85负于他们。3个月后匈牙利队来访，中国男篮针对这支世界强队进行了充分细致的准备。7月的北京，酷暑难耐，当时体育馆里没有空调设施。比赛当天，体育馆内更是闷热难当，但观众为中匈男篮双方队员的精彩球技和奋力争夺所吸引，观众手中的扇子统一地随比赛的节奏摇动或停止，气氛异常热烈。比赛先后出现4次平局，比分交替上升。最后中国队以73∶70获胜，

结束了比赛，终场的哨声一响，全场沸腾，6000余名观众的掌声震耳欲聋。这是中国男篮与匈牙利男篮自1949年以来经数次交锋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此后，国家队、“八一”队、北京队和黑龙江队又连续5次打败了匈牙利队。9月，中国男篮又战胜了来访的世界第四名保加利亚队和第16届奥运会第六名捷克斯洛伐克队。我国的男篮已经具备了战胜世界强队的实力。中国运动员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特点，逐渐形成了快、变、准的战术风格，在实战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为达到世界水平打下了基础。

中国的足球在体育对外交流中，经过选派优秀选手出国学习和国家队互访，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1959年10月，我国举办了中、苏、匈三国足球对抗赛。应邀参赛的苏联队是参加1958年世界杯足球决赛的原班人马，队员中有8名全苏功勋运动员和3名运动健将。中苏比赛时，苏队在开赛后一分钟，便闪电式地攻进了一个球。中国队在多次进攻无效的情况下，加强防守，全场以0∶1告负。

匈牙利队是国家二队，其中有数名队员是国家队的后备人选。中国队在与匈牙利队交锋中，发现匈队的攻击力不强，采取的是求稳的战术，便积极组织反攻，前89分钟，中国队射门12次，匈牙利队射门15次，但双方均无建树。最后一分钟时，中国队得球反攻，在匈队门前的混战中，匈队的伯尔山尼补防时不慎将球碰进了自家的大门，中国队以1∶0获胜。

这次对抗赛表明了中国足球与世界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但也证明了我国足球水平在总体上有了较大的提高。这次对抗赛带动了我国足球运动的开展，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足球高潮[1]。

中国还组队多次参加友好国家间的邀请赛、访问赛。

1957年7月30日—8月9日，中国再次派出篮球、排球、足球、体操、田径、游泳、举重、网球、乒乓球、羽毛球队，共158

[1] 年维泗. 第一次高潮. 体育文史，1984（4/5）.

人组成的代表团，由马约翰率领，参加了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第 3 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中国举重运动员陈镜开以 139.5 公斤的成绩第四次打破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并以 322.5 公斤的总成绩夺得冠军。

1958 年 9 月 20—2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代表团一行 123 人，由团长韩复东大校率领，参加了在民主德国举行的第 1 届友军夏季运动大会的射击、体操、举重、游泳、田径、足球、篮球和战斗性多项运动 8 项竞赛。参赛的有保加利亚、民主德国、中国、蒙古、朝鲜、波兰、苏联、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共 9 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举重队成绩仅次于苏联队，获亚军。陈镜开在 9 月 26 日最轻量级比赛中，成功地举起了 140.5 公斤的杠铃，第 5 次打破了世界纪录，将他自己所保持的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提高了 1 公斤[1]。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20 世纪 50 年代的国际环境，使体育的对外交往成为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及其他友好国家的体育交往，为打破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的封锁，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争取获得国际对中国的承认，增进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和友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这一时期对外体育交往的首要任务。体育对外交往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功能，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接见外国体育代表团、队，实际上是通过体育团、队向这些国家传达了某种政治信息。体育成了当时外交工作的“先行官”。

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的领袖；在 1952 年、1956 年第 15 届、第 16 届奥运会上，苏联的金牌数和奖牌总数都超过了体坛霸主美国队，跃居第一位；在资本主义阵营国家对中国实行孤立、封锁时，苏联给予中国以大力的支持和援助，所以，新中国必然会将体育交往的重心放在苏联。通

---

[1] 国家体委文史委、中国举重协会. 中国举重运动史.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109.

过交往学习和借鉴苏联的体育经验，同时，苏联对新中国的体育在各个领域和层次上都有着重大的影响。新中国的体育事业要发展，学习外国体育的先进经验是必然的选择。但当时的国际环境，可供学习和借鉴的只有苏联和东欧模式。在具体的学习和操作过程中，未能根据中国国情进行很好的消化吸收，存在着照搬照抄的引进，对后来体育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60 年代冲破体育封锁的艰苦努力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关系裂痕的加深发展至公开论战，在苏联的指挥棒下，社会主义阵营中一些国家与中国在外交上开始疏远，反华势力趁机对中国围攻和破坏，又由于中国奥委会因国际奥委会在少数人操纵下图谋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而于 1958 年 8 月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使中国的国际体育环境比 50 年代更为险恶。但是，中国没有关上与国际体坛联系的大门，除了积极参加唯一保持正常关系的国际乒联的各项活动外，还尽可能地努力开展其他国际体育交往，以打破对中国体育的国际封锁。中国体育界没有减缓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前进步伐。

1961 年，中国在北京主办了第 26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此后又参加了第 27、28 届世乒赛，并举办了 1964 年、1965 年乒乓球国际友好邀请赛。

1963 年夏天（7 月 11 日—8 月 12 日），中国邀请两届汤姆斯杯冠军印度尼西亚国家羽毛球队访华，该队与中国羽毛球队和一些地方队的比赛中，战绩是 4 胜 6 负，其中与中国国家队的 5 场比赛是 1 胜 4 负。次年中国队访问印尼时取得了 6 战全胜的佳绩。1965 年 10 月 13—27 日、10 月 27 日—11 月 3 日，中国羽毛球队先后访问了世界羽坛强国丹麦和瑞典，在全部 34 场比赛中有 33 场以 2∶0 取胜对手。中国旋风横扫北欧，中国羽毛球队被誉为羽坛的“无冕之王”。外电评价道：“只要没有中国参加，任何一个冠军都是不真实的。”

此外，在1963年至1966年间，中国还派队参加了国际网球比赛等，中国参加和组织国际比赛呈明显增加的趋势。

在这一时期所有的对外体育交往活动中，1961年主办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1963年参加的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是60年代中国对外体育交往和国际体坛影响极大的两件赛事。

1. 举办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国际乒联章程规定，其成员可以是“国家和地区”，台湾作为一个地区性组织在国际乒联中也保留着席位。因此，在中国中断与国际奥委会和其他8个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后，继续和国际乒联保持着正常联系。1961年，中国在北京主办的第一个世界性体育大赛正式宣告了乒坛“中国时代”的到来。

参加这届锦标赛的有32个国家和地区的243名运动员。中国运动员夺得了男子团体和男、女单打3项冠军、4项亚军和8项第3名。

1963年4月5—14日，我国乒乓球队去布拉格参加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再次获得世界冠军，庄则栋蝉联了男子单打冠军；张燮林、王志良获男子双打冠军；中国女队获团体第3名。

1965年4月15—25日，我国乒乓球队去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参加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蝉联团体冠军；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也第一次夺得团体冠军；庄则栋获得了男子单打冠军；林慧卿、郑敏之获女子双打冠军；张燮林、王志良获男子双打冠军。中国队共获得5项冠军、4项亚军和7项第3名。

2. 积极参与新兴力量运动会

（1） 新兴力量运动会的由来

1962年，第4届亚运会东道主印度尼西亚基于同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良好关系和它自身的穆斯林立场，为主持正义和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与尊严，拒绝台湾和以色列参加第 4 届亚运会。这个行动惹恼了国际体育组织中的某些人。国际奥委会和国际举重联合会、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等国际体育组织，对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亚洲国家施加压力，宣布不承认第 4 届亚运会，并威胁其成员国不得派队参加第 4 届亚运会，否则将受到处罚。有些国际体育组织还对第 4 届亚运会主办国印度尼西亚提出了严重警告。为了摆脱一些国际体育组织的控制和歧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于 1962 年 9 月间提出了举办不受大国控制的新兴国家运动会的设想。9 月 26 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声明，支持印度尼西亚召开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倡议。同年 11 月 22 日—12 月 18 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应邀访问印度尼西亚，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黄中和印度尼西亚体育代表团团长马拉迪就苏加诺总统所设想的新运会事宜交换了意见。中国体育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个设想，希望能在短期内将此设想变成现实。当新运会的设想还处在萌芽状态时，国际奥委会却于 1963 年 2 月 7 日在瑞士洛桑举行的执委会上，以印度尼西亚政府拒绝发给台湾和以色列运动员参加第 4 届亚运会的签证为由，作出了“不定期地禁止印度尼西亚参加奥运会”的决议。这意味着国际奥委会已中断了印度尼西亚的会籍，也意味着不允许印度尼西亚参加 1964 年的东京奥运会。

面对着强大的压力，印度尼西亚别无选择。2 月 9 日，印度尼西亚体育部即对此事发表了公告，强烈地谴责了国际奥委会的行径，指出：“把印度尼西亚排除出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不会使印度尼西亚受到有害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决不会在国际运动中陷于孤立。相反地，印度尼西亚将能更加自由地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组织没有帝国主义分子和殖民主义分子参加的新的运动会，即‘新兴运动会’。”公告还指出：“现在是时候了，新兴力量国家应当以革命的方法，摧毁仍在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控制下的国际体育运动的精神和机构，建立符合于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新世界的理

想的新机构和新组织”[1]。

印度尼西亚的立场和态度，受到了亚、非人民的广泛赞扬。1963年2月12日，国家体委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致电印度尼西亚体育部和奥委会，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的正义立场。阿拉伯联盟要求成员国与印度尼西亚采取一致态度，支持印度尼西亚，抗议国际奥委会的无理决定。

1963年2月13日，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宣布印度尼西亚退出国际奥委会，同时命令体育部长马拉迪筹办不受大国控制的新兴力量运动会。他指出：新兴力量国家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印度尼西亚要以举办新运会来与国际奥委会抗争。苏加诺总统甚至把举行新运会的重要意义同印度尼西亚取得的独立相提并论。

苏加诺的倡议得到了热烈响应。它体现了万隆会议的精神，符合亚、非、拉人民要求举办不受大国控制、平等友好，并能显示自己力量的运动会的心愿，也是奥林匹克精神中强调通过国际体育比赛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团结和互相了解的体现。

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了新运会的坚强后盾。1963年4月20日，刘少奇主席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同苏加诺总统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强烈谴责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无限期地停止印度尼西亚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专断行动。中国政府重申坚决支持苏加诺总统关于组织‘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倡议，并且表示愿意尽一切可能为实现这一倡议而作出贡献。”[2]当时恰逢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仍然帮助印度尼西亚修建了体育场馆，捐赠了体育器材，甚至还运去了新运会的餐具。

1958年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后，中国无法参与奥运会

---

❶ 任道. 国际体育运动中的新旗帜.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63：16.

❷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4）：精华本上册.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39.

和正式的国际比赛，但中国从未放弃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作出贡献和用优异成绩为国争光的宏愿，新运会的举办无疑为新中国运动员创造了一个在国际体坛展示自己力量的机会，是中国体育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走向世界的一座里程碑。

1963 年 4 月 27—29 日，在雅加达举行了新运会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柬埔寨、中国、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伊拉克、马里、巴基斯坦、越南、阿联（现埃及）、苏联 10 个国家的代表和南斯拉夫、锡兰两个国家的观察员。会议宣布：所有新兴力量国家和宣布支持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国家都将被邀请参加第 1 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会议选出了筹备委员会，印度尼西亚当选主席，中国、阿联、苏联分别当选为亚洲、非洲、欧洲副主席，委托印尼推荐拉丁美洲副主席。会议宣布，新运会组织于 1963 年 4 月 29 日诞生，并决定同年 11 月中旬在雅加达举办第 1 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以后每隔 4 年在新兴力量青年中间举行友好和平的业余体育比赛。

1963 年 6 月 5 日，国际奥委会作出了要求各国奥委会不参加新运会的决定。国际奥委会秘书长迈耶说："国际奥委会获悉印尼计划组织一个新的运动会，这是苏加诺倡议的一个纯政治性的计划，这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一定的危险"，"这是能使其他地区仿效的一个危险的先例"[1]。国际田联、国际泳联、国际举联、国际足联等组织随后也相继宣布禁止其会员参加新运会，并企图制裁参加者。但是，新兴力量国家的运动员，不顾威胁，毅然参加了这届盛会。

1963 年 11 月 10 日，第 1 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雅加达开幕，参加运动会的有 48 个国家和地区的 2404 名运动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70%以上，在国际体育史上，还没有一个运动会在它开创的时候就有这样大的规模。11 月 24—25 日，亚、非、拉美和欧洲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雅加达举行了第

[1] 任道. 国际体育运动中的新旗帜.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63：24.

1届新运会代表会议，正式宣布成立新运会联合会，通过了新运会会章，决定在亚、非、拉美和欧洲建立新运会洲际委员会。

1965年9月25日，新兴力量运动会亚洲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会议选举中国为执委会主席，决定于1966年举办第1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

(2) 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召开

1963年11月10—22日，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雅加达举行。48个国家和地区的2404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其中，由政府或全国性体育组织派遣体育代表团的有印度尼西亚、中国、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沙特阿拉伯、巴勒斯坦、阿联、几内亚、马里、索马里、突尼斯、摩洛哥、古巴、玻利维亚、墨西哥；由青年组织名义派遣体育代表团的有苏联、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及利亚；由全国性工人体育组织或其他团体派遣体育代表团的有意大利、法国、芬兰、比利时、荷兰、乌拉圭、多米尼加、日本；由基层单位派遣体育代表团的有阿根廷、智利、巴西；尼日利亚和缅甸派遣了代表和观察员。

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共有20个比赛项目：田径、自行车、射箭、游泳、跳水、体操、柔道、摔跤、举重、击剑、拳击、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水球、帆船、曲棍球。运动员在比赛中创造了较好的运动成绩。

中国派遣了由229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以66枚金牌、56枚银牌、46枚铜牌的成绩名列第一，并打破了举重和射箭两项世界纪录。一批年轻有为的运动员脱颖而出，一部分竞技项目显示了巨大的潜力，举重、乒乓球、射箭、体操、田径选手取得了较优异的成绩。虽然一些项目的成绩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但却成了我国体育赶超世界水平的起跑线。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正式全面地参加国际比赛就展示了中国运动员的才能。

第 2 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原定于 1967 年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举行，中国首都北京为主办第 2 届新运会的替补地点。1965 年秋，印度尼西亚政局发生变化，对外政策巨变，反华事件不断，最终导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不久，阿联宣布由于经济原因不能主办原定于 1967 年举行的第 2 届新兴力量运动会。而原定的替补地北京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几乎中断了与国际社会的一切联系，也无暇顾及这项赛事，新兴力量运动会从此变成了历史。

（3）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

1966 年 11 月 25 日—12 月 10 日，第 1 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在柬埔寨金边举行。这是亚洲新兴力量人民第一次独立自主举办的新型综合性国际体育比赛。中国、朝鲜、日本、蒙古、巴基斯坦、锡兰、黎巴嫩、叙利亚、越南、老挝、巴勒斯坦、尼泊尔、伊拉克、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多名运动员参加。共举行了篮球、排球、田径、游泳和跳水、体操、击剑、射击、射箭、网球、乒乓球、羽毛球、自行车、足球、水球、拳击、摔跤、柔道、举重、赛艇、帆船等项目的比赛。

1963 年新兴力量运动会后，亚洲体育事业获得了蓬勃发展，各国间的体育交流日益增强，但国际体育组织中的某些人仍然坚持制造“两个中国”，并企图孤立中国，破坏中国运动员和各国运动员的友谊和体育合作，并“制裁”新运会参加者，阻止亚洲各国参加亚新会。举办亚新会，是对国际体育组织中某些人的蛮横作风作了一次有力的冲击。

举办这次亚洲新运会是亚洲各国人民的一件大事，为了办好这届比赛，柬埔寨政府在金边市区修建了一座面积达 1.9 万平方米的体育城。它是一个设备比较完善的建筑群，坐落在国家体育场的西北面，包括 8 幢四层的宿舍楼、一座体育馆、两座餐厅、洗衣室、电话室以及一些田径和球类的练习场地，这是在中国的帮助下，用 5 个多月的时间建成的。

首届亚新会在规模、项目设置、参赛人数、运动水平等方面均不低于当时的亚运会。中国运动员共获得113枚金牌、59枚银牌和36枚铜牌，有2人2次打破世界纪录，44人65次打破51项亚运会纪录，19人19次打破全国纪录，再次展示了中国竞技体育的水平。与随后仅相隔14天举行的第5届亚运会上日本队的成绩相比，可看出中国已基本具备了与日本抗衡的实力，其中一些项目的成绩已冲出亚洲，接近世界水平。

(4) 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影响

新兴力量运动会和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虽未能发展成为传统的国际性运动会，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却是对国际体育秩序以很大的冲击，而且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1955年万隆会议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了独立。地域广阔的亚、非、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舞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由于大批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的加入，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国际运动，而作为奥林匹克运动领导机构的国际奥委会与整个国际社会相脱节，无视新兴力量国家的存在和要求，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坚持错误立场。国际奥委会中的少数领导人甚至利用手中的强权势力制裁新兴力量国家，限制一些国家平等、自主地开展体育活动，阻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针对当时国际奥委会中个别人无视第三世界国家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地位和权利的蛮横作风，新兴力量国家针锋相对，成立了自己的国际体育组织，并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新兴力量运动会。新运会与国际奥委会分庭抗礼，但决不是对奥林匹克理想的背叛。这一切使国际奥委会认识到：在国际体育事务中运用强权势力压制第三世界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尽管“新兴力量”是个政治概念，新兴力量运动会和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是在特定时间，由特定事件促成的，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运动会，是对国际奥委会的一个警告和一次强有力的挑战，但是

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次挑战的意义，这种对国际奥委会从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挑战，对国际奥委会中个别领导人无视亚、非、拉新兴国家权利的做法敲响了警钟，促使国际奥委会发生了某些改变。

国际奥委会原定于1963年10月14—19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第60届会议和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与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各国奥委会的联席会议，可是肯尼亚政府为执行非洲首脑会议决议，于8月初宣布拒绝发给南非和葡萄牙代表入境签证。国际奥委会先威逼肯尼亚政府于8月19日前重新考虑其决定，否则将禁止肯尼亚参加奥运会并改变会议地点。肯尼亚政府于8月20日发表声明，重申拒绝南非、葡萄牙代表入境，并称：如果国际奥委会试图把肯尼亚排斥在奥运会之外，肯尼亚将要求非洲所有的国家抵制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正面临着即将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威胁，为了不激怒非洲国家，只得将会议临时移至联邦德国的威斯巴登举行，却没敢制裁肯尼亚。

1965年，第1届非洲运动会在布拉柴维尔举行，主办者拒绝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莫桑比克、安哥拉、罗得西亚参赛。国际奥委会面对着与三年前第4届亚运会主办国印度尼西亚拒绝台湾和以色列参赛一样的情况，却没敢对主办者进行处罚，其中的主要原因便是：担心制裁会使更多的非洲国家加入到新兴力量运动会的阵营之中❶。

新兴力量运动会的举办也使国际奥委会逐渐认识到，缺少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参与，给奥林匹克运动本身的发展也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没有中国的奥运会不是真正的奥运会。这种认识对国际奥委会重新审视中国的价值，并最终接纳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起到了虽然缓慢但却深刻的影响。

当时，相当一部分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的体育水平仍然较低，

❶ 伍绍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234.

一些亚非国家的选手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通过新运会的比赛，各国运动员交流了技术，对推动各国体育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一批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员在新运会上打破本国纪录，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自己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体育事业充满了信心。

二、中国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的摩擦与斗争

中国奥委会历来是国际奥委会大家庭的成员之一。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同年 10 月 26—27 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 1 届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通过了体育总会名单，并推选冯文彬为主任，全国体总对外代表中国奥委会。

20 世纪 50 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不断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企图使"两个中国"同时进奥运会的目的得逞。为维护国家主权，中国奥委会与反华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 参加第 15 届奥运会

1952 年 2 月 5 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致函国际奥委会，声明决定参加第 15 届奥运会，并声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合法体育组织。1952 年 2 月 13 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表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 46 届全会上散发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继续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组织》的书面发言[1]。

1952 年 3 月 23 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致函国际业余篮球、田径、游泳、足球、自行车等联合会，声明自 1949 年

[1]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1）：精华本上册.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已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体育组织，并愿继续参加各个国际体育联合会的组织、会议与体育活动，决不允许台湾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名义进行任何活动。同年4月25日、5月7日、6月14日，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国际业余篮球联合会、国际足球联合会等国际体育组织相继致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替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该会会员，可以参加该年的奥运会比赛[1]。

然而，当时摆在国际奥委会面前的问题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台北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同时宣布自己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而按照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奥委会在一个国家只承认一个全国性的奥林匹克组织（国家奥委会）。尽管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表中国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奥委会的某些人却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新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复杂的局面，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当时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占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但根本原因还是由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造成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给赫尔辛基奥运会组委会通报中国将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电报迟迟不见回音。6月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再度通知奥运会组委会，我国运动员将参加第15届奥运会，并要求它立刻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联系，以便进行必要的准备[2]。而台湾也正在大张旗鼓地准备参加第15届奥运会。6月11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埃德斯特隆（Sigfridv Edstrom）电告台湾，不必参加奥运会[3]。6月16日，距奥运会开幕只剩33天了，我们才收到由赫尔辛基组委会转来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埃德斯特隆的电报，电报称：“由于中

[1]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1）：精华本上册.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4-5.

[2] 张鲁雅. 世纪情——中国与奥林匹克.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109.

[3] 董守义. 奥林匹克与中国//奥运会与中国.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38-39.

国的混乱，在困难解决之前，任何运动员不得参加比赛。”[1]又说此事已“同时通知台湾及北京”。同日，埃德斯特隆又自己来电说，国际奥委会对中国参赛事有一个公告，另行函寄。这个公告的内容是：虽然“目前北京的新的体育组织正要代替它（旧中国奥委会），代表中国体育运动的地位，这个组织似乎领导着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青年”，国际奥委会希望中国青年参加奥运会，然而目前国际奥委会的基本组织与章程妨碍了这一次的参加。因此“国际奥委会希望中国问题能在来年解决，现在中国的两个组织——台湾的一个和北京的一个，不得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2]。次日，埃德斯特隆又补发来一封电报，甚至称：“你们的奥委会尚未被承认，去赫尔辛基是徒劳的。”[3]很显然，国际奥委会中的部分人拒绝并阻止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以合法席位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他们中的某些人明显地不了解中国，有人甚至敌视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对中国的偏见与对立，使一些人站到了错误的立场上，中国席位问题实质上是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问题。

7月5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对无理阻挠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一事向国际奥委会提出了强烈抗议，指出：按照《奥林匹克宪章》，各国奥委会有权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奥运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而成，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合法的中国奥委会，并继续参加各有关国际运动联合会。因此，它完全符合《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具有派出代表参加奥运会的权利。

7月8日，埃德斯特隆再次来电，一方面坚持中国运动员不得参加比赛；另一方面“请转告董守义先生，希望他7月17日来赫尔辛基”。另外，由国际奥委会秘书长出面要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

---

[1] 董守义．奥林匹克与中国//奥运会与中国．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38-39.

[2] 董守义．奥林匹克与中国//奥运会与中国．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38-39.

[3] 董守义．奥林匹克与中国//奥运会与中国．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40.

义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章程寄给国际奥委会。董守义复电指出：只要国际奥委会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办事，接纳体总所派遣的代表团参加奥运会，我当然会和中国运动员一起到赫尔辛基。至于体总是中国的国家奥委会一事并不是一个需要开会讨论的问题，所以无须把它的章程加以审查❶。

7月1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和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致电埃德斯特隆，抗议国际奥委会将于7月16日召开的第47届奥委会上，把所谓重新讨论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即中国奥委会）问题列入议程。7月16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代表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7届会议上发表声明，要求继续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并立即邀请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派运动员参加第15届奥运会。

遗憾的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埃德斯特隆和副主席美国人布伦戴奇等并未接受中华全国体总的抗议。他们在7月17日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提出了所谓的"中国奥委会"问题，要求国际奥委会委员同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决议，即拒绝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并且提出两个办法：一是同时承认两个中国奥委会，一是只承认台湾"体协"为中国奥委会。同日，台湾"体协"的代表郝更生在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发言，他讲道："董守义教授很久以来已与我们失去了联系，有人告诉我说他已经被送进铁幕中的集中营，后来又听说他失踪了……我认为董教授的名字这个时候被利用仅仅是一个傀儡，目的是为了造成国际奥委会委员间的混乱。"郝更生又拿出一张卡片说："我手上有1948年伦敦奥运会的身份证，其中有董教授的签名，当你们注意到董教授过去的签名与现在给国际奥委会电报上的签名并不相同时，对你们将是一种惊奇……"❷这个发言引起了种种猜测，我国代表盛之白同志义正辞严地驳斥了这个发言，

❶ 董守义. 奥林匹克与中国//奥运会与中国.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39.

❷ 董守义. 奥林匹克与中国//奥运会与中国.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40.

并郑重声明董守义委员不久就来赫尔辛基与大家见面。拒绝中国参赛的执委会决议被多数人否决了，国际奥委会以33票对20票通过了一个妥协方案，将中国席位问题予以“保留”，同时作出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运动员和台湾运动员参加第15届奥运会。

次日，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布伦戴奇发表声明：“为了免除一切误会，有必要提出国际奥委会并不承认任何中国的奥委会。我们破坏了我们的规程，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对已经在来赫尔辛基途中的中国运动员的同情。国际奥委会授权他们参加第15届奥运会。这个决定绝不应予误解，这不是开出一个先例，这只是一个例外的决定。”[1]这个声明表明了布伦戴奇对国际奥委会第47次全会决议的不满。

几乎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方面均做出了强烈反响。荣高棠和董守义致电国际奥委会严正声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组织起来的并代表着全中国人民的全国性业余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才能代表中国人民参加国际奥委会及其所承认的各种国际运动联合会。”台湾国民党教育部长程天放则称：如果大陆参加，台湾将退出比赛，“决不与共匪选手在同一运动场上参加任何活动”。接着，郝更生宣布台湾退出第15届奥运会[2]。

7月18日，中国接到了第15届奥运会组委会主席欢迎中国代表团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邀请信。第二天——7月19日，奥运会就要开幕了，赫尔辛基远在万里，中国去还是不去？周恩来总理当机立断，于7月19日批示：“要去！”

7月23日，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代表团即宣布成立。团长荣高棠，副团长黄中、吴学谦，总指导董守义，代表团由男子篮球队（教练员牟作云）、足球队（教练员李凤楼）和男子游泳选手吴传玉及随团译员、医生、记者等共40人组成。7月24日深夜，

[1] 董守义．奥林匹克与中国//奥运会与中国．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40.

[2] 华智．夙愿——董守义传．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领导，在关切地询问了准备情况后，又亲切地指出：此去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会就是胜利！正式比赛可能赶不上了，可多与芬兰运动员进行比赛，积极参加友好活动。

7月29日上午11点，代表团到达赫尔辛基机场。董守义一走下飞机，就受到前来迎接的熟识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拥抱，“董守义早已死在大陆集中营”的谣言不攻自破。当天中午，在奥运村内举行了升旗仪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整齐地站在旗杆前，大批新闻记者和其他国家的运动员闻讯赶来。曾参加过第14届奥运会的中国足球优秀选手张邦纶荣幸地成为升旗手。五星红旗伴着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在异国他乡湛蓝的天空。在奥运村升起五星红旗的同时，奥运会主会场及重要赛场、我代表团驻地和赫尔辛基街道两旁，中国的国旗和其他国家的国旗一起高高飘扬。

但是，中国代表团到达之日，离第15届奥运会闭幕只有5天了，大部分比赛已近尾声。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赶上了百米仰泳比赛，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正式参加奥运会比赛的运动员。由于旅途劳累，吴传玉百米预赛成绩为1分12.3秒，列小组第五位，未获得决赛权。足球队和篮球队未能参加正式比赛，后来与芬兰的球队进行了数场友谊比赛。

8月1日晚，中国体育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酒会，招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前来参加酒会的不仅有来自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朋友，还有美国、英国、加拿大、奥地利、新西兰、瑞典、瑞士、澳大利亚和芬兰的朋友，他们称赞中国代表团忠于奥林匹克理想，在奥运会开幕后还赶来参赛。8月2日，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奥运会和平营活动，在由芬兰和平委员会主持，有1.5万余名芬兰青年与世界各国优秀运动员的会见大会上，我国篮球运动员陈文彬发表了热情的演说。奥运会后，代表团参加了国际体育教育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新中国体育运动发展的情况。

新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历尽艰难，但飘扬在奥运会会场上空的

五星红旗，向全世界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参加奥运会的合法权利。同时，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参与第15届奥运会的过程中，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同世界人民加强友谊的良好愿望。

（二）被迫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在参加了第15届奥运会后，我国继续要求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1954年5月14日，在希腊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全会上，再次讨论了中国代表权问题，终于以23票对21票通过了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国家奥委会。但是，1952年当选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却在未经任何讨论的情况下，将中国台湾的体育组织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继续列入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之中，在以后的国际奥委会一系列有关会议上，中国一再对此提出抗议，要求取消对所谓台湾“奥委会”组织的承认。1956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参加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16届奥运会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并且为了使台湾运动员也能参加这次盛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参加第16届奥运会筹备委员会于9月2日发出《为邀请台湾运动员参加全国选拔赛的通知书》《关于台湾省运动员参加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队选拔赛的办法》及《关于香港、澳门运动员参加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队选拔赛的通知和办法》。10月21日，由来自全国1400多名运动员经过选拔而出的举重、游泳、体操、田径、射击、足球、篮球等项目的运动员共92人，组成了中国体育代表团，整装待发。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黄中和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作为先遣人员于11月4日到达澳大利亚墨尔本。

但是，国际奥委会在邀请中国参加第16届奥运会的同时，也邀请台湾以所谓的“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在第16届奥运会组委会的文件上，不断出现“北京中国”“福摩萨中国”的字样。中国人民忠于奥林匹克理想，积极争取回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中，但中国人民决不拿原则作交易。为了新中国的尊严，在忍无可忍之中，

于11月6日，中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发表了声明：由于国际奥委会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坚持非法邀请台湾参加第16届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在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之前，不能参加本届奥运会。

在1956年奥运会前，于1月23—25日在罗马举行的第52届国际奥委会全会上，董守义一次又一次地申明中国奥委会的立场，一次又一次地抗议图谋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严正要求国际奥委会撤销对台湾的所谓“中华体育协进会”的承认，但国际奥委会在布伦戴奇的把持下，仍然坚持其错误立场。在抗议无效后，我国被迫宣布不参加墨尔本奥运会，先期到达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黄中和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在第16届奥运会开幕的当天——11月22日愤然离开墨尔本回国，本已集结广州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奉命解散。

1956年以后，陆续有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在承认中国唯一合法的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同时，又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接纳了台湾的体育组织。

1957年9月22—27日，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赴保加利亚的索非亚参加了第53届国际奥委会全会，就中国合法席位问题据理力争。而国际奥委会的少数人仍坚持使用所谓的“北京中国”“福摩萨中国”。在会后的《奥林匹克公报》上，也出现了这样的用语。董守义于12月20日给布伦戴奇写了一封抗议信，布伦戴奇于1958年1月8日给董守义的复信写道：“12月20日来函收悉。对于在记录中将你的国家名称弄错一事，我感到遗憾，秘书长迈耶先生将作必要的更正。”但他坚持说“在台湾存在着一个单独的政府”，甚至胡说什么“台湾过去最后是属于日本的一部分，而不是属于中国的。事实上（台湾）本地人，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并指责董守义先生“不断地把政治带到我们的会议上来”[1]。

---

[1] 董守义. 奥林匹克与中国//奥运会与中国.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55.

布伦戴奇竟然以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身份否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使中国人民感到了极大的愤怒。董守义立即回信，谴责布伦戴奇歪曲事实："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历史事实。诚然，在1895—1945年间，台湾确曾一度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强占，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台湾重新归还了中国。"❶

此后，布伦戴奇和董守义又有过通信，但尖锐的对立使双方未能就此达成谅解，也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6月1日，布伦戴奇复信指责董守义先生："你身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却不顾自己的职责，在任何机会都企图提出政治问题，假如你继续违背我们宪章的文字和精神的话，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求你辞职"❷。

董守义在8月19日写给布伦戴奇的最后一封信中答道："像你这样玷污奥林匹克精神、破坏奥林匹克宪章的人已经没有任何资格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所有忠于奥林匹克精神的人，都会反对你。……奥林匹克精神已经被蹂躏无遗，为了维护奥林匹克精神和传统，我正式拒绝同你合作，拒绝同你把持的国际奥委会发生任何联系"❸。

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大气候中，中国无法改变国际体坛的不合理状况。为了坚决抵制"两个中国"的阴谋，维护国家主权，1958年8月19日，中国奥委会发表关于同国际奥委会中断关系的声明。与此同时，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由于同样原因，宣布退出了国际游泳、田径、篮球、举重、射击、摔跤、自行车联合会及亚洲乒乓球联合会8个国际体育组织。董守义也辞去了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职务。

从此，中国和国际奥委会的正常联系被迫中断了21年，这不

❶ 荣高棠. 当代中国体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406.

❷ 董守义. 奥林匹克与中国//奥运会与中国.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55.

❸ 董守义. 奥林匹克与中国//奥运会与中国.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55.

仅给中国体育的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国际奥委会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缺陷。缺少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积极参与，大大降低了奥林匹克运动的代表性和普及性。

在被迫脱离了国际体育主渠道的困难日子里，贺龙元帅仍自信地说："谁也孤立不了我们，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总有一天，他们会请我们回去的。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谁能永远闭着眼睛说不存在！"[1]体育界仍然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时时向世界体育高峰发起冲击。

中国奥委会被迫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一切联系后，国际奥委会中的一些有识人士仍然为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而不懈地努力。1959年5月，国际奥委会在慕尼黑举行的第55届全会上再次讨论了中国问题。许多代表，包括后来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均认为：继续把台北奥委会称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是毫无道理的，应该改变这个名称[2]。国际奥委会内的一些委员认为，布伦戴奇的亲台态度比美国政府还要强硬[3]，所以，他们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就恢复合法席位的联系缓慢而秘密地进行了将近10年。而在国际奥委会1970年的阿姆斯特丹会议上，一向以中国怀有"政治目的"为由而支持台北的布伦戴奇，提议居住在台北的徐亨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这个提名遭到了执委会的一致反对，但当会议进行到选举新委员程序时，布伦戴奇宣读了一份名单，而且把徐亨也夹列其中，坐在布伦戴奇左侧的埃克塞特勋爵高声喊道："我们不推选徐先生！"其他委员也对埃克塞特勋爵表示支持。但布伦戴奇仍独断专行，终于使这一提议成了现实。国际奥委会第六任主席基拉宁先生认为，布伦戴奇的此举使国际奥委会和北京之间狭窄的秘密通道关闭了[4]。

---

❶ 谭华，等．谁来点燃圣火．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29.

❷ 基拉宁．我的奥林匹克岁月．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106.

❸ 基拉宁．我的奥林匹克岁月．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107.

❹ 基拉宁．我的奥林匹克岁月．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108.

由此可见，此阶段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处于摩擦和对立的阶段，发生冲突与对立的主要原因是由当时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以世界宪兵自居，其亚洲和太平洋战略以反华为中心，竭力孤立、遏制中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同以布伦戴奇为主席的国际奥委会的对立，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存在已久的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国际秩序的对立。只有当整个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当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完全可以与西方抗衡，并成为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国家时，国际奥委会才会正视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才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体育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1976年10月，以下简称“文革”）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革”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损失”。在这场以文化首当其中的浩劫中，体育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使体育整个跌入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最低谷。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一产生就与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其延续和发展的必然性。这就决定了体育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其特定的形式和内容，在社会环境条件适宜或允许的范围内继续存在、延续或者有局部特别状态的发展。

“文革”理应完全否定，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并不等于“文革”10年间就没有光明面和值得肯定的东西。历史的发展的最终结果，总是由许多意志力支配下社会各种力量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实际上由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而构成一个总的合力，决定历史的实际结局。

毛泽东是我们党的最有威望的领袖，当时又盛行个人崇拜，但“文革”中整个发展和结果并没有以他个人的意志力为转移。“文革”中有两股重要的力量在起作用，一股是党和人民的正义力量，一股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力量，“文革”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全国人民，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因此，“文革”中社会主义的根基还能保

留着，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还能继续存在并取得了一定限度的成就。“文革”使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必然地遭到严重摧残，但并没有完全被湮没消失，随着“文革”中政治局势的变化，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改变而波折起伏，呈现出此起彼落的阶段性，其中曾一度复苏乃至出现过局部兴盛的态势。

由于正义力量的聚合壮大，最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国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从此越过“文革”的低谷，进入了逐步走向辉煌的发展时期。

“文革”的教训是深刻的。以史为鉴，对“文革”时期的体育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文革”体育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对改革开放后怎样利用和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条件、怎样促进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会给今天的人们以很多的思考和启发。

第一节 “文革”时期的体育组织管理

“文革”初期，体育界的领导干部无一幸免地遭到批斗，管理机构受到严重冲击，致使整个管理体系完全瘫痪。“文革”中期，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乒乓外交”的成功推动使体育管理机构逐步得到恢复。“文革”后期由于“四人帮”插手体育工作，干扰了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给正处于恢复状态中的体育事业带来了严重后果。

一、“文革”初期体育组织管理系统全面瘫痪

在“文革”初期“造反”风潮席卷全国的大背景下，体育界领导无一幸免地遭到批斗，体育管理机构在冲击下处于全面瘫痪状态。

（一）“造反”风潮对体育管理机构人员的冲击

1966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 8 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使“左”倾错误方针占据了统治地位，肆虐全党全国。

“文化大革命”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最大的不同与区别是，其主要目标是解决包括中共中央在内的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中的所谓“两条路线”问题。由于《通知》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了违反实际的错误估计，认为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清洗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

1966 年 5 月开始的红卫兵运动，通过随后全国性的大串联，煽动起全国性各行各业的“造反”风潮，各级各层的领导干部相继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揪斗。1967 年初，首先在上海刮起的所谓“一月风暴”，又煽起了全国性的“夺权”风潮。各级党委和行政机构被搞乱了，完全不能行使权力组织正常的工作。

全国体委系统的各级各层领导干部，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条件下，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冲击和揪斗。1966 年 7—8 月，省、地、市级体委都停止了正常的工作运行。1967 年 3 月 29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奉中央军委发布的命令，开始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军宣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很快进驻各级体委。1968 年在各地相继成立“革委会”的过程中，很多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成立了体育系统的“革命委员会”，作为临时性的体育权力机构，地市级成立了体育运动领导小组。

“文革”开始以后，由于各级各层体委领导干部遭到冲击，无法再进行正常的组织领导工作，大部分一般体育工作者受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洪流裹胁而卷入其中，体委系统组织管理机构全面瘫痪。据近些年各省、市、地、县各级修撰的地方志记载，在1966年的八九月份，体委机关就停止了正常的工作。继而各级工会、青年团、妇联组织中与体育工作有关的机构、企事业单位中专、兼职体育工作人员，由于体委工作的停顿，也相应失去了管理和组织的具体工作职能。

“文革”发端后，大中学生组织的“红卫兵”八方串联“点火”，鼓励“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冲击各级党政机关。由于各级党委瘫痪，同级和下属行政机构也被迫中止了工作。

在“造反有理”“打倒一切”的社会政治大背景下，各级体育领导干部被揪斗批判，失去了开展工作的权力，行政机构已不能正常开展工作。在当时，搞业务抓工作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出力而会遭到批判。因此，现实使业务管理工作无人问津而且唯恐避之不及；再者，在人们盲目地表示扭曲的政治热情的大潮中，将体育活动与追求玩乐连同视做“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和行为”；将竞技运动必然地与“锦标主义”联系在一起，都可能遭到冲击和批判，人们避祸免灾的最好办法只能是采取不参与的态度。专业运动员停止了正常的训练，群体活动几乎消失。因此，既没有体育组织管理机构和人员去开展工作，也没有参与体育的人需要有组织管理的必要；因“文革”前形成的一整套群众体育组织管理系统、工会、妇联、共青团，各企业、机关、学校的体育活动管理机构和专兼职管理人员，在“文革”中同样受到了冲击，由于体委系统的瘫痪以及本身失去了组织管理的工作对象，整个体育管理组织系统形同解散。

（二）“五一二命令”

1968年，林彪、江青、康生出于他们的政治目的，炮制“五

一二命令”，诋毁国家体委系统“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了无产阶级专政，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决定对全国体育系统实行军事管制”。继后，一大批体委领导干部被强行管制、下放、转业，整个体委系统实际处于完全瘫痪的状态。上海市体委系统共1800余人，有306人受到迫害和批斗，702人被“下放”去“接受再教育”。

体育系统的领导干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迫害最有代表性的，是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

贺龙同志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都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很大贡献，建立了卓越的功勋。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面对林彪、江青一伙对干部搞无限上纲的政治迫害，他愤慨地表示：“现在这种搞法，有点像在党内搞清理队伍，难道这些干部为革命工作多半辈子，他们是什么阶级还不清楚吗?!”[1]指示国家体委要抓革命、促生产，要求继续抓紧出国比赛运动员的训练工作，《体育报》要坚持办下去。1967年1月，贺龙家被抄。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蓄意政治迫害，1967年9月9日，“中央专案小组”起草了对贺龙的立案审查报告。11月中旬，当贺龙看到报纸上的一篇针对体委系统的“大批判”文章后，气愤地表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体育战线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的事。”并非常担忧地认为：“这样，不知道又要有多少体育战线的好干部、教练员、运动员挨整了。”“五一二命令”下达后，贺龙由原中央办公厅保护，改成为“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的审查对象。此后，贺龙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身患重病也得不到正常的医疗护理，1969年6月9日，因遭受种种迫害致死。

在这一时期，各级体育领导干部和有关体育工作的负责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有的遭到了揪斗批判，有的被勒令反复检

[1]《贺龙年谱》编写组. 贺龙年谱.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查交待“罪行”。很多领导干部遭受了“坐喷气式”、画花脸、罚跪、戴高帽、挂黑牌和毒打的非人折磨与凌辱。

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五一二命令”下达后，国家体委及各省、市、自治区体委被军队接管。地方各级体委都由军队派出的人员主持工作。

二、体育组织管理系统的逐步恢复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全国的政治局势开始朝好的方向有了转机，“乒乓外交”的成功推动了体育的复苏，林彪自取灭亡，大批干部的解放和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使体育组织管理系统得到了逐步复苏。

（一）全国政治局势的转机

“乒乓外交”的成功给体育界以巨大的震动，体育领域呈现出萌动复苏的迹象。

1971 年 9 月 13 日凌晨，林彪、叶群一伙仓皇出逃，折戟沉沙自取灭亡。这一事件本身，在客观上宣布了“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在举国震惊之后，使全国人民更理智和清醒地去思考和认识社会政治问题和“文革”中出现的怪异现象。

林彪集团覆灭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一时期，周恩来除了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领导批林整风运动外，开始着手努力地消除“文革”的消极社会后果。

1. 一大批干部回到管理的领导岗位

“9·13”事件后，思想战线还极其混乱，周恩来敏锐地认识到，必须相信和依靠党的大批干部来抵制和纠正“左”的错误，推动实际工作的开展。1972 年 4 月，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起草一篇正面阐述党在干部问题上的历来政策和优良传统的社论，并亲自审

改了这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针对“文革”中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受打击和迫害、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的事实，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1972 年春天，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案、错案工作。邓小平出来工作后，继续贯彻和抓紧落实干部政策，使一大批遭受政治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获得解放。1975 年 1 月，第 4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决定的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成员中，绝大多数是恢复工作的老干部。1971 年，周恩来派人到贵州找到贺龙的夫人薛明，得知贺龙已被迫害致死，周恩来遂嘱咐薛明将贺龙生前最后一段情况如实报告党中央。当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在场的人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1974 年，毛泽东指示，要给贺龙翻案，邓小平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1974 年 9 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1975 年 6 月 9 日，在贺龙逝世 6 周年之际，周恩来带病参加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并致悼词。从 1972 年周恩来总理抓正确执行干部政策后以及为贺龙平反的整个过程中，体育领域内的干部，很多得到解放，走上了工作岗位。

2. 思想战线上极“左”思潮受到抵制

1972 年 10 月 1 日，经周恩来总理的授意和亲自修改定稿，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等发表了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这是自“文革”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吹起一股清新的空气，使人精神振奋，起到了解放思想、鼓舞人心的作用。体育领域的广大工作者也同样很受鼓舞。

3. 工农业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趋向稳定

工农业总产值开始逐年增长，尤其是 1975 年邓小平进行的全

面整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些地区严重的派性受到抑制，这些都为体育的复苏和发展创造了较好社会环境。

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四届人大的召开以及邓小平全面整顿工作进行的过程中，“文革”的消极社会后果部分被消除，“四人帮”的活动受到了某些抑制，混乱状况有所好转，这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包括体育事业能在一定阶段和一定条件下得到恢复和局部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二）体育组织管理体系的逐步恢复

从 1968 年“五一二命令”后，国家体委归属军委军训部管辖，各级体委被军管。1971 年全国体工会议以后，国家体委又重新归属国务院管辖，但对省级以下的体委仍实行军管。1970 年至 1971 年间，全国各省、市在革委会下设立了体育局。体育局受省、市革委会和军管会的双领导，如天津市体育局由天津市革委会、警备区实行双重领导，以警备区为主。

1972 年 8 月 2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消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按照这一规定，大部分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从而为地方干部重返领导岗位创造了条件。

1973 年 2 月 20 日，在国务院批转的《1973 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指出：鉴于国家体委已归属国务院领导，各省、市、自治区体委可相应改归革委会领导。建立健全县以上各级体委，列入各级革委会的编制序列，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各项政策。根据需要，尽可能使那些熟悉业务的同志回到体育工作岗位上来。

1972 年至 1973 年初，根据中央的指示，各省、市、自治区体委相继撤销了军管组和体育局，省、地、县级都恢复了体育运动委员会。各级体委下设若干机构，开展各项工作。“文革”以来因遭

受冲击已经瘫痪的整个体委系统的组织管理体系得到了恢复，开始行使组织管理职能。在全国各行各业健全领导班子的同时，体育领域的各级领导机构也恢复了过去的管理职能，加强管理机构，并且重新提出了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方法。

随着各级地方党委和各企业、机关、学校、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党组织的建立，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众组织也得到恢复和逐步的完善，各行业的行政机关和管理机构，如教育、卫生、文化，工、农、林、财贸等局、部、委都得到恢复。

各级体委根据《纪要》的精神，主动配合解放军、教育、卫生、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有关方面，共同开展群众体育工作。同时，很多省、市、自治区根据具体情况，恢复、健全了体育总会各分会和一些重点项目的单项运动协会。这样，整个体育组织管理体系得到了逐步的恢复。

（三）“四人帮”插手控制国家体委领导权

从“四人帮”插手体育到一度控制国家体委领导权，体育事业的恢复势头在“左”的思潮居主导地位的状况下滞缓而受阻，造成了很大损失。

1972—1974年，我国的整个体育事业在相对平稳的有利形势下开始由恢复而得到局部的发展。从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到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四人帮”插手体育界，给正在恢复和发展的体育事业再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1974年1月，毛泽东主席批发中共中央1号文件，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在全国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一伙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主要目的是把矛头指向他们所谓的周恩来总理搞“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毛泽东虽然很快发现了江青一伙利用“批林批孔”和批“复辟回潮”搞阴谋活动后，多次对他们进行批评制止，但是“批林批孔”和“反潮流”还是扰乱了各行各业刚刚恢复的正常秩序，一些单位的领导班

子处于半瘫痪状态，全国重新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在体育界，“四人帮”发出的所谓 “揭开体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的“指示”，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体委的主要领导诬蔑为“三代修正主义”，从而全面否定了体育工作的成就，并掀起批“复辟”批“回潮”的运动，叫嚣“文化革命打不死，批林批孔补一枪”，要对坚持工作的领导和群众“实行全面专政”，导致了许多正在恢复的工作再次陷于停顿状态，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又受到了政治迫害。

1975 年，国家体委的领导权沦于“四人帮”的控制之下。在全国实行全面整顿中，体育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和树立的“新生事物”并未受到批判和纠正，致使本应在全国政治局势呈现转机的有利形势下，体育事业取得更快的恢复和更大的发展势头滞缓而受阻。1971 年以来，体育事业的恢复比其他行业来得要早，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也相对较好。但在 1975 年，全国其他行业取得明显的转机而迅速恢复和正常发展的期间，体育界却相对地落后了。

1976 年，“四人帮”在全国刮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全国再次陷入混乱。整个体育出现了全面滑坡的状态。

第二节 “文革”时期的学校体育

“文革”开始后，学校是受到浩劫的重灾区。学校体育遭到严重的破坏，一度完全消失。“文革”中、后期学校体育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在“文革”中教学秩序被完全破坏、无政府主义盛行的环境下，学校体育被扭曲。由于体育健身和娱乐功能对学生的吸引，学校业余训练和群众体育活动也曾从恢复到一度兴盛。

一、“文革”初期学校体育遭到严重破坏

“文革”初，在极左思潮的煽动下，学校体育教学秩序经冲击而荡然无存。“文革”中、后期学校体育得以恢复，但在“文革”社会大环境下，体育教学显现出被扭曲的不正常状态。

在“文革”这场浩劫中，整个教育领域是“重灾区”，教育事业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破坏，在教育史上是罕见的。学校体育在“文革”初期，由于遭到严重破坏而一度停止上课，随后则变成被扭曲的畸形状态。

（一）学校教学秩序荡然无存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极其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内形势，错误地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对象及方针。把党内的大批干部和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都错误地当做了“革命对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专门）提到“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此即《五七指示》。《五七指示》后来成为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夺取教育领域领导权”和“批判、打倒资产阶级学者、权威”的最重要的依据。

1966年5月，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了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在新闻舆论的煽动下，全国的学生哄然而起，学校首先处于混乱状态。8月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明确规定："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任务。"单纯、好奇、冲动的青年学生，首先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大量文物古迹、文化遗产遭到破坏。9月，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了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很多"红卫兵"和青年学生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走向社会大搞打、砸、抢、抓、抄等非法活动。到1966年底，各级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和学校党、团组织相继瘫痪。学校领导和部分教师遭到揪斗、批判，有的被体罚、殴打。全国大中小学全部"停课闹革命"，学校教学秩序荡然无存。

（二）以军训和劳动为主要内容的军体课

1967年2月，鉴于学校的严重混乱状况，中共中央分别发出了《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停止外出"串联"，"复课闹革命"。要求对中学生、大学生分期分批进行军政训练。

1967年3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材料指示》及天津延安中学的有关材料。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提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中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办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自此以后，军训工作在全国大、中、小学陆续展开，师生陆续返校。学校取消了班级建制，将师生统一按班、排、连、营建制编队，设连队委员会、政治指导员等，实行军事化。由于"大串联"和派别间武斗的影响，"复课闹革命"无人响应，进展缓慢。由于军训与体育课的常规、队列队形、跑、跳、投、攀援技术技能、体能训练等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多相同和相近之处，所以为恢复

体育课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也对日后体育课恢复正常状态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使体育课畸形扭曲。

1967 年 10 月 1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规定的课程是："小学 1—4 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算术、科学常识；5—6 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中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批判旧教材和教学制度，复习数、理、化、外语和各种必要常识，在农忙期间师生下乡劳动"。体育课完全被取消。当时，各级学校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复课，学校中"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主课"，用政治学习冲击教学活动，体育活动陷于停顿状态。以后，中小学和大专院校开始复课。各地开始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教育革命方案"。由于毛泽东多次在有关教育工作的谈话和指示中都强调了体育，解放军在"文革"中仍是学校师生学习的榜样，以及在学校开展军训工作等因素，各级各类学校在开设有限的几门课程中，都设置了体育课，但都更名为"军体课"。原班级体育委员，更名为"军体委员"，以至影响传沿至"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很多中小学开设的课程是：毛泽东思想、工业基础知识（城市学校）、农业基础知识（农村学校）、军体课、革命文艺、劳动课。军体课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学习解放军的常规、队列、投弹、刺杀等简单动作。以往体育教学的内容因属于"资产阶级教育"的范畴，教师只能以种种与军训有关的名目，开展少量的球类、游泳等活动，指导和组织学生锻炼身体。很多学校则常常把军体课和劳动课连在一起，或者干脆以劳动替代军体课教学。1969 年，中苏发生边界冲突后，国内处于紧张的"备战"状态，学军成为中、小学生在校学习的主要内容，很多学校增加了军训时间，进

❶ 老三篇：指毛泽东写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三篇文章.

行大规模的野营拉练活动，体育课完全变成了军训课。

1968 年以后，不少地方提出“上小学不出村，上初中不出队，上高中不出社”的口号，不顾客观条件，一味追求数量，以至中小学盲目发展。在县级以下农村，小学下放大队、中学下放公社成风。由于“文革”开始以后，高师、中师停办，师资来源中断，其中中小学体育教师在“文革”前就大量缺编，加之新办学校体育场地、器材严重不足，因此，这一类学校的军体课多由其他学科的教师兼任或聘请当地复员退伍军人代课。结果，军体课的内容或“下操”、或“放羊”、或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体育课的目的和要求。

全国非体育专业的大专院校在中央要求复课以后，学生才陆续返校。1968 年，工人宣传队和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后，秩序有所好转，除进行一些军训活动以外，不可能恢复正常的教学状态。1970 年 6 月，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课程设置有“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因此，在 1972 年以后相继恢复招生的大专院校都以此为样本设置了军体课。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大、中、小学才逐步将“军体课”改为体育课。受无政府主义的干扰，学校的体育场地、器材被占用毁坏，损失严重，课余时间主要是“民兵训练”和“学军活动”，课外活动几乎取消。

（三）体育卫生教师队伍遭受摧残

“文化大革命”中，体育卫生教师队伍遭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受“两个估计”[1]的影响，那些从旧社会过来，学有专长和教学有成就的老教师，除了被批判斗争外，大多数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利，

---

[1] “两个估计”：指 1971 年 4 月 5 日—7 月 31 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直接操纵编造了一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 17 年的教育工作作了“两个估计”，荒谬地认为，在这 17 年中，“教育部门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原有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分子”。

长期下放锻炼与改造，并强制进行种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一些中、青年骨干教师作为“黑线专政的代表人物”，接受所谓政治上的“再教育”，使他们荒疏了业务，有的人还遭受了迫害。学校卫生工作更是困难，机构被撤销，队伍被冲散。在当时情况下，许多体育教师出于对体育事业的热爱，也采取了各种力所能及的方法和手段，仍在坚持工作。

（四）体育专业教育受到的严重冲击与破坏

“文革”开始后，培养体育师资的院校停止招生，师资培训工作也被迫中断。其中，高等学校停止招生 4 年，中专停止招生 5 年。使体育师资队伍无正常补充来源，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据国家统计，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少培养了 100 多万大专毕业生和 200 多万中专毕业生，其中包括体育卫生方面的专门人才。

“文革”开始以后，各体育院校与全国其他高校一样，教学秩序被完全破坏。北京体育学院自 1967 年春夏开始，领导干部和一些教师被批斗、关押，曾一度把游泳馆变成“牛棚”[1]，对领导干部和部分教师进行迫害。1968 年，“五一二命令”下达后，不少干部、教师又一次遭到了严酷的迫害。1968 年 10 月以后，大批干部、教师被下放到山西省屯留县和北京市郊顺义县“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因周总理指示“北京体院要办，还要办好”，下放人员才陆续返校。其他体院，恢复招生的时间稍晚于北京体院。因此，从 1966 年至 1970 年，体育学院的教学工作完全处于停顿状态。

二、“文革”中、后期学校体育的恢复与扭曲

“文革”中、后期，学校体育逐渐得以恢复。但在极左思潮泛

[1] “牛棚”：指“文革”中关押受迫害人的房舍同农村牛圈一样简陋，后称为“牛棚”。

滥的无政府主义的煽动下，学校体育不可能走入正轨得到正常、全面的恢复，必然地显现出扭曲的状态。

（一）中、小学和大专院校“军体课”、课外活动的状况

1971 年 7 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体育工作的成绩，使广大体育工作者和教师备受鼓舞。随着体委系统各级机构和活动的恢复，国际间体育往来的重新开展，特别是 1971 年我国乒乓健儿在第 31 届世乒赛上取得好成绩，促成了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互访，“小球转动了地球”，打开了中美两国外交的渠道。这对体育教师和学生也起到了鼓舞和激励作用。

1973 年，邓小平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管教育和体育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调整措施，使学校体育工作出现了转机。1975 年 1 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撤销国务院科教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并任命周荣鑫为教育部部长。根据体育卫生工作需要，1975 年 11 月 3 日周荣鑫部长签发了上报国务院《关于增设体育司的请示报告》，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建立体育司，负责人杜英。体育司主管大、中、小学的体育、学生的军事体育和学军等活动[1]。教育部的恢复和体育司的建立，使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有了一定转机。

1971 年以后，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秩序逐渐走上正轨。虽然整个“文革”中由于极左思潮泛滥，造成了青少年学生思想混乱，“造反有理”“无政府主义”和“读书无用”等在青少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但是相对而言，学校基本上恢复了课堂教学，体育课以“军体课”的名义正式排入课程表中。1972 年，全国的政治形势朝好的方面转变，虽然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两个估计”没有被推翻，但极左的危害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认识。体育教师同其

[1] 李晋裕. 学校体育史. 海口：海南出版社，1982：96.

他学科的教师一样，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竭诚地为培养下一代努力地工作。

为了进行军体课教学，各地开始编写军体课教材。全国先后有天津、陕西、甘肃、北京、辽宁、浙江、河北、青海、河南、山西、江西等省、市编的军体课教材出版。如 1970 年 6 月北京出版的北京市中学军体课教材（北京市教育局革命领导小组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教学目的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培养学生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彻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高学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向解放军学习，培养学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加强组织纪律性，掌握一定的军事体育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增强体质，为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服务。

教学建议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紧密结合战备，带着敌情观念；抓紧革命大批判，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贯彻毛主席十大教授法，启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从实际出发，走抗大的道路，积极创造教学条件；发扬教学民主，互帮互学，提高教学质量，贯彻“少而精”“精讲多练”的原则；军体课请解放军、民兵骨干担任专职或兼职教师。体育教师必须自觉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掌握一定的军事基本知识和技能，积极完成军体课的教学任务；军体课应和军训、课外军体活动相结合；教师应配合校医对学生定期进行身体检查，了解学生的健康状况，根据男女生的不同特点和学生体质状况合理安排教学工作；注意安全，严防伤害事故。

军体课教材内容是：队列练习、射击、刺杀、投弹、防空基本知识、过障碍、行军和爬山、游泳、爬绳（爬竿）、徒手体操、技巧、单杠、双杠、支撑跳跃、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其中足、排、乒乓球为选用项目）、跑、跳跃、铅球、武术（军体拳）、体育锻炼卫生常识。以军事项目为主要内容的体育教学朝着军事化方向发展。

全书从第1页到第33页都是摘录政治论述，并且各项目内容中穿插语录，表示以政治为统帅。此期间各地出版的军体课教材，几乎大同小异。受“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一些教材都牵强附会、穿靴戴帽地贴上同体育知识、技术毫无关系的政治标签；同时增加了不少军事动作，削弱减少了体育基本教材的内容[1]。

1973年前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各地开始重新编写体育教材。与1970年编写的教材比较，强调了从增强学生体质出发，根据学生的年龄、性别、体质状况、师资状况和设备条件，设置项目和教学内容。小学教材有田径、体操、小球类、武术、游泳；中学教材有田径、体操、球类、武术、军体项目。军事项目居于次要的地位，内容所占的比例也很小。但体育和卫生的基本知识介绍得很少。这套教材从教学指导思想和教材内容的安排上尽管存在极左的倾向，但对当时纠正“文革”初期体育教学的不正常状态却起了一定的作用。

1973年6月1日，国家体委和国务院科教组公布了《第五套儿童广播体操》，并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小学中推行。这套广播体操根据儿童年龄差别，分成两组：7—8岁和9—12岁的儿童各有一套体操。

“文革”中教学秩序松弛，很多教师无法组织教学。有的只好随学生的意愿开展活动。很多学校由于条件的限制，“军体课”上成自由活动课、球类课，“放羊式”教学现象较为普遍。尤其是1972年以后，全国农村公社大办中学，大队大办小学，使学校数量猛然增长，一些县级中学和区级小学还能勉强地学习球类、田径、体操、游泳和当时流行的“红卫兵拳”“军体拳”，而农村中小学体育课由于师资和器材的限制，上课徒有其名，有的利用“军体课”时间进行劳动，城镇中学则用“军体课”来“学工”“学农”。

---

[1] 李晋裕. 学校体育史. 海口：海南出版社，1982：89.

（二）业余体校的恢复与竞技活动的开展

"文革"中虽然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可是体育课毕竟能部分地满足青少年好动爱玩的需要，因此，在总体上学生对上"军体课"表现出比其他门类的课程有更大的兴趣。1971年，县级以上业余体校恢复后，县级以上的中小学很多建立了与业余体校相联系的训练点。1972年以后，很多县级中、小学也开始办业余体校，随后一些乡、镇级小学也开始办业余体校。

1972年9月3—13日，国家体委在四平市召开五省（四川、安徽、陕西、辽宁、吉林）二市（北京、天津）三小球会议。会上交流了开展小篮球、小排球、小足球活动情况；研究并拟定了三小球场地、器材规格和比赛计划。这对有条件的城市和地县级中小学开展三小球活动起到了促进作用，为后来球类优秀运动员的成才打下了基础。

同月15—25日，全国业余体校工作座谈会也在西安举行，交流了各地业余体校的状况。11月18日，国家体委、国务院科教组联合发出《1972年全国青少年业余体校工作座谈会纪要》，强调了大力发展业余体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业余体校的组织机构、目标、任务和教学内容、人员招收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是在"文革"这场运动中，所以非常自然地也把这一提倡和要求变成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很大程度上导致业余体校也流于形式。此后的几年中，除一部分"文革"前的业余体校得到恢复而转入正规的训练，能达到为竞技运动培养后备人才和群体活动的骨干外，很多本来连"军体课"都不能正常进行，场地、器材设施又严重缺乏的集镇中小学，多是因为"批林批孔"和"反回潮"的政治需要，也办起了业余体校。这些一哄而起的学校，由于条件简陋，教练员水平低等原因，不可能收到满意的训练效果。但确实对组织中、小学生利用早晚和课余时间开展活动和锻炼身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学校“军体课”的开设，业余体校的兴办，使一部分中小学从1972年起开始定期举办以球类、田径为主要项目的学校运动会，校际间的三小球、田径、游泳等项目的比赛也逐渐增多，学生课外活动也开展得很有声势。从全国来看，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和业余训练的人数从1972年起，增加很快。但另一方面，占很大比例的农村中、小学的学生由于条件限制，“军体课”仍然有名无实，根本谈不上开展课外活动和业余训练。就是开设了“军体课”，建立了业余体校的中、小学，也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因无纪律的约束，自行其事，而与体育教学毫不相干。这也是在“文革”特定背景条件下所形成的状态。这种扭曲式的学校体育教育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以真正改变。

学校体育课（军体课）和业余体校活动、训练的恢复，带动了学校竞技体育的开展。1973年，国家体委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1975年成立了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两个体育协会都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下属的全国性的学生体育组织。两个协会的建立促进了学校体育训练和竞赛的开展。在此期间举办及参加国际和国内大型体育比赛的活动有：1973年在长春和烟台举办了第1届全国中学生运动会，比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和足球；1973年中国举办亚洲中学生足球锦标赛，中国队获亚军；1973年10月，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在马德里召开的执委会上接纳我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为该组织的会员国；1974年，我国参加了在联邦德国威斯巴登举行的第1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比赛项目有田径、体操、游泳等3项，中国中学生代表团获田径比赛和体操比赛金牌14枚，其中中国队包揽了体操比赛6个项目的全部金牌。

1972年以后，中、小学的竞技体育普遍地开展起来。河南省在1972年4月和1973年5月，由省体委和省教育局联合举办了全省中学生运动会。广西壮族自治区至1975年，举办了3届全区中学生运动会。贵州省1973年4月召开的全省中学生运动会分别在

4个地、州、市举行。河北省于1973年4月，分别在石家庄、邢台召开了全省中学生运动会，设置了足球、篮球、排球、田径4个项目的比赛，并选拔出参加第1届全国中学生运动会的选手。

从1971年起，很多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开始定期和不定期地举办以球类、田径为主要项目的运动会，区域性体育比赛活动也逐渐增多。

1973年，召开的第1届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对全国的体育教师，尤其中、小学的体育教师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对中、小学体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全国各地中、小学不同规模的单项和综合性运动会很快兴起。带有"文革"中的那种政治色彩，以各种名目和固定的纪念日，如"六一""七一""五四""十一""七一六"和"十二·二六"而召开的运动会，使一些学校的学生课余锻炼和体育活动在1973—1975年间，出现了一个兴盛的局面。

（三）试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1973年2月20日，国务院批转了《1973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要求各级体委密切配合教育部门做好学校体育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毛主席关于"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要求上好体育课，安排好课外体育活动，积极试行《体育锻炼标准》，推行儿童广播体操，开展好小篮球、小足球、小排球活动，开好全国中学生运动会。

6月1日，国家体委和国务院科教组公布了第五套儿童广播操，并联合发出了《关于在全国中小学中推行第五套儿童广播操的通知》。8月17—23日，国家体委在烟台召开了全国青少年儿童体育工作座谈会，讨论了在全国建立健全业余训练网、试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建立少年儿童竞赛制度等问题。

1973年，由于《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试行和推广儿童广播

操，使学校的“军体课”教学参照达标确定内容，军训式的教学内容逐渐减少，促进了学校体育教学内容的科学性、计划性，使教学趋向规范化。此后，学校课外活动也围绕《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来组织进行（表 3-1）。

表 3-1　1973—1975 年分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及格人数[1]

年份	合计	青年组	少年一组	少年二组	儿童组
1973	1568457	263254	555748	426050	323405
1974	1801894	188410	539924	490134	583426
1975	4733971	515967	1600305	1347690	1270009

从表 3-1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达标人数增加的趋势。其间，“批林批孔”和“反回潮”对学校教育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对数、理、化、外语课的影响较大，如当时有“不学 ABCD，照样干革命”之说；对业余体校的训练和比赛，因批判“锦标主义”，也受到干扰，“军体课”的教学秩序受到很大影响。但中、小学生达标活动和工作还是在继续进行着。1974 年下半年至 1975 年，教育界整个形势经过整顿好转后，学校体育教学和达标活动又转入正常。

“文革”中普通大专院校从 1973 年恢复招生后，公共“军体课”的整个教学状况与中学相似。一部分大专院校集中进行了“野营拉练”活动。1973 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开始试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及格达标。由于大专院校的条件相对于中小学要好，“军体课”基本上能正常进行，课余活动和运动会逐渐兴起。因“文革”前的教学大纲、教材不能使用，各大专院校公共体育课按照达标的要求授课，有很大的随意性。

1975 年 4 月，《国家体育锻炼标准》颁布后，在全国大、

[1]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1）：精华本上册.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354.

中、小学体育工作中，作为检验效果和成绩的重要标准，得到全面的实施。

（四）体育院系恢复招生后的教学

1971 年以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部分中等师范学校招收体育班，部分体育学院、高等师范院校体育系、科陆续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

1971 年，北京体育学院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的 1970 年 109 号文件，关于对北京体育学院恢复招生的批示精神，派出 52 名教师，于 1—4 月，分赴全国 28 个省市招收了相当于中专学籍的青训队员 372 名，于 5 月入校上课。这是 1966 年全国体育学院停课后，北京体育学院首先重新招生和恢复上课。

1972 年，随着大批干部重返工作岗位，全国恢复和准备恢复招生的高校都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北京体院由原学院领导钟师统和赵斌任主要领导成立“党的核心小组”，由工宣队、军宣队领导体育学院的非正常时期宣告结束。在新的院领导的集体领导下，重新建立健全和调整了组织机构，基本恢复了学校的教学建制系统。原来的连、排、大队等军事建制解体。

1972 年 8 月，北京体院开始招收体育系首批二年制新生（即工农兵大学生），1973 年体育系和运动系分别招收了三年制学生。从 1972 年至 1976 年，北京体育学院共招收了 2272 名工农兵大学生。西安体院、成都体院等高校，也从 1972 年开始招收了数量很少的学生。1972 年 9 月，青海省为培养体育专业人才和体育师资，在青海师范学院增设了体育系，并招收 53 名学生。这是“文革”中唯一在学校新设体育专业的省份。

1973 年 1 月 8—24 日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的纪要中，提出了“努力办好体育学院，深入进行教育革命，培养以体育师资为主的专业人才”的要求。1973 年 5 月 8 日，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体育专业 1973 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在全国高校恢复

招生，师范院校、综合性大学体育系也同时招收二年制的工农兵学员。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推荐进体育院系的学生体育基础参差不齐，文化基础普遍较差，很多学生没有接受过运动训练，在中学阶段所接受的体育教育既不规范，内容也少，进校后，他们还肩负着“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责任”，每年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学工、学农、学军”，搞“大批判”，加之教学、训练不系统，使这些学员业务学习的质量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受到很大的影响。但绝大多数学员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勤学苦练，进步很快。一些曾受过专业训练且文化基础较好的学员，技术水平提高很大。如北京体院青训队的杨希、陈招娣等，后来成了著名的国手。绝大多数学员毕业后，都成了各级体委、体院的业务骨干。1972 年后，各体育院校、高师体育系、科，在开始招收新生和培养体育师资的同时，还开展了培训在职体育师资的工作，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沈阳体育学院自 1972 年 5 月起，连续举办 6 期在职体育教师轮训班，为全省培训了 1300 多名体育教师和体育干部。还组织教改小分队深入到沈阳、抚顺、铁岭、昭盟 4 个市（地、盟）的 10 个县、区学校作调查，了解体育活动情况和体育师资分布情况，并先后又在全省 10 个市、10 个县和 20 余所中学进行教育实践，为各地培训、辅导体育教师和体育干部共 2800 多人。北京体育学院抽调部分教师组成小分队，协助地方开办体育教师训练班，为一些省、市解决体育师资力量不足的困难，如 1972 年 11 月，先后派出赴青海小分队和赴安徽小分队，1973 年春派出赴内蒙古、西藏小分队。这种形式为各省市培训了不少体育师资，深受各地的欢迎。

1974 年，在“批林批孔”运动“反回潮”“学大寨”和“学小靳庄”等接二连三的运动中，教学和训练不断遭受冲击。各体育院系都搞“开门办学”，到工厂、农村去一边“学工学农”，一边教学训练。在学校则举行不同规模的批判会，举办各种学习班。据西安体院统计，一个“批林批孔”运动，全院就举办了各类学习班

134期，召开各种批判会346次，大小批判会发言的达1799人次，出批判专栏79期、板报70块，写批判文章1500余篇、大字报7189份，漫画150幅。这种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严重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破坏了教育的规律，严重影响了教学的质量。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在进行全面整顿中，各体育院系结合开展了以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加强领导班子团结为中心内容的运动，同时整顿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为时不久，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在全国展开，刚有好转并开始步入正轨的形势再度逆转，各体育院系再度处于混乱状态。

从1971年至1976年，由于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对体育领域的特别关怀，在各体育院校领导干部、教师、工作人员和广大工农兵学员的共同努力下，顶住了各种干扰，培养了大批体育教学、管理、训练的骨干。同时，使体育专业教育在艰难的环境中，得以保存和缓慢地发展，为粉碎“四人帮”后体育专业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保存了基础。

（五）“教育革命”中学校体育的扭曲

体育院系学生长期离开学校搞“开门办学”，也是“批林批孔”中在体育中树立的所谓“新生事物”，说“开门办学还是关门办学，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方向的大问题”。西安体院从1974年7月至1976年2月，长期分批到工厂、农村、部队和各地、县去“学工、学农、学军”，培训小学教师，体育骨干。每次时间从1个月到4个月不等。成都体院也从1974年以后，到少数民族地区和工厂、部队和各地、县、区“开门办学”。客观上，“开门办学”为地方、工厂、部队、农村培养了一批体育骨干，但这种违背教育规律的所谓“革命”使体育教育事业造成了损失。

第三节 “文革”时期的群众体育

“文革”开始以后，群众体育活动因政治环境的变化而陡然降温。从1966年下半年至1969年间，除每年7月16日有为纪念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的游泳活动外，就是少数机关干部、职工平时参加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跳“忠字舞”[1]活动。群众体育只有个人零星活动的形式，处于沉寂而几近消失的状态。

1970年，随着整个社会政治形势和秩序的相对稳定，群众体育开始以自发性的个体和群众性形式出现。1970年春节，很多地方召开了区域性的体育比赛。1971年以“乒乓外交”为契机，在竞技体育得以启动恢复的同时，也带动了群体活动全面普及性恢复。1972—1975年底，全国的群众性体育活动从复苏而蓬勃开展，以至出现畸形兴盛的状况，原因有二：

第一，1972—1973年，由于政治局势出现了转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工农业生产得以逐渐恢复，社会生活较混乱的状况有了改善。尤其是1975年，全国各行各业经过整顿后，工农业生产在稳定的基础上有了提高和发展，为群众体育活动的复苏和兴盛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提供了必备的物质条件。

第二，“四人帮”搞的“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回潮”等造成社会混乱，对体育领域再次冲击，以及“学大寨”“学小靳庄经验”，大搞形式主义的同时，把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纳入作为批判“锦标主义”“为工农兵服务”“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占领业余文化阵地”和搞“体育革命”的具体表现，使群众体育活动成为“突出政治”和体育战线中“路线斗争”的内容和工具。这样，在

[1] “忠字舞”：是“文革”初期手拿《毛主席语录》跳的一种表示“无限忠于的情感”的舞蹈，在1969年一度流行全国，后逐渐消失。

很大程度上恰恰刺激和促成了群众体育活动的畸形兴盛。当时，城市乡村体育轰轰烈烈的景况，与“文革”中整个社会大环境、社会和群众个体的经济状况、文化环境氛围极不和谐。这也正是引起了我们源于惊诧而注意以联系当时众多的社会条件和因素，进行深层次历史透视、分析、研究和深思的原因。

群众体育活动涉及到城市、农村、学校各行各业的人们，城市职工和农村农民的群体活动能得以普遍性地恢复和逐渐兴盛，有其共同点，也有其不同的背景条件。

一、职工体育

职工体育在“文革”中曾一度萎缩和消失，“文革”中期以后，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开始恢复；“文革”后期陡然升温兴盛后，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又出现了大幅度滑坡，造成了损失。

（一）职工体育活动的一度消失和萎缩

“文革”开始以后，体委系统主管群体工作的职能机构很快瘫痪，职工的体育活动组织管理体系，在这场政治运动的冲击下被完全破坏。在极左思潮猖獗的岁月里，政治狂热压抑了职工健身娱乐的需求，很多群众卷入了派性斗争，已经完全不可能有组织地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同时，职工开展体育活动的场地，其中包括很多运动场，主要用作搞批斗大会的集会地，大街两旁和可利用的空地都摆设了“大批判”专栏，贴满了“大字报”，职工已经失去了开展活动的物质条件，加之“文革”中动辄上纲上线的威胁，职工自娱性的体育活动很快就消失了。由于职工绝大多数卷入了这场政治运动，机关不上班，企业厂矿不上岗、不生产，工间操等也自行取消了。

1968—1969年，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机关、大型厂矿企业，各地“革委会”的相继成立，才使

全国混乱的局势有所缓和，群众派别间的武斗也基本平息。机关、厂矿、企业在军、工宣队和“革委会”的组织管理下，职工开始上班上岗。在这种状况下，派性对立虽然还很严重，但“文革”初的打、砸、抢的现象明显减少了，社会秩序相对平稳，使大多数职工有了一定的安全感，逐渐有了一些为政治性的庆祝活动、纪念日等所开展的体育活动。如“7·16”纪念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和有关指示发表而组织的横渡江河大规模群体游泳活动、“12·26”毛泽东纪念日组织的越野赛跑活动等等。这两项活动成为了夏季游泳和冬季越野跑的大型群众体育活动，并形成了制度。在“文革”中参加纪念日活动的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全国主要城市和地、县级职工把自然水域都充分地利用起来组织横渡，利用街道和公路进行越野长跑。这是整个“文革”中群众体育活动每年必办的两件盛事。平常，群众性的活动多以球类为主，小型比赛活动也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参加活动的职工比例很小。

1969年“九大”以后，各地在成立“革委会”的期间，又开始把体育表演和群众性的体育比赛作为庆祝活动的重要内容。地、县级和个别区、镇级的“革委会”在筹建和成立的过程中，都纷纷修建或扩建体育场地。地、县级修建露天的灯光球场在1969—1970年曾风靡一时。

（二）职工体育活动的开始恢复

“文革”开始后，《新体育》（于1966年10月第277期）和《体育报》（于1966年11月2日第998期）相继停刊，国内尚存的几份报纸除了刊登时事消息就是“大批判”文章，几乎没有体育消息的报道。1970年，自发性的群众体育活动从零星逐渐呈现发展的势头。1971年，从我国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消息刊载于《人民日报》后，国际间体育代表团体往来的消息开始逐渐增多。在当时，给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和说教性文章搞得近乎窒息的读者送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对文化活动有限的报道中，体

育消息不仅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启动了人们的需求，而且给各级体委和主管体育工作的领导，恢复开展群众体育活动打开了信号灯。但“文革”的特殊年代，要使群众活动“合法化”，就得遵守“文革”时期的“规则”。1971 年 7 月 8 日，《人民日报》以较大的篇幅，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通栏大标题下，刊载了署名北京市体委大批判组撰写的《体育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署名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体育局大批判小组撰写的《坚持体育的工农兵方向》和《我们贫下中农需要体育》3 篇文章，对 1960—1962 年调整时期对体育工作方针和原则断章取义，歪曲原意，进行了批判。但真正的目的在于要为抓群众体育和抓农村体育“正名”。其中一篇文章里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怀柔县搞革大队，在春节期间针对一小撮阶级敌人企图搞“四旧”的阴谋活动积极开展篮球表演赛，既锻炼了身体，增进了团结，又破了“四旧”，达到了移风易俗的目的。文章中指的“四旧”，很可能就是春节民间传统活动，实际上间接地和客观地反映了群众对文化和精神生活的迫切需要。可见开展群众体育活动，无论从当时的政治意义上还是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上，都已是大势所趋。

1970 年 9 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结束。之后在全党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使林彪反党集团在“文革”中肆意破坏的嚣张气焰受到一定的遏制。

1971 年 9 月 1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第 5 套广播体操图解。这套图解中尽管掺入“样板戏”英雄形象的动作，但毕竟这是“文革”以来，为开展群众体育活动“放行”的具体显示。同年，“乒乓外交”成功，在一定程度上给整个体育领域的恢复带来了契机，启动了竞技体育训练和比赛的恢复，群众体育活动也有了发展。但体育界还并没有全面地得到复苏，一些恢复和发展只在很有限的范围内。

由于“文革”初期，全国笼罩在盲目狂热的政治激情之中，人们对“文革”的“虔诚”，把很多正常的文化娱乐需求归为“资产

阶级生活享受”而大加抨击，压抑了人们对娱乐的需求。整个“文革”中，城市文化生活都处于极度贫乏的状态。据统计，“1965年全国图书出版共20143种，杂志出版790种，报纸出版共343种，到1968年，图书下降到了3694种，杂志降到22种，报纸降到42种[1]。”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曲艺等文艺形式，基本上销声匿迹，出现了一派“百花凋零”的局面。到处只有清一色的“红宝书”[2]、“样板戏”[3]，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极度贫乏。从1966年11月至1971年底，全国没有一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过一种体育书[4]，从而出现了新中国体育图书出版的“绝迹”现象，体育文化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和损失。当全国的政治局势趋于平稳，人们从狂热的政治激情中逐渐清醒，开始审视社会，追求自我生活的正常和完善时，面对一片文化废墟，终于感受到了文化需求的极度饥渴。在当时，体育活动无疑就成了众多人为满足和弥补文化生活内容的必然选择。绝大多数职工对“大批判”由厌倦到抵制的情绪日增，加之由派系争斗之后组合成的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不可能真正行使管理职能，职工空闲时间较多，这些都在客观上为职工群众参加体育活动提供了条件。

1970年国庆、元旦和1971年春节期间，全国很多地、市、县革委会都组织了较大规模的群众体育大会。当时由于条件的限制，一般都以篮球比赛为主，个别地方举行了田径、乒乓球、排球比赛。

在“文革”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职工体育活动也带有浓厚的政

---

❶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32.

❷ 红宝书：“文革”中称红色封面装帧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语录》为红宝书.

❸ 样板戏：指“文革”中以符合当时政治标准的几出京剧（如《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乐《沙家浜》作为艺术表现的样板.

❹ 林思桐. 从体育图书的出版状况看新中国体育发展的轨迹. 体育文史，1989（6）.

治色彩。这一时期的体育比赛有一套很特别的程序：运动员入场后集体向毛泽东像三鞠躬，然后手持“红宝书”齐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在跳完“忠字舞”后才开始比赛。很多运动员把以显示“突出政治”和“无限忠于”的形式也带进了运动场，这些“创造”花样翻新，以致影响了正常的活动和比赛。如篮球运动员有犯规行为时，立即立正面对主席台，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比赛不得不中断停顿。

在1971年以前，尽管职工体育活动已经有了复苏的迹象，但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大背景下，群众体育活动终归没有系统的管理和组织，多以自发性为主。更由于条件的限制，能开展的项目不多，内容也非常单调，与“文革”前比较，是大大的萎缩了。所以，职工体育的复苏，还必须有待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的变化所提供的机遇。

（三）职工体育活动的陡然升温兴盛与大幅度滑坡

1971年以后，职工体育活动增多，在不长的时间里徒然兴盛。

职工群体活动较之农村群体活动恢复早、兴盛快，有城市特殊的基础条件和特殊的社会背景原因。

我国的大、中城市都是一定地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社会趋于平稳后，居住于城市环境中的职工对体育用以健身娱乐，达到愉悦身心、丰富闲暇文化生活的需要必然地有了要求，尤其在1972年宣传舆论开始对极左思潮进行批驳的氛围下，人们从狂热的政治激情中逐渐清醒，希望在工作和生活平静有序的同时，追求生活的正常和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快发展，至“文革”前，大、中城市很多普及了九年制基础教育。在校期间接受体育教育的学生，在职工中的比例不断增加，这对理解和认识体育的作用、功能和价值，从而产生对体育需求的共识，具有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

1956—1959 年，1963—1965 年，我国曾形成过两次体育热。职工大都积极参与了群体活动，从而形成了群体活动高潮，使职工群众活动从组织管理、活动形式、内容方面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71 年“乒乓外交”成功后，地、市级以上的专业体育队伍重新组建，业余体校开始恢复训练，竞技体育比赛和体育专业运动队的活动成为城镇职工关注和谈论的热门话题，对群众体育活动的恢复起到了启动性的影响。

林彪集团覆灭以后，国家体委重新归国务院领导，一大批受迫害的领导干部和专职管理人员重返工作岗位，在各级体委恢复管理职能的同时，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中相继恢复了职工体育活动的管理机构，落实了专职人员。加之从 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以后，出于备战的需要，城市各机关、厂矿企业、单位职工民兵组织建制迅速恢复。1971 年以后，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民兵活动减少，但现存的组织建制，有利于组织职工开展群体活动。因此，城市职工群体活动的组织体系得到了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加强。

整个“文革”期间，文化生活内容极度匮乏，极左思潮压抑得使人窒息，动辄打棍子、戴帽子、搞无限上纲。除了由几部“样板戏”翻版成文学、戏剧、电影的花样外，其他为“路线斗争”塑造的“英雄形象”，高、大、全得使人厌恶。投入体育活动可以远离“路线斗争”的硝烟，也是部分地满足和弥补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

从当时社会环境看，在 1972 年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强调体委要把抓群众体育作为首要工作任务；1973 年，国家体委召开了全国职工体育工作座谈会。在邓小平恢复出任副总理后，曾兼管体育工作，使整个体育领域的局面大为改观。小平同志对群体工作作了很具体的指示：“1974 年 8 月 8 日小平同志在接见我国参加亚运会的队伍时强调：‘毛主席向来主张，体育方面主要是群众

运动……。’体委应该主要在这方面搞好。”[1]但另一方面，由于极左思潮的压力，强调批判“锦标主义”，是当时但凡召开体育工作会议的必讲内容，也是在体育领域大讲“路线斗争”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体现，是落实毛主席关于“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这一指示的体现。当时，尽管社会环境有所改变，“文革”初期的批“锦标主义”“技术第一”与“资产阶级体育路线”挂钩，使很多身受其害的领导同志、教练员和管理干部心有余悸，怕犯方向性错误。而抓群体活动，搞普及工作符合“文革”以来一贯的宣传舆论导向。特别在整个体育界处于恢复的初期，各级体委都非常重视群体工作。地、市级以上的专业运动队在“文革”初期已经解散，重新组建需有一个过程。体委领导和管理人员、教练员除一部分人投入这项工作外，剩余的专职教练和工作人员，有精力和时间去指导职工群众的活动。尤其他们得到重新工作的机会，对“文革”造成的破坏和损失非常心痛，都希望能为复苏和发展体育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鉴于“文革”的特殊环境限制，只可能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去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再一个原因是，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开展群体活动的需求非常强烈，大都新修或扩建了运动场地，购置了必要的设施。尤其露天灯光球场，在 1972 年以后，几乎成为城市各机关、工厂、企事业单位普及性的体育活动场地。这为开展群体活动提供了物质条件。

以上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促成了城市职工体育活动在恢复后就很快兴盛起来。

1972 年元旦、春节期间，全国县级以上城镇，各级各部门的体育比赛和冬季、春季长跑等活动的开展，使沉寂了多年的城市文化生活气氛骤然活跃起来。从 1972 年到 1975 年，城市群众体育活动陡然兴盛呈现出的“轰轰烈烈”的状态，单位间和社区内的一些小型比赛，职工群众自发组织的一些活动，成为休闲时间主要观赏

[1] 伍绍祖. 缅怀小平同志，做好体育工作. 中国体育报，1997-02-22（3）.

和自娱性的活动内容。“文革”中最盛行的球类运动，是当时人们最喜欢的观赏项目，球场也是人们自娱的最好去处。据河北唐山钢厂、机车车辆厂等9个厂矿企业机关的统计，1972、1973年，职工参加篮球比赛的就有2万多人次。内蒙古自治区体委、总工会在1973年召开了全区职工“那达慕”体育活动座谈会。会后，全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大部分重修和扩建了运动场，购置了必要的体育器材，组建了脱产和半脱产的运动队，组织了规模和形式不同的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使自治区职工体育活动很快升温[1]。

举凡重要节日，都会在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名目下组织和开展大规模的体育活动，如“迎接战斗的新一年”“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三八”“五一”“五四”“七一”“八一”、国庆等节日和“7·16”“12·26”等纪念日，以及各种“重要讲话”和“最高指示”发表周年纪念日、各单位“革委会”成立纪念日，都成为组织体育活动的名目。1970年，陕西省借庆祝毛泽东主席“7·16”畅游长江，在全省开展群众性游泳活动，尽管省内可游处不多，但组织参观的人数却很可观，如耀县玉皇阁的庆祝游泳活动有2.5万多人参观。随后，榆林地区纪念“八一”建军节，组织11个县级机关和部队参加的篮球比赛，观众达到20多万人次。如西藏自治区在1973年“为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光辉题词发表21周年，拉萨市组织了15个单位的篮、足球比赛，共进行120多场，观众达10万人次”[2]。其他城市的“盛况”由此可见。

“文革”时期，要求职工离岗去搞“大批判”司空见惯，当时管理松散无序，机关不讲效率、企业不重效益和上班不按时、在岗不出力是较普遍的现象，很多职工无所事事，空闲时间很多。尤其在“批林批孔”运动、“反回潮”的一再冲击下，生产工作秩序常

[1] 袁伟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地方卷）.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113.

[2] 西藏群体活动蓬勃开展. 体育报，1974-04-02.

陷入混乱状态，抓革命有理、促生产有罪。在 1975 年邓小平主持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以前，由于广大职工对搞“大批判”已非常厌倦，占用上班时间，找一个“突出政治”的名义组织体育活动的现象相当普遍。这也可谓是“文革”中职工躲避政治运动，又可自娱自乐的一个创造。

从 1971 年始，各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在招干招工时，都很重视招收体育基础好，尤其是球类技术水平较高的人才。当时，从几百人到上万人的单位，都组织有脱产或半脱产的球队。很多工厂的科室、车间便于脱岗的工作，一般都由有体育特长的人担任。这些人经常离岗训练、参加比赛，满足职工对文化生活的需要，他们也是单位内职工群体活动的组织者和骨干。因此，一年中职工可参加或观赏的运动会基本上不间断。这些规模不同的活动和比赛，就是当时职工可参与和聊以自娱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所以很受欢迎。

1975 年的“学习小靳庄经验”❶，使职工体育活动为强化“突出政治”意义、为讲究造声势而在形式上显得轰轰烈烈。据《体育报》1974 年元旦、春节期间的报道：“在这辽阔的大地上，亿万群众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参加各种各色的体育活动……北京市 70 多万各条战线的青年涌跃参加二万五千里象征性长跑。”❷“上海市群众性长跑活动十分活跃，有近百万人投入了冬季体育锻炼热潮。”“天津市参加春节长跑比赛的近 1 万人，全市已有 40 多万人参加男子 8 万米、20 多万人参加了女子 5 万米的通讯积累长跑。”“沈阳市组织的迎春长跑共 1.5 万余人。”“南宁市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坚持冬泳。今年春节期间举办横渡邕江冬泳周，参加的有 3 万名工农兵和学生。”❸ 尤其每年“7·16”的全国游泳活动和“12·

❶ 小靳庄经验：小靳庄是“文革”中在农村树立的样板，把开展体育活动作为突出政治、占领农村业余文化阵地的重要“经验”加以宣传。

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体育报，1974-01-01.

❸ 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体育报，1974-01-25.

26"越野长跑活动最具声势。全国凡靠江河湖海的大、中、小城镇都举行声势浩大的横渡和游泳比赛；举行象征性的至北京、井冈山、延安、遵义等革命圣地的长跑。如1974年7月16日的《体育报》报道："在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的大好形势下""武汉市5000军民今天举行横渡长江的游泳活动。""首都9万多名工农兵群众，今天分别在全市各主要水域举行游泳、跳水、水球等丰富多彩的水上表演和比赛活动。""长沙市军民，举行了规模盛大的万人横渡湘江活动。"❶1975年7月16日，"与敌金门岛一水之隔的厦门市7000多名军民，举行了厦门—鼓浪屿海峡游泳活动。"❷江苏无锡市"每年夏天参加游泳的有80多万人次，冬季参加长跑的有20多万人。"❸

随之"千人操"等纯为形式主义的表演也逐渐增多。如上海市为显现"批林批孔推动群众体育活动"，由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体委举行了职工广播操、生产操、太极拳会操大会❹。此类报道，随处可见。

由于"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和体育活动是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在意识形态领域向资产阶级进攻，用社会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大事"❺，"文革"中城市群众体育活动是作为"使体育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❻的具体体现，所以，出于"路线斗争"的需要，形式主义更为严重。很多群众乐于参与的活动，如养生、气功、交谊舞和传统民俗活动——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均被冠以"封、资、修"的罪名而不能开展。在活动项目的选择上，也必须从《毛主席语录》中去寻找依据。因此，城市职工群众体育

❶ 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体育报，1974-07-17.

❷ 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体育报，1975-07-18.

❸ 我国群众体育出现崭新面貌. 体育报，1974-01-25.

❹ 批林批孔推动群众体育活动. 体育报，1975-02-04.

❺ 全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 体育报，1975-02-01.

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体育报，1974-01-01.

活动多以球类为主，内容较单调。一方面群众有参与的需要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在职工体育活动被赋予其政治意义后，是否参加体育活动被视为政治态度和表现，这在“文革”年代既有鼓动性，又带有强制性。所以，“文革”中城市群众体育陡然升温而轰轰烈烈，是各种复杂的因素促成的畸形状态，不是在具备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物质、文化基础条件下正常发展的结果，不可能持久地保持下去。

1976 年初，“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城市再度陷入了混乱，工作、生产秩序遭到破坏，稍有好转的城市物质供应又趋紧张，群众体育轰轰烈烈的形式也维持不下去了，再次全面滑向低谷。

二、农村体育

“文革”初期，农村群众体育萎缩。由于农村特殊的社会环境受到“文革”的冲击相对较小，农村体育复苏较快，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农村体育活动起了促进作用。“文革”后期，“农业学大寨”、学“小靳庄”经验促成了体育活动的畸形兴盛。

（一）农村体育活动的萎缩

农村卷入“文革”的时间稍晚于城市。1966 年底，“文革”的风暴也全面地侵袭到整个农村。早在“四清”时期，农村中一些群众自娱性体育活动，如气功、养生、舞龙、舞狮等，就被列入“四旧”“封建迷信”，在很多地方被禁止。如广东省，素负盛名的“排球之乡”“游泳之乡”“足球之乡”被诬为“黑样板”而被迫停止了活动。“文革”开始以后，各级农村工作干部以及公社、大队基层领导都被打成“走资派”而遭到批斗，农村群体活动因无人组织，民兵训练也相应受到影响，传统民俗节令性活动被完全禁止。到 1967 年底，整个农村群体活动从面上看也处于几乎消失的

状态，但也有极个别地方有不间断的小范围体育活动，如“文革”前的农村体育先进社、队，仍然有少数社员坚持锻炼。从普遍的角度看，全国农村体育活动一直没有完全中断过。从1968年初开始，农村的群众体育活动从零星的自发自娱性活动，逐渐出现了社队内的比赛活动，如拔河、举重（石担、石锁等）、球类、游戏等。但与“文革”前相比，无论从规模和内容上都已经大大萎缩了。

但是，农村群众体育活动的恢复存在着比城市要早的有利因素。第一，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矛头所指，是最能体现城市优势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因而城市受到很大的冲击。而农村的生活条件长期低于城市，农民受教育的机会不多，这反倒使农村的社会环境相对平稳，没有城市那种盲目、狂热的政治激情氛围。农村虽然受到了“文革”的冲击，但却没有像城市那样动荡。第二，“文革”的斗争主要指向不在农村，“文革”的政治目的丝毫不代表农民的利益和愿望，因此，农民不可能从思想上产生共鸣，因而没有那股政治热情，在大讲“阶级”和“路线”的年代里，农村阶级成分较“纯洁”，受到冲击的人较少。在以生产队为基础的记工制度下，人们必须劳动才能获得生活资料，一般说来，农民不可能“脱产闹革命”。统一的劳动和闲暇使农民很自然地产生娱乐的需要，而且这种热情在当时比城市人群要高。尤其是从中央到地方一部分坚持工作的领导同志，一直对农业生产抓得很紧。这对保证农村的相对稳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上的因素，就为“文革”中农村体育活动在短暂消失后很快地得到恢复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农村体育的影响

当我们今天来分析“文革”中农村体育活动恢复的原因时，值得花一定的篇幅来对“文革”这个特殊年代“知识青年”的作用，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1968年始，大批城市学校的中学毕业生和在校生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到农村“插队落户”，确实对农村体

育活动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文革”给全国造成的大动乱，国民经济急剧恶化，三届毕业生积压在学校“闹革命”，大量地转化为城镇剩余劳动力，终于在1968年爆发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学毕业生需要就业的严重问题。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与“文革”的动乱局面混合在一起，其性质远远超出了劳动就业的范畴。因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出路问题的一项应急措施；同时，在“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改造青年、“反帝反修”的政治运动。从1968年到1978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共达1623万人[1]，这些人在思想、文化、个人生活等方面都经历了许多不幸，但“上山下乡”的实践也给他们一些有益的锻炼，他们在同农民同甘共苦、艰苦创业的过程中，为文化的传播和卫生的普及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在文艺、体育等活动中，无疑起到了骨干的作用。

从1969年始，农村社队已将安置知识青年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完成对他们进行“再教育”的政治任务，为他们“开辟篮球场、砌乒乓球台、编织排球网、用小车轴作单杠”，满足他们开展体育活动的需求。而城市知识青年相对于农村青年，体育基础较好，在知识青年所在的队，闲暇时因地制宜开展一些体育活动，也是除唱“样板戏”外的唯一正当消遣娱乐。每逢赶集和节令假日，知青在一起打球就成了主要的娱乐内容。随着农村组织开展的体育活动逐渐增多，很多社队以知青为骨干，经常组织球类比赛。这在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十分单调贫乏的状况下，与翻来覆去观看自己排练的“样板戏”相比，体育活动的开展显然更能寄托人的情趣，

[1] 谭宗级，等. 十年后的评说. 北京：中国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满足观赏和娱乐的需要。而知识青年对体育活动也表现出异常的热情，究其原因：一是在群众中宣传毛主席的革命体育路线，带动当地青年一起参加体育活动，这与大演“样板戏”同样被视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政治行为，也是衡量知青政治表现好与坏的重要标准。二是参与体育活动是知青充实生活和娱乐消遣不可缺少的内容。三是凡知青参加社、队的文体活动，生产队照样评工计分，这点使得很多知青“在学校不会打球，到这里才学会的”[1]。

下乡知识青年对体育活动的热情，也吸引和带动了大量农村青年。我国农村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小学生的比例增加很快，这部分人有体育基础。其中很多青壮年都经历过“体育大跃进”或之后的体育高潮，对参与体育活动同样具有强烈的愿望。通过生产劳动、民兵训练，知识青年很快就与他们融合成一体。共同的志趣爱好，使体育活动在农村得到普遍的恢复。

下乡知识青年在技术上的指导和传授，也大大提高了农村群体活动的水平。如重庆市部分“文革”前在业余体校训练过的高、初中生，在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落户后，经常在区社学校球场为社员表演，组织体育活动，参加各级组织的比赛，让人们大开眼界。上海知识青年在云南边陲落户，经常开展球类比赛活动，还成为十里八乡群众喜好的一大景观。在一些农村群众体育基础相对较差的地区，知青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内蒙古自治区在“1968 年，随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插队自治区各地，全区农村、牧区逐渐出现了社、队范围内有组织的拔河、球类、跳远、跳高等比赛，“带动了广大农村、牧区青年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提高了全区农村、牧区群众体育活动的水平。”[2]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的招工、招干中，由于城市职工体育活动的需要，使一大批有体育特长的人捷足返城，很多学生看到了

---

[1] 李坤. 一封下乡知青的来信. 新体育，1973（8）：7.

[2] 袁伟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地方卷）.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113.

“学得一技之长，将来必有用场”，从而放弃了文化学习，选定了“球打好，有人找”的路，这使各类业余体校有了充裕的生源。很多城市学校为了“面向农村”而重视了培养体育骨干的工作。如沈阳市的105中学、四川温江县中学，就是加强了体育工作为学生适应“上山下乡”需要做准备，当时作为典型经验加以报道。这些中学生毕业后下到农村的确是“很受欢迎”。

（三）体育活动政治化与畸形“兴盛”

1. 农村群众体育活动的逐渐恢复

1972年，全国的政治形势好转，农村更趋于平稳。尽管由于极左思潮的控制，农村在当时的生产情况下劳动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经济状况普遍较差。但是，广大农民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在“文革”特定历史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利用劳动之余的闲暇，普遍地在青壮年社员中恢复了娱乐性的体育活动。1972年11月20—30日，国家体委召开了全国农村体育工作座谈会，针对农村体育活动的现状，对积极推进和引导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并树立了一批典型。

《新体育》杂志有选择地报道了青藏高原牧民在草原上比赛拔河、跳远、短跑、爬山、赛马活动的盛况；黑龙江松嫩平原上“体育室”的热闹景象；贵州苗家姑娘冲破旧习俗锻炼身体的新风尚。安徽省南陵县奎湖公社是当时比较突出的“样板”：“全公社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约占总人数的70%，7个大队、67个生产队都有男、女篮球队，57个自然村有64个球场，同时开展了广播操、游泳、乒乓球、田径、拔河等活动。”由于“广大社员群众开展体育活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有的利用村头一棵树，钉上几块木板就成了篮球架；有的生产队利用土坯、石块拌一层水泥就垒成了乒乓球台。他们因陋就简，自制了双杠、山羊、篮球架、手榴弹、拔河绳等十几种体育器材。有不少村还搞

了简易的灯光球场。”[1]

1973年，《新体育》杂志以本刊评论员署名发表了《积极有步骤地开展农村体育活动》一文，这是在周恩来总理着手纠正“左”倾思想危害的有利形势下的一篇导向性文章。指出了在恢复和开展农村群众体育活动中要“广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体育路线，但在工作上，要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我国的农村幅员广阔，情况千差万别，开展体育活动就应当根据客观条件，因地制宜，有的发展快一些，有的地方可能发展慢一些，不能强求一律。我们要积极地深入下去，调查研究，抓好典型，取得经验，逐步推广，逐步开展。”这实际上就是对60年代初开展农村体育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在当时环境下的肯定和运用。当然，“以路线斗争为纲，革命大批判开路”也是必然要强调的，轰轰烈烈搞形式主义的现象也在那些“典型”社队存在。但从总体形势看，在1972年至1974年夏天，农村群众体育活动基本在正常的状态下得到恢复和发展。很多社、队，尤其是知识青年集中的农场、兵团，闲时有经常性活动，年节和纪念日通过民兵建制展开比赛已逐渐形成惯例。

自娱和观赏，是农村社员投身体育实践的主要目的和动因，是农村体育活动得以广泛开展的主要因素。“文革”时期流行于农村的节令性民间娱乐活动，诸如舞龙、竞渡、庙会等被作为“四旧”而一扫光，在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十分单调贫乏的状况下，体育活动更能满足人的需求，寄托人的情趣。在经济贫困、居住分散、劳动工具原始落后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下，本来组织体育比赛是比较困难的，涉及到时间、精力、场地和必要的器材费用，但由于广大社员群众的热心支持和积极参与，“大寨式”吃大锅饭的劳动方式形成的作息时间统一，在众人潜在的劳动能力足以帮替极少数人的劳动等条件的促成下，农村群体活动得到了逐步的普及性恢复和发

[1] 中共南陵县委会，南陵县革委会，南陵县人民武装部调查组. 红太阳照亮了农村体育阵地.新体育，1972（10）：22.

展。在政治、文化环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也得以复苏。“文革”初，内蒙古自治区历史悠久的“那达慕”“祭敖包”等体育活动被取缔，内蒙古群众喜爱的博克、赛马、射箭、布鲁、赛骆驼等体育活动遭到禁锢。民族传统体育在内蒙古草原上处于消失和禁绝的状态。1971 年以后，随着全国政治局势的转机，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因举办各种庆祝活动的需要而逐步得以恢复，内蒙古、新疆富有民族特色的赛马、摔跤等体育活动，也在农牧区逐渐形成赛事。这些活动虽然在内容上、形式上必然地受到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而不可能完全复原，但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延续和继承，无疑是很有作用和意义的。

“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而六亿人民绝大多数在农村。各省、市、自治区体委主管群体工作的负责人和有关机构，都很重视农村的群体工作，地区、县级体委与“文革”前一样，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群众体育上，而工作的重点就是面向农村。各级体委与县、区、公社武装部、共青团、妇联密切配合，基本恢复了农村体育工作组织管理体系。以生产队民兵班排为单位，结合医疗卫生工作，以青年为骨干，利用工前、工间、工余休息时间，根据农村状况开展简便易行的体育活动，利用节日组织比赛，对于活跃农民业余文化生活，提高社员的健康状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2. 农村群众体育活动的畸形“兴盛”

从 1974 年“批林批孔”开始，农村体育活动开始走向畸形。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散布的“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对农村正常的生产造成干扰冲击的同时，他们出于政治需要，加强了在农村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他们为了“不让资产阶级从业余阵地上打开缺口”，将农村体育活动作为“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农村业余文化阵地”的政治武器，歪曲毛主席的关于体育工作的一系列讲话的精神，散布社会主义体育的根本任务和方向就是“体育必须

面向我国大多数农民群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农村，如果不抓农村体育就不能全面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体育为工农兵服务就成了一句空话"。这一阶段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是为了达到占领"农村阵地"的目的，带有相当大的强制性。很多社队日工分值仅在两角钱左右，而往往这类社队自然条件都很差，劳动强度大，开展体育活动有很多困难，但在"棍子"到处打的年代，农村基层领导为了不离"纲""线"，也组织部分人成立宣传队演唱"样板戏"，利用晒粮场作活动场地，以应付各种检查。特别突出的是，为了批判"孔孟之道"，"解除封建枷锁"，以体现"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把农村妇女是否参加体育活动，是否下河游泳，作为开展"批林批扎"运动的重要内容和标准。当时宣传各地农村体育活动开展的"盛况"时，有不少这方面的报道。如河北省南窑县小范庄 70%以上的妇女参加体育活动；福建省长泰县大兴大队女社员"打破了妇女不能下河游泳的风俗，都学会了游泳"。

1975 年以后，又将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作为衡量是否全面、真正地"学大寨"、推广"小靳庄经验"的"大是大非"问题。当时大寨大队和小靳庄为迎接四面八方"取经"的需要，为突出"占领农村业余文化阵地"而组织了专门的体育和文艺队伍。"四人帮"为了达到目的，采取断章取义的方法，将 1960 年初调整时期关于开展农村群众体育活动的指导方针的有关内容，歪曲成"体育不能下农村""体育影响生产"的所谓"谬论"加以批判。

山西省体委在《扎扎实实开展农村体育活动，为农业学大寨服务》一文中，把农村各级领导、每个社员是否积极组织或参与体育活动同政治表现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可说明当时农村群众体育工作的导向和状况。"文革"中"学大寨"，做表面文章非常盛行。"公路两边层层石头墙，检查好看不打粮"的顺口溜就是搞形式主义的写照。尤其是"四人帮"树立的"小靳庄经验"强化了农村体育与"路线斗争"的联系，各社队也纷纷仿效建立宣传队、球队、游泳队。由于各级文艺调演、运动会不断，很多大队、公社、区至

县采取层层训练、层层选拔的办法，组成各级农民代表队参加比赛，不少青年从农村生产队劳动中抽出来唱戏、打球，仍由生产队评工记分。被各地树立成“宣传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革命体育路线”典型的社队，为了“场地新建数”和“参加体育活动人口比例数”的增加，层层虚报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和开展的项目，不顾社员的经济承受能力，搞形式主义。为了显示轰轰烈烈的声势，到处组织农村“万人体育大军”和“千人操”表演，广建球场以凑数。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出现了山区几口之家建有球场的“事迹”。陕西户县玉蝉公社21个生产大队，队队有篮球队，村村有体育活动。有的大队参加活动的成年人达70%以上。根据《陕西省志·体育志》记载：在学习“小靳庄经验”时，曾出现了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现象。陕西有的县、社体育代表队脱产训练，社员不参加体育活动要扣工分。1976年，全省农村普遍举行盛大的游泳活动，各地农民也参加横渡江河、水库、池塘活动。据全省普查，西安市所辖郊区县会游泳的农民有17万人、安康12万人、榆林7万人、渭南23万人、汉中24万人。在开展农村体育活动中，户县尤为突出，全县有男女篮球队525个，各类篮球场424个，其中灯光球场88个；余下公社一年内组织篮球赛有200多场。定边县堡子湾公社相继举行了5届农民运动会。四川温江县158个大队有球场200多个，湖北省广济解垴大队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占总人口的62%。尤其山西和天津，农村体育搞得更有声势：昔阳县大寨大队组建的田径、武术、乒乓球三小队的做法在全省农村得到推广，全省农村的篮球、乒乓球发展较快，全省百户以上的村，村村有球场，球类赛事不断；天津市农村在推广“小靳庄经验”的政治催化和行政命令要求下，各社、队纷纷建立宣传队、球队、游泳队，农村文体活动曾热闹一时。这其中很大成分是搞形式主义的结果。

农村群众体育的开展，必须以经济为基础，应与整个生产和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步而行。“文革”中农村受到的冲击虽然比城市

小，但在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年代里，农民生活普遍非常困苦，很多地方的农民尚未解决温饱，搞所谓“用穷棒子精神办体育”，采用政治压力，搞一平二调，用意在为“路线斗争服务”，严重偏离了在农民完全自愿的原则下，开展体育活动以达到强身健体、丰富文化生活、愉悦性情的目的。因此而形成的畸形“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应故事、流于形式的结果。

三、“文革”期间的军队体育

“文革”初，当地方全面卷入“批判”“揪斗”和派性武斗以后，军队与地方机关、团体的体育比赛消失了。由于军队练兵的需要，除军训科目外，强化身体素质和娱乐性体育活动在军队中仍在开展。因“文革”中强调“突出政治”的影响，在1969年以前，军队开展球类、游泳、田径等体育活动和比赛的热潮降了下来。

1970年以后，军队的群众体育活动开始升温。以球类为主，配合军训的娱乐性群体活动普遍开展起来。军内和军地之间的比赛也逐渐恢复，各地驻军都参加地方组织的体育比赛。据《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和各省、市、自治区撰修的《体育志》记载，每年的“八一”建军节和春节，是军队内、军队和地方机关团体进行体育比赛，体现“拥军爱民”最热火的期间。如陕西省榆林地区，为纪念“八一”建军节组织县级机关和部队参加的篮球比赛，观众达20多万人次。商洛军分区举办了运动会后，还组织运动员下乡为农民表演。

军队还和地方机关、群众共同组织参加大型的纪念活动。1970年《解放军画报》登载了为纪念“7·16”驻京解放军指战员在昆明湖举行的泅渡、青岛市军民1.4万多人冒着倾盆大雨横渡汇泉湾、武汉市军民举行的规模盛大的纪念活动和游泳活动等照片。1970年《人民画报》刊登了解放军8341部队帮助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职工开展游泳、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拔河、跑步、投弹、

举重、广播操等各种体育活动，使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达到职工总数的90%以上。《解放军画报》用较大的篇幅，陆续登载了沈阳部队某部侦察连，长年累月活跃在林海雪原，坚持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昆明部队某团10年来坚持开展游泳泅渡活动；海军某舰艇根据舰艇活动的特点，群策群力，积极开展体育活动；新疆部队某边防哨所指战员，针对山高缺氧气候严寒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活动；兰州部队第七医院医务人员，自己动手修排球网，开展体育活动；常年驻守在海岛上的某部，劈山填海建球场，开展体育活动等照片，介绍了处于不同地域、环境条件，不同兵种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的状况。

在1975年5月11—25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军第3届体育运动会上，全军61个群众体育活动先进单位的代表出席了大会，部分代表介绍了开展群体活动的经验，反映了全军群体活动的整体状况是好的。

1970年始，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兵种开始恢复和组建专业运动队，各部队在征兵中也注重招收有体育专长的战士。在1972年6月10日至7月3日于北京举行的全国篮、排、足、乒乓、羽毛球五项球类运动会上，解放军组团参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1975年5月11—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届体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叶剑英、朱德、李先念、陈锡联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陈锡联在会上讲了话。这次运动会共设18个比赛项目，其中有8项军事体育项目。“这届运动会的军事体育比赛和军事体育表演项目，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练为战’的思想比较明确”，根据“打仗需要什么，部队战士训练什么，运动场上就比赛什么”的原则”[1]，在比赛中除专用枪射击依旧按照国际比赛规则进行外，军用枪射击、对刺、投弹、器械体操、通过障碍、武装越野、三轮摩托车越野射击，都是结合部队训练内容来制订规则的，强调和突

[1] 钧体. 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新体育，1975（6）：20，21.

出了应用性。

全军各单位共20个代表团近5000名运动员参加了这届运动会，在18个项目中，共打破了46项全军纪录，9项全国纪录。北京部队运动员董湘毅打破了女子小口径标准手枪60发慢加速射世界纪录，南京部队运动员杜宁生平了这项世界纪录。第3届全军运动会是对“文革”中部队群体活动、军事训练和专项优秀运动队训练的一次检阅，对推动军队体育的开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很明显的“文革”痕迹。

“工农兵评体育，是体育战线上的新事物。这届全军组织了200多名工农兵评论员，对大会工作和各代表队的思想、风格、运动技术水平，进行了认真负责的评论，对开好运动会起了重要作用。”运动会期间，组织了篮球运动员下连队表演；刺杀项目的运动员为工人表演；乒乓球运动员到学校表演和辅导；到工厂参加劳动；听取农民的意见；到人民公社进行比赛等活动[1]。

1975年9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幕，2.3万多名男女青少年、运动员和解放军战士表演了大型团体操《红旗颂》，由解放军表演的团体操第四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展示了解放军的英姿和军威，受到热烈的欢迎和好评。在这届全运会上，解放军女射手董湘毅在女子小口径手枪慢加速射60发比赛中，分别以592环和591环的成绩，打破了苏联运动员于1974年创造的587环的世界纪录；女射手李亚敏、杜宁生分别以591环和588环的成绩，也打破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在这个项目的团体赛中，由董湘毅、李亚敏和杜宁生组成的解放军队，以1771环的成绩打破了苏联运动员在1974年创造的1752环的世界纪录。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以后，整个体育工作大滑坡。军队的体育活动也受到了影响，但与地方比较，专业队训练和群体活动受

[1] 解放军画报，1975（7）：12.

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尚能正常地进行相应的训练和活动。

四、“文革”时期的国防体育

“文革”中国防体育的恢复较晚，恢复的项目也很有限，少数几个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文革”一开始，国防体育俱乐部都停止了活动。1968 年，林彪、江青阴谋篡党夺权，炮制了“五一二命令”，诬蔑国防俱乐部“完全是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出来的”，“国防体协是搞地下武装的黑阵地。”国防体育因此遭到严重的破坏。机构被完全撤销，人员多被遣散，场地、器材和俱乐部所属工厂也被挪作他用。例如山东省，从“文革”开始到 1971 年，被完全撤销的就有水上、陆上、航空俱乐部所包括的航海模型、摩托艇、射击、跳伞、滑翔、航空模型、无线电等运动队；上海市国防体育单位也被撤销。除个别省、市，如内蒙古在 1970 年下半年重新组建了军事体育学校，有射击等训练项目外，其余的都停止了训练。

1972 年以后，我国先后加入或重返了国际赛艇联合会、国际划艇联合会和亚洲射击联合会等国际体育组织。恢复国防体育是适应参加国际比赛的需要；同时可以向部队输送专业人才，如业余滑翔学校，还可以输送飞行员。

1973 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把恢复国防体育列入了议事日程。当年经国务院批准，首先恢复了射击运动和直属北京的射击场，并着手恢复组建省、市专业运动队。陕西省在 1973 年重新组建了射击集训队，设 7 个班，开展了 18 个训练项目。在当年的全国射击邀请赛和 1974—1977 年的全国射击分项赛中，一些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有的队达到甚至超过了“文革”前的成绩。

1973 年 10 月，国家体委副主任李达将关于恢复业余滑翔学校的适应备战和战略需要的报告，上报党中央、周总理，建议在全国开展群众性国防体育活动。1974 年 8 月，空军党委将《建议恢复

业余滑翔学校的请示》上报中央军委、邓小平副总理。邓小平副总理批示道："这是应迅速办理的事情，可由李达副总长召集空军、体委等部门讨论一次，解决复校问题。例如体制、归属、校址、经费等，向军委提出报告。"10月，国家体委、总参谋部即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报送了《关于在全国恢复业余滑翔学校和开展其他军事体育活动的请示》。1975年，有条件的省、市重组滑翔队，陆续调回部分老教练员，选调新运动员开始训练。

1975年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了国家体委、总参谋部的请示，以国务院发的19号文件向全国批转了这个请示。各地按请示精神："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逐步把群众性的射击、跳水、潜水、航空模型、航海模型、摩托艇、航海多项、'三防'和野营拉练军事活动开展起来，以增强人民体质、扩大军兵种技术兵源、培养和储备国防后备力量。"

军事体育恢复以后，在领导体制上，仍实行体委与军队双重领导的原则，由国家体委主管，军队方面由总参办公厅和部队协助国家体委办理与军队有关的工作。省军区、军分区和各级人民武装部指定一位领导参与当地军体工作领导。在机构设置上，国家体委将原来的陆上运动司、航空运动司、航海运动司合并，成立军事体育局，下设政治、航空、航海、陆上、后勤处和办公室。

1975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又恢复了军事体育9个国家体委直属单位，即北京航空运动学校、北京摩托艇学校、安阳滑翔学校、青岛航海运动学校、北京无线电运动学校、北京怀柔水上运动学校、湛江潜水运动学校、沈阳滑翔机制造厂、成都滑翔机制造厂。

当时开展活动所需经费由体委系统提出预算，分别报请国务院和省、市、自治区党委批准，财政部门拨给需要的主要物资，器材由国家体委报请计委安排生产，统一分配。需由军队解决的装备、器材、被服等，由国家体委统一提出计划，由总后勤部从退役的堪用物资中无价拨给。

5 月，国家体委、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公安部、农村部、商业部、财政部、卫生部、教育部 11 个部委联合下发了贯彻国发 19 号文件的通知。6 月 8 日召开了全国军事体育工作会议，具体布置落实军事体育的恢复工作。

到 1976 年底，恢复了业余滑翔学校 18 所，航空运动学校 35 所，潜水运动学校 1 所，射击运动学校 29 所，摩托运动学校 16 所，无线电运动学校 18 所，综合军事体育运动学校 18 所，滑翔机制造厂两个；向海、空军输送了一批飞行员，训练了较大数量的普通射手、特等射手、普通摩托车手、特等车手、无线电报务人员、无线电工程人员。有 8 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了潜水运动。航空、航海模型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开展。

在 1975 年的第 3 届全国运动会上，由于军事体育刚刚恢复，除射击外，其他项目尚无条件参加比赛。射击在全运会上有 1 个队 4 人 6 次打破 3 项世界纪录，1 人 1 次平 1 项世界纪录。跳伞、航空模型、航海模型、摩托艇、摩托车等项目，组织了多场表演，为全运会增添了光彩，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广大观众的好评。

第四节 “文革”时期的竞技体育

“文革”初期，竞技体育受到了浩劫性的冲击和破坏，整个训练、竞赛完全停止，优秀教练员、运动员遭到批斗迫害，竞技体育处于湮灭的状态。“乒乓外交”的成功，为竞技体育的恢复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在“文革”中、后期，竞技体育一度在局部恢复的基础有了一定的发展，业余训练由恢复而得到了加强，在一些城市和地区，进入业余体校一度成为青少年热衷的选择。由于“文革”中“左”的思潮的错误导向和“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竞技体育几反几复，最终由上升又滑向低谷。

一、“文革”初期竞技体育遭受浩劫

“文革”初，竞技体育遭到了浩劫性的破坏，整个训练、竞赛系统全面崩溃，领导干部、优秀教练员和运动员遭到迫害，整个竞技体育处于湮灭的状态。

（一）整个训练、竞赛体系崩溃

1966 年“文革”最初期，国家体委，各省、市、自治区体委的专业运动队，在参加“口诛笔伐”“大批判”的同时，还能坚持训练和参加比赛。为了能保持专业运动队的竞技水平，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同志向中央呈送了《关于运动队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持一定训练的建议》的报告，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陶铸同志同意后转发到各级体委。到 1967 年 1 月，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打倒陶铸同志，将转发的报告作为其抵制和破坏“文革”的“罪状”之一，报告也就被完全否定。

1967 年以后，“政治斗争”完全代替了运动训练和竞技比赛。教练员、运动员绝大多数被迫卷入这场内乱之中，被迫将自己热爱和从事的体育事业，对经过流血流汗的艰苦努力打下基础和取得的成绩与“资产阶级体育路线”“锦标主义”硬挂上钩，进行无情地批判而与其“决裂”，“红宝书”和不甚熟悉的毛笔取代了过去朝夕相处的运动器材。1967 年以后，新中国成立以来确定的一整套竞技体育的管理制度被废止，整个训练和竞赛体系完全崩溃，国家体委主管的国家级优秀专业运动队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专业队伍很多被迫解散。据有关统计，仅足球一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足球队就解散了 47 个，有 1124 名优秀足球运动员和 115 名专职足球教练员离开了球场。广东的优势体育项目举重、棋类被取消，优秀运动队被砍掉约 70%。山西省 1970 年还撤销了足球、女排两个项目，运动队只剩下篮球、男排、田

径、体操、武术等项目，运动员编制200人，实际人数不足90。整个专业运动队伍濒于散摊子的局面。地、市级运动队几乎全部解散，没有解散的专业运动队也都停止了正常的训练。用于训练和竞赛的场馆有的被迫关闭，蛛网罩空、尘灰蔽地，比赛和训练的器材设施由于无人管理而遭到严重毁损。室外运动场都成了“大批判”和“群众集会”的理想场所，北京市的先农坛体育场等几个主要场馆都主要为批斗“走资派”和“誓师大会”所用。昔日热气腾腾的训练场上杂草丛生、荒芜凄凉。据广东省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仅21个地、市、县被占用的体育场地面积就有336亩；福建晋江地区共15个田径场，其中14个被开垦种田，唯一一个拥有十多个场馆的综合性体育设施——福建人民体育场被夷为平地，改作福州市“五一广场”。

在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竞技与“资产阶级锦标主义”等同而遭到批判。1967年以后，国内与参加国际的重大体育比赛因受政治运动的冲击而完全取消，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很多项目的训练和竞技完全中断。以天津市为例，1966年下半年到1970年初，训练和竞赛中断的就有田径、足球、排球、羽毛球、棒球、垒球、游泳、跳水、冰上运动等项目[1]。少数保留下来的项目，一方面由于运动员主要精力用于搞“大批判”，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组织管理和教练员的潜心指导，训练条件受限，又没有参加国际性比赛和国内大赛的机会，竞技水平急剧下降。从1967年初至1969年的两年多时间里，竞技体育比赛在全国几乎绝迹。

1969年“九大”以后，全国派性武斗基本平息，在全国性混乱状况稍有好转后，1970年部分体育管理干部、教练员、运动员顶着压力和风险，利用简陋的条件开始恢复训练。如黑龙江省体委在1970年就开始抓青少年业余体校，利用25米×15米的游泳池进行游泳训练。个别地方为适应各种纪念日举行庆祝活动的需要，

[1] 天津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天津通志·体育志.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开始有单个项目的表演性比赛，个别运动员因在“文革”开始后能坚持个人训练而取得了好的成绩。如 1970 年 11 月 8 日，跳高运动员倪志钦以 2.29 米的成绩打破了男子跳高世界纪录。本年还召开了“文革”以来组织的第一次全国排球集训比赛。但是，在 1970 年的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猖狂的破坏，全国整个政治局势没有明显的转机，极左的肆虐和横行，使我国的竞技体育从总体上处于几乎消失的状况。1971 年，竞技体育得以全面恢复，但由于近 5 年的停训，水平大大下降，如甘肃省在当年举办的第 4 届省运会上，项目从上届的 12 项减为 5 项，连一项省纪录也未打破。

（二）优秀运动员遭到打击迫害

1968 年，林彪、江青、康生出于他们的政治目的，炮制了“五一二命令”，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继后，一大批体育界领导干部遭到更加严重的冲击。贺龙同志于 1969 年 6 月 9 日被迫害致死。从“文革”开始以后，一些优秀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尤其是海外归国的优秀运动员，也被冠以“保皇”“黑尖子”“特务”等罪名而遭到批判。1968 年以后，很多人又再一次遭到更加严酷的批判，如著名的乒坛三杰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都在 1968 年因不堪迫害而相继含冤去世（自尽身亡）；9 次打破世界纪录的广东著名举重运动员陈镜开被迫离开体育战线，到工厂去当工人。根据“五一二命令”，军事接管小组进驻各省、市、自治区体委。黑龙江省的“军事接管小组将省和哈尔滨市体委系统职工按军队建制编成 9 个连队，全部拉到通河县岔林河农场办“五七干校”。在此期间，大搞“清理阶段队伍”，“近 1/3 的干部和教练员被隔离审查，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投入监狱”[1]。当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体委无一例外地处于这种

[1] 袁伟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地方卷）.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189.

境况。陕西省体委系统588人中，被点名、揪斗的97人；有家庭和历史问题的干部100多人；职工13人、运动员152人相继被下放到工厂、农村。“陕西体育队伍从此彻底解散。出现了篮球放了气，操场种了地，运动员唱了戏”的局面[1]。

二、竞技体育训练、比赛的局部恢复与发展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政治局势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乒乓外交”的成功，为竞技体育的恢复带来了契机。体育为政治服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促成了竞技体育的局部发展。

（一）“乒乓外交”与竞技体育的复苏

“文革”中体育得以全面复苏，是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政治局势变化的必然结果。而“乒乓外交”的成功，则为体育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

1.“乒乓外交”——体育为政治服务的淋漓尽致的表现

“文革”的潮水冲击体育领域后，曾经作为突击力量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中国乒乓球队，因为“与资产阶级体育路线跟得最紧”而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1967年4月10日，新华社发布了我国决定不参加在瑞典举行的第29届世乒赛的消息；1968年，乒坛三杰怀着巨大的痛苦相继自杀以表示自己蒙冤的不幸和不屈；中国乒乓球队有长达两年的时间没有进训练馆练球。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一些被关押的著名运动员受到了保护。

1970年春天，中国乒乓球队虽然逐步开始了训练，但由于“文革”中极左思潮猖獗，体育比赛与“锦标主义”联系在一起，出于各种需要，除了摆一摆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搞一点儿表

[1] 袁伟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地方卷）.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713.

演赛之外，没有系统地进行训练，没有国际间竞技体育的交往，训练水平和竞技水平已大大降低了。

1971 年春天，第 31 届世乒赛将在日本举行，日本为了使本届比赛成为真正世界级的比赛，竭力争取中国乒乓球队参加。日本友人后藤钾二先生是促成中国队参加第 31 届世乒赛的关键人物，他作为亚乒联主席和日本乒协会长，更希望把第 31 届世乒赛办成真正世界性的比赛。因此，他不顾本国右翼分子的阻挠，多次发函邀请中国参加第 31 届世乒赛。

由于中国乒乓球队有两年的时间没有真正训练过，人们也担心他们的水平能不能在世界大赛中具有抗衡强手的实力，因为此前有过失败的例子，即 1970 年 11 月 20 日—12 月 6 日在瑞典举行的第 13 届斯堪的纳维亚乒乓球锦标赛上，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国家体委决定派出当时的最强阵容——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林慧卿、李赫男、郑怀颖等组团参加比赛。结果可想而知，因为中国乒乓球队的技术水平已经大大落伍了，中国男队团体赛连半决赛都未冲过去，单打在半决赛中也未能如愿而告负。在如此的技术水平和沉重的心理压力情况下，中国队还去不去日本参加第 31 届世乒赛？就在瑞典的观众席上，前世界男子单打冠军荻村伊智朗预料道：看来中国队不会去日本参加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了。

但是，周恩来总理以博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胸怀，为推动中国乒乓球运动重返国际舞台，打开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这扇沉重的大门的决心并没有因为在瑞典的失利而动摇。心急火燎的后藤先生于 1971 年 1 月 24 日亲自来到中国。在与中国乒协的会谈中，后藤诚恳地希望中国派团参加世乒赛，并首先表态将周恩来于 1958 年 7 月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提出的“日中关系政治三原则”纳入两国乒协会谈纪要，即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日中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他还指出，由于中国乒乓球队多年没有参加国际比赛，台湾以“中国”的名义占据了

亚乒联的席位，他将在亚乒联大会上提出整顿亚乒联的动议，如果动议不成功，他将辞去亚乒联主席的职务。然而，由于“左”倾思想的作怪，中方在双方协议的具体条款上给后藤出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难题，一时搞得很僵。周恩来得知后批评了中方代表的做法，还亲自会见了后藤钾二，并对他表示感谢和支持[1]。

中日乒协会谈纪要的签署，在日本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日本《朝日新闻》评论说：“日方承认了‘政治三原则’，这就打开了日本与中国乒乓球交流的道路。今后不仅是体育，在推进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交流时，也将继承这种乒乓球方式。”中国乒乓球队知道将要赴日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消息时，距比赛开幕仅剩50余天了。正是周恩来总理的高瞻远瞩，才使历史戏剧性地将中美两国运动员在第31届世乒赛的赛场之外联系在一起，共同承担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使命。1971年2月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国乒乓球队将去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比赛的消息。2月3日，周恩来总理在当时国家体委负责人曹诚等人的陪同下，两次来到体育馆看望处于紧张训练中的中国乒乓球队运动员，要求运动员要充分认识参加比赛的政治意义，根本的目的是促进友谊。周恩来总理对运动员说，你们到日本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打胜了固然很好，但如果人家有本事，我们得第二、第三也没有什么，无非五年没有出去，生疏了，就再学习一次嘛。”周总理在当时的背景下提出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和方针，是准确和符合实际的，具有十分积极的涵义。

正当中国乒乓球队全体成员全力以赴，准备去日本的前半个月，美国扶植的柬埔寨朗诺集团宣布参加世乒赛的消息传来。由于中国队参赛连着“五国六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国内也有强大的政治干扰，使是否派队参赛重新面临抉择。周恩来总理在紧急处理与参赛有关的外交事务的同时，征求了有关人员，包括运动员的

[1] 钱江. 小球转动大球“乒乓外交”幕后.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27-44.

意见之后，于15日凌晨亲自向毛泽东主席写了关于派队去日本参赛面临的国际问题、自己的分析及处理意见，并力主赴日参赛。毛泽东主席经过权衡，于当天下午批示："照办"，并写下批语："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971年3月21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中国派出以赵正洪为团长，有庄则栋、林慧卿等著名乒坛宿将参加的代表团共60人，分乘联邦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和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两架客机前往东京。中国队这次参赛为世人瞩目。

3月28日，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式开始，共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运动员参加角逐。中国队由于赛前思想、技术准备充分，共获得4项冠军：男子获团体冠军；林慧卿获女子单打冠军；林慧卿、郑敏芝获女子双打冠军；张燮林、林慧卿获混双冠军。

这支在"文革"开始后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的中国体育代表队，赛前训练时间短，当时的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绩，完全依托于"文革"前所练就的扎实功底和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与关怀。

这届锦标赛的结果再一次证明了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乒乓强国。这一届锦标赛在世界乒坛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乒乓球运动史上欧、亚抗衡的时代开始了，日本队从曾经雄踞过的巅峰滑落下来。此后，中国队每每将与欧洲强队临阵斗智斗勇。

2. "乒乓外交"的成功——小球转动大球

在第31届世乒赛上，中国队虽未取得十分满意的成绩，但却意外地拉开了"乒乓外交"的序幕，并由此为打破中美之间的坚冰、开通往来的航道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由此，"乒乓外交"这个词汇出现在国际政治、文化、经济诸多方面的词典中，使竞技体育为一定社会政治服务的功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在名古屋的比赛期间，中美运动员多次接触，美国运动员曾主动招呼攀谈，并表示了想去中国访问的愿望。在当时，对外出比赛

运动员有很严格的限制，中国运动员除了礼节性的应付一下和向领导汇报外，再没给对方以深入下去的机会。但是，中美两国人民的沟通及政府间正常交往的通道口的打开，似乎历史地要放在这届世乒赛期间，放在经过动荡和波澜、艰难地走出国门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身上。

4 月 4 日，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从训练馆去爱知体育馆时，情急中连连招手，跳上了一辆载满中国运动员的班车。庄则栋为打破尴尬的局面，从后排走到科恩身边，科恩也认出了这位前世界冠军，两人通过翻译进行了友好交谈。庄则栋将一幅一尺多长织有黄山风景画的杭州织锦从挎包里掏出来送给了科恩。在“文革”中，一般人若有亲人在国外都怕沾惹“里通外国”的罪名而唯恐避之不及，冒然与美国人接触，是要担风险的。

科恩与庄则栋肩并肩地交谈，一起到达爱知县体育馆，这一别开生面的场景，早已被众多敏感的记者摄入镜头，并很快见诸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新闻。

两天后，科恩来到中国代表团的驻地回访，向庄则栋赠送了一件别有美国纪念章，印有红、白、蓝三色和平标志的运动衫。两人站在一起高举互相收到的纪念品，四周立即响起了一片“嚓嚓”照相机快门的按动声，中美运动员的感情交流在乒坛盛会上传为佳话，共同社、美联社作了详细的报道。

在比赛期间，中国代表队邀请了加拿大等国运动员顺道去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和交流。美国队的副领队来到中国队的驻地要求会见，这位美国人开门见山地表达了希望访问中国的愿望。中国领队对这突如其来的请求毫无准备，只好立即请示国内。

4 月 6 日与 7 日午夜、凌晨时分，毛泽东主席在批复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后，脑子里还在斟酌和权衡此事。从 3 月中旬以来，美国在对华关系上已做出了积极的姿态，从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两条秘密渠道不断传来的美方信息分析，中美关系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毛泽东的身边放着报道国

际消息的“大参考”，中美运动员友好交往的情景，已引起了西方新闻界的极大关注，致使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的新闻都逊色一筹。毛泽东主席经过反复思考，毅然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让美国乒乓球队而不是让特使先来中国，符合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外交思想。毛泽东、周恩来以伟人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政治家的气魄，艺术地把握和抓住了这个绝妙的时机。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发出以后，全国为之震动。尼克松看到国务卿罗杰斯送来的电报后，惊喜万分，立即批准美国队访华，并连夜召开国家安全特别会议，研究制定对华政策。当天晚上，美国乒乓球队将访问中国的消息震动了日本朝野，震动了整个世界。

新当选的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后藤钾二先生以主人的身份对中美代表团官员说，他之所以努力邀请中国队参赛，始终是为了使世锦赛获得成功，并未料到有今天的惊人结果。美国队收到访华邀请发生在由他主办的世界锦标赛上，也许是历史的特意青睐。日本一些官员发表评论说：“中国人可能绕过日本把手伸向太平洋另一端，不由得使人想起一个月前周恩来会见藤山爱一郎时说过的一句话：中美关系的发展可能会超过中日关系。”“今天的日本还存在一种忧虑，怕和中国改善关系后会引起美国的不满，我认为政府现在应当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看法了。”

美联社著名记者罗德里克在题为《乒乓球：通往北京的日子》的文章中说：“可能成为20年来在恢复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已经中断的对话方面所采取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步骤，竟出现在一个不大可能的地方——乒乓球赛……这个邀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一个迹象，表明北京对美国的政策有了缓和，它终于响应了美国国务卿罗杰斯自1969年以来所作出的和解姿态。”

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政府对美国乒乓球队计划中的北京之行表示欢迎。总统在向国会提出的对外政策报告中清楚地表明，他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相互接触。”

中国对美国乒乓球队的邀请，成功地拉开了“乒乓外交”的序幕。4 月 10 日下午，美国乒乓球队从香港走过罗湖桥进入广东深圳，傍晚乘飞机抵达北京。李梦华、吴晓达、邹伯贤、凌青分别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名义到机场迎接。4 月 14 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了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国、尼日利亚乒乓球代表团，掌声响彻大厅。中美这扇关闭了整整一代人的沉重大门，在一代政治伟人的谋划下，利用“乒乓外交”的契机，终于开启了。

在会见中，还有一段不可不提到的小插曲。美国运动员科恩还是嬉皮士的装束，利用周总理会见的机会，站起来问道：“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周恩来专注地倾听了科恩的提问后，坦诚地作了回答。周恩来谦逊、和蔼的态度，表达了对当代青年，尤其是对美国青年的了解和理解，使科恩和在场的人员都心悦诚服。两天后，一束来自美国加州威斯沃德的深红色玫瑰花被送到了周恩来办公的地方。这是科恩的母亲为感谢周总理对她儿子那番教诲而特意托人送来的。

同一天，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在专注地研究了周恩来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对中美关系的讲话后认为，是美国总统做出反应的时候了。中午，尼克松发表了一项声明，决定采取 5 个对华政策的新步骤。新步骤使美国政府实行了长达 20 年之久的对华贸易禁令大墙崩塌了。中美关系之门在中美双方的推动下徐徐打开了。

4 月 16 日，尼克松总统又发出了一个信息：本届和下届政府的长远目标，一是使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二是使大陆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结束。

美国乒乓球队带着中国人民的友谊，于 4 月 18 日回到了美国洛杉矶。在机场上，代表团所有成员都发表了对中国热情友好的观感。

4 月 21 日上午，尼克松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斯廷霍文，斯廷霍文告诉总统他已经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然后问：“如果来访的中国运动员希望见总统先生，我该如何回答？”尼克松应道：

"给予完全对等的接待。"

与此同时，总理周恩来充分利用"乒乓外交"带来的机遇开启了"巴基斯坦渠道"，他向尼克松总统发出了口信："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总统本人来北京商谈。"几天后，尼克松请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着手准备秘密访华。"乒乓外交"是以中美乒乓球队互访为形式，以两国政府的高层对话为实质的。在美国队于1971年4月访问中国后，基辛格作为总统特使于1971年7月实现了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并缔结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美上海公报》。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回访了美国，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访问美国的团体，并受到尼克松总统的接见，从而为"乒乓外交"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中美建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乒乓外交"为加速中美双方走向官方接触的步伐提供了契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这次访华的结果，是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紧接着是中日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随后，又有很多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乒乓外交"的成功，使竞技体育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在"文革"那种大讲"突出政治"的年代和社会环境下，开启外交大门的同时，无疑为竞技体育走向世界创造了充分的理由和条件。1971年，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使竞技体育与世界各国开始相互交往，这同时也为竞技体育的复苏起到了启动和促进的巨大的作用。

3."乒乓外交"的成功对体育领域的巨大影响

（1）国际间竞技体育活动的增加

直径3.8厘米、重2.5克的小小银球，在毛泽东、周恩来以超常智慧和魄力的操作下，撞开了紧闭了23年的中美关系大门。1971年，以乒乓球比赛为桥梁，联系和加强国际间关系的外交攻

势，在第 31 届世乒赛后，有了更强劲的力量和新的目标。小小银球依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第 31 届世乒赛结束后，中国乒乓球队利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在日本朝野引起巨大震动的机会，为推动中日民间友好活动的发展，推动中日帮交，应邀在日本继续访问。4 月 18 日，中国乒乓球队在福冈市九电纪念体育馆与日本运动员进行了男女团体和男子单打比赛。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在赛前的讲话中，希望日本观众通过观看表演增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促进和恢复日中两国帮交的早日实现作出贡献。19 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乘飞机到达北海道首府札幌，进行为期 3 天的友好访问，为推动中日帮交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以鲁挺为团长率领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部分成员，应邀从 4 月 13 日起，连日为香港地区贸易、银行、新闻、出版、文艺、教育等各界人士进行了多次专场表演。16 日，为两千多名工人、农民进行了专场表演，并与工人乒乓球业余爱好者进行了友谊比赛。5 月 3 日晚，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香港向港澳同胞作汇报表演，受到了热烈欢迎。

8 月，中国乒乓球队访问阿联酋；9 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古巴、智利；10 月，中国乒乓球教练员访问加拿大；同月，南斯拉夫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11 月 3 日，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在北京隆重开幕，亚非 58 个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协会或体育部门应邀参加。49 个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运动员、各国外宾和近两万“革命群众”参加开幕式。这是“文革”以来，我国主办的第一次国际大赛。在“乒乓外交”取得成功，打开了中美政府间紧闭的大门后，这届亚非区域性乒乓球比赛，对于中国加强同亚、非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有其重要的意义。这次邀请赛提出了以“增进亚非各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促进亚非乒乓球发展为宗旨”。中国虽仍处于“文革”的动乱之中，但为保证这次邀请赛的圆满成功，从各方面

都作出了巨大努力。11 月 13 日，在邀请赛行将结束的前夕，亚非友好邀请赛举行了第 3 次团长会议，继续讨论了有关下届友好邀请赛的问题。通过了友好邀请赛代表团长会议公报，一致决定把友好邀请赛范围扩大到拉丁美洲，并在适当的时间举行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会议选出智利、朝鲜、厄瓜多尔、埃及、日本、毛里求斯、尼泊尔、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中国的乒乓球协会的代表组成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筹备委员会。这是“乒乓外交”卓有成效的继续和扩展。球桌上划过的道道银弧，像一条条纽带，将亚非拉国家首脑人物、政治家、外交家力图达到的沟通、联系的目的，通过很和谐、很自然的欢快体育比赛实现了。这也是“文革”那种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条件下的重大发现和创造。

“乒乓外交”同时也开启了竞技体育的其他项目与外界隔断了 5 年之久的大门。4 月 14 日，应古巴全国体育文娱委员会邀请，中国女子篮球队前往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文革”以来国家专业运动队的第一次外访。6 月，中国女子篮球队访问几内亚；7 月，中国田径队访问阿尔巴尼亚；9 月，北京男女篮球队访问几内亚，中国女子排球队和男子篮球队访问朝鲜；12 月，中国女子篮球队和男子排球队访问阿尔巴尼亚。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出访的同时，一些友好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也来到中国访问。5 月，刚果、朝鲜、巴基斯坦等国的足球、羽毛球、田径等代表队应邀访问我国。我国与其他友好国家的体育代表团的互访，主要是充当国家政府间的友好使臣的角色，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比赛本身，主要侧重点不是提高竞技水平，而是加强合作，促进友谊。继后，各省、市、自治区的国际体育交往也日趋频繁。以湖南省为例，仅 1972 年，就有来自友好国家的运动队计 20 批 359 人来访问、训练和参加友谊比赛。湖南省运动队出访的人员也渐渐增多，1974 年，由湖南女子体操队和上海男子体操队组成的中国体操队，访问土耳其和黎巴嫩；1975 年，湖南男子排球队和四川女子排球队组成中国排球队访问伊拉克；1976 年，湖南体操队代表中国体操队出访希腊、意大利

和圣马利诺。

(2) 参加第7届亚运会、世界中学生运动会

“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之间的联系，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外交上获得的重大成就和国际关系的不断改善，为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席位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际体育界许多主持正义的人士，在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后，纷纷提出应当恢复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席位。首先是亚洲体育界的人士，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亚洲运动会联合会的成员，亚洲运动会没有近10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是不正常的。第7届亚运会东道主伊朗国王多次表示：没有中国参加，就没有亚运会；如果中国不参加，亚运会就不开了。

1973年9月18日，亚洲运动会联合会执委会会议在曼谷召开，由亚运联主席伊朗古拉姆亲王主持。伊朗代表在会上提出了“亚运联中应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表中国”的提案。提案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运联不能充分代表亚洲。”经过辩论，该提案以5票赞成、1票弃权被通过。同年11月16日，在伊朗德黑兰举行的亚运联理事会特别会议上，以38票赞成、13票反对、5票弃权确认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亚运联合法权利的决议。亚洲体坛的大门开始向中国运动员打开。

1973年11月17日，在亚运联理事会通过恢复中国合法权利决议的第二天，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声明，宣布：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为亚洲运动会联合会的成员，将派出代表团参加1974年9月在德黑兰举行的第7届亚运会[1]。

[1]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1）：精华本上册.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65.

亚运联率先确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该组织合法权利的公告发表后，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1974 年 2 月 9—11 日，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的执委会上就此事进行了讨论。亚运联主席古拉姆亲王应邀与会，介绍了亚运联理事会通过接受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经过。此时的国际奥委会在经历了一系列危机后已逐渐进入了初步改革阶段，1972 年接替布伦戴奇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基拉宁，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各种痼疾有深刻的认识，对国际奥委会保守、封闭，与社会发展脱节的旧模式有切身的体会。在他的领导下，国际奥委会开始向改革、开放过渡。因此他对中国问题采取了积极、客观的态度，在他的主持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成员认真听取了亚运联主席和国际奥委会台湾委员徐亨的意见。认为国际奥委会应继续承认并支持主办亚运会的亚运联，并表示有条件地承认了伊朗德黑兰承办的第 7 届亚运会。这意味着国际奥委会已默默地同意了亚运联恢复中国席位的做法，这对想解决中国问题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来说无疑是一种暗示。

然而，按照奥林匹克宪章和有关国际体育组织章程的规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成员不能与非会员比赛，由于相当一部分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尚未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尽管成了亚运联会员，但我国仍不能参加亚运会中部分项目的比赛。中国迈向世界体坛的坚冰虽已融化，但仍困难重重，不过随后发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冲破了这些障碍。1974 年 5 月，国际击剑联合会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击剑协会入会的决定。同年 7 月和 9 月，国际业余篮球联合会、国际业余摔跤联合会、国际举重联合会相继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几乎与此同时，国际田径联合会、国际足球联合会等国际体育组织也先后召开特别会议并作出了决定，在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之前，允许会员国的运动员同中国运动员进行比赛。但国际游泳联合会理事会在讨论中国参加亚运会游泳比赛议案时，却以微弱多数通过了禁止亚洲各国运动员与中国运动员比赛的决议。游泳成了在第 7 届亚运会前唯一禁止中国参赛的项目。但中

国游泳、跳水、水球选手仍飞抵德黑兰。在机场，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赵正洪对记者说：为了表示对亚运会的支持，我们的游泳队已到德黑兰。但是，为了尊重亚洲各国和地区的游泳界，特别是为了尊重东道国伊朗，我们决定游泳队暂不参加比赛。后来，经过亚洲体育界人士的斡旋，8 月 30 日，国际泳联主席亨宁最终与中国体育代表团达成了参赛协议，中国游泳、跳水和水球运动员终于出现在第 7 届亚运会的赛场上。

在第 7 届亚运会期间，亚洲各单项运动协会召开了会议。举重、羽毛球、射击、击剑、自行车、摔跤、体操、足球、手球联合会等 13 个亚洲体育组织先后承认了我国各运动协会的合法席位。为了向中国打开大门，亚洲羽毛球、体操和足球联合会甚至修改和删掉了妨碍我方入会的章程规则[1]。其中亚洲足球联合会席位的解决颇费周折。9 月 14 日，亚足联在德黑兰举行代表大会讨论中国问题，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认为，中国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威望，亚足联没有中国的席位是不合理的。但亚足联章程中又有非国际足联的成员不能接纳为亚足联成员的规定，于是，会议以 25 票支持、8 票反对，通过决议将亚足联有关章程改为：得到国际足联同意，参加第 7 届亚运会足球比赛的国家可成为亚洲足联的成员[2]，我国在亚足联的合法席位得到确认。从此，中国全面走上了亚洲体坛，并开始了“冲出亚洲”的辉煌历史。

1974 年 9 月 1—15 日，第 7 届亚运会在伊朗德黑兰举行。2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400 名运动员参赛。这些国家和地区是阿富汗、香港、缅甸、印度、印尼、科威特、伊朗、日本、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以色列、柬埔寨、韩国、越南、巴林、朝鲜、伊拉克、老挝、蒙古和中国。由于有中国等 6 个国家的首次参赛，亚运会参加国家更具有广泛性，这

❶ 张鲁雅，等. 世纪情——中国与奥林匹克.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141.

❷ 张鲁雅，等. 世纪情——中国与奥林匹克.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142.

是亚运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被称为“第一次真正的亚洲运动会”。

中国派出了以赵正洪为团长的大型体育代表团，269名运动员参加了14个项目的比赛。我国运动员在这届亚运会上打破了1项世界纪录（李亚敏以555环成绩打破女子手枪25米60发的世界纪录）、18项亚运会纪录、22项全国纪录。在跳水（包揽了全部4枚金牌）、体操（获8枚金牌）、乒乓球（获6枚金牌）、羽毛球（获5枚金牌）等项目中取得了优异成绩。由于国内的“文革”尚未结束，我国的运动水平还不高，在田径、游泳和三大球等项目上与亚洲体育强国仍有一定的差距。

中国运动员在第7届亚运会上获33枚金牌、64枚银牌、27枚铜牌，团体总分列第三位，开创了中国正式参加亚运会比赛的历史。

1974年9月24—27日，第1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在联邦德国威斯巴登举行，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名运动员参加，中国运动员在田径、体操等项目上取得了较好成绩。

初登国际体坛的中国选手的成绩虽然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乒乓外交”后的一系列国际体育活动和比赛，开创了新的局面，为中国体育全面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二）竞技体育的局部恢复与发展

1972年，在整个国家政治局势出现了转机的前提下，竞技体育得以较全面的复苏。此后，在部分项目上取得了局部的发展。

1. 专业队伍的重建与训练比赛的局部恢复

在国际性大赛和国际间交往的带动下，为加强与“世界各国革命人民”交往的需要，一些专业运动队开始恢复训练。1971年，主要是国家体委管辖的部分专业运动队逐渐开始进行训练，以恢复和提高技术水平，一些省、市、自治区体委管辖的很多专业运动

队，在1970年已经有时断时续的训练。1971年，专业队的训练在“乒乓外交”的推动下有了“合法”的名分，在重新组建的基础上，开始转入有组织的训练。如山东省的田径、体操、足球、篮球、排球、游泳等项目的专业队，1971年开始走入正轨训练；天津市在1971年正式组建了田径队。同时，全国和地区性体育比赛也开始恢复。1971年5月8日，吴浮山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田径比赛中，跳过了1.82米的高度，创造了我国女子跳高的新纪录。6月，在北京举行了“文革”以来第一次全国田径集训赛。11月，在广东韶关召开的田径表演赛上，天津选手张豹以75.87米的成绩，打破了男子标枪全国纪录。天津市遵照国家体委指示，在全国率先恢复了棒球运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召开了不同规模的单项或多项运动会，地（市）县级的体育比赛也相应增多。由于比赛和训练的相互促进，打破了竞技体育沉默局面，出现了活跃的状态。

但从整个竞技体育队伍来看，已经被“文革”的浪潮冲得七零八落，元气大伤。1972年以后，随着整个政治局势的转机，竞技体育得到较全面的复苏，在整个体育组织管理体系得到了梳理和初步恢复后，首先开始了专业运动队的重新组建工作。从现在各省、市、自治区编纂的体育史志中所记载的资料看，1972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体委所辖的专业运动队中，一些主要的项目率先得到恢复。大多省、市、自治区建立了体工大队。根据“文革”后运动员年龄、技术的实际情况，重新组建了各个项目专业运动队。如天津市1972年6月，将体育训练班改为体工大队，组建了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游泳等项目，共有321名队员。8月，组建了棒球队。1973年，重新组建了男、女手球队、自行车队、击剑队。1974年，组建了女子垒球集训队。北京体育学院在1972年经国家体委同意，成立了射箭队，全队编制22人，这是“文革”以来恢复组建的第一支高水平运动队。男、女队教练员分别由曾打破世界纪录的著名运动员徐开才、李淑兰担任。河北省在“文革”前，优秀运动员集训队有17个项目，1971年以后，至

1976 年恢复了 12 个项目。“文革”初，武术被称为“四旧”而遭到摧残，许多老拳师被迫害致死，不少有价值的武术著述被查抄焚毁。1971 年以后，一些省、市的武术队得以恢复，1972 年，在山东济南举行了“全国武术评奖大会”，进行了拳术和器械的表演与交流，继后，很多省、市恢复和组建了武术队。

“文革”中在重新组建和恢复体育优秀专业运动队过程中，也有今天看来很有创新意识的举动，如山西省体委在 1974 年 3 月，与太钢公司签订协议，由太钢组建男女手球队，这可说是全国办高水平运动队最早的企业。当然，当时不可能有今天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体育社会化的条件和思路，但是，职工对体育的喜爱和需求，促成了后来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太钢模式”。

1972 年，由于竞技体育组织管理体系的恢复，保证了重新组建和完善后的专业运动队转入比较正常和系统的训练。经过 5 年动乱，很多运动设施被破坏和废弃，运动员身体素质和运动技术水平严重下降。教练员和运动员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环境和机遇，克服重重困难，因陋就简，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补课”式的恢复性训练。很多体工大队针对运动员的状况，组织了专门性集训，专业运动队训练开始步入正轨。

1972 年 10 月，在《新体育》复刊号上发表的《为革命攀登技术高峰》一文中指出：“我们讲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是输赢无所谓”“思想只能统帅技术，不能代替技术，不练技术就不行。”“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精神万能论’，无限度夸大思想作用，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典型的形‘左’实右。我们一定要彻底清除这条错误路线的流毒。”在同期刊载的《切切实实抓好冬训》一文中，很明确地提出了“努力提高我们运动水平，迅速赶超世界水平，是体育战线一项迫切任务”。并大胆地提出要恢复在“文革”前总结出来，并行有效的方法，“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必须遵循毛主席关于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一贯教导，结合运动训练的实际，从实践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进行大运动量训练，这是提高运

动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迅速改变目前一般运动量偏小、训练质量不高的状况”。并对专业运动队提出了要求：“通过今年冬训，要求各个运动队伍在身体素质和基本技术方面取得显著进步。”

1973 年 2 月 20 日，在国务院批转的《1973 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根据 1972 年训练的状况，提出了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迎接第 3 届全国运动会、刷新大部分全国纪录、部分项目达到国际水平的要求，并要求从现在起就要积极准备，各地要订出指标，采取有力措施，力争在一两年内刷新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纪录，球类项目的水平要有明显的提高。各省、市、自治区以上专业优秀运动队根据会议纪要精神和要求继续进行了调整、充实，健全了领导班子，补充了新生力量；很多教练员恢复了训练工作，缓解了教练员不足的矛盾；继续贯彻了“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方针，坚持从实际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进行大运动量训练的原则。很多优秀运动队为改变运动量偏小、训练质量不高的状况，在保证政治学习、“大批判”、集会，为工农兵表演的时间外，确定了全年训练时间在 280 天左右、平均每天训练 5 小时以上的指标。并在特别注重苦练基本功、重视身体素质训练的同时，加强了训练的计划性、科学性和系统性，以保证训练的质量。1973 年国发 22 号文件，明确提出了要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调整充实优秀运动队、提高训练质量等要求。之后，各省、市、自治区优秀运动队得到了较大的恢复、健全、充实。如山西省恢复了足球队、女子排球队，并着手组建了举重、射箭、棋队，对篮球、田径、乒乓球、体操、自行车和武术等项目的运动队进行较大规模的充实和加强，几年中从全省各地选材达 1700 多人次，集训 580 多人次，入选 229 人[1]。

1973 年，优秀专业运动队的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多数运动项目的成绩超过 1972 年，打破了一批全国纪录和省、市、自治区纪

[1] 袁伟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地方卷）.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89.

录。体操在国际交往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跳高、跨栏等田径项目保持了较好的水平；游泳多项全国纪录被打破，竞技水平提高较快。虽然专业运动队集训时间较短，但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青少年运动员。

由于整个社会环境条件只是有所好转，“文革”中的各种消极因素依然在干扰训练工作的正常开展，加之一些专业优秀运动队的领导不力，不能认真贯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方针，致使训练质量不高，影响了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1973 年 12 月 3 日，国家体委转发了《1973 年全国训练工作会议纪要》。在 1973 年“批林整风”对极左思想进行抵制和进行有限度批判的有利氛围下，《纪要》中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我国运动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纪要》总结了一年多来全国训练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明确地指出了我国运动技术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以 1973 年的成绩比较，我国在田径大项开展的 39 个项目中，只有 3 个项目进入世界前 20 名，其他项目均在世界 30 名以后。虽然亚洲的田径水平较低，但我们仍不占优势。在游泳大项中，我国与 1972 年世界最好成绩相比，有 29 个项目排在世界第 50 名之后；与亚洲成绩相比，除男子 100 米自由泳外，男女项目都低于日本，女子项目大部分还不如新加坡。体操的水平提高较快，但与世界强队相比，我国运动员的高难度动作数量少，动作质量也不高，编排陈旧，成队水平低。有的强项，实力也不雄厚，如男子跳高，跳过 2.10 米以上的，有的国家有几十人，而我国当时只有 2 人；100 米跑 10.2 秒以上的，有的国家上百人，我国当时也只有 2 人。我国与世界高水平的悬殊差距实际就是由于“文革”的冲击和破坏，使专业运动队停止训练的结果。

当时，我国的竞技体育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肩负着艰巨的任务。1971 年“乒乓外交”的成功，使竞技体育承担了在国际间架桥铺路和树立形象的任务。特别是同年 10 月，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3 年 11 月 16 日，亚洲运动会联合会理事会又

以压倒多数通过决定批准了执委会关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合法权利的决议。同年11月17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声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为亚洲运动会联合会的成员将派出体育代表团参加第7届亚洲运动会。竞技体育的特殊性，使国家体委在抓训练工作的过程中，必须抵制和反对空头政治口号，要实实在在地刻苦而科学地训练，必须以真正的技术水平作保证。

因此，在1973年12月3日下发的《全国训练工作纪要》中，明确地提出了要在1974年的第7届亚运会上，力争部分项目取得冠军，大部分项目进入前3名；参加世界中学生田径、游泳、体操锦标赛，应力争创造优良成绩，并通过比赛促进我国青少年运动员成长；在第3届全运全上，要力争刷新大部分全国纪录，部分项目达到国际水平。此外，还要有一大批接近全国纪录和省、市、自治区纪录的运动员，为超越世界先进水平打下雄厚的基础。

为了实现以上目标，《纪要》要求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迅速掀起大干快变的训练高潮，要继续贯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方针，提高训练质量；各运动队要根据三五年达到一般国际水平的要求，制订多年的、年度的和各个阶段的训练计划，并根据实践经验，不断地调整和充实；在身体素质和技术训练中，要加强技术分析和技术研究，要根据各个项目的规律和当前国内外技术发展状况，采取科学的训练方法和手段，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求实精神结合起来，讲科学、讲实效，不搞形式，不走过场；教练员要加强思想革命化，在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同时，不断提高科学和知识水平；在训练方法上，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运动队的党支部要讨论训练计划，对训练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要一项一项地研究，一个一个地解决。

1973年底，全国已经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树“反潮流典型”，批所谓“复辟回潮”。“四人帮”一伙的矛头所指，就是反对周恩来总理在“批林整风”中提出并实施的一些纠“左”的措施。“批林批孔”和“反潮流”的歪风扰乱了各行各业刚刚恢复的

正常秩序，一些单位的领导班子再次瘫痪，全国重新出现了大动乱的局面，使整个体育战线再次受到冲击，造成了损失。但单从竞技体育领域看，运动队虽然也搞“大批判”、搞一些形式主义的活动，但基本上稳住了阵脚，保证了正常训练。

1974年2月12日，国家体委在下发的本年工作重点中，强调了认真贯彻落实1973年全国训练工作会议精神，继续贯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方针。大运动量训练要贯彻全年。提出了要狠抓优秀运动队伍的建设和训练，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运动队伍。要坚持政治挂帅，树立赶超国际水平的雄心壮志，大破无所作为的懦夫懒汉思想，要充实加强教练员队伍，提高教练员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提出将在1975年举办第3届全运会，力争在全运全上打破几项世界纪录，部分项目达到国际水平，刷新大部分全国纪录和省、市、自治区纪录，实现各个项目1974—1976年规划中所提出的指标。

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训练工作从1972年起，开始较快地得到恢复。1973年，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以后，又兼管体育。使整个体育界，尤其竞技体育的训练工作在1973、1974年继续朝好的方面发展，逐渐地步入了正轨。1973年全国训练工作纪要和1974年全国体育工作要点强调的精神内容中，敢于公正客观地分析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提出并运用“文革”前制定的训练方针和原则，强调党支部要管训练，教练员要学业务，不搞空头政治，还大胆地提出了吸收国内外科学的训练方法，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提出科学、系统训练所应达到的长期、中期、短期目标。与当时全国其他行业相比，整个体育界抵制极左思潮的力度要大一些，尤其竞技体育，更是先行一步进行了整顿。

竞技体育要出成绩，周期比较长，不是一年半载、三两个月就能抓出成效的。因此，在整个体系遭到破坏后，恢复的时间也相应较长。尽管从1972年到1975年间，整个社会环境与“文革”初期相比已是大为有利，但仍然要受到极左思潮氛围的压抑和“四人帮”的干扰。这两个主要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使训练不能很快很明

显地取得效果。1974 年，在第 7 届亚运会和国内大赛中，部分运动项目的成绩才开始显示出有所提高。在 1975 年的全国第 3 届全运会上，部分运动项目的成绩提高幅度较大。如果整个政治局势沿着 1975 年邓小平同志全面整顿的状况发展下去，我国的训练水平将会有大幅度的提高。不幸的是，1976 年初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造成了全国性的动乱，造成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大滑坡，整个体育界同样不可能幸免于难，已经上升的训练水平，又再次滑回了低谷。

2. 业余训练的逐步恢复与逐步加强

为了培养竞技体育的后备力量，抓业余训练一直是“文革”前体育方面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从 1966 年到 1968 年，整个业余训练的工作完全停止，浪费了大量可能或即将成材的人才，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断层。

1969 年，全国的局势趋于稳定，部分省、市、自治区体委恢复了“文革”前一些重点业余体校的训练，如湖南省，于 1969 年较早地开始业余训练，并且是地、市、县业余体校、厂矿业余体校和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三条线逐步发展。黑龙江省在 1970 年就开始了青少年业余体校的工作。1971 年，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如北京、山东、辽宁、广东、四川等开始着手抓业余体校的训练工作。

全国普及性地恢复业余体校和全面地恢复青少年业余训练，是在 1972 年。在当时召开的全国训练工作会议上，明确地指出了抓青少年业余训练的紧迫性和重要意义，要求各地把开展业余训练作为整个训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提出了“从儿童抓起”。继训练工作会议之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从恢复“文革”前的重点业余体校逐渐地向地（市）、县级发展普及。1972 年，天津市恢复市、区级业余体校 15 所，共 19 个班，设有 13 个项目。山东省体委于 1972 年 3 月在山东省体育骨干训练场举办了第一期业余

教练员学习班，培养教练员 78 人。到 1972 年底，济南、青岛、烟台等 17 个市、地、县恢复了业余体校。除“文革”前各省、市、自治区的重点业余体校外，全国地、县级业余体校，基本都是在 1972 年才得以恢复。

针对业余体校训练普遍恢复的状况，为加强对业余体校训练的指导，1972 年 9 月 15—25 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体委在西安召开了全国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工作座谈会。11 月 18 日，国家体委、国务院科教组联合下发了《1972 年全国青少年业余体校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办好业余体校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宣传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教育方针；不断提高青少年运动技术水平，为优秀运动队和业余代表队培养新生力量，同时为基层培养专业技术骨干；推动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普及与提高；青少年业余体校在办学形式上，提倡因地制宜，多种多样。但应有组织领导机构，有专兼职干部，有专职教练，有固定训练的时间和必要的器材场地保证；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体委可以会同教育部门合办一所或数所重点青少年业余体校，在保证教学任务完成的前提下，使学生有较多的训练时间。

根据《纪要》的精神，各地在恢复业余体校的过程中，基本上做到了指导思想明确、培养目的和目标明确，组织领导、教练员、设施器材都做到了基本落实，县级以上业余体校，都由体委一名副主任分管。根据业余训练停顿了 5 年和青少年、儿童基础较差的状况，各业余体校都很注重从小培养的原则，立足于经过多年训练，打好基础。在教学训练中，各地体校根据实际条件，针对青少年儿童年龄特点，区别对待、循序渐进地进行训练，根据各个项目的不同特点，建立学制，使教学训练有系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1972 年，全国在恢复原有青少年业余体校的同时，又新建了一批业余体校。为尽快提高业余训练的水平，解决教练员缺乏的困难，省、市、自治区的优秀专业运动队有计划地与一些青少年运动

队挂钩，定期进行辅导。

1973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提出和强调了要大力抓好业余训练工作。根据1972年全国业余体校恢复状况，要求在1973年逐步形成层层衔接的业余训练网，为运动员培养后备力量，为基层培养骨干。

1974年国家体委下发的体育工作要点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选择两三个市（区）县，建立按项目对口挂钩、层层衔接的业余训练网，并总结推广经验。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体委商同教育部门至少办好一两所重点少年儿童业余体校，并提出具体的指标是：重点业余体校（班）学员与优秀运动员应达到一比一，基础较好的达到一比二。

各地在怎样办好业余体校、解决优秀运动队后备力量不足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有的省、市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湖南省的业余训练恢复得很早，从1969年启动训练后，三条线并行发展培养专业人才：第一条线是地、市、县业余体校。至1977年发展为97所，有专职教练员277人，兼职教练员405人，在训学生达9763人。由于很注重办校的质量，培养出了一批高水平竞技人才。第二条线是厂矿业余体校。1973年首创于株洲田心机车厂和衡阳冶金机械厂，1974年发展到11所。厂矿业余体校的特点在于集中抓好某一专项，其中湘潭钢铁公司的网球、南方机械公司的羽毛球、江麓机械厂的垒球和田心机车厂的体操形成了各自的优势。湘潭钢铁公司业余体校网球班坚持“从小抓起、系统训练”，选拔培养出一批国家优秀网球运动员。第三条线是体育传统项目学校。1972年开始，各业余体校在学校设立训练网点，各学校根据自己体育的优势和特点，形成传统体育项目。除省级体育传统学校外，各地、县也相应确定了一批传统项目学校[1]。

北京市为解决优秀运动队后备力量不足的问题，70年代中期

[1] 袁伟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地方卷）.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467.

在各个业余体校普遍成立了体育班，把具有同一运动项目特长的同龄学生实行三集中：同吃、同住、同训练。这种办法对提高业余体校学生运动技术水平起到了一定作用。1973 年，北京市成立了第二业余体校，设有足球、篮球、排球、田径 4 个运动项目，招收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进行为期 3 年的学习和训练。这所体校为北京优秀运动队输送了不少人才，女排的郎平和杨晓君就是突出的代表。同期，北京市还设立了业余体校的输送奖，教练员每输送给优秀运动队一名队员，就可以获得一定的奖励。通过这些办法，使业余体校从普及型转变为提高型，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优秀运动队后备人才的燃眉之急[1]。

为解决业余训练教练员紧缺的矛盾，关心他们思想和业务水平的提高，国家体委委托北京体院开办业余教练员训练班。各省、市、自治区都参照举办了相应的业余教练员训练班。

1973—1975 年，全国业余体校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县级以上中学和小学，大都办起了业余体校。优秀运动队与青少年业余体校挂钩，业余体校又扩展性地与周围基层训练点和中小学挂钩，很快就形成了层层衔接的业余训练网。1972 年，全国只有上海恢复了 1 所重点业余体校。到 1974 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恢复和建立了重点业余体校，县、地、市各级业余体校也达到了非常普及的程度。

业余体校从恢复到发展，在短短的 3 年内能在全国形成这样大的规模，且生源非常充足，是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条件的。第一，中小学从 1970 年恢复上课以后，由于“文革”中不敢抓智育，“教育革命”的直接结果就是减少文化基础课程，压缩课时，很多学生都亲眼目睹了“文革”初知识分子的可悲下场，学生受“读书无用”的影响，不上课、不考试，大量时间无所事事。由于体育能满足绝大多数青少年活动和娱乐的需求，参加业余体校进行正规和

[1] 袁伟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地方卷）.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13.

系统的训练，无论从“学”还是“玩”哪个方面考虑，学生和家长都比较赞同而愿意投入。第二，从1970年开始，在“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招兵，1971年又开始招生、招干等。在挑选和竞争中，有体育特长的人往往被优先考虑而得以抢先返城，所以这使得很多家长和学生本人都把进业余体校作为创造将来顺利返城的重要条件之一。如北京市自从初高中毕业生必须经过“上山下乡”以后，“使身体条件较好的学生及其家长感到搞体育可能是更好的出路，因而刺激了学生参与体育训练的积极性。所以1972年北京市为准备参加1973年的全国比赛而组织的中学生足、篮球队和田径集训队，就出了一批条件相当不错的运动员，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成为七八十年代北京竞技体育的骨干。”[1]第三，建立业余体校以锻炼和培养青少年具有强健的体魄，是国防和备战的需要。因此，很多业余体校在招收学员时还要挑挑拣拣，很多爱好体育的学生要经过多方努力才能如愿。

到1975年，很多边远山区的中小学也建立了业余体校。为了提高和检查业余体校的训练质量，各级体委从1972年始，举办了不同规模的单项和多项竞赛。这样，既能促进训练，提高技术水平，又能发现优秀体育人才。

应该说，“文革”中的业余体校在极左思潮笼罩的环境下，也不可能顺利达到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目的。在全国性的大办业余体校的过程中，免不了有为政治的需要而大哄大上、搞形式主义的情况，但由于广大体育工作者和教练员的竭诚工作，从为祖国体育事业培养人才的高度责任感出发，对极左的东西进行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抵制，确实也收到了效果，培养出了一批拔尖人才。80年代一大批优秀选手，如足球运动员容志行、古广明、迟尚斌，乒乓球运动员李振恃、郭跃华、蔡振华，体操运动员李月久、马燕红和排球运动员郎平、孙晋芳等，都是从这个时代的业余体校走出来的佼

[1] 袁伟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地方卷）.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12.

佼者。

3. 体育比赛的恢复与形成高潮

1971 年，竞技体育得以恢复，到 1975 年，逐步形成了“文革”中的一个高潮。

（1）国内体育比赛

1971 年 7 月 8 日，中央任命王猛为国家体委革委会主任。此后，体委整个组织管理系统开始逐渐恢复，各级体委抓住“乒乓外交”成功所产生的巨大政治影响的绝好契机，重新组建了优秀运动队。为了尽快阻断由于“文革”造成的技术水平严重下降的趋势，恢复原有的技术水平，1971 年，很多省、市、自治区的优秀运动队开始从时断时续的训练转入正常化的训练。1972 年以后，各省、市、自治区的优秀运动队大多得以恢复和重新组建，抓专业队的训练成为各省级体委的重要工作。1971 年 7 月 29 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 7 个专业会议全体代表时指出：“体育运动有它的特殊性，就是比赛，一个是国内比赛，还有一个是国际比赛。”[1]周总理的这一讲话，是为了促进训练，增强训练效果和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同时也为了部分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从 1972 年起，全国性专项大型运动会逐渐增多，规模也不断扩大。

1972 年 6 月 9 日，为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 20 周年而召开的全国篮、排、足、乒乓、羽毛球五项球类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这个运动会打破了“文革”以来竞技体育比赛沉寂的局面。运动会分别在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唐山、张家口 6 个竞赛区隆重举行，共有 3000 多名运动员参加了这个运动会。由于这是自“文革”以来第一次全国高水平竞技比赛，观众踊跃，盛况空前，入场参观开幕式的观众总人数达二十多

[1]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1）：精华本上册.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61.

万。这次运动会确定的目的："是对我国体育事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新成就的一次检阅，是推动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促进运动技术提高的一次动员。"通过这一全国性轰轰烈烈的动员，使当时竞技体育比赛不再遭受"锦标主义"的打击而取得相对"合法"的认可和形成了舆论氛围。7月2日，举行了隆重的发奖仪式，周恩来总理等党政领导人把运动会的奖状和奖章分别颁发给获篮、排、足、乒乓球团体赛的前12名运动队，羽毛球团体赛的前6名，以及在乒乓球、羽毛球的单项比赛中获得前两名的运动员。这次比赛由于项目多，赛区分布宽，影响极大，对于优秀专业队的恢复和组建，完善和健全管理体系，抓好运动训练和竞赛，尽快恢复和提高竞技体育水平，确实起到了"动员"的作用。随后，接二连三地召开了单项全国性的运动会，使竞技体育比赛在1972年全面启动。

8月28日—9月8日，全国跳水、水球比赛在长沙举行，参加这项比赛的有11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队。在参赛的200多名运动员中，绝大多数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比赛。由于"文革"的冲击，大部分原来的专业跳水和水球运动员中断了训练，因年龄或技术原因而不能参加比赛，所以一些参赛队是临时组织的。如江苏水球队就是个新建队，大部分运动员是工人。反映了经过"文革"这场大动乱的冲击和破坏，优秀运动队伍后继乏人的状况。

9月，全国射箭邀请赛在呼和浩特举行。9个省、市、自治区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北京体院选手韩桂芳打破了3项女子全国纪录，内蒙古选手赵连壁打破两项男子全国纪录。

10月，全国田径运动会在南京举行，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体院等运动队共1258名选手参加了这次比赛。我国的一些著名运动员陈家全、余维立、吴浮山、肖洁平等也出场参赛。这次比赛除少年选手刷新了一批全国纪录外，仅余维立以47.03秒的成绩打破了他本人保持的47.08秒的全国纪录。获团体总分前五名的是北京队、山东队、辽宁队、河北队、广

东队、上海队。

10 月举行的全国排球分区赛，分成年组和青年组，参赛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单位共 118 个男女代表队，比赛分乌鲁木齐、贵阳、武汉、福州 4 个赛区。各赛区的很多场次安排在工厂、农村、部队等基层单位进行。这次分区赛，是对全国排球专业运动队现役和后备力量的一次大检阅。

同月，全国体操比赛在南宁举行。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体院等 537 名体操运动员和 88 名技巧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全国篮球分区赛分别在哈尔滨、兰州、合肥、昆明举行，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等 57 个单位的 161 支球队参加了比赛。这是继五项球类运动会后又一次检阅，大大促进了篮球竞技水平的提高。

11 月初，全国武术表演大会在济南举行，24 个省、市、自治区及北京体院等单位 360 多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了表演比赛，共表演了 1350 多个项目。30 多场表演，观众达 10 万人次[1]。“文革”初期，武术因被批判为“与封建帮会有密切联系、传播封建文化的内容”而遭到冲击，这次表演大会不仅推动了全国武术运动的开展，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武术运动起到了松绑和正名的作用。

1973 年，全国各级各层次、各个项目的体育比赛有了很大的增加。据统计，全国举办的运动会达 16829 次，其中国家体委主办的全国性和区域性高水平优秀运动队的比赛共计 31 次，由各省、市、自治区主办的运动会共计 662 次，专区、盟、市级主办的运动会共计 3276 次，县区级主办的运动会达 12860 次。国家体委和省级主办的运动会，基本为竞技体育比赛，地、市级主办的运动会中，有一部分属于专业运动队的竞技比赛。1973 年，打破了一些项目的全国纪录。

从 1972 年以来，由于抓训练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广大教练

[1] 全国武术表演大会在济南举行. 人民日报，1972-11-19.

员、运动员和工作人员“为革命而练”“为革命而教”的自觉性、积极性很高，大多数运动队贯彻了“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方针和进行大运动量训练的原则，进行了有计划、有系统的训练，使大多数运动项目的技术水平在恢复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但终究因受到“文革”初的冲击和破坏的影响太大，与世界水平相比，差距仍很明显，不过已经表现出上升发展的趋势。

1973 年 10 月 16 日，《人民日报》“在党的十大精神鼓舞下，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标题下，报道了全国田径、体操、举重比赛的消息。《体育报》在 11 月 27 日也以同样的标题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并明确指出：要“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要求“各队以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为目标，鼓足革命干劲，以大干促大变”。在 1972 年，体育领域先行提出要瞄准世界水平，应该说这是整个体育界思想相对宽松和对极左思潮强有力地抵制的结果。当然，“文革”中的任何行为，都必须有一个“合法”的政治旗号，例如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目的是“以路线斗争为纲，联系体育战线实际，狠批了刘少奇、林彪一伙散布的锦标主义、技术第一等修正主义黑货，划清了为革命钻研技术与技术第一、力争上游与锦标主义等界线……为了赶上世界水平。”❶

1974 年 2 月，国家体委下发了本年度的工作要点，要求为“迎接第 3 届全运全和亚运会认真办好各项赛事”。据统计，1974 年合计举办运动会 15806 次，其中国家体委主办了全国性竞赛 41 次，省、市、自治区级比赛 298 次，专、区、市级举办了 2810 次，县级举办了 12657 次。

1974 年国家级的单项比赛，项目、次数都比 1973 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为参加亚运会，全国从 4 月底开始，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选拔赛，涌现出一批年轻选手。1974 年的竞赛成绩比 1973 年有较普遍的提高，尤其射箭和射击两个项目，在成绩上有所突破。以射箭为

❶ 全国篮球联赛全部赛完. 体育报，1973-11-27（4）.

例，2月19日，上海运动员王文娟在广州举行的全国8单位射箭友谊赛中，以342环的成绩打破女子单轮30米世界纪录；6月28日北京体院射箭运动员黄淑艳，在济南举行的3单位射箭友谊赛中，以1237环的成绩打破女子单轮全能世界纪录；9月8—11日，山东运动员姜胜玲在西宁举行的全国射箭比赛中，以308环的成绩打破女子双轮70米世界纪录。

1973年底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大量的训练时间被用作“政治学习”和搞“大批判”，还要搞“赛前批判会”等，这些都对训练和比赛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可是广大体育工作者、教练员、运动员通过艰辛努力，顶着压力取得一些成绩。但在总的形势上，我国的竞技体育水平在不断排除干扰和破坏的过程中有了发展。通过从1972年以来的扎实工作，我国竞技体育领域的广大教练员、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憋着把“文革”初期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劲头，在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的特殊关怀下，竞技体育以相当快的速度得到恢复，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逐步缩小，掀起了一个竞技体育发展的高潮。在第7届亚运会上，显示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实力，锻炼了队伍，为第3届全运会的召开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1975年四届人大以后，邓小平同志接替病重的周总理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以他常有的坚毅果断、敢于碰硬的作风，鲜明地提出了全面整顿的口号，着手整顿各条战线上的混乱状态，消除“文革”的严重消极后果。这为体育事业的恢复，尤其是竞技体育的发展和提高，营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环境。在竞技体育领域，虽然把“技术第一”“锦标主义”作为靶子，作为抓体育队伍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进行批判，但另一方面，针对“批林批孔”运动对竞技体育队伍抓训练、抓竞赛形成的思想压力，进行理直气壮的辨析。1975年，《红旗》杂志第九期上的《加强体育队伍的思想建设》一文指出：“我们批判‘技术第一’决不是不要技术，恰恰相反，批判的目的，正是要发挥无产阶级政治的威力，‘抓革命、

促生产'，用政治去统帅技术，为革命去掌握技术，尽快把我国的体育运动水平搞上去。那种由于批判'技术第一'而不敢抓训练技术的倾向是错误的。政治思想工作，不能完全离开体育业务工作去做。""同样，批判锦标主义，也决不是不要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文章的遣词用句和所阐述的观点，难免有"文革"的痕迹和特点，但敢于在令人瞩目的、作为社会政治形势标向的《红旗》杂志上为抓技术、夺锦标正名，这是"文革"以来，只有在 1975 年那种特定的社会背景条件下才有可能。这说明经过"文革"中多次政治斗争的反复，人们对"文革"的性质认识得更加清楚，"四人帮"在后期倒行逆施的行为正为全国人民，包括体育界广大工作者愤慨和反对。同时，也表现出广大体育工作者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进行坚决抵制的勇气和胆魄。正是由于思想的相对解放和全面整顿提供的良好社会环境条件，1975 年，整个竞技水平又有了较大面积和较大幅度的提高，全年共举办了 21110 次运动竞赛，其中国家体委 15 次，省、市、自治区体委举办 323 次，专区、盟、市体委举办了 3093 次，县、区体委举办了 17679 次。与前几年相比，1975 年举办的运动会规模大，综合性运动会占的比重较大。国家体委举办的 15 次全是综合性运动会，各省、市、自治区全年共举办了 64 次综合性运动会，县区体委举办了 1682 次。各省、市、自治区为迎接第 3 届全运会，强化训练，认真选拔参赛运动员，促进了竞技水平的快速提高。

1975 年 9 月 12 日，在北京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3 届运动会，这是"文革"10 年内乱中召开的唯一的一次全运会。这次全运会是在全国进行全面整顿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但又处于"文革"中曲折政治运动的后期，很具有时代特色。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比赛项目分成年组和少年组，成年组共有 28 项：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棒球、女子垒球、手球、田径、游泳、跳水、水球、划船（赛艇、皮艇和划艇）、体操、技巧、举重、射击、射箭、击剑、武术、自行车

(公路和赛车场)、中国式摔跤、棋类、冰球、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和滑雪。少年组进行了8项竞赛：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田径、游泳和体操。

以上项目中，足球、篮球、排球、棒球、女子垒球、手球和棋类，进行了先期预赛，分别取前12个队、6个队或前10名来北京比赛。划船项目在武汉举行。冰雪4个项目于1976年1—2月份在黑龙江省举行。各个项目，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取前6名、8名、10名予以奖励。

表演项目有民族传统体育，包括马术、秋千、跳板、民族摔跤等6项。本届比赛，包括台湾省在内的31个单位的12497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其中有7302名运动员进京参加了23个项目的比赛。

开幕式上，有2.3万多人表演了大型团体操《红旗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评选出来的300个群众体育先进基层单位的代表也参加了本届全运会。在这次运动会上，有1队4人6次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2人2次平世界纪录，49队83人197次破62项全国纪录，4队36人144次打破58项全国少年纪录。

朱德、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人出席了于9月28日举行的第3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式。

在第3届全运会前后，形成和达到了“文革”中竞技体育从复苏到发展的高峰。第3届全运会后不久，“四人帮”在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邓小平同志再一次被“打倒”，体育界也再次陷入混乱，竞技体育领域不可避免地受到再次冲击和破坏，重新跌入低谷。

(2) 国际间体育交往的进一步活跃与发展

1971年，“乒乓外交”的成功，无疑为我国竞技体育进行国际间交往打开了绿灯。1972年以后，中国竞技体育的国际交往更加活跃。

1972年，中国乒乓球队分队多方外访，在亚、非、拉美和欧

洲展开更强劲的“乒乓外交”，并且成功地访问了美国。这一年，我国与79个国家和地区在体育活动方面进行了友好交往。除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外，通过和亚、非、拉及欧、美、大洋洲各国的体育交往，加强了民间和政府间的友好关系，增进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了解。我国的体育代表团（队）的频繁出访继续起着架桥铺路的作用，特别是我国同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体育交往面达到74%的比例，为配合政治、外交起到了很大作用。1972年9月2—13日，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第1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有31个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队参加了比赛。这是亚洲乒乓球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会，为巩固和发展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

1972年我国还向13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派出多名教练员，指导竞技运动员进行训练。

1973年，我国同109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5000多人次的体育交往。这一年的8月25日，我国成功地主办了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有86个国家和地区共1100多人参加了比赛，规模之大，参加的国家和地区及人数之众，在亚非拉乒乓球运动史上是空前的。董必武、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这次邀请赛对于发展中国与亚非拉友好国家的关系，对于在当时提高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有很大的作用。

1974年，我国外访的体育团体和项目比1973年有所增加，接待来访的体育团体也有所增加。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由徐寅生率领，参加了3月在日本举行的第2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8月20日，由赵正洪任团长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共385人参加了在德黑兰举行的第7届亚洲运动会。行前，代表团在首都体育馆向首都群众作了5个项目的表演。李先念、邓小平、陈锡联等领导人接见了全体成员，并观看了表演。邓小平副总理在接见时提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争取好的成绩”的要求。代表团在离京和回京时，邓小平等领导人都前往机场送迎。中国运动员参加了本届亚运会16个大项中14个大项的角逐，显示了我国竞技水平已基本全面恢复的实力。

1975年以后，由于受“批林批孔”的影响，我国同国际间的体育交往活动逐渐减少。1975年“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并插手体育界，干扰和破坏了我国体育的正常国际交往活动，全年国际交往的次数大大减少。1976年初，由于整个国家又陷入混乱之中，很多国际体育活动被迫取消和延期，我国同国际间体育的交往又陷入了僵化的状态。

4. 业余体校比赛的恢复和发展

业余体校从1971年开始恢复。1972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重点业余体校很快普及的态势迅速发展。为抓好业余训练，检查业余训练状况，提高训练质量和水平，发现优秀人才，根据国家体委1972年业余训练会议的精神，开始组织全国及省、市、自治区级的单项和多项比赛。

1972年4月15日，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在沈阳隆重开幕，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415名少年乒乓球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自“文革”以来，全国性少年运动比赛已停止了6年。这一次参赛的女选手共192名，全部都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这是“文革”造成竞技体育人才断层的严重后果。在开幕式上，赵正洪代表国家体委讲话，他强调了开展青少年体育训练、培养和壮大各项体育后备力量的重要意义。上海队、辽宁二队分获男、女团体第一名。这次比赛实际上是对青少年业余体校恢复训练后，对各个运动项目的训练情况进行检查的一个先例。

1973年，全国业余体校数和在校生人数都有了很大的发展。1974年，全国业余体校数比1973年增加了62%，专职教练员增加70%。仅上海市部分中小学参加系统训练的学生就达5万多人，形成了层层衔接的少年和儿童训练网。1974年，全国已有上千所青少年业余体校，学员达10万多人，为体育专业人才储备和培养了后备力量。

从1972年到1975年的全国性运动会上参赛的运动员看，来自

业余体校的学生已占相当大的比例。1975年，全国共举行学生运动会11277次，其中省、市、自治区体委举办了185次，专区、盟、市体委举办了1781次，参加运动会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业余体校的学员。

1976年，业余体校再次受到冲击，比赛大大减少，很多省、市、自治区完全停止了业余体校的比赛。

三、“体育革命”“竞赛改革”对竞技体育的破坏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体育界的干部、教练员、运动员和工作人员被迫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领会所谓的“精神”，摘抄报纸写“批判稿”，开“批判大会”，使正常的工作和训练受到了很大影响。接着，“四人帮”又借“反潮流”之风，开始在体育方面扶持所谓的“新生事物”。

1974年7月，全国排球联赛上海赛区的各个比赛场馆都建立了一批“工农兵评论小组”，即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现的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目的是使运动队在竞赛中“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体育路线，落实‘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深入批判修正主义体育路线”，“提高运动员路线斗争觉悟，实现思想革命化”。他们的任务是“细致观察赛场上的各种现象”，“对一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经过评论小组集体讨论，从路线高度上具体分析，然后写出评论文章”。如本届联赛中，“某队领队恼火地批评一个被换下场的运动员。”“上海第六电表厂工人评论小组就写了一篇《在责备的背后……》的评论，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路线分析，指出在‘恼火’和责备背后，存在着一些‘师道尊严’的意味和锦标主义流毒。”[1]这一“新生事物”通过舆论工具的宣传，很快在全国各种比赛中推行。由于各地评论

[1] 上海各体育场馆建立工农兵评论小组. 体育报，1974-07-09.

小组的人员组成比较复杂，他们的使命就是用极左的标准在比赛中找差错，凌驾于比赛组委会和裁判员之上，插手比赛，给比赛工作带来很大的干扰。

为进一步加强对运动员和教练员“进行工农兵再教育”，要求运动队长时间离开训练基地到工厂、农村搞“开门训练”，是“批林批孔”中又一“新生事物”。“开门训练”对系统性训练是很大的冲击，影响了竞技成绩提高的速度和幅度，客观上对基层体育活动开展有促进作用，但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

1976年，“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在全国刮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全国再次陷入混乱。江青反革命集团进一步插手体育界，打出“体育革命”和“竞赛改革”的招牌。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体育工作诬蔑为“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体育”，并在竞技比赛的名次上大做文章，搞“革命”搞“改革”，取消竞技比赛。“四人帮”利用在国家体委的代言人，将竞技比赛名次扣上三条罪状：“产生锦标主义”“助长技术第一”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在当时，很多比赛不再公布成绩，不排名次。给体育界造成了很大混乱，挫伤了教练员、运动员的积极性，直接影响了竞技水平的提高。

1976年5月，《红旗》杂志在署名发表的《邓小平在体育战线鼓吹什么》一文中，连邓小平副总理在接见参加第7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提出的“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争取好的成绩”的要求，也被批判成体育方面的“修正主义纲领”。1976年，我国的体育界再度陷入严重混乱之中，运动成绩严重下降。我国曾30次打破世界纪录的举重，连一项世界纪录也没保持住；我国的游泳项目曾3人5次打破世界纪录，但在1976年，我国男女游泳的总成绩都落在世界30名之后；田径成绩没有1项能进入前10名，达到奥运会报名标准的只有3个项目。竞技体育从整体水平上又拉大了与世界水平的距离。

第四章　体育领域的拨乱反正（1976—1979年）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体育战线与全国人民一道，清算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在"文革"中犯下的罪行，彻底摧毁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体育领域的帮派体系，从政治上、思想上、路线上进行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体育战线坚决、果断地把重点转移到高速发展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上来，一边调整，一边前进，为后来体育领域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第一节　对30年体育发展道路的反思

粉碎"四人帮"后，从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入手，从思想上解除了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健全了规章制度，全面恢复了体育各项工作。同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体育发展的道路进行了认真深刻的反思，通过对比，对"文革"前17年体育工作给予了全面的肯定，总结了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在发展道路上的经验和教训，为拟订新的体育事业发展规划打下了基础。

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一）解除枷锁，分清是非

从1976年底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整

个体育战线和全国一样，重点工作是深入揭批“四人帮”犯下的罪行，清除“四人帮”在体育领域的流毒和影响，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把“四人帮”完全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

“四人帮”被粉碎后，体育战线立即掀起了声讨和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运动。1977 年 2 月 24 日，中央采取了果断的组织措施，免去庄则栋国家体委核心小组组长、主任的职务，任命王猛担任中共国家体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体委主任，2 月 25 日又任命徐寅生为国家体委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体委副主任，及时解放了李梦华、黄中，并恢复了原来的职务，又排除干扰解放了荣高棠同志。1978 年初，荣高棠同志由江西返回国家体委工作。这样，国家体委的领导力量得到大大加强，一套政治上坚强成熟、业务上精通、受到广大体育工作者认可和拥戴的领导班子形成了。同时，地方各级体委也对帮派人物进行了清理，调整和充实了各级体委领导班子，一些政治立场坚定、有相当业务水平和能力、敢干实干的人被充实到领导班子中，迅速改变了一些领导班子不纯和软、懒、散的状况。

县级以上的各级体委得到重新建立或健全。全国体育总会、地方分会和单项运动协会等社会体育组织，也自上而下地得到了恢复。

教育、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有关部门的体育工作机构也逐步恢复、健全。基层体育组织也从 1978 年以后普遍开始着手恢复和重建工作。在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街道建立了体委或相应的机构，学校、厂矿、企业、机关建立了体育协会或体育领导小组。

至 1979 年初，“文革”中曾一度瘫痪、遭到严重破坏的整个体育组织管理体系全部恢复，开始正常发挥其功能，为整个体育事业的发展能迅速步入有序的轨道提供了重要的先决条件。

林彪、“四人帮”诋毁国家体委系统“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十七年搞的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体育”，运动队是“封资修的综合体”

"修正主义大染缸"，是"滋生资产阶级，培养精神贵族的一块肥沃土壤"。他们以反"唯生产力论"为借口，对抓业务、抓训练、学技术、夺金牌的领导干部、教练员、运动员等体育工作者进行攻击，诬蔑他们是"技术第一""白专道路""锦标主义"，采取戴帽子、打棍子的恶劣手段进行打击迫害。

为了正本清源，1978 年 1 月，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专门举行了 20 天的预备会，集中学习了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对体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以根据党的十一大精神，完整、准确地理解毛主席的革命体育路线，分辨是非，统一思想，把"四人帮"搞乱的是非纠正过来。1 月 22 日，全国体工会议正式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到会的 1400 余位代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代表性最广、规模最大的一次体工会。到会代表列举了大量事实，驳斥了"四人帮"的"黑线专政论"，证明"新中国成立 28 年来毛主席的革命体育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尤其是"文革"前 17 年，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贺龙同志的主持下，体育战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次会议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

要坚持党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四人帮"结帮篡党，以"帮"代党，鼓吹"踢开党委闹革命"，严重地破坏了党对体育工作的领导。体育工作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指挥。维护党的生活准则，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要促进青少年德智体全面发展。要彻底清算"四人帮"破坏党的教育事业，篡改德育、破坏智育、取消体育，摧残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严重罪行。把发展青少年体育作为造就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和从根本上增强人民体质、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战略措施抓好。

要坚持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四人帮"及其党羽歪曲、割裂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诬蔑抓提高是搞"修正主义"，使提高成为"禁区"，既破坏了普及，又破坏了提高。要坚决大力搞

好普及，理直气壮抓好提高。

要开展体育运动竞赛。“四人帮”及其党羽诬蔑我国体育竞赛“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没有根本区别”，要废除名次、比分、竞赛等级，甚至取消竞赛。比赛必然有胜负，必然产生名次，要积极开展和合理安排形式多样的体育竞赛，提高运动成绩和水平。

要迅速攀登体育运动技术高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推动和指导体育运动普及的需要，是适应我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我国体育战线各项工作都要为迅速攀登世界体育高峰作出贡献。体工队是攀登高峰的骨干力量，要刻苦锻炼，快出人才，多出成果，为国争光。

要开展国家体育交往，为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服务。要肃清“四人帮”攻击参加国际体育活动是“为国际资产阶级服务”的谬论的流毒，认真做好国际体育工作，积极完成援外任务，为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服务。

要坚持合理的体育规章制度。要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切实把被“四人帮”破坏的各项规章制度恢复和健全起来。

要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批判“四人帮”歪曲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的谬论，“积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充分调动广大体育工作者的积极性。……把体育队伍建设成思想红、技术精、干劲大、纪律严、作风好的队伍”。❶

通过全国体工会正本清源，解除了全国广大体育工作者的精神枷锁，解放了广大体育工作者的手足。

（二）平反昭雪，落实干部政策

“文革”中，“四人帮”在体育界制造了很多冤案。很多干部、教练员、运动员受到无辜迫害，受尽凌辱，有的被迫害致死。1978

❶ 1978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126.

年以后，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整个体育领域逐渐全面展开。对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领导干部、教练员、运动员、体育教师和管理人员进行平反，对被迫害致死的人进行昭雪，彻底推翻了“四人帮”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销毁了诬蔑不实的材料，恢复了名誉。对被审查的干部进行了认真的复查，解放了一大批干部。1979 年 2 月 12 日，国家体委召开“中央批准撤消《五一二命令》为国家体委系统彻底平反大会”，推倒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贺龙和荣高棠等同志的一切诬陷之词。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陈锡联、王任重出席了大会，陈锡联讲了话。搬掉了长期压在广大体育工作者身上的这块大石头，使整个体育战线消除了心头的阴影和精神压力。

1978 年 4 月 5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 4 月 4 日向中央呈送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国家体委根据中央的文件精神，对反右扩大化中受到错误处理的体育工作者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在此后几年的时间里，又根据中央的有关规定，为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体育工作者落实了政策，使很多人恢复了职务得以回返体育战线工作。

通过迅速落实党的政策，全国广大体育工作者感到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激发了大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积极性。为了充实力量，提高业务水平，1978 年，各级体委对大批体育干部进行了培训（表 4–1）。

表 4–1　1978 年各级体委训练体育干部人数[1]

		合　计	教练员	裁判员	学校体育教师	基层体育干部
总　计		115021	8830	41487	53843	10861
其中	军体校	2063	1337	636	90	
	业余体校	11869	3286	4691	3449	443

[1] 中国体育年鉴编辑委员会. 中国体育年鉴 1978.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1：688.

(三) 恢复、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制定了一系列体育工作条例和制度，反映了发展社会主义体育的客观规律，促进了体育运动的发展，调动了群众投入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积极性。这些条例和制度虽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缺陷和不足，但从总的来讲是好的。"文革"中，它们自然都成了"修正主义"的东西而被统统砍掉，给体育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混乱。1977 年以后，在恢复、建立和健全各级体育管理机构，形成整个体育组织管理体系的同时，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了恢复、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的工作，并于 1978 年、1979 年先后公布了一批经过修订和新颁布的条例、规章制度。

1978 年 7 月 11 日，公布了《运动员技术等级制度（草案)》，规定从 1978 年 1 月 1 日起试行，凡符合条件，达到标准者，均应授予相应的等级称号。并同时公告以前公布的运动员等级制度，自新制度生效之日起作废。《等级制度（草案)》共 7 章 17 条，对技术等级称号和条件、项目和标准、授予技术等级称号的权限和程序、证书和证章、取消技术等级称号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并公布了田径、游泳、射击、举重、速度滑冰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1979 年 4—12 月，又陆续公布了航空模型（试行)、航海模型、潜水、摩托艇、体操、技巧、射箭、水球、击剑、摔跤、赛艇、皮划艇、跳水、自行车、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手球、棒垒球、冰球、滑雪、单人花样滑冰、飞机跳伞、航海多项等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大大促进了运动成绩的迅速提高。

1978 年 6 月 5 日，公布《裁判员技术等级制度（草案)》在全国试行，对提高裁判员水平，提高竞赛质量，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加强裁判队伍的建设，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同日，还公布了《体育运动全国纪录申请及审批办法（草案)》，在全国试行。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发展，我国已有一支相当数量的专职教练员队伍，他们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攀登世

界体育高峰做了许多工作。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教练员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1963 年 5 月 10 日，国家体委公布过《教练员等级制度条例（草案）》，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施行。打倒“四人帮”以后，为适应体育事业发展和需要，充分调动教练员为社会主义体育事业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做好教学训练工作，迅速提高我国体育运动的技术水平，国家体委重新修订并于 1979 年 6 月 12 日公布试行了《教练员技术等级制度（草案)》。

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等级制度以及全国纪录申请和审批办法的公布，对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的迅速发展，对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及运动成绩的确认等方面步入规范化管理，具有很重要的示范作用。

二、对 30 年体育工作经验的总结

打倒“四人帮”后，体育界拨乱反正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新中国成立后体育工作进行反思，在肯定“文革”前 17 年成绩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使整个体育战线尽快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

经过 1977 年、1978 年深入揭批“四人帮”运动，已经达到了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辨明是非，认清“四人帮”的反动面目，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目的。1978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以后，体育战线也在 1979 年初提出了工作重点的转移。为了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后预定的目标，必须对新中国成立 30 年来的体育工作进行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1980 年 1 月召开的全国体工会议上，王猛同志代表国家体委，在广泛征求广大体育工作者意见和认识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的体育工作进行了总结。

(一) 对“文革”前17年的肯定

会议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前的17年间，我国的体育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工作上曾经出现过失误，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出发点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

王猛指出：党和政府非常关心体育工作，1952年，毛主席亲笔题词：“新体育”，“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党中央在发出《关于加强人民体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宪法规定：“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发展体育运动的措施，逐步建立起各级体育领导机构，制定了使体育运动普及和经常化的方针，广泛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活动，团结、教育、改造老体育工作者，兴建体育学院和体育场馆设施。还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制定了若干体育制度，使体育事业不断发展。1953年，吴传玉为祖国夺得了第一块金牌。1958年、1959年，有上亿人参加体育活动，25次打破世界纪录，容国团为祖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体育高峰。1960—1962年间，体育工作根据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采取了缩短战线、确保重点的正确措施，收缩了群众体育活动，调整、整顿了体育院校、业余训练，精简了运动员队伍，确定把工作重点放到运动训练上，集中人力、物力攻尖端。从总的方面讲，体育事业的发展速度放慢了，规模缩小了。但一些重点项目在艰苦条件下仍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1960年登山健儿创造了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奇迹。1963年前后，我国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在群众体育运动方面，强调从生产、生活水平出发，坚持需要、可能和业余、自愿、小型、多样，以及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等原则，积极地、有步骤地开展，不能要求过急过高。1965年有些方面提出把工作

重点转向农村，体育工作根据自己的特点，提出重点抓好青少年，首先抓学校。在优秀运动队方面，搞了60条。实践证明，这些体育制度、方针、政策和措施，是正确的，因而体育事业得到了更加健康的发展。到1965年，无论普及或提高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大大缩短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体育高峰。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工作上曾经出现过失误，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58年犯有“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片面强调大运动量训练等错误，1959年不适当地开展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挫伤了一些同志的积极性，对体育工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总的来讲，成绩是主要的。

（二）30年体育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

会议经过对30年来体育工作的认真反思，总结出以下6个方面的基本经验教训。

要正确处理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说明，政治局势安定团结，体育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反之，政治动乱、社会不安定，就不能集中精力搞体育，体育事业的发展就要受到影响。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是在党的政治路线指导下发展的，通过自己的专业体现为政治路线服务。如果脱离业务空谈政治，甚至以政治取代业务，体育就不能得到发展，就不能出人才、出成绩。在新时期，体育事业要为四化这个最大的政治服务，体育事业的发展、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国争光，就是一项政治任务。

要正确处理体育与经济的关系。体育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需要和生产发展的水平相适应，既受国民经济的制约，又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体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归根结底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生产越现代化，人民对体育的需求越高，发展体育事业的基础也越雄厚，才有可能全面地、持久地高速前进。体育的发展不应消极地依赖于经济条件，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无所作为。在我国，体育纳入国家计划，能够运用社会主义

指导的优越性，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调动各个地方和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按比例、有重点地分配财力、物力。这样就能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使体育上得更快一些。

要正确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普及和提高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既互相矛盾，互相区别，各有一定的独立性，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单位，在工作上可以并且应当有所侧重，不能平均使用力量，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30 年来，我国许多项目在普及基础上得到提高，在提高指导下得到普及。当然，也要看到有些项目很普及，水平却不高；而有些项目虽不普及，经过科学训练达到了世界水平。这种现象说明，普及是提高的基础，但并不等于自然会尖子尖，要提高到尖端水平，决定性的因素是科学训练。

要充分运用竞赛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竞赛是体育运动最大的特点。通过竞争比高低，分名次，优胜劣汰，激发人们强烈的荣誉感，鼓舞力争上游的劲头。它既能吸引、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体育活动，又能促进成绩、出人才，对推动体育运动普及与提高有巨大作用，对其他各项工作也起到杠杆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竞赛就没有体育运动。实践证明，必须按照竞赛的规律和特点，制订正确的方针政策来指导竞赛。不能把竞赛单纯看做是个技术问题。我国历来重视加强竞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既反对不择手段夺锦标、不顾政治影响争胜负的锦标主义，又反对输赢无所谓，不努力创造好成绩为国家、体育争取荣誉。在竞赛的安排上，要把训练与比赛、国内比赛与国际比赛、专业比赛与业余比赛妥善地结合起来，形成制度。国内竞赛必须适应国际竞赛，特别是重大国际竞赛，项目要对口，规则要统一，同时必须保证突出重点，才能多出人才，快出成绩，在世界体坛争雄。

要正确处理学习与独创的关系。体育运动的技术性很强，许多东西各国都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利用。国际比赛更有一套统一的规则和规定动作。学习国外经验，引进先进技术，把世界上最新的成

果拿来为我所用，对于发展我国体育有着重要的意义。30 年来，无论在开展群众体育活动或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等方面，我们都吸取了大量外国的好东西。经验证明，学习外国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有自己的独创，走自己的路，发展中国特长，创造独特风格，技术上具有绝招、特长，才能走在世界的前面。否则，机械照搬外国，丢掉自己的风格和特长，那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跑。

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大家办体育。体育是全党全民的一件大事，群众性十分广泛，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健康，各行各业人人都需要体育，而人们的要求又因身体条件、兴趣爱好而不同，不能强求一律。要充分运用报刊、广播等宣传工具和利用各种机会，大力宣传体育的意义和作用，造成整个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最广泛地动员、吸引广大群众自觉参加各色各样的体育活动。历史经验证明，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各方面分工合作来完成这项工作，单靠体委是不行的。尤其要加强同教育、卫生、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的密切合作。学校体育，主要靠教育部门领导，职工体育主要靠工会组织，体委的任务是根据党和政府有关体育的方针、政策，大力配合有关部门去开展。就是体委直接主管的工作，也需要有各方面的配合和支持。

这次体工会提出的这 6 个方面是拨乱反正的成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实现体育工作重点的转移，加快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同时，这次体工会也为 80 年代的体育改革和发展，勾勒出了基本思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但是，由于国家刚刚从 10 年动乱中挣脱出来，繁重的恢复和建设任务摆在全国人民面前，因此，这种反思还只能集中在最紧迫的方面，即分清“文革”中被搞乱的大是大非，让人们能轻装上阵，加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机制等更深层次重大问题的认识方面，还存在着许多模糊不清的东西，或根本没有触及到。80 年代体育发展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显然与此有关。

三、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工作重点转移

粉碎“四人帮”以后，体育工作者为把“文革”中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尽快迎头赶上世界体育的水平，使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拟订一个体育事业的发展规划，已成为当务之急的重要内容。

1978年1月26日—2月6日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拟定了一个体育事业发展的长、中、短期目标。即在本世纪内，一定要努力做到：城乡群众体育大普及，全国人民体质大大增强，拥有世界第一流的体育队伍、世界第一流的运动技术水平、现代化的体育设施，成为世界上体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8年内，要基本普及群众体育，大部分运动项目的成绩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79年9月15—30日举行第4届全国运动会，检阅体育战线30年来的巨大成就。

鉴于当时全国的形势，仍然把揭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放在首位，因此，各省、市、自治区只是把这个目标作为努力的一个方向，并没有细化和具体成各项标准，而拟定出实施的措施和步骤。1978年全国体工会议后，拟订全国事业发展规划，确定好长期、中期、短期发展目标，立足现实和眼前、兼顾以后、着眼未来，成了国家体委、各省、市、自治区体委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1979年体工会议把开好1979年的第4届全运会、力争1980年奥运会上进入团体总分前10名、获得15个左右奖牌，群众体育要创一个新的局面，建立健全大、中城市的训练网、搞好重点项目的布局和建立各地区传统项目的业余训练基地、开展教练员轮训，努力办好体育学院和科研所等，作为近两年的目标和工作任务。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都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召开体工会议，并按照近两年内侧重抓提高的要求进行工作部署。

在这次全国体工会议上，王猛在会议总结中肯定了23年

（1978—2000年）设想和8年（1978—1985年）的规划，认为"奋斗目标是鼓舞人心的，实现了这一设想，也就可以说实现了体育现代化。我们应结合各项工作，经常地、适当地加以宣传，以鼓舞体育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教练员、运动员，为实现这一设想而奋斗"[1]。代表们对设想与规划提出了不少意见，总的认为，《规划》的方向是好的，是鼓舞人心的，但有些指标过高。会后《全国体育事业发展规划》以草案形式下发，供各地修订本地区发展规划时参考。应该讲，在制订全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长期、中期规划上，虽然由于指标上的分歧及其他如地区具体情况等因素未能确定下来，但恰恰表明了会议代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通过这次讨论，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体委，在工作上都有了一个长远的共同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意识。

1979年2月12—28日，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到会同志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了体育战线如何转移工作重点，讨论修改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具体安排了1979、1980两年体育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注意力集中到高速发展体育事业上来，努力攀登世界体育高峰"。体育工作要"一面调整，一面前进"。同时，鉴于运动技术水平落后已成为突出薄弱环节，而参加1980年奥运会的任务迫在眉睫，我国一些项目的成绩还达不到奥运会报名标准，因此，今明两年，国家体委和省一级体委要在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会上对在第8届亚运会上作出较大贡献的有关单位进行了表扬。这次体工会议的召开，使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第二节　体育事业的全面复苏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国的体育事业经过揭批"四人帮"运

[1] 王猛. 在1979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 国家体委档案.

动，从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等一系列工作。我国的体育事业步入正轨，并开始显示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

一、学校体育的规范

打倒“四人帮”以后，学校的整个教学秩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教风、学风焕然一新，学校体育教学得以规范。

（一）建立健全组织机构，规范体育各项工作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陆续设立了体育工作机构，学校的党、团组织和行政，有负责分管体育工作的专兼职干部。

1978 年秋季，各级学校按照教育部颁布的《体育教学大纲》有计划地进行教学。中小学按要求每周两课时的体育课、高等学校按教学计划上体育课。

1979 年 3 月 29 日，国家体委、教育部联合相继发出《全国学生体育运动竞赛制度》《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章程》《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和《关于在学校中进一步广泛施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意见的通知》。

根据教育部、国家体委的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在上好体育课的同时，积极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中小学要认真做好早操、课间操和眼保健操；每周至少要有两节课外活动列入课表；每天平均保证有 1 小时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体育锻炼；要建立健康卡片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登记卡片，并列入学籍簿；有条件的学校，要逐步开展国防体育活动。

各级学校根据具体条件，建立起了运动队，很多学校开展了业余训练。为推动学校体育的普及开展，学校分春秋季举行 1—2 次校运动会和冬季单项活动。在规范体育工作的同时，学校还加强了

卫生保健工作。

(二)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体育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是一件非常严重和亟待解决的问题。1978 年底，据教育部体育司初步统计，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专职体育教师才 20 万人。按当时学校的规模计算，全国尚缺体育教师约 30 万人。以培养专职体育教师的规模计算，至少 20 年以上才能补齐所需数。很多省、市、自治区从对整个教育事业发展，为下一代青少年健康高度负责出发，利用体育院、系毕业的教师为骨干，在地、市、县分级办体育教师短期培训班，教学行政部门和学校组织教学观摩交流，这对解决体育专职教师数量和质量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 学校体育活动的新气象

重点抓好学校体育，这是 1978 年以后一再强调的重点工作。坚持在群众体育方面重点抓好学校体育，是出于一种战略性考虑。青少年学生在全国有两亿多人，又正处在长身体的时期，抓好学校体育可以从根本上达到增强我国人民体质的目的。学校又是优秀运动员成长的基地，通过抓从小训练、打好基础，可以源源不断地为优秀运动队输送人才。由于全国有 80%的学校在农村，抓好学校体育，还可以为广泛开展农村体育活动培养大批骨干。

“由于林彪、‘四人帮’对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严重破坏，……加上一些学校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条件不好，体育、卫生设备很差，很多学生的健康状况不好。不少学生体质趋于下降。北京市西城区对 3053 名中、小学学生进行体格检查，各方面都合格的仅占 11.86%。视力减退现象尤为突出，据上海市调查，中学生患近视眼的，1977 年为 15.3%……广东省 1977 年高校、中专招生初选合格的 48580 名考生中，录取时因各种疾病受专业限制的竟高达 13924 人……河北省石家庄市 1978 年高考初选合格的学生中，因

身体不合格受专业限制和未被录取的占34%。”[1]面对上述情况，学校如何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正确处理好德、智、体三者之间的关系，纠正忽视体育、卫生工作的做法，摆正体育、卫生工作的位置；如何积极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结合学军开展军事体育活动，在普及的基础上建立运动队，开展业余训练，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如何加强体育教师和卫生人员队伍的建设，加强党对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领导，使学校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等问题，应该切实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1978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4月14日，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联合下达《关于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通知》。5月12日，国务院在批转国家体委《1978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指出：要“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广泛开展群众体育活动，重点抓好关系两亿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学校体育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全国有443950所大中小学坚持两课、两操、两活动，参加课余体育运动队的学生达724万余人。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活动（简称“达标”）受到广大青少年的热烈欢迎（表4-2）。河南体育、教育部门每年秋季联合举办《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运动会；广西桂林地区12个县举办“达标”学习班，培养了900多名骨干；上海逐步恢复了市、县两级体育传统重点学校500余所。许多地方还在调查学校体育和学生体质状况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制定了提高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水

[1] 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纪要（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共青团中央1979-09-24下发）//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412-413.

平、扭转学生体质下降等方面的措施，学校体育逐渐步入正轨。

表 4–2　1978 年学校《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及格人数 [1]

	合　计	青年组	少年一组	少年二组	儿童组
总　计	4216127	355741	1697315	1039533	1123538
大专院校	28044	27763	151	130	
中技中专	41069	30076	7941	3052	
中　学	2731076	270996	1459208	869894	130978
小　学	1415938	26906	230015	166457	992560

1979 年 5 月 15—22 日，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在江苏省扬州市召开了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着重讨论了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认识，切实加强对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组织领导，从实际出发，积极开展学校体育、卫生活动和为搞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努力创造条件等方面的问题。同年 10 月 5 日，经国务院批准下达了《大、中、小学的体育工作暂行办法（草案)》。教育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制定了《全国学生体育运动竞赛制度》，国家体委还下达了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精神、抓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意见，学校体育进一步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

国家体委及各级地方体委，在侧重抓提高的同时，也很重视兼顾体育事业其他方面的工作，协助、指导社会各行业、部门抓群众体育活动的普及和深入开展。在科学研究和体育专业人才的培养等方面，也全面地展开了工作。

二、竞技体育水平的迅速回升

“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复苏

[1] 中国体育年鉴编辑委员会. 中国体育年鉴 1978.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1：688.

不久刚刚开始步入正轨的优秀运动队伍的训练再次受到连续的长期冲击，竞技体育水平在1975年和1976年间再次滑向低谷。打倒“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激发了教练员、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的训练积极性，从1977年到1978年底短短两年的时间，运动成绩和竞赛水平很快走出低谷，开始回升。

（一）优秀运动队恢复训练

1977—1978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级体委陆续恢复，体育工作开始正常运转。体工大队又恢复了原名称，被迫改行的教练员又调回原岗位，优秀运动队恢复了正常的训练。在全国人民对中国的竞技体育寄予厚望的氛围下，为尽快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国家队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专业运动队，都提出了自己的努力目标和规划，围绕第4届全运会确定了项目重点。如黑龙江省提出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高速发展我省体育事业”的口号，确定了全省3年内使城乡群众体育出现新面貌的同时，有1/3项目成绩接近和达到全国先进水平，速度滑冰接近或赶上亚洲最好水平，在第4届全国运动会上打破一批全国纪录；至1985年，大部分项目接近或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部分项目接近或达到亚洲先进水平，冰上项目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当时各省、市在制定的发展规划中有些目标过高，反映了广大体育工作者希望加快体育事业发展步伐的迫切心情。

为抓好后备人才的培养，各省、市、自治区体委在建立层层衔接的训练网、办好业余体校的工作上下大工夫，保证了业余体校学生的生源质量和训练水平。为80年代竞技体育多项目尖子的脱颖而出打下了基础。

1978年12月8日，国家体委、国家劳动总局、财政部联合颁发了《关于恢复〈优秀运动员运动技术补贴试行办法〉的通知》，12月25日又下发了补充通知，对于调动运动员的训练积极性，迅速提高竞技运动水平，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赛事增加，竞赛水平提高

为了检查训练效果，交流经验，总结成绩，找出差距，在1977年和1978年，国家级，尤其省、市、自治区级的体育赛事大大增加。事实证明，从1977年以来的强化性训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普遍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专业运动队在训练中注重技、战术的创新，实战水平提高很快，竞技水平在迅速回升和提高。

广东省1978年9月举行的第5届省运会，在广州、佛山、东莞、江门、顺德、四会6个赛区进行，有23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16个项目的比赛，有2人2次打破全国纪录，16人20次打破8项全省纪录；陕西在1978年8月的第7届全省运动会上，有2380名运动员参加了16个项目的比赛，5人3次破3项全国纪录，182人176次破54项省纪录；内蒙古在1977、1978年两年中，有3人2次打破2项世界纪录，7人1队9次破6项、平1项全国纪录，51人4队145次破50项、创1项、平3项自治区纪录。河南省狠抓乒乓球队的训练，在1977年的第3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1978年的第8届亚运会上，河南运动员黄亮、张立、葛新爱为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男、女团体冠军立下了功劳，他们个人还获得了很好的名次，张立在亚运会上获乒乓球女子单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三项第1名。福建男排，汪嘉伟等一批新手，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打法，个人专长很突出，从1977年起一直称雄国内排坛，两次获全国冠军，3次获全国亚军。汪嘉伟、徐真、郭明、颜建明、徐国荣、肖青松先后入选国家队，成为国家队的“半壁河山”；福建省女排应用男排交叉步起跳拦网技术，突出作风培养，攻防能力大大提高，一直保持全国甲级队行列。我国的竞技体育很快就走出了低谷，从表4－3的统计可以得到证明。

表 4–3 1976—1978 年我国运动员打破全国纪录统计 [1]

单位：项、人次

年 份	项 数		人 数		次 数	
	合计	其中：女	合计	其中：女	合计	其中：女
1976	76	35	69	25	118	48
1977	77	27	107	40	161	57
1978	113	40	263	103	514	193

（三）参加世界大、中学生运动会和亚运会

1977 年 8 月 5—30 日，中国组团参加了在保加利亚索非亚举行的第 9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有 85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多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共 38 名选手参加了田径、女子篮球、女子排球和男子体操 4 项比赛，获 1 枚银牌、3 枚铜牌，奖牌总数名列第 18 位。

1978 年 7 月 19—23 日在土耳其伊兹密尔举行了第 3 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中国运动员在体操和田径比赛中取得了较好成绩。

1978 年 12 月 9—20 日，第 8 届亚运会在泰国曼谷举行。25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余名运动员参赛，各国选手共打破 66 项亚运会纪录，有些项目的成绩接近世界水平。

中国派出了以徐寅生为团长，包括 280 名运动员的代表团，参加了 15 个项目的比赛，共打破了 24 项亚运会纪录、34 项全国纪录。在乒乓球（获 7 枚金牌）、跳水（包揽了全部金、银牌）、体操（获 10 枚金牌）等项目上获得了好成绩。田径水平比上届有了较大的提高，金牌首次超过日本，而游泳等项目则与亚洲体育强国有较大差距。

新中国第二次参加亚运会获金牌 56 枚、银牌 60 枚、铜牌 51

[1] 国家体委．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1）：精华本上册．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298.

枚，团体总分列第二位，与第一位的日本队的差距大大缩小。对日本的亚洲体坛霸主的地位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1979年8月29日—9月15日，中国组团参加了在墨西哥举行的第10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共有107个国家和地区的4381名选手参赛，中国选手参加了游泳、跳水、水球和田径比赛，中国女子跳水选手陈肖霞获得跳台跳水金牌。

（四）第4届全运会的召开

1979年9月15—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4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在粉碎了“四人帮”，由拨乱反正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建国30周年的时候，举办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全国运动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4届全运会的会徽由跑道和火炬组成，以火炬为主要标志，象征继往开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由共青团中央、国家体委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联合举办的“新长征火炬接力”，7月1日在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点燃火炬，50多万名青少年参加接力跑，途经15个省市，历时77天，行程2.5万里，于9月15日把火炬传到北京第4届全运会开幕式会场。

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在开幕式致词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贺龙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破坏，体育事业遭到严重挫折，本来已经缩小了同世界水平的差距又拉大了。粉碎了“四人帮”，体育得解放；体育战线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王猛说，第4届全运会，是对我国的体育事业的一次大检阅，要通过竞赛和表演，充分体现体育战线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大干快上、勇攀高峰的精神面貌，体现同心

同德、一心一意奔四化的坚强决心。要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努力创造优异成绩。我们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必须接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点燃的革命火炬，振奋精神、再接再厉，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新的长征，努力发展体育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第 4 届全运会的比赛项目有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手球、棒球、女子垒球、田径、体操、技巧、举重、游泳、跳水、水球、划船（赛艇、皮艇、划艇）、武术、射箭、棋类（中国象棋、围棋、国际象棋）、击剑、自行车（公路、赛场）、摔跤（中国式、自由式、古典式）、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球、滑雪、射击、摩托车、跳伞、航空模型、航海模型、摩托艇和潜水共 34 项。少年组有足球和田径两项。1.6 万多人表演了团体操《新的长征》。

参加这届运动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单位评选出来的全国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338 人，有包括台湾省在内的 31 个单位的 15189 名运动员参加各项比赛。部分项目的比赛在外地进行，到北京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有 3824 人。

第 4 届全运会设金牌 469 枚、银牌 471 枚、铜牌 469 枚。有 5 人 5 次破 5 项世界纪录，2 人 3 次破 3 项青年世界纪录，3 人 3 次平 3 项世界纪录，12 人 24 次破 8 项亚洲纪录，36 队 204 人 376 次破 102 项全国纪录，2 队 6 人 10 次破 5 项全国少年纪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徐向前在闭幕式上致词。徐向前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向创造优异成绩的运动员表示热烈祝贺。徐向前说，一定要十分重视体育工作，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各行各业的同志们，都要积极参加各种各色的体育活动，不断提高健康水平，为实现四化多作贡献。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要特别加强体育锻炼。运动员、教练员同志们，要发扬为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献身的精神，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勤学苦练、勇攀高峰，为祖国争光，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

第 4 届全运会的胜利召开，证实了经过拨乱反正，我国的体育

事业已经步入正轨，显示了竞技体育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

12 月 28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和《体育报》联合评选出本年 10 名全国最佳运动员。他们是：陈肖霞、陈伟强、葛新爱、吴数德、容志行、聂卫平、栾菊杰、邹振先、宋晓波、吴忻水。自此开始了每年度评选十佳运动员的活动。

（五）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1979 年 10 月 25 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会议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全国性奥委会；设在台北的奥委会将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留在国际奥委会内，但它不得使用当时所使用的歌和旗。这项决议有待于国际奥委会各国委员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予以批准。

10 月 26 日，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以通讯表决的方式批准了此决议，此后，游泳、田径等国际体育组织相继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

10 月 26 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穆罕默德·姆扎里在洛桑宣布，国际奥委会经过全体委员的通讯表决，以 62 票赞成，17 票反对，批准了执委会 10 月在日本名古屋做出的关于中国代表权的决议。国际奥委会批准了这个决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它的旗和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得到了恢复。中国将在奥林匹克竞技场上展示自己的实力，中国将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作出较大的贡献。

三、群众体育活动的全面发展

打倒“四人帮”后，群众体育得到了迅速全面的恢复，职工体

育日趋活跃，农村体育、国防体育活动在短时间内，有了很大发展，整个呈现出良好的态势。

（一）职工体育日趋活跃

“文革”中，职工体育活动曾一度畸形兴盛后很快跌入低谷。10年动乱结束后，随着整个国家形势的迅速好转，生产、生活正常秩序的恢复，职工又有了开展体育活动的强烈要求和愿望。1978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通过的《中国工会章程》中，规定各级工会“办好文化体育事业，组织好业余文艺体育活动”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内容。各厂矿、企业、机关在以工会为主，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和机构的协同配合下，全国性职工体育活动迅速开展起来。

为了促进城市职工体育活动的开展，1977年和1978年，国家体委相继举办了8城市工人足球比赛和12城市职工篮球比赛。1978年6月26日—7月8日，国家体委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了城市体育工作调查会，并于9月5日转发了《关于加强城市体育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要求“积极开展职工体育”，“贯彻业余、自愿、小型、多样的原则”，在厂矿、企业、机关、财贸、科技等各方面职工中开展以广播为主的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力争做到每天半小时体育锻炼。这个《意见》受到城市各机关、单位的重视和职工的积极响应，如天津市虽因受地震的影响，一些体育活动场地被毁、被占，但群众锻炼身体的积极性很高，有47万多人参加“天津—遵义”象征性长跑，跑完全程的达30多万人。据统计，全国有33560个工矿企事业单位建立了体育领导机构，配备专、兼职干部5.7万多名，成立1.15万多个体育代表队，近150万名运动员。贵州省有326个厂矿、企业、机关恢复和新建了体育机构，国防工业系统、铁路等单位还建立了体协或体育运动员会，有专业人负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3.1万多人参加了1900多个职工业余体育代表队。北京、天津、上海、四川、广西、辽宁、陕西等

12 个省、市、自治区体委，会同有关部门，对职工、干部做健康调查，搜集了 40 多万人的材料进行研究，提出要开展体育锻炼、增强体质、防止职业病等意见和措施。全国有许多工厂针对工人劳动特点，开展各种生产操、慢跑步等活动。就全国来说，职工体育活动已经达到或超过了“文革”前的发展规模和水平。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我国的职工体育也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上，职工体育活动能否做到群众性和经常性，成了检验各地职工体育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好坏的重要标志。

1979 年 2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了 7 个省、市、自治区 18 个工会的体育工作干部和火车头体育协会的代表的职工体育工作座谈会，规定了“必须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群众，贯彻普及和提高相结合，而以普及为主的方针，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和因地、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全国不少单位成立了体育领导机构，加强对职工体育的领导，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使工矿、企业、机关在体育干部配备和运动器材装备方面得以基本恢复，促进了职工体育活动的开展。

（二）农村体育活动的新发展

农村体育的发展是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1978 年 11 月 25 日—12 月 1 日，国家体委在黄陂召开了全国县级体育工作调查会，根据农村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体育工作的任务，经过充分讨论，制定了《关于做好县的体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应“积极有步骤地开展农民体育”。后来全国广大农村在传统节日，普遍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体育活动，很多社队在节假日组织体育比赛，随着党的农村政策的落实，农民人心顺畅，生活水准大大提高，体育活动呈现出勃勃生机。

由于农村的生产、生活、体育工作的基础差别很大，1979 年 3 月，国家体委在《关于加强群体工作的意见》中，强调了开展农

村体育活动“一定要分别情况，从实际出发”，仍然坚持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和勤俭节约的原则”。一些地区生活和体育工作基础好的社队，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运动队，利用业余时间锻炼和就近比赛；民兵组织把体育列入军事训练内容；各地开始提倡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民间体育活动；充分利用端午节、中秋节，组织小型体育表演和比赛。农村体育活动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普及面逐渐扩大。

（三）国防体育活动的较大发展

1973年，全国开始恢复“文革”初被迫停止的国防体育活动和训练。打倒“四人帮”以后，国防体育活动很快恢复到“文革”前的状况。1979年，为了备战国际国内大赛，国防体育活动和训练有了较大的发展。根据1978年、1979年全国体工会议精神，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国防体育机构，加强了领导。如湖南省17个地市体委中有15个配备了专职干部和教练员，有10个成立了军体科；江西省大部分县、市都成立了军体领导小组；辽宁省13个市、地体委也都成立了军体科，建立了11所军体类业余体校，有专职干部和教练员约400人。

国防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在逐步恢复中走向世界，并取得了新的发展。1978年8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射击队的董湘毅在布加勒斯特同罗马尼亚射击队女子小口径手枪慢加速射比赛中，以593环的成绩超过世界纪录；团体比赛以1766环的成绩超过了世界纪录。在第8届亚运会上，我国射击运动员共获8枚金牌、4枚银牌和7枚铜牌，打破了12项亚运会纪录、3项亚洲纪录。1979年8月1日，我国航空模型运动员敖维训、崔仁智在成都举行的第4届全国运动会无线电遥控模型直升飞机直线距离比赛中，以2854.77米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同年8月23日—9月2日，我国由13名运动员组成的跳伞代表团，参加了在法国夏特鲁机场举行的第3届世界造型跳伞锦标赛，获得3个冠军。

在一些有条件的省市和个别地区，建立了航空模型、航海模型、射击、无线电等项目的业余训练点，温州、宁波地区建立了摩托车训练点，浙江全省参加训练的约 2 万人。为结合开展群众性军事体育活动，有 2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海军制作了 14 种类型的舰艇识别模型 600 余艘。国防体育活动扩大了普及面，也为优秀运动员的培养打下了基础 [1]。

1982 年，国家体委对国防体育的管理体制和方针任务，作了根本性的调整，将国防体育完全纳入体育运动统一管理。从此，"国防体育" 便成了历史。

四、体育科技与体育教育的新局面

"文革" 中，体育科技处于完全停顿的状况，体育教育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文革" 结束后，在科学的春天到来的大环境下，体育科技工作得到了很快的恢复，体育教育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局面。

（一）体育科研组织管理与科研工作的恢复

体育科研在我国是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逐步建立起来的，尚处于初创阶段，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很大。打倒 "四人帮" 后，全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8 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提出了要 "大打体育科研之仗"，"体育要大上快上，科研必须先行" 的方针引起了体育界相当一部分人的共鸣。按照全国体工会议精神，国家体委开始筹建管理科技工作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体委和各体育学院逐步恢复和建立了科研机构。

1978 年 5 月 29 日，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加强体育科学技术工作的意见》，要求 "必须重视加强体育科技工作"。《意见》拟

[1] 秦笃训. 新中国 "国防体育" 始末. 体育文史，1997（3）.

定了 1978—1985 年体育科研的主要任务，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内体育科技工作也应侧重抓提高，并规定了抓好体育科研机构的建立、加强学术交流、建立体育学会和体育科学技术委员会、培养体育科技人员、保证科研经费等 6 方面的工作，为建立体育科研组织管理体系和科研协作交流打下了基础。

高校的科研工作恢复较快，并很快举办了科研学术活动。北京体育学院在 1977 年以后，院领导十分重视科研工作，修订了科研规划，调配了科研力量，增加了科研经费，购置了仪器设备，科研工作迅速走上了正轨；1978 年建立了科研处、综合研究室和体质教育教研室，并举行了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院科学报告大会。

西安体育学院于 1978 年 4 月 22 日正式建立了第三届学术委员会，由李一青院长任主任，郭俊卿教授等 4 人任副主任，委员 21 人中有学术水平较高的老教授和一批在科研工作上作出成绩的中、青年教师及各专业教研室的代表，学术委员会下设科研科作为办事机构。学术委员会成立后，为迎接省、市科学大会，经过积极筹备，自 5 月 26 日至 29 日举行了“文革”后首届学术报告会。报告会对全院科学研究工作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各教研室在会后都进一步充实修订了科研规划。在各教研室科研规划的基础上，学院于当年下半年向国家体委报送了 1978—1985 年重点科研项目，主要包括少年、儿童身体全面发展的教学与训练的研究（包括多年训练、跳高跳远训练、投掷训练、选材 4 个专题）；若干重点项目运动员的身体训练与技、战术训练（包括田径、足球、篮球、排球、体操、举重、摔跤等 9 个专题）；不同年龄儿童的生理形态机能及身体素质发展特点研究；髌骨软骨病中西医疗法；体育运动对增强体质和防治疾病的研究（包括太极拳等 7 个专题）5 个方面。当年还完成出版了《太极拳常识》《农村体育卫生》和《少年儿童体育游戏》等著作，开展了外敷一号伤药的成果应用推广工作。

为配合体育着重点的转移和侧重抓提高的工作，1979 年 5 月

7—15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 2 届体育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要求“要把体育科技工作放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上来，有一位领导分管这项工作”。要“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使之发挥应有的先行作用”。

会议对国家体委科研所、各体育学院、各地方体育科研所、解放军体育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体育系、各级专业运动队、解放军体工队等作了任务的分工和科研布局，并对研究领域和课题提出了建议，商请有关院校单位协作攻关。

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体委，总政文化部，各体育学院以及各体育科研所的有关负责人和科技人员，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新闻单位共计 110 余人。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副主任荣高棠出席会议并讲话。

与会人员认真学习和讨论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交流了科研工作情况和经验，介绍了国外体育科技动态。根据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精神，对今后一个时期体育科技工作任务、分工、布局和建立健全科研机构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6 月 11 日，国家体委下发了第 2 届全国体育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今后体育科技工作的任务以及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会议纪要提出，体育科技工作应为体育的普及与提高服务，实行专业与业余相结合，应用科学与基础科学研究相结合，当前任务与长远任务相结合。根据 1979 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的精神，今后一个时期内，体育科技工作也应侧重抓提高。

根据会议确定的 6 项任务，各省、市、自治区体委和解放军的体育科研机构进行了分工和布局。为实现当前任务和着眼今后的发展，会议明确要抓好体育科研机构建设、建立体育学会和体育科学技术委员会、加强学术交流、精选与培养体育科技人员以及体育科研经费的落实和使用等方面的工作。

这次会议后，我国体育科技工作者在围绕奥运会争金夺银的高水平运动员训练、体育基础理论和体育专业学科基础的研究方面，

有了比较明确的领域和方向，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一些学术水平较高和有较大应用价值的成果。

（二）对体育院、系调整的规划

1977 年，全国主要体育院、系招生工作开始恢复正常。为培养和造就大批的体育专业人才，适应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和体育运动攀登世界高峰的需要，1978 年 7 月 13 日，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认真办好体育学院的意见》的通知，对人才培养规格、专业设置、学制，以及教学、教材、科研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并提出了规划和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意见》要求：

各体育学院要以提高为主，兼顾普及，尽快为国家培养大批又红又专的体育师资、科研人员、教练员和其他体育专业人才，并应加强基础理论工作，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体育学院设置体育系。面向全国和地区的体育学院，主要培养中学的骨干体育教师和高等学校的体育教师；其他体育学院，培养中学体育教师。学制均为 4 年。

各体育学院还可根据需要和可能设置运动系，培养专项体育教师和教练员。

对培养的学生，除了有政治思想和道德作风要求外，对专业方面明确要求通过 4 年的专业学习，要能比较全面地、牢固地掌握体育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在主要术科中能有一项专长，具有从事体育教学和训练的能力，能担任主要运动项目的竞赛组织与裁判工作；掌握一门外语；了解与专业有关的科学技术新发展，并初步具有科学研究的能力。对运动系学生，在专项上应有较高要求。

为了培养高层次研究人才，尽快解决基层学校体育教师、业余体校专职教练员缺口较大的问题，要求体育学院积极创造条件，尽早举办研究班，招收研究生，培养一批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又红又专的人才，充实专业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师资。

同时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在集中力量办好体育系、运动系、研究班多为国家培养体育人才的同时，还要在当地教育部门和体委统一规划下，调配一定力量，采取函授、进修班、短训班、定期派出小分队等多种形式培训在职体育教师、教练员、干部和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的体育骨干以及积极分子。

为调动体院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保证他们正常的工作时间和生活待遇。《意见》还要求各体院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确有真才实学而用非所学的专业人才，要有步骤地进行调整。恢复教师的职称，根据德才兼备的条件，提升一批，并建立考核制度。要宣传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要安心终身做体育工作，要保证教师每周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教学和科研，切实组织好教师的进修提高工作，特别要采取各种措施帮助青年教师迅速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对成绩卓越的优秀教师，要予以表彰。

对于体院的发展，《意见》要求根据国家体委《二十三年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制订体院发展规划，努力实现以下奋斗目标：3年内，整顿提高，逐步恢复一些体育学院。办好重点体育学院，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打好基础。在本世纪内，争取实现周总理“每省市都要有一个体育学院”的遗愿。

《意见》对体院的各项工作，起到了很重要的导向作用。反映了在打倒“四人帮”后，寄希望于体院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愿望。

1979 年 3 月 14 日，国家体委下发《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充分发挥体育学院在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中的作用》的文件，要求各体育学院采取有力措施，大力提高教学质量，创造条件，逐步把体育学院办成教学、训练和科研的中心。

各体育院系根据国家体委的规划和文件精神要求，结合实际，着手发展规划的论证和制订工作，使体育专业教育有了明确的办学方向，为体育院系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大事记

1949年

9月2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48条规定"提倡国民体育"。

10月26—27日 新中国的第一次体育会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1届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改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通过了体育总会委员名单，并推荐冯文彬为主任，马约翰、吴蕴瑞、徐英超、荣高棠为副主任，荣高棠兼秘书长。

1950年

7月1日 《新体育》杂志创刊。毛泽东主席为杂志题了刊名。朱德为《新体育》题词："提倡国民体育"。

1951年

11月24日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公布和推行第1套广播体操。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教育部、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青年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青联、全国学联9个单位发出《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联合通知》，决定从12月1日开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体操口令和配乐。

1952年

2月5日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致函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决定参加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声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体育组织。

6月10日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2届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为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6月24日 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在北京成立。

7月29日—8月7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括游泳、篮球、足球队）40人由团长荣高棠率领参加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因我代表团受阻迟到，仅游泳运动员正式参加了第15届奥运会的游泳比赛，足球队和篮球队未能正式参加比赛。

11月8日 华东体育学院在上海成立（1956年改名为上海体育学院）。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体育学院。

11月15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并任命贺龙为主任，蔡廷锴为副主任。

1953年

4月27—30日 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各大行政区体委负责人会议。贺龙主任在会上指出，今后体育工作的主要方针是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

6月30日 毛泽东主席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号召全国青年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8月9日 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中国25岁运动员吴传玉以1分8.4秒的成绩夺得男子100米仰泳冠军，在国际体育比赛中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

9月1日 中南体育学院在南昌成立（1955年迁至武汉，1956年改称武汉体育学院）。

11月1日 中央体育学院在北京成立（1956年改称北京体育学院，1993年改称北京体育大学）。

1954年

1月1日 人民体育出版社成立。

1月8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的指示，指出：现在的人民健康状况还远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为了改善这种情况，除了加强卫生工作和逐步改善劳动、学习等条件外，开展体育运动确是一种最积极的有效的方法。同时指出："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3月10日 西南体育学院在成都成立（1956年改称成都体育学院）。

5月4日 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公布"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的暂行条例和项目标准。中央体委、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青年团中央、全国学联等单位发出关于在中等以上学校中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联合指示。"劳卫制"的项目标准分为少年级、一级和二级3个级别，并分年龄段，主要包括田径、举重和射击3个项目。

5月14日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合法地位，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第49届会议上得到了确认。

6月11日 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中央体委发出关于开展学校保健工作的联合指示。

7月27日 中央体委公布和推行第二套广播体操。

9月1日 东北体育学院在沈阳成立（1956年改称沈阳体育学院）。

9月20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4条规定："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

西北体育学院在西安成立（1956年改称西安体育学院）。

9月28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名，通过了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人选的决定，贺龙兼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11月1日 国务院任命蔡廷锴、蔡树藩、卢汉、黄琪翔、荣高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1955年

1月6—15日 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1955年体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并研究了建立体育协会和推行“劳卫制”等问题。

1月19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关于开展职工体育运动暂行办法纲要”。

6月20日 国家体委下达关于积极开展暑期学生体育活动的通知。

国家体委决定在《新体育》杂志上开展对体育工作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7月4日 国家体委、青年团中央、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在青年中开展国防体育活动的联合指示。

10月2—9日 全国第1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体育运动大会。毛泽东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分别为运动会题词。运动会设有田径、举重、自行车、篮球、排球、足球等比赛项目，来自全国各产业工会的1700多名运动员参赛，并在田径、举重和自行车项目中创造了3项全国最好成绩。

10月21日 北京体育馆落成。

11月19日 国家体委公布和推行第一套儿童广播体操。

1956年

1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公布了1955年的102项全国纪录。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公布全国纪录。其中，78项是在1955年创造的，18项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其他年份创造的，只有6项是在旧中国时创造的。

1月30日 高等教育部下达《一般高等学校体育课试行教学大纲》，要求组织体育教师学习研究，1956年暑期后正式试行。

2月1—7日 北京体育学院举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体育科学讨论会。会议报告和讨论了体育理论、生理卫生和田径等方面的论文。

2月16日 高等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青年团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领导、进一步开展一般高等学校体育运动的联合指示。

6月7日 在上海举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上海市联队同来访的苏联队的举重比赛中，陈镜开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成为新中国打破世界纪录的第一人。

11月11日 陈镜开在广州以135公斤的成绩，打破了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

1957年

4月1日 《中国体育》（英文版）杂志创刊。

5月1日 在广州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泳表演赛上，戚烈云以1分11.6秒的成绩打破男子100米蛙泳世界纪录，成为我国第一个男子100米蛙泳世界纪录的创造者。

11月17日 在北京田径赛场上，郑凤荣以1.77米的成绩打破由美国运动员M.麦克丹尼尔保持的1.76米的女子跳高世界纪录，成为我国第一位打破世界纪录的巾帼英雄，也是自1936年以来亚洲第一位打破田径世界纪录的运动员。

1958年

2月25日—3月11日 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会议充分讨论了国家体委提出的《体育运动十年发展纲要》，要求大力普及体育运动，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3月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体育之研究》一文。该文系毛泽东所著，署名"二十八画生"，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杂志。

8月19日 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关于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断绝关系的声明。声明指出，国际奥委会在少数人操纵下，蓄意违反自己的宪章，在承认了中国唯一合法的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之外，竟又承认台湾的所谓"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另一个中国奥委会，不顾中国奥委会多次抗议，图谋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中国奥委会严正声明，不再承认国际奥委会，并同它断绝一切关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由于同样理由，退出国际游泳、田径、篮球、举重、射击、摔跤、自行车联合会及亚洲乒乓球联合会8个国际体育组织。

9月1日 《体育报》创刊。

哈尔滨体育学院成立。

9月18日 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成立。

9月19日 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体委党组《关于体育运动十年规划的报告》。批语中指出："体育运动的根本任务是增强人民体质，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体育运动的方针是"大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在体育运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提高技术水平，不断地创造新纪录"。

10月4日 广州体育学院成立。

10月25—29日 国家体委根据国务院全体会议第81次会议批准，发布"劳动卫国"体育制度条例和项目标准。

11月1日 南京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成立。

1959 年

1 月 1 日 北京运动医学研究所成立。

4 月 18 日 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体育工作中，应当贯彻执行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发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逐步提高我国的体育水平。"

4 月 28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任命贺龙兼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9 月 13 日 第 1 届全运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宋庆龄、董必武副主席、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和越南胡志明主席出席了闭幕式。本届全运会共有 7 人 4 次打破世界纪录，664 人 844 次打破 106 个单项全国纪录，数以千计的运动员刷新了省、市、自治区的各项最高纪录。

1960 年

3 月 1—7 日 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体育学院中国体育史编写与开课座谈会。

3 月 14—18 日 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全国体育科学工作会议。会议听取了近几年来体育科学工作发展情况和 1960 年体育科学研究发展规划的报告，交流了经验，进一步明确了体育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及今后努力方向。

3 月 20 日 国家体委发出关于建立各级各项国防体育俱乐部的通知。

4 月 6 日 教育部和卫生部发出关于在各级学校中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和加强体育运动的联合通知。

4 月 20 日 国家体委、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在青少

年中广泛开展田径运动竞赛的联合通知。

5月25日 我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和屈银华成功登上海拔8882米（当时的高度）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创举。

11月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在广州成立。

1961年

2月28日 我国最大的一座能容纳1.5万名观众的工人体育馆建成。

3月6—15日 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北京、上海、西安、武汉、沈阳、成都6个体育学院院长座谈会。会议讨论了编写体育院校教材问题，成立了体育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

4月4—14日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中国男队获团体冠军，女队获团体亚军；庄则栋和邱钟惠分别获得男女乒乓球单打冠军。

12月5—20日 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鼓足干劲，继续前进。陈毅副总理在会上作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认真做好体育工作的报告。

1962年

5月10日 国家体委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练员等级制度》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练员等级制度的说明》。

5月30日 国家体委公布《各项运动全国最高纪录审查及奖励制度》。

10月10日 国家体委公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等级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裁判员等级制度》和《田径、自行车、体操、举重、技巧、游泳、跳水、速度滑冰、花样滑冰、水球、冰球、滑雪、射箭、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网

球、手球、棒球、垒球、登山、射击、无线电收发报、无线电通讯多项、无线电测向、摩托车、航海多项、摩托艇、航海模型、滑翔、跳伞、航空模型等项运动员等级标准》，并决定从 10 月 15 日起在全国施行。

1963 年

11 月 10—22 日 第 1 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 14 个项目的比赛，获得 66 个第一名、56 个第二名和 46 个第三名，13 人 17 次打破 16 项全国纪录，2 人 2 次打破 2 项世界纪录。

1964 年

6 月 30 日 毛泽东主席为《体育报》题写报纸名字。

7 月 23 日 国家体委发出《关于开展游泳、射击、通讯、登山四项活动的指示》。

8 月 19 日 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体育运动委员会、卫生部《关于中、小学学生健康状况和改进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报告》。报告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必须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能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真正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1 月 22 日—12 月 1 日 第 1 届全国体育科学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与会者 126 人。会上报告了有关运动训练、体育教学、运动生理和运动医学等方面的科学论文 109 篇。

1965 年

1 月 11 日—2 月 11 日 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会议在贺龙副总理亲自领导下，学习了 1 月 12 日毛主席对“徐寅生同志对国家女子乒乓球队的讲话”的重要批示，结合体育工作的实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会议指出，必须坚决贯彻普及和

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大力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在体育运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不断地创造新纪录。重点项目要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1965 年要首先集中力量开好第 2 届全国运动会。

9 月 11—28 日 第 2 届全运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出席开幕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出席了闭幕式。本届全运会共有 24 人 10 次打破 9 项世界纪录，331 人 469 次打破 130 项全国纪录，数以千计的运动员打破了大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项运动最高纪录。

1966 年

7 月 16 日 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并对陪游人员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7 月 28 日 国家体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级体委进一步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开展群众性游泳活动。

10 月 《新体育》杂志从 277 期停刊。

11 月 2 日 《体育报》从 998 期停刊。

人民体育出版社停止出版图书。

11 月 5 日—12 月 10 日 第 1 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在柬埔寨金边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一行 311 人由团长黄中率领参加。我国举重运动员陈满林于 11 月 26 日以 118.5 公斤的成绩打破他本人保持的轻量级推举的世界纪录；肖明祥于 11 月 27 日以 158 公斤的成绩打破次轻量级推举的世界纪录。

1968 年

5 月 12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命令，对全国体育（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实行军事接管(1979 年 2 月中央批准撤销"五一二命令")。

1969 年

6 月 9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在北京逝世。

1970 年

3 月 31 日 毛泽东主席在接见 8341 部队驻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出操这办法很好。增强体质，锻炼身体。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太少，要半个小时。工作时间当中可以出来活动活动，搞搞广播操。

1971 年

1 月 29 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国家体委有关领导同志，就中国乒乓球协会同日本乒乓球协会会谈和我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本参加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作了重要指示。

3 月 19 日—5 月 6 日 由团长赵正洪率领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行 60 人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5 月 30 日—7 月 30 日 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7 月 8 日 中央任命王猛为国家体委革命委员会主任。

11 月 3—14 日 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在北京举行。叶剑英、李先念、郭沫若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周恩来总理出席了闭幕式。来自亚洲、非洲 49 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1972 年

3 月 16 日—4 月 3 日 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5 月 4—7 日 亚洲乒乓球联盟筹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亚洲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代表团。会议宣布成立亚洲乒乓球联盟。

6 月 14 日 国家体委下发《关于纪念毛主席“7·16”畅游长

江6周年》和开展夏季游泳活动的通知。

9月3—13日 国家体委在四平市召开5省（四川、安徽、陕西、辽宁、吉林）、2市（北京、天津）三小球会议。会上交流了开展小篮球、小排球、小足球活动情况，研究并拟定了三小球的场地、器材规格和竞赛计划。

10月 《新体育》杂志从本月起复刊。

1973年

9月18日 亚洲运动会联合会执委会会议在泰国曼谷召开。会议通过决议，确认我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该联合会会员。

11月15—16日 在德黑兰召开的亚洲运动联合会理事会特别会议上，以压倒的多数批准执委会决议，确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该联合会会员。

12月25日 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执委会通过决议，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为该联合会会员。

1974年

1月1日 邮电部发行一套《体操运动》特种邮票，共6张。

《体育报》从1月1日复刊，公开发行。

1月5日 （1973年12月14日—1974年1月5日）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

8月8日 邓小平在接见我国参加亚运会的队伍时说："毛主席向来主张，体育方面主要是群众运动，就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就是群众性问题。当然，这就是广泛的群众体育运动。体委应该主要在这方面要搞好。"

1975年

5月5日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体委公布《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条例》，开始在全国施行。

5月27日 中国登山队队员潘多（女）、索南罗布、罗则、桑珠、侯福生（汉）、大平措、次仁多吉、贡嘎巴桑、阿布钦9人，于北京时间14时50分从北坡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

9月12—28日 第3届全运会在北京举行，朱德、邓小平、李先念、陈锡联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朱德、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出席了闭幕式。在这届全运会上，共有1队4人6次打破3项世界纪录，2人2次平2项世界纪录，49队83人197次打破62项全国纪录，4队36人144次打破58项全国青少年纪录。

10月16—26日 全国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共182人参加。

1976年

6月22日—7月1日 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竞赛改革调查研究座谈会。

6月25日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台湾省体育联络处在北京成立。

12月13日 国家体委下发《关于开展冬季体育锻炼》的通知。

1977年

11月30日—12月10日 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座谈会，修订《全国体育科学技术规划（草案）》。

12月27日 国家体委下达颁发《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证书证章的通知。

1978年

1月22—30日 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400余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体委召开的代表性最广、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会议揭批了“四人帮”的罪行，讨论了体育事

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重大措施。

5 月 29 日 国家体委下发《关于加强体育科学技术工作的意见》。

6 月 5 日 国家体委下发试行《体育运动全国纪录申请及审批办法（草案)》《裁判员技术等级制度（草案)》的通知。

7 月 11 日 国家体委下发关于试行《运动员技术等级制度（草案)》的通知。同时下发田径、游泳、举重、速度滑冰运动技术等级标准。

7 月 13 日 国家体委下发《关于认真办好体育学院的意见》的通知。

9 月 5 日 国家体委下发《关于加强城市体育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9 月 8 日 国家体委下发《射击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1979 年

2 月 12—28 日 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40 人参加。到会同志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了体育战线如何转移工作重点，讨论修改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具体安排了 1979、1980 两年的体育工作。

3 月 29 日 国家体委、教育部联合相继发出《全国学生体育运动竞赛制度》《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章程》《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和《关于在学校中进一步广泛施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意见的通知》。

9 月 8 日 中国参加在墨西哥举行的第 10 届大学生运动会，陈肖霞获女子 10 米跳台跳水冠军，这是中国运动员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赢得的第一枚金牌。

9 月 15—30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4 届运动会在北京举行。本届运动会共有 34 个比赛项目，共有 5 人 5 次破了 5 项世界纪录；

2人3次破3项世界青年纪录；3人3次平3项世界纪录；36队203人376次破102项全国纪录。

10月5日 国家体委、教育部联合发出《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和《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并通知试行。

11月26日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穆罕默德·姆扎里在洛桑宣布，国际奥委会经过全体委员的通讯表决，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批准了执委会10月在日本名古屋作出的关于中国代表权的决议。国际奥委会批准了这个决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它的旗和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

主要参考文献

[1] 伍绍祖.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综合卷）.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

[2] 袁伟民，李志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地方卷）.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

[3] 体育史教材编写组. 体育史.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 国家体委. 体育运动文件汇编（1949—1981）：精华本上册.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

[5] 林伯原. 中国武术史.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4.

[6] 黄汉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科技发展史.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7] 荣高棠. 当代中国体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8] 基拉宁. 我的奥林匹克岁月.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

[9] 钱江. 小球转动大球“乒乓外交”幕后. 北京：东方出版社，1979.

[10] 中国体育年鉴.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

[11] 董守义. 奥林匹克与中国·奥运会与中国.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12] 任海. 奥林匹克运动.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13] 新体育（1950—1978）. 北京：《新体育》杂志社.

后 记

经过3年的努力，《中国体育通史》第五卷的撰写工作终于画上了句号。原国家体委的领导、体育界资深专家和教授给予了热心而严谨的指导，审查修订了编写提纲，对书稿中涉及的一些可能引起争论的重大问题，以及撰写的体例等，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使我们得以避免一些疏漏和错误。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参阅了相关的专著、论文和资料，我们对获得辛勤劳动成果的作者，由衷地表示感谢。对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体育系统各相关单位的领导、工作人员等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书由广东华南师范大学的邓星华博士、教授撰写（1949—1956年）第一章；山东鲁东大学的傅砚农教授撰写（1957—1966年）第二章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第三章；陕西西安体育学院的陈彦教授撰写（“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1976—1979年）第四章。傅砚农教授完成了对全书的统稿修订工作，并梳理了本卷覆盖时间的大事记。